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开 国 总 理 周 恩 来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为《开国总理周恩来》序

刘海涛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崛起的时代。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和助手的周恩来，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人们心中矗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辉煌形象成为历史进程中为数不多的几位伟人之一。

周恩来同志鞠躬尽瘁、坦荡一生的光辉业绩，深得人们的敬佩和爱戴。大家早就盼望能看到由国内自己人撰写的周恩来传记。现在，力平同志所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出版了。他以准确、可靠、翔实而生动的材料，记述了周恩来才智过人、气度非凡的一生。特别是作者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展现建国以后、作为共和国总理的伟人风范。这正是广大读者所最需要了解的内容。我读了这本书，很受启迪。应作者的要求，为此好书写几句话，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崇敬。

我仰慕周恩来的英名，是从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开始，当时我在陕北从事革命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就同周恩来同志有所接触。建国后，我不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得以常见周恩来同志。后来，我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正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的。所以，平时的工作接触和往来就更多了。我在中央书记处任候补书记的时期，也经常见面和聆听他的工作指示。一九六六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决定我任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临去西安前，我找总理给予指示。当时他带着沉重和焦虑的心情向我介绍了国内经济形势的严峻困难状况。然后，他着重作了三点指示：一是要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二是要搞好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三是要发扬延安精神，关心人民疾苦。这简短而切中要害的谈话内容，至今仍铭刻在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周总理工作最艰难的十年。他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无端诋毁和蛮横刁难的逆境中，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气魄，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竭智竭力挽救国家，保护革命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我在西北局将面临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即亲拟电报，深夜报请毛主席圈阅后，急速致电西北局和“造反派”，明确指示：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完全清楚的。从而遏制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斗。当“造反派”将我秘密裹胁到北京时，周总理、陈毅同志非常关心，指示有关部门给予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后来，我在狱中被囚禁八年，心中一直忧虑着我们国家会不会堕入崩溃的深渊，正是因为有周恩来等一批老领导作为中流砥柱，支撑局面，才使国家免于大难，也才会有后来的重大转折。

周总理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全党学习的楷模。他那种虚怀若谷、特别突出的自我批评精神，更应成为全党学习的典范。当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的端正党风、反腐倡廉的工作中，我们更应当向周总理学习，认真贯彻毛主席倡导的、我党特有的“自我批评”精神。

在这本书里，还反映了周恩来同邓小平同志五十多年的深厚情谊。二十年代初，他们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又同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共同学划中国革命。五十年代，周总理因反对冒进而有离职的可能，政治局极力挽留，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拟写纪要，送毛主席圈阅的。七十年代初，毛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复出，也是周总理等同志努力的结果。一九七六年的

“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呼唤邓小平，这是人心所向。当前，我们正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一读《开国总理周恩来》，可以了解一些周恩来同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长期探索如何振兴中华，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思想。也可以帮助我们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理解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决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读《开国总理周恩来》，可以体会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隽才，可以便人们启发心智，扩展胸襟，也有助于学习和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一九九五年二月

开国总理周恩来

写在前面

在江苏省淮安市的周恩来故居内，悬挂着一幅题词，上有四个大字：“全党楷模”。

这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10月29日到此瞻仰时题写的。

诗人臧克家写过一首诗：

“你会觉得心的太阳
到处向你照耀，
当你以自己的心
去温暖别人。”

他认为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周恩来“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很少想到自己，处处时时关心别人，体贴入微，感人动人。”

这样的认识和感觉，并不是个别人的，也不只限于中国人。美国记者白修德，1939年在抗战中的重庆与周恩来相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1972年。在30多年中，他同周恩来的交往，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完人。”

很多党外人士，包括外国友人，当年都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成功。抗战时期，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有的朋友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和妻子玛莎·盖尔虹访问中国，在重庆会见蒋介石，宋美龄和很多国民党知名人士，并秘密会见了周恩来，他们在回忆中写道：这个国家最杰出的人恰好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唯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

周恩来是一代楷模，首先在于他全心全意地、无私地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正如有的人说：“周总理的英名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他的一生为着民族的兴旺鞠躬尽瘁、英勇斗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劳苦，在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在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国际事务中，总理以博大的胸怀，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创业者，将永远为人民所崇敬。”

阳翰笙称之为“千古中华一巨人”。

周恩来诞生于中国濒危、民族挣扎于灭亡线上的忧患中，成长于救国救民的斗争中。

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间，遭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和压迫，几次面临被列强“瓜分”或被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灭亡的

臧克家，《三见周总理》。

白修德：《探索历史》。

胡康民：《周恩来的统战风格》。

吴雪：《“青艺”，在总理关怀下成长》。

危险。从 1845 年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胁迫上海道台宫幕久订立《上海租地章程》开始，到 19 世纪末，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我国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汉口、九江等 16 个城市占有“租界”，京城北京则有划归帝国主义特权统治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控制着中国的铁路、航运、海关等命脉。这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过许多侵略战争。1840 年到 1842 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这些战争的结果，都使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进一步加重，除被烧杀劫掠外，还要割地赔款，缔结不平等条约。近代中国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贫穷、衰弱、落后、四分五裂，奄奄一息。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抗争，是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开始的，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想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但是不成功。辛亥革命达到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但是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才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

西方曾经把中国说成是睡着的巨人。现在巨人醒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美国有的领导人说：二十世纪是中国饱经世界上最沉重苦难的世纪，但“沉睡的巨人已经醒来”，她正准备迈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主要大国的行列。

为了救国图存，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周恩来付出了大半生的时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是 51 岁。

国外的学者写文章说，中国 1949 年以前的百年时期可以概括为求存的时代，即致力于民族的救亡图存；1949 年至 1976 年可以概括为求强的时代，即致力于民族的独立自主；在此以后的时代，根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思想，以及这 10 年多来的大政方针和措施，可以概括为力求富的时代，即致力于民族的脱贫致富。当然，这样的区分法，并不很科学，因为 1949 年后中国不但强了，比之旧社会来说，中国的贫困状况也有所改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以求人民日益富裕，也与谋国家的强盛不可分，而就周恩来来说，1949 年到 1976 年，他既为中国的强，也为中国的富，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全部心血。

周恩来的一生，在新中国建立前，可以说是为立国而奋斗，无论是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他都作出了杰出的不朽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全部心力为建国而奋斗。17 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进入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部心力进行保国，使我国濒于崩溃边缘的经济而终于没有崩溃，政治上历经艰险而终于转危为安。保国期间也有建国，建国期间也有保国。终周恩来之世，贫穷残破的旧中国已经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西方的学者也认为：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七十年代，中国已经经济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之列。“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以周恩来担任总理的 26 年计，从 1949 年到 1975 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粮食由 2264 亿斤增加到 5690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译本第 540—541 页。转引自沈庆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几个问题》。

亿斤，棉花由 890 万担增加到 4762 万担，钢增长 50 倍，煤增长 15 倍，电增长 45 倍半。钢、煤、电三项，同恢复时期最后一年 1952 年相比，也分别增长 18 倍、7 倍和 27 倍。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中国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现在已经建立起许多新的工业基地。1964 年我国有了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后来又取得了氢弹、远程导弹的试验成功，有了自己制造核潜艇和核电站、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等科学技术成就。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工业技术落后和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的状况，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国后的 26 年间，建立起了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所必须的强大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

新中国的成立和建国后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到如此规模，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性功绩，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奋斗的结果。其中，周恩来居于显著的位置，创建了丰功伟绩。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抗战时期在重庆，美国《纽约时报》名记者怀特询问周恩来：“你是以中国人身份为重，还是以共产党员身份为重？”周恩来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当然以中国人的身份为重。”

1946 年国共和谈中，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徐永昌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说是原规定三人小组内任何提议都要三方同意才能进行，但如果国共双方争执不休，问题就难以解决，因而提出国共双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时，由美方仲裁，也即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周恩来听到这话，站了起来手指着墙上挂着的孙中山肖像，气愤他说：“徐部长，当着孙中山先生的像，我问你：我们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仲裁？”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如果中共方面提出要请苏联人仲裁，则我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周恩来声色俱厉，义正辞严，使徐永昌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从周恩来身上可以深切地看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他热爱中国，献身中国。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强盛，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为之奋斗终身。

周恩来为之奋斗终身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他为了人民而努力创建新中国，他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可以获得自由幸福的生活。

基辛格说周恩来是杰出的历史人物，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

田中角荣说周恩来：“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有的人想起周恩来亲切的笑容、风趣的语言、洒脱的风度，感到面前“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思维敏捷、精力超凡”。

有的人怀念周恩来善于听取对方的意见，照顾对方的处境，调查研究，注重现实，平易近人。

有的人说，周恩来“那卓越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不能不令人惊叹。他的话富有鞋力，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周恩来的高大形象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位有着无限爱的人”。

有的人说：周总理就是这样的领导者，他总是一身承担艰难的任务并为克服困难而斗争，总是把功劳归于别人、从不居功自傲。

要说周恩来的功绩和感人之处，可以说上成百条、成千条，成百条、成千条可能还不能表达周恩来的全貌。但是在周恩来身上最激动人心、最使人经久不忘的是什么？恐怕是他与人民的感情，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出了丰功伟绩而从不居功，成为领袖人物而仍然自居普通一员在人民之中；他关怀所有的人民，平等待人，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一次，“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天，在全国政协礼堂的电梯前，一群人等电梯。电梯门开了，最前的一人刚把前脚迈进电梯，就听见开电梯的服务员轻轻说：“您稍微等一会儿，总理来了。”人们回头一看，周恩来正从几步之外走来。这人立刻把脚抽回来。人们想，任何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这样做的。但是，周恩来迅步走到电梯门口，问电梯服务员：“为什么让别人退出来？”人群中的最前一人赶紧为服务员开脱：“不赖他，是我看见您来了，想请您先上。”周恩来说：“不可能！人的眼睛都不能长在脑后嘛，怎么能看到背后？”他又转向服务员说：“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当总理，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能要别人给我让开？”这时，周总理身后的邓颖超上前轻声低气地指着周总理说：“你们知道吗？他的大名叫周恩来！小名才叫总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就是不能让他到了哪里，就叫哪里的老百姓立刻让开……”由于这一情况，周恩来不愿坐电梯了，要走，最后还是人们共同提出一项“折衷”的建议，大家一起乘坐，周恩来才同意了。电梯里，人们的身子紧挨着周恩来，心连着心。

又一次：1957年5月12日午夜一点。周恩来总理招待泰国艺术团的酒会结束了。周恩来送走了客人们，又回来和中国的青年演员们围在一起，谈得很热烈。谈着谈着，他看了看酒阑人散的会场，向演员们说：“你们住在哪里？”“剧院的宿舍，在史家胡同。”“远吗？”“不太远，我们每天排戏都是走来走去。只要15分钟。”“走吧，到你们的宿舍去，去看看。”周恩来含笑说。演员们一下愣住了，不知怎么来接待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怎样来表示内心的激动和欢迎的心情，又想到时间已经很晚了，总理的身体不是太累吗？但是，周恩来已经迈步领先走下了楼梯。走到大门口，汽车为周恩来开过来了。周恩来却摆了摆手，问道：“你们怎么走？”“我们走着回去，您上车吧！”演员们说。“不，我陪你们一道走吧！”“不，我们每天走惯了，好像是锻炼身体。”“我也锻炼锻炼，散散步。走吧！”这样，在

夏梦：《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时刻》。

渡边弥荣司，《夙愿和理想》。

李世济：《三件事》。

深夜里，静悄悄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人，年轻的演员们簇拥着一个心地十分年轻的人。他们像一家人，像父亲和儿女们，一边走，一边亲切地说笑，谈工作，谈演戏，谈生活，也谈其他想谈的问题。大家压低了声音，怕惊吵了路边住户中已经熟睡的人们——在这一群人的后面，远远地尾随着一辆空着的汽车。夜风飘着路边槐花的清芬，温煦地吹拂着每个青年人的心。

这就是周恩来，他有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心和关心着普普通通的干部和群众的真挚感情，他对人不看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胸怀博大，心中只有人民，为人民而无私奉献，到了忘我的境地。

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大每逢谈到周恩来，总是眼中闪烁着泪花讲起一件事：1946年1月，周恩来从延安坐军用飞机去重庆。飞机经由陕西秦岭上空时，进入冷气团，机翼结冰，飞机处于危险状态，机长叫乘客全部系好救生的降落伞，大家纷纷做好跳伞的准备。但是同机的叶挺女儿11岁的叶扬眉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不由得哭了起来。周恩来知道后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降落伞让给叶扬眉。冈崎嘉平大说：“若是别的事，只要注意到了，我想我会按照周总理的高尚风格行事的。但像救生衣这种事，如果真的碰上了，我能不能做到呢，我曾多次们心自问，却未能作出肯定的回答。”

另一位日本朋友说：如果让我列举所尊敬的历史人物和现在活着的人士，那是不胜枚举的。知道某人业绩辉煌，思想卓越，品德高尚，便尊敬那个人。但是，虽然尊敬，而要说到令人心醉或倾倒，却不敢苟同。尊敬的人比较多，但心醉的人就为数有限了。周恩来是“真正的超人”，“真使我心醉如痴”。

为什么周恩来使国内国外那么多人“心醉或倾倒”呢？

因为他如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那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这样的人，在中国可以作为楷模的，有雷锋、焦裕禄、周恩来等。

有一位外国友人说：“我羡慕中国人民有这样杰出的领导人。”

还有一位外国友人则说：“周恩来属于全世界。”

梅阡：《春》。

渡边弥荣司：《夙愿和理想》。

上篇

三个母亲的抚育

周恩来曾经说：“我算是浙江绍兴人。”这是按照旧中国传统的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而这样说的。

在浙江省绍兴市的劳动路50号（原名宝桔桥河沿），有一座前后三进的砖瓦平房。这是一所明代建筑，在大厅前端，挂着一块匾额，中有三字：百岁堂。据考证，这是周氏的祖先，明代周懋章的王氏夫人，年高百岁，皇上所赐的匾额。

绍兴周氏的始祖周茂，字元泊，是元朝进士，官至左丞相，封沂国公。周懋章是他的十一世孙，是周恩来的前十世祖。现在，百岁堂已成为绍兴市的一个胜迹，不少中外人士前来瞻仰。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迁居淮安，先是给县官当师爷，到晚年才得任山阳知事。他有四个儿子：贻庚、贻能、贻奎、贻淦。按照当时封建大家庭的叔伯兄弟大排行，分别为者四、老七、老八和十一。周贻能后来改名周劭纲，字懋臣。娶妻万氏，是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第十二个女儿，小名冬儿，大家称她为十二姑。他们居住在淮安城内驸马巷和曲巷相交的一个宅院内。

1898年3月5日（农历2月13日），万氏十二姑在这里生了第一胎男孩，取名大鸾。大鸾五岁那年，进家塾学习时，取学名恩来，字翔宇。这就是后来的历史伟人周恩来。

周恩来不满一岁的时候，十一叔（父亲的四弟贻淦）病重。为了给病人和新嫁来的十一婶陈氏以安慰，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想把周恩来过继给十一叔、婶为子。这要征得万氏的同意。万十二姑慨然允诺，为了挽救小叔的生命，把大鸾抱给了十一婶。陈氏含着感激的泪水，接过了婴儿，为他请了一个很好的乳母——蒋江氏。

这样，周恩来有了三个母亲，生母、过继母、乳母，三个母亲，都用伟大的母爱，对幼年周恩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心血。

万氏妈妈是万青选最喜爱的幼女，虽然不识字，但从小常随为官的父亲外出，见多识广，十分能干。周攀龙去世后，大伯周贻庚在奉天一个衙门里当“主稿”（中下级职员），收入有限，对家庭支持不多。丈夫劭纲在外作点文书之类的工作，无钱养家。两个小叔，贻奎是残废，贻淦不久夭亡。整个大家庭，就靠万氏来支撑。万氏未出嫁时就主持万府家务，婚后掌管了周家这个败落家庭的全部事务，平时周家经济上入不敷出，要典当借贷；亲朋好友的婚丧喜庆、送往迎来，要出面应酬；大家庭内和亲戚间有了矛盾，要调解纠纷……这些，全靠她操心。在处理这些家政事务的时候，她常喜欢把大鸾带在身边。她性格开朗直率，处事精明果断，给童年时代的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过继母陈氏是另一类女性。她出身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陈源是个秀才，饱读经史，很有学问。陈源没有儿子，对女儿尽自己的才学来进行教育。陈氏温文好学，爱好诗词、戏曲、小说和绘画，涉猎了广泛的中国古典文学读物。丈夫去世后，她把小恩来当作唯一的精神寄托和生活希望。小恩来三四岁的时候就跟她读书写字，五岁以后跟她学唐诗宋词，熟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篇。陈氏经常给他讲故事，而他是更喜欢听故事的，因而他从小就常常听到陈氏母亲讲述《西游记》、《窦娥冤》、《天雨花》、《再生缘》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很强的故事。

乳母蒋江氏是一个 20 多岁的劳动妇女。丈夫是一个轿夫。她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在用乳汁哺育小恩来成长的过程中，同时用自己的言行向他灌输了劳动人民的朴素的、诚实的感情。例如，她给他讲大米饭的来历，从捂稻种到着大米，要经过十几道关口，一关过不好，就吃不上大米饭。又讲，瓜菜是怎样从地里种出来的。院子里有一块半亩地的小菜园，蒋妈妈招呼得它四季常青，蔬菜不断。春天有黑菜、青蒜，夏天有茄子、辣椒，秋天栽黄芽菜，冬天长菠菜。小恩来常跟着蒋妈妈在这块小菜园里种菜、锄草、浇水、捉虫。一次，他在花坛里埋了一粒瓜子，天天浇水，盼它出苗，可就是不见苗长出来。他去问蒋妈妈。蒋妈妈说：傻孩子，现在是冬天，要春天种才行呀！到春天，蒋妈妈带他在花坛里种了几棵南瓜，果然出苗了，后来结了几个大南瓜，小恩来高兴得不得了。

小恩来在三个妈妈的爱抚下成长着。

周恩来曾经回忆说：“我的母亲（万氏）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母亲在 35 岁时即患肺病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周恩来是很富感情的人，他对几个母亲都有深厚的感情。1918 年他在日本求学时，1 月 2 日，是陈氏去世十周年忌日，周恩来为了纪念，一个人在宿舍里诵读陈氏生前所写的诗作遗墨，然后含泪焚香，静坐哀悼。1920 年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运动中被捕，羁押期间，他还写了《祭娘文》，寄托对母亲的怀念。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蒋妈妈到天津去探望他。周恩来留蒋妈妈在天津住了五天。临行时，他请伯父替蒋妈妈买了船票，并送他几十元钱。他知道蒋氏是持斋吃素的，还专门让她带上一只吃饭用的瓷缸和一条毛巾，在路上用。几十年后，周恩来已担任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他在接见从家乡来的当地负责人时，仍是关心地问起这位蒋妈妈，怀念这位亲爱的乳母。

当然，周恩来的童年，并不总是文静地坐在屋子里，捧读着书本的，也并不总是跟着几位母亲在一起的。他同其他的儿童一样，有儿童的天地，有儿时的伙伴，也有淘气的时候。周恩来谈过：

小时候，我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满巷吆喝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从文渠划到河下去，叔母等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看见我们划船回来了。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了一下，差一点跌倒。我很害怕，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惩罚！可是叔母半句话也没有责怪我，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刷刷地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儿童时期的生活，在周恩来脑海里保留着很深的印象。1950 年，他曾对来北京看望他的万家表哥谈起童年时代喜欢的一种游戏：放鸽哨，表哥教会他做一种小型哨子，拴在鸽子身上，当鸽子飞去的时候，迎风发出悦耳的哨音。当哨音由远而近时，就知道鸽子飞回来了。

1960 年，他曾向淮安县来京的领导人谈起过童年生活的一些情景：“小

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呐！”

建国以后，故乡淮安的父老乡亲多次请周恩来回去看看。周恩来点了点头，不无感慨他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有一回，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梦见自己在文渠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棘手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放放风筝……”

逝去的久远岁月，是使人向往的，周恩来在这块泥土上出生、成长，他忘不了童年的岁月。1960年，周恩来在上海开完会，准备回故乡淮安一次。正当这时，毛泽东来电要他赶回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预定的回乡打算没能实现。当飞机从上海起飞赴北京，经过淮安上空时，周恩来紧贴机窗，眷恋地俯瞰着这块，故乡大地。

尽管周恩来没有时间回到淮安，但淮安时刻在他心中。1952年，建国之初，我国举行第一次戏曲会演。上海人民淮剧团的彼文艳、何叫天在北京怀仁堂演出《千里送京娘》、《种大麦》两出小戏。演出结束，周恩来到后台同演员一一握手。当他听到彼文艳的口音时，立刻黑眉一扬，亲切问道：“你是哪里人呀？”

“江苏淮安人。”

“噢，那我们还是同乡呢。”周恩来高兴地说：“你老家在城里还是在乡下？”

“在乡下，东乡车桥。”

“车桥？不错。小时候我和家里人去赶过一次庙会，是从涧河坐小船去的。”周恩来说：“你回家过没有？”

“我五岁离家，20多年了，还没回去过。”

周恩来慨然说：“我老家在淮安城里，也几十年没有回去了。你如有机会回去，代我问乡亲们好。”

1965年7月，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回来，途经新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看望由内地到新疆支边的青年。他问招待所的一个服务员是什么地方人。

“淮安的。”这位白上衣、蓝布裤的短发姑娘回答说。

“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十分高兴。

“我叫李正兰。”

“是木下加子李，正大光明的正，花木兰的兰？”

姑娘点了点头。

周恩来笑了：“到底是老乡的话听得懂，我都猜对了。你是淮安城里的还是乡下的？”

“是北乡钦工的。”

“什么时候到新疆来的？”

“1959年支边来的。”

“噢，六年了。你想家吗？”

“有时想。”

“是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我离家已经 50 多年了。”周恩来伸出五个手指比划着。然后他鼓励这位姑娘安心新疆建设，尊重兄弟民族，搞好团结，展开了广阔的胸怀：“新疆和江苏都是好地方。你看，石河子的天和我们淮安的天不都是一样的蓝吗？”

尽管祖籍绍兴，周恩来儿时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也还是在他的惦念之中。1939 年 3 月，周恩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顺道到浙东抗日前线视察，曾经坐了当地的乌篷船到祖坟去扫墓，并且给故乡的人题了“中华终竟属炎黄”的诗，鼓励他们要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鼓励他们坚持抗战，直到胜利。当他经过轩亭口秋瑾就义处时，他吟着“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说秋瑾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是一个先驱者。他给表妹王去病题字：“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1973 年，王去病到北京，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她提到这个题字，说：“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注意，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否定历史的时候。

周恩来所受到的母亲的抚育，不止是上述这三位母亲，还有三位伟大的母亲：祖国母亲、民族母亲、时代母亲。她们用悠久美妙的文化、辉煌灿烂的历史、先进的思想和杰出的人物以及他们优秀的品格，抚育着周恩来的成长。

正如有的朋友所说，周恩来“是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以及解放前的动乱中产生出来的伟人”。

这也是从淮安开始的。

淮安是人才荟萃之地，文化昌明之乡。周恩来写道：“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江淮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青莲岗文化，就因首次发现于淮安青莲岗而得名。五千多年前，中国人民的祖先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春秋末期，吴王夫差称雄江南，为了北上中原与晋国争夺霸主之位，在公元前 486 年开筑邗沟。古邗沟南起扬州以南的长江北岸，向北穿越高邮湖、宝应湖、白马湖，折向东北入射阳湖。再折向西北，到淮安的未口，进入淮河。邗沟开成之后，吴王夫差就举兵北上，大败齐国军队，然后挫败晋国，当上了霸主。

周恩来诞生的时候，这里叫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辛亥革命后三年，山阳县改为惟安县。山阳（或淮安）的名称，由来已久。东晋义熙七年（公元 411 年），这里设立了山阳郡和山阳县。隋朝改山阳郡为楚州，州治仍在山阳县。南宋改楚州为淮安军，元朝改淮安军为淮安路，明朝、清朝均称淮安府。历代的郡、州、府、路、军的领导衙门都设在山阳县。清朝的康熙皇帝还曾到这里巡视过。所以可以说，这里是历史上一个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要中心。在漕运时期，这里又是一个十分繁荣的都会，是经济重镇和交通要津。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淮安出过不少著名人物，汉三杰之一韩信是淮安人。现在淮安还有漂母祠。韩信早年，有两件传诸千古的事，一件是在他落魄的时候，河边漂洗丝絮的妇女看他饿得可怜，常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韩信表示将来要重重报答她。漂母说：我看你像个大丈夫，却不能养活

秦九凤：《乡影·乡音·乡情》。

中岛宏：《周总理和冈崎嘉平太》。

自己，是可怜你，哪里想你报答。韩信深感惭愧，从此发愤自强。另一件是他带剑上街时，一个无赖对着韩信说他是胆小鬼，不敢杀人，如果韩信不敢杀他，就叫韩信从自己的胯下爬过去。韩信考虑了一下，果真从他胯下爬了过去。后来，韩信解释说：“我当时不是不敢杀他。杀他没有理由，还要受秦法处置，所以我忍了。”

苏东坡对此十分赞赏，在《淮阴侯庙记》中说韩信“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壮图”，故能“受馈于漂母”，“忍耻于胯下”。

南宋的抗金英雄梁红玉，是淮安人。她同丈夫韩世忠率领七千士卒，抵挡金兀术率领南下的数万精兵和几百艘战船；把金兵堵截在黄天荡里整整48天，金兵凿开老鹤河故道，才得逃生。后来，韩世忠和梁红玉乘胜追击金兵，来到家乡楚州，大修淮安城池，以淮水为界，抵抗金兵，与岳飞的军队相互呼应。“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周恩来小时候晚上听蒋妈妈讲梁红玉打仗的故事，常听得不想睡觉。

抗英名将关天培，也是淮安人。他在任广东水师提督期间，正逢林则徐到达广州，开展禁止鸦片烟的运动。关天培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林甚引为知心，时共议堵御”。关天培命令水师严加巡查，截住了企图躲避的鸦片船22艘，收缴鸦片168万多公斤。林则徐把这批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这是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为准备迎敌英军的进犯，关天培改建旧炮台，增筑新炮台，添造大炮，在近海设置铁链、木排，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1839年11月4日，英军挑起穿鼻洋海战，关天培挺立桅前，持刀督阵，打败了英军。此后十多天，双方连续战斗六次，每次都以英军的失败而告终。英军在虎门不能得逞，就掉头北上，占领定海，直指天津海口，威胁北京。清廷恐慌，投降派乘机攻击禁烟派。惊慌失措的道光皇帝派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琦善裁减兵船，拆除铁链、木排，让英人随意活动。1841年1月7日，英军大举进攻，关天培壮烈战死，遗体运回淮安，现在淮安城内建有关天培祠堂。

至于文人学者，淮安也是人才辈出。汉赋的创始人枚乘，是淮安人。他的代表作《七发》，想像丰富，气势宏伟，排比铺张，比喻形象，有极大的感染力。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是淮安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来，是淮安人。他曾经描写古淮安城的坚固形势：“鼓角凌虚雉堞牢，晚天如鉴绝秋毫。山川摇落霜华重，风日清明雁字高。”文学名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现在淮安还保留着吴承恩写《西游记》的院落，小他旁矗立着吴承恩的塑像。《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淮安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最后定居淮安。其他如唐代诗人吉中孚、赵嘏，明代才人瞿佑，朴学大师阎若璩，经学大师丁晏，扬州八怪画派的高手边寿民，笔记散文家阮葵生，都是淮安人。近代名人如吴昌硕，祖籍是淮安；李公朴，生于淮安。科学技术方面，也出现过不少人才。

地灵人杰，在这些淮安籍的对民族和人民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中，不少是对少年的周恩来有深刻影响的。有一次，小恩来在听了关天培的故事以后，就缠着陈氏要去看关天培祠堂。周恩来在瞻仰关祠时肃然起敬，仿佛看到了关天培统率水师，身受数十创而不退的英勇场面。他恭恭敬敬对关天培的塑像鞠了一躬。1939年春，他到浙江绍兴时，正是抗战烽火四起的年代，周恩来还向人谈起了关天培祠内林则徐所撰的一副对联：

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 壤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周恩来在童年时代，曾在淮阴岳飞庙中看到一首题咏岳飞的诗。后来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在学校的《敬业》学报上发表的《飞飞漫笔》中，忆叙了这首诗：

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热泪洒英雄。

奇冤不恨埋三字，和虏终惭失两宫。

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马付秋风。

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照红。

周恩来诞生的年代，正是中国濒临被列强分割瓦解，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国仇家难，伴随着他的童年。

周恩来出生的前四年，发生了甲午战争（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结果是清廷战败，按照日方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联合德、法，迫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1897年，沙皇政府出兵占领旅顺、大连，德国武装占领山东的胶州湾。接着，法国强行“租借”广州湾，英国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德国把山东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把福建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到周恩来出生这一年（1898年）中，中国沿海的重要港湾——旅顺、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为帝国主义列强攫夺；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周恩来两岁的时候，英、俄、法、美、意、日、德、奥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城（1900年8月14日）。在这中国的文化古都，帝国主义军队奉命“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据翰林院编修叶昌炽记载：“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据英国人记载，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是死人。”在周恩来三岁时，帝国主义列强同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1901年9月9日），中国实际上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周恩来出生后的六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帝国主义战争，结果日本夺得辽东半岛南端沙俄占领的大连、旅顺和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这时，还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的侵略，进占拉萨。

这时候，在中国的知识界中，开始涌现新的革命潮流。周恩来五岁时（1903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陈天华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大声疾呼：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不准我们自由。”“我中国虽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必须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也是这一年，邹容写了《革命军》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在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他们开始策划武装起义。1905年兴中会同华兴会、光复会等建成中国同盟会，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统治，选孙中山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在这国家多难，革命声高的日子里，周恩来的家庭正频道不幸。在他五岁（1903年）的时候，家况越来越破落，生活越来越窘迫。到六岁，万氏妈妈就带着全家搬到清江浦外祖母家居住，并让周恩来进万氏家塾读书。这时，

外祖父万青选早已去世，万家也面临着离析和衰败。大家庭中，矛盾重重，因而只住了一年多，万氏又带着他们搬出来另辟新居，请了一个先生教孩子们念书。这样过了三年，当周恩来九岁的时候，万氏母亲由于穷病忧愁而去世了。父亲在外谋生，没有能够回来同她见最后一面。

万氏去世后，一直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过继母陈氏抚摸着周恩来说：“大鸾，我也活不长了。”这年夏天，陈氏带小恩来到宝应的娘家去了一趟。陈氏的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人，她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堂兄住在宝应。堂兄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陈家，周恩来结识了他的二表兄陈式周。

陈式周比周恩来大十多岁，毕业于江苏南通的通州师范学校，具有新知识，当时在宝应当私塾教师。周恩来在这里居住的一二个月期间，从陈式周那里得到不少新的思想，时间虽然不长，两人间却有了很好的友谊。后来，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陈式周在上海的《新闻报》任编辑，周恩来和他的一些进步同学所写的宣传学生爱国活动的文章，大多是通过陈式周代为联系，转送有关报刊发表的。周恩来去法国留学，1920年10月离天津到上海等候船只，曾到陈式周家道别，交谈很久。周恩来到法国和英国后，曾经给陈式周多次写信，诉说襟怀。如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给陈式周的信中说：“来书语重心长，读之数遍，思潮起伏，恨不与兄作数日谈，一倾所怀。”就是在这封信中，周恩来阐述了自己对英、俄的观察比较。他说：“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说为有力矣。”“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为总理，十分繁忙，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少年时代曾经支持过他的陈式周。他曾经委托江苏省有关部门在宝应、扬州一带寻找陈式周的行止，可这时陈式周已经去世了。

在宝应住不多久，过继母陈氏的病日益沉重了。他们又回到淮阴。很快。陈氏就去世了。一年中，生母、过继母相继去世，父亲须在外地谋生，生活上山穷水尽了。1907年的秋冬之交，落叶纷飞，西风萧瑟，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在人们的冷落和白眼中，坐船回到淮安。在这里，他靠着借贷和典当度日，拿着母亲的一点遗物，走进当铺，向高大的柜台上递进去，永远不可能再赎出来，用得到的一些钱，维持自己和弟弟的生活。后来，他的表舅龚荫荪，早就听说周恩来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就建议周恩来到自己的家塾“寄馆”，也就是依附人家读书。周恩来高兴地接受了龚家的好意，早出晚归，有了新的学习生活。

龚荫荪原来是服膺康梁维新派的思想的，后来成为孙中山的信徒。他到过日本，认识一些同盟会的成员，当时属于革新派的人物。周恩来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社会知识。龚荫荪给周恩来讲鸦片战争的故事，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回答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当时政治时事问题，使周恩来的幼小心灵中，明白国家的沦丧和社会的不平，滋生出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思想萌芽。龚荫荪请的家塾老师周先生，是个落第秀才，学识很好，人也比较开明，家中藏书很丰富，使周恩来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条件，周先生教周恩来的，固然仍旧是四书五经，但周恩来也有机会阅读其他的历史、文学读物。周先生

的书法很好，他教导周恩来临摹字帖。周恩来的书法风格，就是在周先生的指导下定型的。

对于这一段生活，周恩来在 1952 年曾经对龚家的一个表姐妹说过：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可见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这一段生活，约有两年时间。后来，龚荫荪要离家远行了。他走后不久，龚家全家搬走了。周恩来失去了这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1910 年春天，周恩来十二岁那年，他的伯父接他到东北。先是到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作事的堂伯父周贻谦家寄居，后来移居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的伯父周贻赓家。从此，周恩来永久地离别了淮安。

周恩来说过：“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

国破山河在，中华崛起心

“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漏瀑，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

“吾己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一个老汉在东北的大地上行漫步，口里吟咏着，在他身旁，是少年周恩来。

这里是东北辽宁沈阳郊区的魏家楼。

1910年，周恩来在奉天省银州堂伯父周贻谦家中寄居时，进当地的银岗书院读书。秋天，搬到在奉天府的伯父周贻赓家时，进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读书。1911年暑假，周恩来随同学到奉天南郊的魏家楼。这个同学的祖父，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老人，在乡间办私塾。他带领周恩来观看了六年前这里发生的日俄战争的战场。

沙皇俄国对于中国东北部的垂涎和侵略，由来已久。1897年，沙皇政府出兵强占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辽东半岛和整个东北实际上落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之下。1904年2月，日本舰队进击沙俄占领下的旅顺口，沙俄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就在东北的大地上进行。战争进行了一年零七个月，结果是日本占有旅顺、大连，东北的南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北的北部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魏家楼是当年的主战场之一。村东的烟龙山成了一片火海，魏家楼的所有房屋被烧成灰烬，不少中国的老百姓惨死在战火中。帝国主义间争夺宰割中国，遭难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周恩来站在当年的战场上，望着经过炮火浩劫的遗迹，倾听当地农民的血泪控诉，加深了中华民族危亡之感。

他满怀悲愤地唱起当年流传的一首歌曲。歌名叫《何日醒》。歌词中说：“辽东半岛风云紧，强俄未撤兵。呜呼！东三省，第二波兰错铸成。哥隆克队肆蹂躏，户无鸡犬宁。日东三岛，顿起雄心，新仇旧恨并。舰队联樯进，黄金山外炮声声。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

国破人亡的现实，深深烙在少年周恩来的心坎里。40多年后，周恩来已是国家总理，在同几位艺术家洛汀、李默然等谈到一个写日军侵略东北的话剧时，还问：“你们谁看过一本小说叫《旅顺口》的吗？”周恩来说：“我看过这本小说，写得不好，光写中国人的愚昧，什么留长辫子，吸大烟，怎么能这样表现中国人。”

中国人，是有志气的；中国人，是能自强的；中国人，要复兴国家和民族。周恩来后来曾经说到，自己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自觉起来参加革命的。

在学校里，周恩来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周恩来说：“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反对中日军事协

定等爱国活动。”

1912年10月，周恩来在学校里写了一篇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其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那？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那？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那？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周恩来提出了，为了将来担负起振兴中华的“艰巨之责任”，应当在学校中奋勉学习，打好基础。

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当校长在课堂上问学生为了什么而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3年周恩来十五岁的时候，因为伯父周贻质的工作变动，周恩来也随之搬到天津，住在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二号。平房三间，住处狭窄。他在这里补习功课，8月，考上了天津南开中学。

天津是我国华北的大商埠，西卫北京，东扼渤海，是海上门户。但是这门户早已被打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军队多次侵犯天津，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霸占了租界，海河上游大着帝国主义的军舰。列强的侵略、政府的辱国、人民的贫困，震撼着周恩来的心。

在天津，近代工业在这里已经兴起，新式教育也居于比较先进的地位。南开中学是四年制的学校。周恩来从1913年8月入学，到1917年6月毕业，学习了整四年。1957年周恩来陪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天津，在全市高等学校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我每次来至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便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南开中学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它的创办人严范孙、校长张伯苓是爱国教育家。一进校门，左壁悬挂着一面长方形大镜子，供学生自己照着端正仪容。镜子上端镌刻着“诤诫之言”：

面必净 发必理 衣必整 钮必结
头容正 肩容平 胸容宽 背容直
气象 勿傲 勿暴 勿怠
颜色 宜和 宜静 宜庄

周恩来一生，十分注意仪表，接见中外人士，总是彬彬有礼。衣服尽管旧，甚至补过，但总是十分整洁，当年的学校教育是起了作用的。

南开中学是私立学校，学杂费很贵。周恩来的伯父是长芦盐运司的一个科员，收入微薄。伯母用线编织些钱袋、自行车把套、墨盒袋之类来换钱，其他就没有收入了。周恩来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学校抄写教学材料或刻蜡板挣些钱，暑假期间常留在学校作些教务准备工作，筹备下学期的费用。就这样，他已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老家的两个弟弟连出来求学都不可能。学校的伙食费每月四块九角，周恩来为了省钱，不在学校入伙，常从家里带点酱菜，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42页。

梁吉生：《张伯苓先生与周恩来总理》。

在外买点主食就着吃。夏天只有一件白大褂，要星期六回家去洗，星期天再穿回来。由于他家庭困难，而又品学兼优，后来学校同意他成为唯一的免费学生。

周恩来的学习成绩突出，“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1916年5月，三年级二组默国文，周恩来名列最优者中。同月，全校国文特试，十一个班二百多人参加，周恩来得第一。他的行书很好，全校习字比赛，他名列行书优胜中。1916年班级考化学，周恩来名列最优者中；班级考代数，名列得足分中。全校笔算赛速，十九个班六百多人参加，最优者四十八名。周恩来又在其中。

周恩来在这里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并且接受着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熏陶。他不但学业优等，而且课余活动也十分丰富。他的表现和兴趣是多方面的，而其中贯穿着一根红线，就是要奋发向上，振兴中华，复兴危殆中的中华民族。

他在南开中学作过一次演说，题目是《中国现时之危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呜呼，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也那！然而国诚危矣，吾党青年，际此时势，知之可，欲奋起而救之则力有未足，恐谦让未遑。故吾今日之言，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这一段话，也可看作周恩来在学生时代的主旋律。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辛亥革命之后，清朝政府推翻了，号称“中华民国”的共和国建立了，但是很快就是袁世凯窃国。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9月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朱执信等，接着又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侵占济南车站、青岛，四个月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直到中国政府在政治、军事、财政上都须聘日本人为顾问。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1915年，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为中华帝国皇帝。1916年，蔡锷在云南组成护国军，誓师讨袁。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接着，开始了北洋军阀混战的时期。

生活在这样黑暗的年代，外敌侵袭，内政腐败，军阀横行，国无宁日。周恩来在南开读书，一方面对各部门功课精进钻研，成绩优越，另一方面目睹时艰，爱国心切，忧国忧民，见诸言行。

他在作文《尚志论》中说：“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并且提到了“探新大陆的哥伦布”、“竖自由旗之华盛顿”、“闻鸡起舞之刘昆”、“击揖中流之祖逖”。说明他当时的立志，已不在私而为公，为人民为民族而发愤。

他在作文《多难以固邦国论》中说：“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安南之役，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役，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

日。”“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纓，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对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与卖国，周恩来指出：“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要“使帝制罪魁尽诛，余党悉斥”。

1915年6月6日，天津各界人民在河北公园召开天津救国储金募款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抵御外寇”、“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周恩来发表演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指出“我国民之热血亦是可洗今日之羞”。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提出“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

综观周恩来一生，不大作诗，但并不是他不善作诗。他的诗隽永深醇，的为上品。现在流传下来的他的几首古体诗，都属南开时期的。诗如其文，诗如其人，他的诗篇，也反映着周恩来的同样的心情。

春日偶成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这是迄今见到的周恩来最早的诗，发表在1914年10月《敬业》杂志创刊号上。此时正当袁世凯暗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勾结帝国主义，打败了“二次革命”，废各省都督，神州大地硝烟迷漫，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灾难之中。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

（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

扞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依拙，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寥天。

惟有交游旧，临歧意怅然。

这首诗发表在1916年4月出版的《敬业》第四期上。周恩来的同学好友张蓬仙1915年11月退学回故乡吉林，别离时，周恩来赠诗三首。第一首回顾了同学生涯，情意深切；第二首深深惜别，也回顾在校时文字相交，聚短离长；第三首表彰了好友在校的成绩，高度评价他像大雁起飞，将进入新的生活。三首诗在抒情叙旧之中，仍有“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句，道出了为国为民的志向，相互鼓励。正如李大剑所写的“铁肩担道义”，

《南开星期报》第49期。

周恩来：《本社之责任观》。

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对世对民的慷慨承诺。

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这首诗发表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敬业》第五期上。这年，袁世凯死后，安徽督军张勋为了打击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力，在九月间召开徐州会议，勾结各地军阀，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订立北洋军阀攻守同盟，策划复辟帝制阴谋。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师张皞如9月28日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掷报流涕，写成《伤时事》一首：“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孤客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周恩来因而作上边这首诗和他，并在演说中抨击：“试问督军何人，徐州何地？乃竟有十三省联盟之事，自力盟主，干涉宪法，取消国会，改组内阁，排挤总长，甚而至有废；日约法之议。”这首诗蔑视张勋一伙军阀似秋虫，而遥测祖国大地，将起风云。

大江歌罢掉头东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诗是周恩来1917年夏在南开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前所写。这首诗反映了周恩来出国留学，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将来，而是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满怀豪情壮志，追思留日学生陈天华蹈海而死的精神，欲为祖国而“破壁”、“济世”。

周恩来在校中学舞剑时，还曾同王朴山共同吟作一首诗：

华年惜绿鬓，午夜啸青锋。学道雄心淡，观时热血浓。无成惭画虎，有待爱潜龙。

诗思飞何处？云山几万重。

后来，他们二人同到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周恩来还曾笔录梁启超的《自励》诗赠王朴山。

献身甘作千矢的，著述求为万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

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南开中学允许学生自由结社组织团体，周恩来同张蓬仙、常策欧三人发起创立了“敬业乐群会”。这是一个全校性组织，参加的同学很多，有二三百人。成立过程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周恩来，但在选举时，周恩来坚持推张蓬仙为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自己任智育部长。常策欧后来曾对他的孩子们讲：“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不争名，不争位，吃苦受累在前，享受荣誉在后的美德，并将之贯彻始终于其整个一生的工作之中。”敬业乐群会的目的，是敬所业，乐群众，共同爱国，它的成立宣言中说：“青年为斯世将来之主，学者乃领导标新之人，况生值学道将绝之国，大厦濒倾之邦，则吾辈后生责任，不更加重大耶！”敬业乐群会办有《敬业》刊物（后改为《敬业学报》）。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忧时爱国的文章，周恩来也有很多作品刊载在上面。除了《敬业》之外，南开中学还有一种刊物《校风》，总编辑也是周恩来。《校风》上也刊载有不少青年周恩来的重要著作。

南开中学有新剧团（话剧团）的组织，每年校庆时演出。周恩来参加了，他担任布景部副部长。当时，男女还不能同校，南开没有女生，演出没有女

演员，大家就推周恩来担任女角。周恩来认真练习，演出很成功。特别是1915年演出《一元钱》，非常动人，盛况空前，轰动一时。这次演出后，周恩来等到北京，已经成名的梅兰芳还专门邀请他们座谈。

邓颖超曾经说：“周恩来同志是话剧的提倡者。”周恩来为什么致力于新剧？他是这样想的：“夫中国今日所急者，人民之贫极矣，智陋矣，衣食所迫，大都不足为求学之需”，那末，要“感此昏眼，化此愚顽”，用什么办法呢？应该进行通俗教育。而要进行通俗教育，就要依靠新剧。新剧可以使“民智开”，“民德进”，“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列强之林，亦意中事”。他认为新剧是有关“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事。他不但演新剧，而且编写新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南开中学的功课很紧。周恩来在校中，对学习非常努力，同时对体育锻炼也很重视。各个班都有足球队、篮球队、田径队等，班级与班级、宿舍与宿舍之间，常有比赛。周恩来所住宿舍四个人就同另宿舍的四个人进行过田径和篮球对抗赛，结果是田径获胜，得“我武威扬”奖旗，篮球输给了对方。

在南开中学毕业后，1917年7月，周恩来到北京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靠同学和师友的帮助，他筹集到一笔费用。行前，他到奉天探望又调到那里做事的伯父，并且到沈阳母校同师友话别。他为同学郭思宁题写的临别赠言是：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过去同中国一样，也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但是明治维新后却强盛起来了。他们实行的是军国主义。从他们的富强，是否可以思考中国今后该走什么路呢？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于知识界。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周恩来到东京后，曾住在中迁区矢吹町金岛建筑工具店二楼，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小房间。当年送洗衣服的孩子长岛英雄说：屋里摆着一张床，屋子中间有一个方火盆，周恩来经常在火盆前读书。“每逢我送完衣服回家时，他都很礼貌他说上一句‘谢谢’，反而弄得我难为情了。”教师元木省吾说：大正七年（1918年）7月29日，路上遇到周恩来，同车，那天的日记上写着，“坐在我面前的是中国留学生周恩来君。他同我谈了很多有关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情况。他是去年来日本的，日语讲得相当不错。但时而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他提议用英语交谈。可我的英语很蹩脚，最后只能在笔记本上用笔谈，反而交谈得更投机了。他说，休假时要回天津，并讲到中国的现代文和中国的辞书，最后还谈起了日中亲善。”这应该说是当年的宝贵记载了。元木省吾还保留着周恩来的名片，已经泛黄，右上角用铅笔写了“东京神田高等预备校”，左下角小字印刷着“翔宇”。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是一所主要以教中国留学生日语为目的的学校，当时三分之二的旅日中国留学生都在这所学校学习，周恩来在这里上过学。

当时在东京，有一个“新中学会”，是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留日

1983年9月6日，在南开中学的讲话。

周恩来，《吾校新剧观》。

梶谷善久，《留学日本时的周恩来》。

学生为主组织起来的爱国组织，这组织在东京牛迂区鹤卷町 112 番租了房子作活动地点，叫“新中寄庐”。周恩来在 1918 年春夏之交加入了“新中学会”，搬入“新中寄庐”，和十多个同学伙住在一起，“炊爨洒扫皆自为之”，轮流值日作饭，每周聚会一次，讨论国际形势，交流学习心得。周恩来常到神田区北神保街的“中华青年会馆”阅读日文报纸和书刊，还经常阅读国内寄来的《新青年》、《南开思潮》，每天读书、阅报十三个半小时，休息和处理其他事三个半小时，七小时睡眠。

当时，日本政府对华采取高压政策。外务省表面上欢迎中国留学生，实际上却对留学生在日本的政治活动严加防范，禁止他们集会，一旦发现，警察立即干预，常发生拳脚相加的暴力事件。一般日本国民也蔑视中国人，骂中国人是“清国奴”。1918 年 5 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将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留日学生群情激愤。他们举行抗议集会。周恩来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亲自起草了学生救国团体的组织条例。在 1918 年 5 月 7 日东京《日日新闻》上有一则报道。

在京支那人留学生连日来时有不轨举动，……昨天下午一时许，约 700 名学生在神田区北神保町 10 号民国中央青年会馆集合，密闭室门，严禁警察和其他日本人出入，似在讨论何事。……更有 40 名干部集合于同区今川小路 1—4 维新号支那料理店楼上，饮酒并激烈论争不休，致使神田署数十名警官赶到现场，……

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曾采访过周恩来的神近市子说，那时中国留日学生约有 4000 人，在他们中间，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大人物”了。周恩来被认为是这次集会的领导人。

周恩来在旅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周恩来是想救国，要尽力社会的，日本强盛了，周恩来在国内时曾想军国主义是否能够救中国呢？到日本后他看到军国主义的日本，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占国民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劳动人民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现实告诉周恩来，“军国主义必然是扩张主义，一定要被推翻的。”他说“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据周恩来的好友张鸿诰回忆：在南开学校他同周恩来讨论救国问题时，他主张实业救国。周恩来认为要从教育入手，改革政治。所以，周恩来到日本留学，报考的是政治科。同学潘述庵写信劝周恩来到美国约翰学校去求学，经济上可以得到补助。周恩来谢绝了，认为那是教会学校，在那里学习对我国现实没有帮助。周恩来留在日本研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结果是使他感到渺茫和失望。

怎样才能救中国呢？

1918 年 7 月到 9 月，日本发生了“米骚动”，广大劳苦人民起来进行反

王永祥、刘品青：《为了中华之崛起》。

陈子来，《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2 月 20 日。

抗斗争，形成了强大的运动。这场风暴席卷日本全国，虽然后来被日本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周恩来从中看到了日本人民群众的力量。

这时已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思想涌入日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反映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在书店里可以买到。周恩来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研究了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对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也读过。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出刊后，周恩来是热心的读者。周恩来在彷徨、苦闷之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

1919年4月，周恩来来到樱花盛开的岚山时，写了两首白话诗：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处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濛；
一线阳光穿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仅人工，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些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以后“将何所恃”？

这首诗，表达了周恩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心头的喜悦和振奋，也反映他从日本“米骚动”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指出反动统治者今后“将何所恃”。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1919年4月，他离开日本，回到中国。

三五四健将

周恩来回国时，正是1919年五四前夕。不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起来了。周恩来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是以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而得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9年前三年，在思想上启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并随着五四爱国运动而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关于时限分界，很多学者的倾向是这样的：从1915年到1919年初称为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至6月的群众运动称为五四爱国运动；从这以后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仍称五四运动时期。台湾学者如汪荣祖认为：“‘五四’既是一爱国运动，也是一新文化运动，我们便应照顾到‘五四’的双重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说：爱国运动若无新文化发生的背景，也许不会如此激烈（扮演主要角色的学生便是新文化‘产品’）；新文化运动若无爱国运动的刺激，也许不会那样盛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主要的阵地是《新青年》。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第一卷叫《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宣战的对象是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那时周恩来正在南开学校上学。他看到过《新青年》，他的思想事实上也接受着反帝反封建的影响，但是他对这本杂志却没有引起很多的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1917年在去日本途中，他身边有一本《新青年》，在船上翻着看看，觉得很喜欢。到日本后，他借到一本《新青年》第三卷全份，拿回宿舍中看，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后来，他在日本感到找不到救中国的道路，心中极端苦闷，又把《新青年》第三卷找出来读，感到心头豁然开朗。

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的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借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二月十一日的“三个主义”是什么呢？二月十一日是这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他写下了新的一年要：“第一，想要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恩来原来写诗，写的是旧体诗；五言、七言都有。从这以后，他写起了新体诗。这不能说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起到了使人们解放思想、唤醒良知的的作用，为五四爱国运动

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卷首语》。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9日。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5日。

打下了思想基础。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会上，中国和日本同属战胜国一边，但列

强却不是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权益还给中国，而是转让给日本，并胁迫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字。消息传来，全国愤怒，首先起来的是北京的青年学生。

五月四日，北京的学生喊出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决心“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日，天津学生起而响应。十四日，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谌志笃、马骏为正副会长。周恩来作为校友，天天到南开去，全力参加运动。学联会成立后，马骏拜访了周恩来，诚恳地邀请他主办机关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说：“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学生会报，我愿和大家共同努力。”

6月3日，北洋政府成百名地逮捕在北京街头进行爱国演讲的学生。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纷纷起来支持北京学生。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数千人的爱国运动大会，通过六项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这一天，上海开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到10日，这一势态扩展到南京、厦门、宁波、松江、镇江，苏州、常州、无锡、扬州、芜湖、杭州、天津、济南、汉口、广州等地。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惊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

10日，北洋政府被迫免去曹汝霖的交通总长、章宗祥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市制局总裁职务，被捕学生也陆续释放。接着，拒签和约的运动又成为一个高潮，天津各界派出马骏、刘清扬等十人作为代表到北京请愿。周恩来到车站送行，跟大家一起吟唱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名句。

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7月21日，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在这之前，周恩来在《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说：

“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可以说很不希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为着这个时期感受这种潮流，本我们的良心，实在是不能不有个觉悟。因着这个觉悟，就生出许多的举动。”

他宣布，这张报纸要“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

周恩来用这张报纸为阵地，议论时事，唤起民众。1919年7月，日本宪兵在山东济南、青岛等地逮捕中国人。山东各界数千人到省政府请愿示威，北洋政府宣布山东戒严，任命马良为戒严司令。周恩来在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说：“日本人对山东的九条决议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国民啊！黑暗势力，越来越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马良在山东对爱国运动进行镇压，枪杀“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天津各界联合会发通电要求北洋政府严惩马良，解除戒严。天津学联和

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

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于6月8日打给北洋政府的电报中的话。

女界爱国同志会派刘清扬、郭隆真等 10 人进京请愿。在天津，马骏、周恩来等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消息。夜色初上时，电话铃响了：赴京代表和北京代表一起到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时，遭到军警拘捕。周恩来立即撰写文章，出版号外，唤醒千家万户。他和马骏等商议发动学生分批进京，请愿示威。进京的请愿学生遭到军警驱赶毒打，现场总指挥马骏等又被捕。周恩来赶紧和张若茗等率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开展营救活动。在全国舆论的一致声援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全部被捕代表。

在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商议，把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分子，组成一个团体。这就是后来的“觉悟社”。

1919 年 9 月 16 日，觉悟社在天津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中成立。这也是“五四”运动史上永垂史册的事情。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创立了“新民学会”，李大钊在北京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集中了天津市优秀青年的代表。参加者有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男女同学各十名，体现着男女平等。开会了，大家推举周恩来为主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预先征询过大家意见的方案，决定这个团体称为“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对于社会一切生活取评论态度；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同演讲！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出版的刊物，叫《觉悟》。在第一期上，周恩来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中说，觉悟社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

“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

觉悟社的社员对外不用姓名，而用抽签的方法，决定每个人的号码，再用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周恩来抽到的是第五号，谐音“伍豪”，这便是他后来又名“伍豪”的由于。

觉悟社是个什么性质的团体呢？后来有的学者把它写成是革命团体。邓颖超对这点有不同意见。她曾回忆觉悟社说：“这个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她认为：当时的觉悟社内，思想还比较杂，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她同意称之为进步团体。

不过，从觉悟社的核心人员如周恩来等来说，是靠近马克思主义者的。在 1919 年夏秋，李大钊的世界观已经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 1919

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11月出版的第六号上，连载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在觉悟社成立后第五天，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觉悟社邀请李大钊到天津来宣讲马克思主义。讲演会后，又请李大钊到觉悟社进行指导。周恩来向李大钊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束缚，男女同学在一起组成团体，以及出版《觉悟》等，非常赞许，还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文章。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周恩来在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时，就提出以“革心”“革新”精神为主旨。成立觉悟社时，又提要本着“革心”、“革新”精神。在出版《觉悟》刊物时，首先提出了“思想改造”这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命题。

这一思想内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到过，他说：“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是在1919年9月。

李大钊的这个思想，是他认真思考后的结论。这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说：“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混阶级的最后手段。”在这篇文章中，他就已说：“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后来，9月15日，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他认为，精神改造，就是要改造人心，“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并且，“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

1920年，毛泽东也提出了思想改造问题。他在给蔡和森等的信中，说到新民学会时写道：“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

他们这时所说的“思想改造”，同我们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还有所不同。但是，这几位历史巨人，当时已经提出了改造思想的问题，表现了当时中国的先进青年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便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决心。这在后来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入之后，发展这一精神用来改造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但是，爱国运动并没有终止，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勾结起来欺压中国人民的事件仍旧不断地发生。

9月，天津警察厅查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宣布报社照常办公，并写了紧急启事，争取社会支持，力争继续出版。后来在十月份复刊了。

陈子来：《青年周恩来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信。

10月1日，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等七个省、市的代表到北京总统府门前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解决山东问题。徐世昌不见。代表们坚持到晚上，被警察全部绑架走了。在北京担负后勤供应和宣传通讯任务的周恩来立即把消息编成稿件，送回天津印发。他焦急地奔走于北京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间，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决定10月10日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地一齐举行示威游行，反击北洋政府，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回到天津，联络贯彻，10月10日，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开大会，周恩来是主席团成员。大会发表宣言，斥责北洋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会场，阻止游行。学生们冲出包围，进行环城游行。在这场斗争中，有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邓文淑（颖超）也被打伤，吐了血。愤怒的队伍冲到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躲了起来。为了抗议政府当局的迫害，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决定南开大学等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后来，北洋政府慑于人民的威力，释放了10月1日逮捕的各地请愿代表。

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者福州打伤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并打死一名警察，造成“福州惨案”。福建学生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25日，天津学生一千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12月10日，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20日，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十万人举行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上检查到的日货十多卡车，然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1920年1月初，直隶省长为了瓦解学生爱国运动，下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周恩来主持觉悟社的会议，提出“反对提前放假”、“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由学联组织学生广为宣传，并组织日货调查团，抵制日货。23日，学联的调查员在一个商店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毒打。这就激起了社会公愤，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但是，政府当局不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派出军警殴打学生，逮捕了请愿代表马骏、马千里等二十人，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等。

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学生们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方舟）、张若茗四人为代表，要求催办福州惨案的交涉、释放被拘代表等。他们四个人不顾军警阻拦，强行进入省公署，但全部遭到逮捕。在公署外的学生队伍，遭到武装军警的镇压，重伤五十余人，造成天津的“一·二九”惨案。

下面是周恩来对被拘捕情况的记载：

“……保安警察数十人从大门进来，将代表捕走。两人架一人，途中站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住交通，街道肃静，观者如堵，（我们）四个人沿路大呼：‘民国万岁’、‘同胞万岁’、‘学生万岁’。鼓掌声从人丛中零零落落的应着。有些人跟在后边的，便遭警察的枪托毒打。”

（我们）“致最后通告干警厅，大概的意思都是说民国约法新刑律，全载有人民身体自由，无故不得受逮捕拘禁的干涉。他们被拘70多天，没受正式审判。这种非法对待，众人为尊重人权国法起见，限警厅三日内公审。要是做不到，三日后全体绝食，以存他们人格。”

里边，被捕代表进行绝食斗争；外边，谏志笃、邓文淑等二十四人到警察厅，要求代替被拘代表。4月7日，警察厅被迫把周恩来等移送天津地方

检察厅。

在检察厅，又经过斗争，争取到大家同住一处（女代表另住），自由往来，有一定范围的阅读书报和通信的自由。于是，难友们组织起来，制定起居时间表和学习课程表，推举处理众人事务的各种委员，每天的日程安排是：上午预备接受检察厅讯问，下午读书，晚上共同研究社会问题和开娱乐会。

在监狱中，周恩来想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心潮澎湃。正如他5月4日的日记所载：“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的。将来之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在狱中，周恩来向难友们宣讲马克思主义。当年的《检厅日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五月十四日，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五月卅一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六月二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六月四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六月七日，周恩来讲解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讲完了。

1920年的时候，这样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这在我国是甚为罕见的。周恩来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人。

还在狱中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在考虑将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探索救中国的道路了。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将要去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在狱中写了一首长诗赠送给他。下面是诗中的三段：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
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又来说，
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哪知不几天，你来别我；
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这首诗是周恩来6月8日写的。诗中所说“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说明周恩来在狱中时已在考虑去西欧。不久，周恩来也到了法国。

1920年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宣布释放马千里、周恩来、郭隆真等全体被拘捕的代表。天津各界代表百余人前去欢迎，把铸有“为国牺牲”四个字的闪闪发光的银质纪念章和红绸花佩戴在代表的胸前，在审判厅前合影留念。这时，九辆高悬着“欢迎代表出狱”的门旗的大卡车开过来了，请代表们上车，在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驶往商会出席欢迎大会。

本来，周恩来和马骏等都已考上了新创办的南开大学文科，现在，他们不能再上学了。出狱后，周恩来很关心觉悟社，8月初，就主持觉悟社的年会，在会上总结了一年多来开展天津的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会后，他同觉悟社社员十一人到北京。

8月16日，觉悟社和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在北京外城的陶然亭举行茶话会，这是五四运动史上有名的“陶然亭会议”。当时的陶然亭，偏僻荒凉，野草丛生，人迹稀少，十分恬静。在这里可以避开政府探员的注意。会议开始后，先由邓颖超向大会报告觉悟社的组织和经过。大家对这个十七岁的姑娘投以赞赏、信任的目光。接着是周恩来发言，他着重强调了青年们联合起来，到群众中去开展工农运动的重要性。最后，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充分肯定周恩来和青年们的革命热情，鼓励大家要确定共同的、明确的“主义”，这是联合的基础。“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李大钊所强调的“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后来，这五个团体又订立了宣言和约章，规定要联合起来，“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切切实实做点事”。

为了进一步研究“主义”，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周恩来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11月7日，他从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当年同船赴法的谢树英回忆说：

“我们乘坐的是特设舱位——统舱，舱位设在船头，分上下铺位。我先

认识李福景，经李介绍认识周恩来同志。‘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印度洋、锡兰、科伦坡，再经非洲三角的吉布提阿刺伯海、亚丁，入红海，经苏伊士运河塞得港，由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上岸，共计航行四十余天。”

“一出国门，中华民族受人歧视欺侮，国际地位甚为低落，极感愤慨。”

“由新加坡横渡印度洋到非洲这段航行时间最长，在汹涌澎湃的波浪中，轮船震荡得很厉害，同行者多在舱中静卧，周恩来同志却在船头甲板上坐着，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大风大浪，镇定如常。”

一路上，“周恩来同志以历史事实激励了每个人的爱国热忱，使人认识到积弱不振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坐视’”。一系列的谈话，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忧国忧民，矢志改革中国现状的赤胆忠心，令人佩服。”“李福景有志于到英国学土木工程；我的志愿是学采矿；而周恩来同志表示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表现出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远大抱负。他矢志革命救国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四运动，对此后的中国影响深远。在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不少人是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青年知识分子中，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董必武、赵世炎、马骏、郭隆真、张太雷、方志敏、陈毅、林祖烈、张闻天、许德珩、闻一多、黄日葵、阮啸仙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或靠拢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走向国民党方面的有傅斯年、罗家伦、盛世才、张其购、左舜生、曾琦、段锡朋（抗日战争中成为汉奸）等。当时积极参与运动的北京大学教职员陈独秀、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报界的邵力子、叶楚沧等，教育界的黄炎培、蒋梦麟等，都是日后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四西欧旅史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有一次问邓小平：在旅欧期间，什么人与你关系最密切？

邓小平想了一下，回答说：周恩来。

邓小平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两个伟人的战斗友谊，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法国的时候开始的。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二十年代初去法国勤工俭学，是一件大事。就在这批勤工俭学生中，产生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和新中国的一大批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蔡和森、蔡畅、向警予、赵世炎、张昆弟、罗学瓚、颜昌颐、陈毅、李维汉、李立三、刘伯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大章、邢西萍、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袁子贞、谢唯进等等。在中共旅欧支部入党的，就不下五六十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常委六人中，就有三人是旅欧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周恩来 1920 年 12 月中旬到法国马赛，随即去巴黎。1921 年 1 月 5 日到英国伦敦。他到欧洲求学，本来的目的并不是只关闭在学校中学习功课，而是要对西欧发达国家作“社会实况之考查”，“虚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他认为，“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他到了欧洲，第一个印象，就是欧洲社会所受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十分巨大，尽管英国、法国都是战胜国，但是社会上表现出显著的不安定。生产力下降，经济界恐慌，生活窘困，“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这同出国以前总认为欧洲物质文明发达，战争的影响不会大大，完全不一样。看巴黎、伦敦的市面，虽然觉得比东亚的都市繁华，但是煤、电、糖、面包这类东西，甚至不如上海、北京、天津丰富。英国仅苏格兰一地，失业者超过一百万。法国受战争影响最大，满目疮痍，战后的恢复还不到百分之五六，“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周恩来发现，欧洲多是工业国，工人组织比中国完备得多，但工人仍不能得到完善的救济。至于中等阶级的人，既没有组织，又受经济压迫，失业和困难又有很多。这些国家中，只有俄罗斯已成为工人苏维埃，另有解决办法。

周恩来到欧洲后，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和思潮，“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他在巴黎时，在一个法语学校学法文。他住在巴黎拉丁区，后来搬到郊区的一个小镇加郎内——科隆贝居住，宽阔平坦的塞纳河从镇边流过，环境很安静，但是离学校较远。每天早上天刚亮，周恩来就招呼住在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7页。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4页。

《伦敦通讯》，《天津益世报》1921年3月22日。

一起的勤工俭学学生起来，他们几个人一起开伙，吃的经常是挂面和卷心菜，用的是煤油炉，一作饭，满屋子烟油味。早上匆匆吃了早点就向地铁站跑，因为早上七点以前坐地铁票价减半。周恩来平时出门，近距离不乘车，远路坐地铁时，常把皮包摆在膝盖上，看书或写东西。除了上课，他就是到书店看书。他读了大量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也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如《克鲁泡特金自传》等，还曾经对鼓吹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合作”的费边社会主义感兴趣，但最后他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他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信仰。

1962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当时在中国国内，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等在上海筹备建党的时候，考虑到党的名称叫什么好？拿不定主意，写信问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回答说：叫共产党。所以上海党组织一成立就叫共产党，随后创办的秘密刊物也叫《共产党》。上海党组织成立后，北京以李大钊为首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张申府是成员之一，当时他是北京大学讲师。这年12月，张申府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聘请到法国，行前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张申府说：“到法国后，因为刘清扬的关系，我与周恩来经常来往，彼此更加熟悉。1921年2、3月间，我先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恩来入党。……在此前后，通过国内关系入党的赵世炎、陈公培又和我建立了联系，……我们五人就在巴黎成立共产党小组，……”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1921年2月，我介绍刘清扬加入共产党，3月，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恩来入党。”

刘清扬也说：“到法国之后……不久，张申府介绍我，我又同张申府一起介绍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世炎也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

巴黎的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建党发起组之一（现统一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党的创始人之一、负责组织召开中共一大的李达回忆一大情况时，在历述了上海发起组邀约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同志分别在各地成立党的发起组后说：“此外，还邀集广州、东京、巴黎当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发起了中国共产党。截至1921年6月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八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巴黎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毛泽东1936年和斯诺谈话，在叙述了建党时的国内情况后说：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7页。

《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刘焱：《关于周恩来入党时间问题的探讨》。

《刘清扬同志对赵世炎同志事迹的回忆》，《周恩来青年时代》第6期。

李达：《七一回忆》，《七一杂志》创刊号。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没有公开出面领导活动。周恩来等开始筹建青年团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

1922年3月初，因为德国的生活费用比法国低廉，周恩来由巴黎迁到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的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五十四号。当时旅欧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散居于法、德、比等国，周恩来经常奔波其间。党的组织，在法国的由赵世炎负责。周恩来和赵世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约在1921年底或1922年初，周恩来、赵世炎托人带信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约他到巴黎的一个旅馆见面，共同研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三人见面后，商定了分头筹备，终于在1922年6月间，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空地上开会，到会的有二十三人。会议是赵世炎主持的，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了组织的名称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侦察下秘密工作，各用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就用的“伍豪”，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个旅馆里。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

这时在国内，5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赵世炎、周恩来等得知后，10月又在巴黎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恰好李维汉要回国，赵世炎、周恩来就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李维汉1923年1月初回到中国，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事，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了这一要求。1月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收到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陈独秀的回信，信中建议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把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2月中旬，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它的“旅欧之部”，在欧洲的名称则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上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任书记。会后，又收到了国内团中央1月29日的来信，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周恩来虽然身在西欧，但他和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国内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声气相通，互为支援，并且经常给天津《益世报》提供报道文章。

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在国内时的接洽，出国时的引导，到法国后的接待，以及以后一切生活的问题，都同华法教育会发生关系。华法教育会在法国都有机关，由中法两国人士任职。勤工俭学学生到法国后一时没有找到工作的，由华法教育会发给维持费。在当时法国经济不景气情况下，这部分人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要占三分之二以上。1921年2月，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停发维持费。这些学生顿时生活无着落。再加传闻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救济款项，蒙达尼学校又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学生退学。因而2月28日，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到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但遭到法国警察和马队的毒打和驱散。当时，周恩来在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不在巴黎。3月间，周恩来写了第一次西欧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了这次斗争的始末，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表示了对这些学生的深切同情。

周恩来十分关心时事和社会，这年6月中旬，他在法国报纸的字里行间，看出北洋政府派了专使朱启铃和财政次长吴鼎昌到巴黎，同法国政府秘密谈判借款和买军火，他就同赵世炎、蔡和森等共同商讨对策。当时，在法国的华工有二千多人，有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周恩来和工学世界社的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平和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等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知》，谴责军阀借款打内战。6月3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参加由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的拒款大会，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国人“赞助”。同时，周恩来撰写了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寄回国内发表。这篇报道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激起了国内爱国人士反对中法借款的巨大声浪。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朱启铃潜往美国，吴鼎昌避到伦敦，法国政府中止讨论借款。但是实际上，谈判仍在暗地偷偷进行。7月25日，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出借款合同已经商妥和草签，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是吴鼎昌和陈篆。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旅法华人首先集会反对。周恩来和赵世炎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驻法公使陈篆来说明真相。陈篆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会上，王曾思遭到殴打，被迫代陈篆签署了反对借款声明。法国政府也怕事态闹大，只好宣布暂缓借款。

国内，军阀政府的迫害和镇压正在加剧。觉悟社的社友黄爱担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1920年6月回到家乡湖南后，创建了湖南劳工会，1921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被军阀赵恒惕逮捕，连砍三刀，惨杀在长沙浏阳门外。周恩来从国内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陷入深深的怀念之中，挥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壮丽新诗：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远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在这首诗里，表现了周恩来的彻底革命的意志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生死观。他把这首诗随信寄国内觉悟社员时，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3年，国内又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件。5月5日由上海开往北京的一趟快车，在山东临城地方遭到土匪拦劫，车上二百多名中国乘客和三十余名外国乘客被绑架作为要价的“人质”。帝国主义列强以此为借口，有的提出中国“水陆一切交通路线皆归外警保护，全中国各要点均驻外兵”，有的要“以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以外员编练中国警队归列强管辖”，到6月12日，尽管被动持的外国乘客已经全部释放，列强仍准备“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7月2日，周恩来阅看《巴黎时报》，看到这一消息后气得拍案而起。第二天，他发起召开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商讨行动，以“少年杂志社”的名义主持会议，由八个团体决定印制传单分送巴黎各报馆。7月8日，周恩来又召集二十几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周恩来、徐特立等被推为负责人。当晚，周恩来等用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名义拍发“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工农商各界速起力争”。7月15日在巴黎又召开大会，会后开了各团体代表会，正式成立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徐特立、郭隆真、许德珩、袁子贞等当选为领导成员。在国内，各界人民也起来强烈反对。最后，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的打算没有实现。

旅欧党团成立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不断斗争的过程，也是同旅欧青年中自身间的斗争分不开的。1923年夏天，周恩来从德国回到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从事党和团的工作，常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演说，或者写文章。在旅欧青年中，当时比较突出的，是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和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曾经有过广泛市场，很多后来成为很好的共产党员的青年，开始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在旅欧青年中，有几十名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秋组成了“工余社”，1922年1月还在巴黎创办了机关

刊物《工余》月刊。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是两个满腔革命热忱的青年，却一度相信了无政府主义，是“工余社”的主要成员。陈延年还当过《工余》的编辑，化名林木。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周恩来认为他们毕竟是要革命的青年，所以“在学理上愿与无政府主义者辩驳讨论”，但对他们中有的人的“嬉笑谩骂”“不做相对的回报”，要用中国革命实际的教育，争取他们参加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对于“二陈”，周恩来、赵世炎等也是一直做争取的工作，热心关注他们态度的变化和趋向，打通联系，同他们接触，让同“二陈”熟悉的同志给他们写信，“与之问讯，且探其动静”。到1922年中，陈延年、陈乔年已经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

当时国内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互助月刊》在1923年初的“同志消息”栏中说：“法国之《工余》杂志，为吾党派法之机关报，前为陈延年君编辑，近陈君因改变为共产党，编辑事务改由李卓君担任矣。”

李卓是“工余社”的主要组织者。1923年1月3日他到法国无政府主义老将格拉儒家家中时，有一段对话：

格：陈君（陈延年）从前还能卖些小册子，为什么现在不作声，连我去信也不回答？

李：陈君已变成共产党，每月他写一种半月刊的报，太忙。

格：他变成共产党了！我现在明白点了。你与他常见面吗？

李：不，已有两个多月了。

陈延年、陈乔年转变后，又现身说法，教育团结了其他人，到1923年末，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反对无政府主义派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1924年，《工余》仅仅出版了两期，就停刊了。

国家主义派是五四运动后以曾琦、李璜为首形成的一个派别，1923年定名为中国青年党。他们认为：“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无耻，而在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国家主义派否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国家主义派，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都以很大的精力来同他们斗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8月创办《少年》。1924年2月《少年》改名《赤光》，由周恩来主编。周恩来在这两种刊物上写了约有四十多篇文章。邓小平从1924年起参加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是负责人中最年轻的。当时的人回忆：1922年下半年，在巴黎郊区皮浪哥中国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年龄最轻，人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宏亮，铿锵有力。”邓小平在负责编写、刻印《赤光》中，工作非常出色，使油印的《赤光》简直和铅印本不相上下。人们用“油印博士”的称呼来赞誉他的工作。他写的文章也很尖锐、泼辣、有份量，如《赤光》第18期上的《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第21—22期上的《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国家主义派后来堕落到指引法警搜捕、捉拿共产党员，曾琦回国后，公然投靠了军阀孙传芳。

王永祥：《旅欧期间周恩来同志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吴琪：《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法德两国的革命活动》。

王永祥：《周恩来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周恩来卓越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在当时是仅见的：

（一）他明确地提出了要用社会主义来救中国。他说，“社会主义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周恩来在提倡共产主义信仰时，指出这要区别于迷信：“凡有所‘信’都不应超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是迷信。”他指出信仰要付诸实践，“信而又疑，不去实行，我们又何必谈实验，谈改革”。

（二）明确指出革命的对象、领导和队伍。他说：“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他认为：“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倍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所可得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旅欧时，周恩来已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分析，不看成铁板一块，指出“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也渐能与革命派表同情，而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会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伍中”，但“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

（三）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周恩来非常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说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周恩来立志救国，很早就开始注意军事，在南开学校建立敬业乐群会时，在会中就设立了“军事研究团”。旅欧时，在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它各地党组织都还没有的。1923年7月15日他在巴黎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上讲话，公开号召要用“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暴动”推翻北洋军阀政府，“自己起来，组织革命政府”，成就中华民族“独立的伟业”。这些思想，是极为光辉的。

（四）1924年6月1日，他在《赤光》第九期上发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周恩来在旅欧时期，所写的论文和报道数量是巨大的，有不少充满智慧的思想 and 论述。有的法国学者看了周恩来的作品后，曾表示惊讶，说周恩来

魏宏达：《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

林代昭：《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光辉榜样》。

周恩来：《革命救国论》。

周恩来：《军阀统治下的中国》。

周恩来：《革命救国论》。

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

周恩来：《德法问题与革命》。

曾预见到日本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确实，周恩来在《赤光》第十期上发表过《太平洋上的新风云》一文，指出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则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这场战争，十几年后发生了。

对于当时的国共合作，组成统一战线，周恩来既有论述，又亲身实践。周恩来认为，国共合作“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消弭某些部分人的目前部分利益的争执，训练统一，步骤一致，不复有时同时否的阻碍，号令集中，指导自如，易于杀敌”等。有人说，共产主义应受三民主义所左右所改变。周恩来驳斥说：“谁左右了谁，谁改变了谁，这要看实际情形始能决定。假使今日之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加入国民党后抛弃共产主义不信或忽视了无产阶级的最后敌人——有产阶级——不管，而后方得谓三民主义左右改变了共产主义者，但仍与共产主义无涉。”他指出，有人希望“我们上此圈套，我们却决不‘甘心盲目’、‘发了疯’、‘走弯了路’”。当时，周恩来曾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要他协助中国国民党筹组旅欧党部。1923年6月，周恩来等到里昂同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商谈合作问题，商定旅欧共青团员八十多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11月，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在里昂召开，选出王京歧为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后来在王京歧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周恩来在西欧期间，和法共、德共都有密切的联系，同第三国际和苏共的旅法代表也有比较多的接触。中共旅欧支部好几批派往苏联学习的学生，都是周恩来亲自向各方联系，而得到法共、德共、苏共组织的大力帮助的。周恩来同胡志明（当时叫阮爱国）的近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也是从旅欧时开始的。1939年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向人介绍胡志明，说这是他“留学法国时的朋友”。

1924年7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对他作了如下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王京歧在给家人的信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

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周恩来从这里起步，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没有忘怀几十年前在西欧的旅史，西欧也没有忘怀当年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周恩来。事隔五十年，当法共（马列）总书记雅克·儒而盖见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告诉他说，法国的报纸对周恩来当年在雷诺汽车厂工作的情况作了一些报道，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周恩来听了以后放声笑了起来。

1963年秋，中国驻英代办熊向晖回国休假。周恩来找他谈话，谈到了1921年1月去英国住了一个多月，原想投考爱丁堡大学，因费用太贵，转回法国。在伦敦时，到过波特兰街。新中国的驻英代办处就在波特兰街49—51号，原

周恩来：《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

来是国民党政府的驻英大使馆，最初是清政府购置的驻英公使馆宿舍。周恩来问：

“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是不是被关在这个地方？”

熊向晖说：“他被关在清使馆侧屋的一间阁楼，面积约十平米，光线很暗，只在临街的墙上有一个插上铁条的窗口，没有窗框，也没有玻璃。”

周恩来说：孙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除了反动分子以外，现代中国人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要在原来的位置，重建孙先生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

后来，周恩来派建筑师戴念慈到伦敦勘察，作了详细测绘，带回北京设计。这件事，到1971年9月英国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周恩来又提出来。1973年9月熊向晖卸任驻墨西哥大使回国，周恩来找他谈话时，又说：他已作批示，必须重建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后来，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周恩来的愿望才办成功。

1978年11月，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英、法，比三个西欧国家。在伦敦，著名作家费里格斯·格林接待他们时说：“我要和你们好好谈一个人呵！他照亮了我一生。他的光辉，使许多人打开眼界，升起智慧。”他说的是周恩来。他说：“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家中，有谁称得上是把欧洲真正地、又那样持久地迷住了的人，我认为，唯有中国的周恩来了。”在法国，政治家、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对他们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有一批杰出的中国革命家来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以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他讲到了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邓小平等，说：“我们法国人一直尊敬他们，怀念他们，并以此为荣。”

代表团无论在英国的苏格兰。曼彻斯特、伯明翰、威尔士，或者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瓦隆地区和佛朗芒地区，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对周恩来的称颂。正如人们所形容的：“见了中国人，赞美周恩来，就成了不可少的话题。”

1979年10月16日，巴黎的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座三层楼房的正面墙上，挂上了一块美丽的墨绿色花纹的大理石纪念牌，法国总统参加了揭幕仪式，牌上写着周恩来于1922—1924年在法国期间住在这所房子里。刻着“周恩来”三个中文字，这是邓小平的亲笔。

熊向晖：《周恩来关注孙中山伦敦蒙难室》。

朱子奇：《周恩来——迷住了欧洲的人》。

五黄埔之光

1924年9月初，周恩来到广州。

广州，当时是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希望。

10月，26岁的周恩来参加了第一次战斗。

周恩来到达广州的时候，广州正发生商团事件。所谓商团事件是：商团的头头陈廉伯是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买办。8月间，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他和一些人密谋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从国外私自买了一万多枪枝和几百万发子弹，准备偷运入境后举事。孙中山知道后，派军舰在虎门沙角截获了这批军火。陈廉伯就煽动商界人士组织请愿团，还鼓动商人罢市。孙中山派人拿他的亲笔信到商团总部揭发陈廉伯企图“倾覆政府”。广东省长兼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另一方面，陈廉伯和他的党羽强迫商店罢市扩大到佛山、顺德等地。8月28日，英国军舰9艘集中到广州白鹅潭，炮口对着中国军舰，英国沙面领事向廖仲恺提出警告，29日，英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9月1日，孙中山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同时对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正抗议。后来，孙中山采取了折衷办法，发还四千枝枪械给商团。商团得枪后，气焰更加嚣张了。10月10日，竟然放出步哨，在长堤西壕口一带戒严。这一天，正是全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双十节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周恩来出席了大会，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说，严正警告商团：

“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

这个讲话，实际上已向商团指出他们是孤立的一小撮。

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经过永汉路（今北京路），南出天字码头转入长堤西壕口，向太平路（现人民南路）进发时，商团向群众开枪，当场死二十余人，受伤和被捕几十人。商团还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发动武装暴动。

孙中山在广东北部的韶关准备北伐，知道后立即打电报给胡汉民等，叫他们严办，不得“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切勿犹豫，以招自杀”。他下令从北伐军中抽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平叛，成立革命委员会，由谭平山、廖仲恺、陈友仁等为全权委员。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等都参加了军事指挥部的工作。15日，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援助下，击溃了商团军，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当时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

11月，周恩来被任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是革命的广州的希望，它创建于1924年5月，是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以来失败的教训，深深感到自己过去依靠军阀的部队来搞革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1921年，经中国共产党人的介

绍，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谈到必须建立革命的军队，建立一个军校时，孙中山衷心赞同。1922年，原来依附于他的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感触更深。他回到上海，就先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林伯渠等商谈建立革命军校的问题，要求中共和苏联派人帮助。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就先派出廖仲恺负责筹备军校工作。孙中山的办军校思想，从他在黄埔军校的开学演说中，看得很清楚。

他说：“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致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

这个学校，本名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因为校址在广州市郊的黄埔长洲岛，所以简称黄埔军校。孙中山是校总理，廖仲恺是党代表，蒋介石是校长。校本部下设政治部、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入伍生总队长、教育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等。周恩来是应孙中山、廖仲恺的邀请去任职的。在他之前，政治部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但两人都很快离去。第二任是代主任邵元冲，根本不懂政治工作。邵元冲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周恩来接任。

革命军队的灵魂是政治工作。

中国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从此开始。

周恩来的戎马生涯，也从此开始。他后来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杰出的军事家。

周恩来以旺盛的革命斗志、炽热的爱国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开创政治工作的局面。他调了一些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对他们说：“过去黄埔军校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你们看，蒋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于右任为他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主持编写的‘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

他建立起政治部的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部下设几个股，选调共产党员担任。规定工作细则，进行有关调查，出版《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等。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教育，课程中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等。例如在“社会主义”课中，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讲授社会主义呢？因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一定要研究欧洲自原始共产主义到柏拉图之理想国中的社会主义，“由柏拉图到符离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进化到‘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

们作报告，政治部专设的政治教官大都是共产党人。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在这个荒芜的小岛上，如今热气腾腾，一进校门，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校歌中高唱：“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生活是艰苦的，全校除一间俱乐部是砖瓦房外，教室、宿舍、厨房、厕所全是草棚，墙是竹帘、草席，穿的是布袜、草鞋……生活又是活跃的，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革命戏剧。陈赓当时是“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也是有名的演员。后来又组织了“火星社”，团结了进步的学员。进而又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联合广东各军进步青年军人，对在军队中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政治部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得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又起了核心作用，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尽管环境艰苦、生活紧张，但始终斗志旺盛，革命的情绪很高。周恩来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每天清晨，他步行到码头坐船到黄埔军校工作，傍晚回广州，晚上到广东区委办公室。桌上放满了马列著作和各种文件，星期天常到工会、农会作报告。当时黄埔军校的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说：“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随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氛围中，到1925年夏，张治中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边了。他想参加共产党，曾经向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同组织上研究后，回答他：“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的，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1925年1月，军阀陈炯明图谋进犯广州。2月1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发令讨伐陈炯明，这是第一次东征。

东征军总指挥是许崇智，兼右路军指挥。参谋长叶剑英。黄埔军校以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建了两个教导团，参加了右路军。周恩来参加了东征，在中共广东区委内，他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长。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军行所至，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政治部一再激励官兵为“救国救民”而英勇作战，要“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即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这次东征中的一个有名战役是“淡水之战”。淡水城地势险要，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陈炯明军约四千人固守城他。叶剑英了解了城里的敌军兵力部署，勘察了地形，拟定了作战方案，到司令部同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等详细商讨粤军第二师和黄埔学生军教导团攻打淡水的计划。2月13日，向淡水发起攻击。城内敌军猛烈还击。教导二团团团长王棺龄在紧急关头逃跑了。周恩来领导政治部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

李义彬：《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斗，坚持到底。15日晨攻下淡水。苏联顾问看到革命军将士作战英勇，连连说可以同苏联红军相媲美。淡水一仗，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黄埔学生军打出了威风。几十年后，周恩来还记得这场战斗的艰辛，同叶剑英谈起过。

周恩来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新的国民革命军成立了两个团后，仅仅以新成立这两个团为骨干，举兵‘东征’，即得着东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克复潮汕，直抵闽境，并迅速扫平杨、刘。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

这时期内，周恩来阐述了建立革命军队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有一个演讲，叫《军队中政治工作》。在这个讲演中，他充分地阐述了要革命成功，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道理。他谈到人类社会分化为阶级社会以后，军队就成为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个工具去压迫人，如奴隶社会的酋长用军队这个工具来压迫奴隶，封建社会的天子诸侯王拿这个工具来压迫乡村的农奴和城市的市民，现在的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利用这个工具来压迫农工和其他的群众。但是，被压迫的阶级也可以用这个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统治。酋长制度的社会，奴隶起来赶跑了压迫他的酋长；封建社会没落，资产阶级起来赶跑了压迫它的天子诸侯王；资本主义社会，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和支配下的工农商学，也会起来利用武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现在，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

关于建军的宗旨和任务，他说：孙中山建立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说：“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关于军队政治工作，他说：“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

区分了两种不同军队的不同政治工作的要求，不但对于革命军队，而且对于后来的敌军兵运工作也有指导作用。对于革命军队，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他认为革命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觉悟的提高，“军队的本身完全在兵士，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2—93页。

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

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

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

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

周恩来，《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成为一个军队”。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部门，他说：“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

关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说：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大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要使兵士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

后来，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军队里，取消了政治部、党代表等，黄埔时期的革命政治工作，只在工农革命军、红军，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中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它的基础，是周恩来在这时打下的。

抗战时期，毛泽东谈起大革命中的军队时，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62年，有一次朱德谈到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时，也说：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还亲自组织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经孙中山同意后周恩来建立起来的。他从黄埔军校中选调了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从外面调了廖乾坪、曹汝谦，五人负责具体组织，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当队员。铁甲车队的所有人员的配备、调动，它的工作与活动，都直接请示广东区委、周恩来决定。后来，孙中山去世后，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叶挺独立团。这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队伍，号称“铁军”，在北伐战争中无往不胜，功勋卓著。

正当东征军队主力在前方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驻守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閔、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的收买、支持下，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广东军阀陈炯明，密谋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东征军主力迅速回师到广州郊区向叛军发动进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东征时留在广州，这时也配合作战。在工农群众的大力协助下，6月15日，杨、刘两部被缴械，广州政府转危为安。

周恩来的一生，多少次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险境，第一次，就在1925年6月。

这年5月，上海内外棉六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上海学生援助工人，租界巡捕进行逮捕。5

周恩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周恩来：《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周恩来：《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

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0页。

月 30 日，上海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十多人，酿成“五卅”惨案，全国各大城市由此卷起反帝大风暴。6 月 23 日，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进行反帝大游行。周恩来从马队中抽出两个营，从黄埔军校抽出一个营，去参加示威游行。队伍四人一排，周恩来走在最前列，沿途高呼口号，情绪十分激昂。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河对面的沙基时，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在机枪扫射下，当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几百人。周恩来身旁左右两边的人都被打死了，他幸免于难。这是“沙基惨案”。这次惨案激起了省港人民的更大反抗。

8 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周恩来从旅欧时期起，就同邓颖超鸿雁不断，但已经有五年没有见面了。8 月 8 日，他们在广州结婚。婚后不几天，就遇到廖仲恺遇刺身亡的事件。邓颖超曾经讲过这段历史，他说：周恩来一知道就出去了。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回来时周恩来穿着他唯一的那套西服，背上一片血迹。后来才知道廖案发生后，为了抓凶手，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去司令部，原定是晚上 11 时戒严，蒋介石狡诈多变，突然提前两小时，9 时戒严。周恩来不知道。车到司令部门口，警卫叫停车，司机没有听见，警卫就开了枪。周恩来在车里赶紧卧倒，司机的脑袋被打碎，血流在了周恩来的背上。后来，周恩来跳出车门说明身份，才算无事。

1925 年 7 月 1 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黄埔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这时的广东，革命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固，但陈炯明部队在第一次东征被击溃后，退到福建边界，从香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府那里得到援助，又从北洋政府段祺瑞那里得到军饷，力量逐渐恢复。他们乘黄埔军回师广州时，又向广东进军，占据潮汕、梅县、惠州等整个东江地区，以惠州为中心，集结重兵，并且企图进而夺取广州。

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再次东征。这次东征和第一次东征不同的是：第一次东征，黄埔学生军只占兵力一小部分，并且附于许崇智的右路军。这次东征则是全由黄埔军也就是第一军进行的。第一军有两个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王懋功还兼广州卫戍司令。10 月 1 日，蒋介石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一个团出发东征。周恩来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接着又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

这次东征，关键是惠州战役。周恩来参与指挥了这一战役。10 月 11 日扫荡了城外的敌人，12 日开始攻城。蒋介石求胜心切，在炮兵火力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时候，就严令步兵冲锋，在敌军火力密集封锁之下，牺牲很大。周恩来在前线观察地形后，和苏联顾问提出新的攻城方案，为指挥部采纳。于是先用炮兵进行面的轰击，摧毁敌人设在城墙上的重机枪阵地并打开一处城墙缺口。周恩来“又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团党代表蒋先云率领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终于在 14 日晚攻克惠州，取得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敌人的主力被歼灭了。然后，何应钦、周恩来率部队从惠州出发，20 日到赤石，22 日攻克海丰，26 日占河婆，27 日至 30 日同陈炯明的林虎、洪兆麟等部万余人在华阳、河婆一带决战，击败洪兆麟部，歼灭了林虎主力。随后，进驻揭阳、汕头，收复东江各地，

一路顺利。11月，又进入福建追歼陈炯明残部，在永定、平和一带全歼逃敌，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陈炯明从此没有能东山再起。

1925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县行政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主持地方政权的共产党人。

1926年2月，他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当时，汪精卫是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兼所有各军的党代表，所以，各军的副党代表实际上就是各个军的党代表。

在东征中，有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党代表“专管与人民有关系之事”的规定，周恩来在第一次东征中，就已介入地方政权工作。第二次东征，军事时期的地方行政事务，事实上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已经管起来，所以，周恩来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是这一事实的延续。

周恩来在东江主政，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关心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把群众观点运用于政权建设，使政权体现出充分的人民性。他公开宣称：“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在东江主持政务中，他有计划地组织工、农、商、学、妇群众团体，发布保护农工的布告，褒扬省港罢工工人，支持工农斗争。他通过演讲宣传、办学习班等，培养工农运动骨干，教育他们要把“民族间的一切仇恨集中于帝国主义”，为争取“自己的生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在周恩来的支持扶植下，东江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妇女群众组织起来的规模都是空前的，而且逐步地团结联合。东江各县、市基本上都有了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有的县、市有了各界的统一组织。以1926年计，潮州、梅县、海陆丰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有一百多万。1926年2、3月间，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目的是要“为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在会议的闭幕宣言上，还特意写上“东江人民万岁”的口号。会议议题不少：

“市长对于市政交通计划、工程布施。财政统计、户口调查、警政改良，县长对于县政财政统计、户口调查、生产概额、行政计划。治安急务、警察扩充，土地登记、农工生活、造林计划，教育局长对于教育方针、经费确定、学龄儿童调查、改良私塾，农工会对于农工状况之调查、生活之改良、新知识之灌输，商会对于商务之发展、商品出入口之调查、商业知识之灌输、外国奢侈品人口增减额之调查，妇女协会对于妇女入学调查、生活改良等案。”

从这些议题可以看到当年周恩来主政，已经有很细致很全面的思考。

会议还讨论了《组织人民自卫军之提案》，提出人民自卫军应从工会、农会、学生会中定期征募，从区到县逐级地组织起来，定期训练，定期退伍，“起举国皆兵之风”。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当时也是创造性的。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在东江革新政治。新的行政公署设秘书长一人，下分三科办事，从秘书长、委员随从书记、科长、科员到司书，共31人。撤查了一批沿袭军阀老路，卖官鬻爵的县长，如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提议枪决了私任官吏的潮梅军副长官杨占鳌。当时报纸称赞周恩来“究办卖官”，“给利令智昏的贪官们以巨大惩罚”，另一方

面，任命了二十一个县、市长，其中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据建国后对其中18人的了解，除4名当时是中派，后来转化为右派外，其他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周恩来在东江主政，11月20日，邓颖超也到汕头。他们开始住在外马路海关旁卧龙酒店，后来租房子住在同益西巷二号，直到1926年3月17日离开汕头。周恩来家中经常人来人往，毫无拘束。当时周恩来留着大胡子，同志们亲切地称他“胡须伯”。坐着闲谈时，邓颖超站在周恩来背后，有时边说话还边抚摸他的头发，大家说说笑笑，一家人一般。在东江，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也发展起来了。周恩来很注重在先进的工农和青年学生中去发展和建立组织，并把他们派到各县、市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去。各县、市的群众组织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主导作用，农界的彭湃、工界的杨石魂，都是著名人物。

当时的广东，革命在蓬勃发展，同时，一股逆流也在暗中滋长着。正如鲁迅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教书时，一次演讲中所说：“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1925年6月23日，因为五卅惨案，周恩来从黄埔军校和学生军中抽了三个营去参加反帝游行，蒋介石知道后，是不满意的，认为不应该去。而国民党中的革命派如廖仲恺是支持的。周恩来曾经有一个讲话：

“黄埔健儿之血既染遍了沙基，英国帝国主义者遂深深认识了党军党校的最大使命是在与他们誓不两立。尤其是代表党的最大目标不仅指导革命军，并且还率领工农群众以与帝国主义相抗的廖先生，更遭香港政府的忌视。”“香港帝国主义政府有了这样的大恐慌，于是领导兵工农联合的唯一革命首领——廖党代表遂惨死于它和它的走狗买凶暗杀中了。”

“沙基死难之黄埔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而死，廖党代表之惨死更是为反帝国主义而死。”

“帝国主义的欢乐宴，我们同志的血泪场。”

蒋介石在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思想上实际是反共的。1925年2月黄埔军校成立了进步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他就在4月成立个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作为牵制。沙基惨案中，蒋介石是惧怕帝国主义，表现动摇。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和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名字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周恩来听后，借口这事关系两党，需要请示中央决定，搪塞过去了。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确定在会议中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利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条件，提出开除右派戴季陶等人的党籍；计划在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电报表示不同意，对右派采取让步的政策，还派张国焘到广东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服大家让步。选举结果，在中央执委中，右派、中派占了多数；在中央监委中，右派更是

陈汉初：《试论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主政东江》。

鲁迅：《在钟楼上》。

周恩来，《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

占了绝对优势。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监视各师党代表，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周恩来去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周恩来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在广东区委议论，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们分析了力量对比，认为对蒋介石是不利的，反击是可能取得胜利的。周恩来还同毛泽东在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的家中讨论，大家也主张反击。这个主张提出来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不采纳，主张妥协让步。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接着，蒋介石又从党务上展开进攻，在1926年5月15日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于压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这个进攻，是能够打垮的，因为当时他的兵力还不大，民众运动的力量完全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但是，中共中央派了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务方面毫无地位了。

已经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撤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了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黄埔军校出了不少人才。许多人成了日后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从同窗学友成为战场上作战的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正确的，国民党的道路是错误的。后来，许多黄埔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又通过各种渠道，走上了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道路。

六两次领导武装起义

1927年，29岁的周恩来领导了两次武装起义。

一次是3月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了城市起义胜利的第一枪，消灭了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部队，占领了上海市。

一次是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胜利地占领了南昌城。

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周恩来指挥下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夺取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这次起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同后来的南昌起义一样，震惊了全国和全世界。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把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上海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大都市，是当时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帝国主义据以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侵略。市中心有帝国主义统治的法租界和英、美、日等国共管的公共租界，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四周是中国管理的上海市，分为闸北、南市、沪西、浦东等区，历来是军阀争夺之地，谁取得了上海，谁就睥睨东南，势大力强。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最强大的城市。当时的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下。

自从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一路进展顺利。12日进长沙。8月下旬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北军事要隘汀泗桥，接着又和第四军一部在贺胜桥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十余万人。9月，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10月攻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占蛇山，突进城中。11月，北伐军攻占九江、南昌。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昌。1927年1月，美国命令驻檀香山和苏伊士的军舰赶去上海，又从菲律宾调集一个旅团陆军到上海。英国把它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开到上海，从英国和印度调集一万二千名“中国远征队”向上海集中。日本派遣巡洋舰、驱逐舰五艘开到中国。2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杭州。3月17日，占领杭州的北伐军分两路向沪宁线前进。

早在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就准备配合北伐军的挺进，进行武装起义，10月23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1927年2月中旬，在北伐军占领杭州后，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表示响应。工人的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残酷镇压，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罢工转为起义。2月22日下午，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宣布“全上海动员暴动”。但是，由于事先准备不足，已经罢工四天的群众十分疲惫，因此，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起义，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接着，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且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

周恩来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教训，认为“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为什么没有准备呢？因为从中央的指导思想来说，“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的立场”，而强调“应该彻

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周恩来说：“既然全党从前没有要夺取政权，它在国民革命时期成了一种似乎是辅助的力量”，“既然党只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军事工作也被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工作，工人又没有武装起来，因此遇到像现在这样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做不到这一点，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

当时，陈独秀是中央总书记，又是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于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积极的。但是，他认为武装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个指导思想反映在中共上海区委的一次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起义不必先有武装，说：“要明瞭武装暴动是民众的武装暴动，是以广大的民众的热情跑到街市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决不是先要有了武装才可以暴动。”

周恩来早在旅欧时就明确，革命要有革命的军队。在广东时指挥过战争，有军事工作经验，更体会到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现在军阀的队伍虽然是在瓦解中，这些队伍很不巩固，他们在寻找我们，我们在他们中间可以做宣传工作，但是“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他提出：“要有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

瞿秋白也主张武装起义“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

周恩来是军委书记，他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核心是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克敌制胜。

周恩来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

纠察队。“目标五千，先组三千”。到3月11日，组成了常备军一团，1500人，后备军三团。最后总数超过二千人。

自卫团。用手枪，“目标五百”。3月4日已发展到700人，6日发展到820人。据3月11日报告，“自卫团可扩充到一千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党，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

特别队。开始人数很少，到3月6日已增加到900多人。

有了队伍，要加强训练。当时军委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那里有三栋楼房，周恩来住在第三栋的楼上。楼下住着孙津川（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总指挥）夫妇和孙的母亲。周恩来对训练抓得很紧，花了很多心血。“周恩来同志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京、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周恩来同志非常机敏灵活，为工人们所敬佩。他除了住在辣斐坊以外，有时也去孙津川的家乡开会和部署工作。孙津川的家乡在上海郊区江湾徐家宅，离江湾火车站不远。那里是我们党当时设的一个据

192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局给湖南区委的指示。

周恩来，《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日，《活动分子会》。

周恩来，《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

1927年2月26日，《特委会议记录》。

点，十分隐蔽。”

据当年周恩来从北伐军浙江前线调来担任纠察队指挥、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说：周恩来“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个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并亲自作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

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之一，晚上在印书馆的铸造部翻砂车间利用那里的噪音，练习实弹射击。周恩来很重视这支纠察队，多次去指导。一次，一个队员的手枪走火，另一个队员受了伤，周恩来马上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稳定了大家情绪。

南市纠察队的起义准备工作在三山会馆，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来到这里，询问训练情况。他亲切他说：“小心枪支走火，不能大意呀，一定要好好训练，消灭敌人。”

沪东在培开尔路（现惠民路）仁寿里的过街楼等处，对纠察队训练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利用障碍物进攻，侦察地形。浦东区委派了二十多工人到南市接受射击训练，在那里见到过周恩来，听过他讲话。

沪西有的纠察队是在菜市路（今顺昌路）康涕路（今建国东路）附近一所学校里练射击、进攻、后退。

闸北的工商业资本家要组织保卫团来保护自己，周恩来、赵世炎就派商务印书馆工人进去。有的工人很不理解。周恩来笑着问他：“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枪支和弹药”。“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加入了保卫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枪支和弹药吗？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利用保卫团这个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掩护我们有关起义的其他准备工作。”于是有40多工人参加了保卫团，在起义中发挥了作用。

什么时候起义？陈独秀感到我们力量薄弱，不要发动大早，提出两条标准，一、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到达龙华后。

周恩来不同意这两个标准，认为根据北伐战场形势分析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北洋军阀驻军领导人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最后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3月20日，北伐军过松江，傍晚到达上海近郊龙华。上海总工会派人去联系，蒋介石命令白崇禧停止前进，意图让北洋部队和工人纠察队互相厮杀，两败俱伤。21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起义指令，全市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他们用30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起义队伍，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同驻在上海的北洋军阀毕庶澄部加其他军警共5000多人激战。

原来的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坤、陆震负责；“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21日下午1时，南市工人纠察队和起义工人进攻警察署和淞沪警察厅，警察都已经吓跑了，枪支扔得满地都是。工人捡起枪武装了自己，又向高昌庙兵工厂进攻，敌人争先恐后登上黄浦江边的船只逃命。接着，工人纠察队又占领南火车站，战斗胜利结

束。在浦东，工人纠察队只有十多支枪，去攻打警察局，一面开枪，一面把爆竹放在火油箱里放，声音像打机枪，警察马上竖起白旗投降了。沪东、沪西也都很快取得胜利，结束战斗。最后，集中在闸北。闸北是敌人主力集中地，敌军装备又好，因而战斗最激烈。

起义当天，在闸北，工人纠察队攻占了五区警察局，周恩来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接着又指挥攻下了北站附近一个警察署。22日，闸北、沪西、沪东起义队伍合力攻下天通庵车站，向占据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敌军进攻。这时，有些纠察队员牺牲，大队长受伤，使工人纠察队员气愤万分，准备硬拼。周恩来亲临前线，制止了大家的这种情绪，指挥大家占领四层楼窗口，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封锁对面敌军的大门，利用附近建筑物包围了敌人，攻下了这个据点。最后，只剩下北火车站的敌军负隅顽抗了。敌军放火烧民房，给起义队伍造成困难。周恩来命令工人纠察队一面灭火，一面保护老百姓撤退。22日下午，北站守敌企图向租界逃窜，工人纠察队已有防备，用火力的封锁了敌军。下午五时左右，周恩来到前线向工人纠察队讲话，介绍了两天战斗的情况，要求六时之前占领北火车站。起义队伍高呼：“保证六时前消灭敌人。”终于，这天下午六时攻下了这个堡垒，战斗胜利结束。

在工人纠察队攻打军阀部队遇到困难时，陈独秀知道了曾下令要工人纠察队向大场方面撤退。命令由郑超磷传达给指挥部，指挥部没有执行，继续打下去，结果胜利了。

战斗结束后，起义工人把俘虏押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周恩来亲自对他们讲话：“你们也是苦兄弟，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去投亲，我们不杀害你们，也不强留你们。”

周恩来当时对俘虏已经采取正确的政策。

两年后，周恩来在回顾这次起义时说，“暴动前的军事准备是比较充分，在短促的时间，赤卫队（即自卫团）的主力有八百余人，纠察队有二千三百人。”“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很快的就成功”，“只有闸北经过长时期的激战，毕庶澄军队几千人都集中到闸北车站”，“在群众的威袭之下，经过二十八小时的巷战，最后完全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周恩来在领导起义中表现了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并且在斗争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增长了才干。参加这次武装起义的工人，后来有些人参加了红军，成为领导骨干。如商务印书馆工人艾毅之，后来在红二方面军任师政委；吕振球，1940年在延安时任旅政委；黄志竞，曾到湖南红16军任军政委。上海纱厂工人万云程，1933年是中央苏区福建省军区政委。

起义胜利后，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上海。

革命取得了胜利，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反革命却在磨刀霍霍，准备屠杀革命。

早在1926年广州发生“三二”事件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已经注意到了蒋介石。他向国内报告说：“蒋不再要俄国顾问了。”“蒋介石给共产派以数年来未曾有过的致命一击，这对广州政府未来的政策有影响”，但“政府中的保守派尚未强大到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足以轻而易举地处置俄国

黄火青：《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几位工人的简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26年第1卷、第701页。

人和共产党人的地步”，“蒋将军不得不首先处置自己军内的情况，然后才能支持政府再次发动反俄国人的政变”。

此后，美国就以“承认”为诱饵，力图使广州国民政府放弃反帝的立场。他们注意物色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所谓“随时准备与任何表现出有能力代表中国履行其所负义务的政府建立关系并进行谈判。”他们十分注意蒋介石正在“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蒋介石到南昌后，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就到南昌同蒋介石密谈，答应用巨额款项支持蒋介石，交换条件是反共和镇压工人运动。虞洽卿是同英美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之后，买办豪绅阶级代表、政学系政客黄郭等和亲美派官僚王正廷等都到南昌见蒋，密谋破坏革命。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党羽残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6日又强行解散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这些情况，在上海的中共特别委员会是有所听闻的，特委和中共上海区委也开会讨论过对策，但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终于丧失了起义胜利的果实。

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会上，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介绍了27日他同蒋介石会见的经过，说蒋介石“并无赞扬上海工人，我报告一点上海工人暴动的经过，他不大注意”。这时，外界已有传言说蒋介石将对工人纠察队不利，但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人与工人纠察队”等，都是“谣言”，“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失去了警惕。

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3月24日击溃北洋军阀的直、鲁联军，占领南京。美英等帝国主义依凭自己增强了的武装力量，借口“保护”侨民而炮轰南京城，中国军民死伤很多，这就是南京事件。这时，蒋介石正在去上海途中，他不是向帝国主义严正抗议，而是派人向他们疏通。到上海后，31日他对外国记者声明，事件不会扩大，他向帝国主义保证“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帝国主义则答应为他发动政变提供便利，直至用驻沪侵略军来配合。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蒋介石表示，只要能把工人打下去，可“认捐五百万”，“借款可另案办理”，“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纠集流氓打手，供袭击工人纠察队之用。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汪寿华被杜月笙骗到住地，残酷打死。大批武装流氓冒充工人，臂戴白底黑工字袖章，从租界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袭击工人纠察队，跟在后边的国民党军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或武力强制手段，收缴“双方”枪支。几千名工人纠察队全被解除武装，工人死伤300多人。13日，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6万多群众示威游行，向国民党军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走到宝山路，遭到反动军队机枪扫射，死伤无数，尸横满街，血流成河。同一天，南市的游行工人也遭反动军队枪击，死十多人，伤数十人。接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捕杀。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三天中，被杀害300多人，被捕500多人，五千多人下落不明。接着，蒋介石势力所及的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大屠杀。

《美国国号院档案》。

《美国对华关系文件集》，1926年第1卷，第855页。

《美国国号院档案》。

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得知上海的消息后，立即派李立三、陈延年、魏金斯基到上海，加上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大家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电文给中央。周恩来在电文中说：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乘它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电文中分析了蒋介石目前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1、2、3、14、21师，1、21师的领导人薛岳、严重被蒋赶走，战斗力大减；2师常败，在昆山；在南昌的只有3、14师，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兵力大不及蒋。他写道：“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个意见没有被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采纳。后来，大革命失败的结果也为周恩来言中。

“四·一二”之后，中国共产党马上变成了地下党。周恩来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离上海，到武汉去，或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他穿着长袍，戴上礼帽，俨然一个商人，搭乘一艘英国的轮船，去到武汉。

4月27日到5月9日，中国共产党刚刚在武汉开过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忽视农民土地问题，但是会议没有作根本的纠正，仍旧忽视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周恩来没有出席中共五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到武汉后，5月22日，就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25日的常委会议上，决定周恩来任军人部（军事部）长，并决定他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

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用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了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武装叛变，虽然已经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军击退，但是长沙的许克祥又发动“马日事变”，解散湖南省工会、农会等一切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农村发动武装起义。

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武装起义，这在当时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确是创见。

6月1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意见。

6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提出：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

但是这些重要建议，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

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也就是不再由陈独秀领导，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但是，为时已经晚了。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头汪精卫也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也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是怎样提出来的？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他说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和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军委提出了这个建议，而当时军委的领导人正是周恩来。提出的时间是7月中旬，是对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反击。

聂荣臻说：“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同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5日（或24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前去领导。

周恩来5月下旬离上海后，不久邓颖超也从上海到了武汉。这时又要分别了。邓颖超写道，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由陈赓陪同，乘船东下。浩淼长江烟波万里，波涛翻滚。面对这大江烟水，周恩来看着远方，思绪起伏，他将要前去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击武装的反革命，挽救革命的危局。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起义的意义将远远超过起义的本身，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将从此诞生，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7月26日，周恩来到九江。27日到南昌。在南昌按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

“七一五”汪精卫反共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内，也充满了火药味和血腥味，革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和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两支革命情绪高涨的部队，当时集结在江西九江一带。汪精卫和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到庐山，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通知叶挺、贺龙到庐山开会，阴谋解决这两支部队。这个情况被张发

《聂荣臻回忆录》上卷，第60页。

邓颖超，《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奎部黄琪翔第四军的参谋长叶剑英知道了。

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担任教授部副主任时，曾经向共产党员熊锐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熊锐和其他党员认为叶剑英是倾向革命的优秀军人，是可以吸收入党的，但是也有的党员认为叶剑英是蒋介石嫡系的领导骨干，要经过长期考验才行。1927年，叶剑英又向一个老党员提出这个要求，这个老党员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叶剑英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吸收进党。7月上旬，党组织批准叶剑英为中共党员。

这时，叶剑英知道了汪、张的这个密谋，就连夜找到叶挺，告诉给他，两人商定立即通知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碰头。五个人坐在一只小划子里，明似游湖赏景，实是商议对策。他们决定，贺、叶不上庐山，立即将部队开往南昌。

27日，周恩来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看望贺龙，同他谈到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贺龙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坚决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于就怎样干。

这样，起义军方面的兵力有：贺龙的第二十军七个团，叶挺的第十一军廿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还有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共计两万多人。敌方在城内的兵力计有：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王均第三军的七十三团、七十四团和金汉鼎的九军一个团等，共三千多人。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在南昌的国民党军，在拂晓就占领了南昌。

起义军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因为驻在马回岭，没有赶上夜间的战斗。8月1日上午，聂荣臻赶到七十二团见到团长周士第，传达了起义决定。周士第立即率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一个重机枪连和七十五团三个营，到南昌同起义军主力会合。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这一天，发布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中说：“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在武汉时由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要运来一船军人，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所以计划就订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大的接济上。后来。1961年9月，周恩来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曾经感慨他说：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在八一起义后，要不单依靠国际找海口取得外援，而在江西就地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就好了。

当时守南昌是守不住的，敌方不论是南京政府方面还是武汉政府方面，环绕南昌的兵力都几倍于起义军。然而在南昌城外，江西、湖南、湖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很多铁路、矿山的工人也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很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但周恩来是组织性很强的，他严格地按照中央的计划执行。8月1日晚，他主持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

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同广东东江起义农民联络，会议决定走国民党兵力较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是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的。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这样。他率领几万起义军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部队到达宜黄。陈毅赶到了起义部队。周恩来同他谈话后，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王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击溃了它，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根据贺龙从南昌起义到会昌战役的表现，根据他本人的要求，周恩来和周逸群在9月初提出，同意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前委通过了这一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作为介绍人。在这之前不久，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郭沫若是8月3日在九江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后，和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赶到南昌起义军的。

在会昌，周恩来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时间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起义军主力应该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就可以了。但是会上多数人包括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用主力占取潮汕，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结果就按多数人意见作了决定，这个决定是后来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余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

己的敌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不能取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和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在这里，周恩来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注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高烧，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他们乘小船到了香港。起义军余部，一部分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另一部分，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农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这一天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七大革命失败后重新站起来

大革命失败了。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四一二”和“七一五”后，相继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从1927年4月到1928年夏这段时间内，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人。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中国共产党淹在血泊中。

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没有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没有变。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后，城市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都是它的主要支柱。大城市仍旧保留着“租界”；海关大权仍旧在外国人手中；外国在华仍；日保有领事裁判权。很多重要经济命脉如煤，铁、布、铁路、航运等主要仍由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经济仍旧是依赖于帝国主义列强。

国内，进入了国民党内部军阀大混战时期。

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己是全国一统，实际上却是派系林立，群雄割据，拥兵自重，各霸一方。拥有重兵的除了有蒋介石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四大系外，还有一些小系，如程潜、唐生智、张发奎等。1928年，四系联合战胜不是国民党的奉系张作霖，然后四系又时分时合，相互混战。

1928年，程潜的湘籍第六军掌握了湖南省大权。5月，桂系李宗仁假称请在长沙的程潜到武汉开会，把程潜扣押。蒋介石同程潜本来矛盾很大，就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免除程潜本兼各职。这是蒋、桂的一次勾结。但是蒋、桂都要夺取湖南、湖北这块地盘。李宗仁派鲁涤平接任湖南省主席，蒋介石把鲁涤平拉到了自己一边。1929年2月，以李宗仁为首的武汉政治分会撤了鲁涤平的职，用何键为湖南省主席，桂系控制了湖南。蒋介石用中央政府名义下令查办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任免湖南省主席。这就发生了三月开始的蒋桂之战。结果，桂系失败，李宗仁跑到香港，白崇禧、黄绍竑也逃到国外。

蒋桂战争之后，发生了蒋冯战争，同时发生了张发奎与桂系联合的反蒋战争。冯玉祥战败，表示“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在南方，蒋介石在1929年9月中调张发奎的陆军第四师从宜昌开往陇海路，打算乘机解散它。张发奎发觉后举兵反蒋，向南到达粤桂边境。在国外的李宗仁、白崇禧乘机联络张发奎，重占广西。张桂联军沿西江进攻广东，打到广州郊区。蒋介石急派何应钦率军入广东同陈济棠联合，打退张桂联军。12月底，张桂联军退入广西。

当张桂联军同蒋介石军队对峙的时候，12月初，郑州的唐生智和安徽的石友三也举兵反蒋。石友三还把军队开到浦口，隔着长江炮轰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介石大吃一惊，调刘峙率军打唐生智，还收买阎锡山配合作战。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石友三投降。

1930年4月开始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东起山东，南达长沙，西至襄樊，绵延几千里，战火纷飞。作战双方各有大军六七十万，势均力敌。这场大混战打了七个月，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难以数计。最后蒋介石军队取得了胜利。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割据仍然存在，终蒋介石统治大陆之世，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国民党将领发出反蒋通电：

“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权威，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人之党，中央成一人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蒋自主中枢，政以贿成。政

府官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人，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曩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干破坏无余。”“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备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介石对于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不发一饷，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产无一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自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心。自蒋氏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四亿二千万元。”“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

这是国民党内自己人说的话。

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人被大批地屠杀，但是中国共产党仍旧存在，在很多地方仍然有党的组织，有党员。中国的根本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没有解决，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谁来救中国、救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

人民盼望着共产党，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革命的旗帜又高高举起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毛泽东说，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突然袭击，使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8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内正处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中，而会议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集中很多的同志，全面地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系统地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所以放在莫斯科开。周恩来是大会的筹办人之一，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六大的政治决议案说：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这次大会，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评价的：

“1928年7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总任务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指出了主要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当时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组织问题的报告。他说：“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但共产党人将在“英勇的长期的反抗中重新得到新的力量的结合”。报告指出了当前组织工作存在的问题，如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组织上的错误倾向——命令主义、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惩办主义、反知识分子倾向等，提出今后党的组织任务，必须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战斗的革命党。要求各地党组织对建立红军和乡村苏维埃的工作予以极大的注意。

周恩来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他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另一种是“抹煞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他说：“目前任务在争取成千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秘密组织工农武装，加强敌军工作，特别是士兵工作。他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指出红军的来源应包括游击队的扩大和军阀队伍的倒戈，一定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方能有巩固的红军组织；红军的建军原则，一要改变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可以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要无产阶级化，三是要有政治工作。总之，“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常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还兼任了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还有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被选为候补常委的有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工人化”，在六届大会后的政治局第一次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苏兆征 1929 年 2 月便去世了，蔡和森 1928 年 11 月不再担任常委职务。由李立三补上。所以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李立三，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张国焘。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起不了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80 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应邀撰写《周恩来》条目稿。胡乔木审定时对六大后加了一句话，“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胡乔木说，有的老同志当年在上海工作了解这情况，说到过，李维汉也说，当时“政治局的决策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领导的革命斗争开展了新的局面。

周恩来重建中共中央机关蒋介石国民党建都南京，江浙一带成为他严密统治的地区，上海是它的经济中心，军警遍地，捕房林立，统治森严，国民党政府同“租界”的殖民地政府互相勾结对付共产党。另一方面，这里的“租界”地区较大，华洋杂处，政出多门，敌人营垒内部矛盾很多，可以供革命

者利用，再加市内人口复杂，不查户口，住房易找，便于秘密活动。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机关，设立在上海。

建立起和维护好中共中央机关，这是极重要的。这一重任落在周恩来的肩上。

1927年5月周恩来到武汉后，主持成立了中央特科。特科下逐渐建立了四个科，第一科建立最早，同中共中央的关系最密切。它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人，处理善后，租家具，打铺保，做生意，以至对牺牲了的负责同志收殓，料理家属生活等。工作既多且杂，又必须作得稳妥、机密，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中央的安全。周恩来1927年11月到上海后，就继续主管特科工作。中共六大后，他陆续使机构发展完善。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处所。周恩来在1928年11月安排熊瑾玎、朱端缓夫妇用湖南土布土纱商人的名义，租了公共租界的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门上挂着福兴商号的牌子。这里地处上海闹市中心，隔壁是大戏院天蟾舞台，整天锣鼓喧天，人来人往。国民党特务决想不到，这地方竟是他们日夜搜寻的中共中央核心所在。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等经常来到这里开会，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也参加会议。离这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周恩来在这里同各省领导人谈工作。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同志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所在。就在上海这个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中共中央、团中央、中共江苏省委（也管上海市）纷纷设立机关，开展活动。

不但设立机关的地点选择得巧妙，而且对调用人员特别重视。据朱端缓回忆：

六大后不久，党把她从武汉调到上海，协助熊莲可（当时是中共中央会计，负责政治局机关机密工作，大家称他为“老板”），操持作掩护用的福兴商号。一天，熊瑾玎带她到一座房子，在一个大亭子间里，见了几个同志。有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问了她一些家常话，如“哪里人”、“上过几年学”、“到过什么地方”等。这个人浓浓的剑眉，嗓音宏亮，脸上挂着和蔼的笑意。问到她年龄后，他爽朗他说：“哦！你这小妹子比我整整小十岁哩！”她听后想，这位领导真像一位平易可敬的老大哥。这天给她的任务是为会议放哨。散会后，她问熊瑾玎：“开会的地方是什么机关？”熊瑾玎轻声告诉她，是中央军委机关，和你说话的是军委主席伍豪（周恩来）同志。经过在军委机关的一段考察，才把她调到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工作。“那时政治局机关经常开会，常来的有恩来、小平、杨殷、立三、彭湃等领导同志，每逢这时我就一人兼起放哨、打开水、准备午饭这三项任务”，“恩来同志来的次数最多”。一次周恩来对她说：“小妹子，这个开会的地方可是中央最重要、最机密的机关，你在工作中要胆大心细、一丝不苟呀！”朱端缓把心里话倒出来说：“我是乡里人，没见过世面，万一出了差错，我……”周恩来笑了，说：“你这个妹子呀！你这个妹子！你很机灵，我都注意到了。你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我也了解了。至于怎样更好地保护这个核心机关，我让有关同志找你谈谈。”没几天，周恩来派人教朱端缓学会了放置警号、如何在传送机密文件时防止“抄靶子”（特务在路上对行人搜身）等。这个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用了两年多，始终没有被破坏，直到顾顺章叛变，才废置不用。

建立起中央机关的同时，要恢复和发展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下面几个关键问题。

提出要思想建党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要使革命重新兴起，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是朋友、今日成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突变关头肖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这也是中国革命实际的要求。再一点，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城乡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人数特别多。中国共产党如果拒绝农民群众入党，就不能在广大的农村立足，就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政党；接受农民入党而不加以思想上的改造，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中共六大后的斗争，实际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 1928 年 11 月，党员成分中已有 75% 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思想改造问题十分突出。在中共六大决议中，提出了“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六大后，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其中第四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突出地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文中说：

“要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文中提出首先要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极端民主化，正是农民的散漫性的表现，作为党员却对党的决议随便不执行，没行得到党组织的许可却自由行动等。“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事事讲“平等”，实际上是绝对平均主义，“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须严厉地肃清”。文中根据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指出许多同志的思想动摇、心灰意懒，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情绪。

“中央受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委托，坚决地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确的倾向继续猛烈争斗，尤其在党内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毛泽东在 1928 年 11 月 25 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

相同。中共六大后，随着党、红军、根据地的扩大，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大量农民进入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从红军来说，开始建立时主要成份是北伐军，后来大量农民以及起义过来的士兵加入红军。所以，不论是党内或者红军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作风都大量反映出来。斯大林是长期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1940年周恩来在苏联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是“农民党”。周恩来回答说：党在农村，但是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经过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决定的不是成分，而是思想领导。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抓住思想建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

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自首告密叛变的个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脱离社会，上级机关很多成了空架子，完全与群众生活隔绝。从中央到支部，机关层层，而工作效能极其微弱。为此，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指示信，指出“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队中心区域做起”，“要能在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动起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以发展到行动，并在这一艰难困苦的工作中训练我们的战斗员”。他认为，假使我们能在每一地方。得到几个能深藏在群众中、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同志，则便是仅仅这几个同志，便是仅仅一两个工人支部，也会使这一些组织成为这地方工作发展的核心，总之，要深入社会，深入群众，使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

解决中共顺直省委的问题

“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顺直，指的是顺天府、直隶省，工作范围实际比这大得多，曾经包括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广大地区，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五四运动后，顺直是北方铁路、矿山工人的革命中心。是同反动军阀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地方。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发生急剧变比，顺直的中共党组织遭奉系军阀残酷镇压。北京发生“四二八”惨案，李大钊等被捕，北力“局受到严重破坏，如天津的党组织先后九次受到敌人袭击，一百多党员被捕，二十多人遭杀害。而顺直省委领导人彭述之执行陈独秀的那一套，实行家长式统治，很多党员政治受抑制。情绪低落。“八七”会议后，纠正了右的错误。顺直许多地方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行动。结果，党内思想十分混乱，闹个人意气，绝对自由等。1928年6月，已经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军进攻北平、天津，顺直党组织竟有入手拿旗帜欢迎国民党“北伐胜利”，有的地方党组织还接受国民党党部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页。

《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委派。省委内部的混乱后来发展到组织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许多人灰心丧气，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在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旧充满了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观念，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仍旧是“八七”会议以前的那一套，极端民主化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陈潭秋和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的职权。陈潭秋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后，中共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回天津传达中央的指示。陈潭秋回去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表示不同意，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没有可能，他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决定由周恩来去巡视。

12月中旬，周恩来身穿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轮船到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他在顺直省委的党刊《出路》上发表了《中央致顺直省委信》和他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文章分析顺直党的历史和现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强调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顺直党的旧基础还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连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

他认为只要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党员们大多数会转变过来。

周恩来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做一些党员领导的思想工作，帮他们分清民主集中制同极端民主化的区别、命令主义同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同铁的纪律的区别等，引导党员用向前看的精神，以积极的态度来解决存在的纠纷，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彼此思想逐渐接近了。12月底，在天津张庄大桥附近的平房里，秘密召开了北方党的代表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说这次会的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在会上作了报告。会后，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顺直省委的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开始扭转顺直党组织的状况。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对周恩来这次在顺直工作的评价是这样的：“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到了顺直全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现在的顺直党已经较以前为进步”，“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

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江苏问题，出了乱子。

江苏问题是仅次于顺直的一个问题。当时的江苏省委兼管着上海的工作，因此，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江苏超过三分之一，党员人数也多，是党

内举足轻重的一个省委。

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从李维汉那里得知中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他感到不妥当，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提出，要中央政治局重新讨论。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江苏问题。

据当年的会议记录，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不同意中央兼江苏问题，故要求开今天会再讨论。”

周恩来的理由是：（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向忠发、李立三认为中央兼江苏工作可以得到实际经验，但中央如果只注意实际，这是不够的，中央对全国的政治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2）中央兼省委，这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中央对每个具体斗争都要去指导，反而得不出工作的中心。

（3）兼省委会妨碍中央进行本身的工作。

（4）这样会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央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

周恩来主张加强江苏的工作，但不是取代中共江苏省委。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向忠发、李立三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也说明周恩来当时在政治局中能起主要的决策作用。

但是，中央政治局1月3日的决定已经传出，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有的说如果中央硬要兼省委，就由中央去另组省委。省委提出了反对向忠发、李立三。事态的发展，变得十分严重。

周恩来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以上举动。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解决省委同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江苏省委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当时还有江西问题、浙江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省的党组织内的问题，经过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这些问题一一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支援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8年1月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贺龙在1927年11月到了上海。上海白色恐怖

严重，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打算派贺龙到苏联去学习军事。

贺龙说：“还是让我回湘鄂西搞队伍吧！”

周恩来支持贺龙的意见。他在1928年1月6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张派贺龙回湖南开辟根据地。1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会后，周恩来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要他和贺龙等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派卢冬生护送他们前去。贺龙到湘鄂边后，1928年3月底，就组织了三千来人的革命武装，攻占了桑植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周逸群。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后，写信告诉他们目前形势和党的路线、任务。1929年3月，起草了中共中央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信中告诉他们：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走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

“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单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

这封指示信中对他们说，武装斗争“仍然是一个游击战争的局面”，“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过去曾经发生、今后还容易犯而应该注意的，一是脱离群众，二是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三是散漫而缺乏组织。“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在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

关于军队的训练，信中说：“红军的军事训练不能同于军阀军队的方式，施行强迫的和机械的军事纪律，应在党员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得到全体兵士的拥护。”对军队中的党员要训练和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他们不但自己严格地遵守军队纪律，还能成为士兵的模范”。

不仅对湘鄂西。六大后周恩来领导军委和组织部的工作、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曾不断地派出干部去帮助他们建设红军。如派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分别到鄂东北和广西等地，加强当地红军工作或开创革命根据地。1929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军委在上海秘密办了三期军事干部训练班。每期三十多人，时间三个月左右。学员由苏区、白区的地方军委选送参加。训练班的地点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交叉口后侧的一幢三层花园洋楼里。具体工作者彭干臣的掩护身份是武汉驻沪“蜜蜂经理处”经理。这幢三层楼的底层是“经理”办公室，摆设整齐，学员住在三层，二楼后间是上课的地方。周恩来到这里时，总是化装成商人，先到底层办公室洽谈“生意”，然后上楼讲课。每期训练结束，大部分学员派往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领导干部。例如派到洪湖苏区工作的许光达、孙一中等，都是训练班毕业的。

这种军事训练班，到1930年3月周恩来去莫斯科才停办。

周恩来在上海期间，除了办军事训练班外，还主持筹办过党的干部训练

班和特别训练班，审定讲授提纲并讲授“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向各地中共党组织和苏区输送党的干部和政工干部，参加过训练班的有唐宏经、王立功，金贯真、恽雨棠、吴亮平等。

周恩来支持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出后送往各革命根据地。

周恩来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各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给予尽可能作到的支援，还筹划组织了对处于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下的革命根据地的物资支援工作，指示有关省委在根据地周围建立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店铺，向根据地输送物资，并逐步建立起中央同各地红军、根据地的交通联络网。

解决红四军的问题

周恩来对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的工作，一贯是支持的。他在1929年3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信中，就推荐了朱、毛红军的经验：“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这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了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要调朱德、毛泽东到中央的决定，曾经由周恩来起草过致四军前委的信。朱、毛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到四月，向忠发又起草了这样一封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时，周恩来提出“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修改，周恩来就改为如果润之、玉阶两同志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红四军前委派一个得力同志到中央来，以便讨论问题。这样，就改变了要将朱、毛调到中央的作法。

朱、毛红军，即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当时在全国红军中是最重要的一支部队。但是，在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都存在着分歧，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五月间，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这一争论发展得十分严重。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争论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没有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在8月21日就为中共中央写了《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先讲了当时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然后批评说：“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之下，你们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他解释了“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认为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但并不是说便没有党内民主了，不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了，并对“党管一切”的口号、军委和前委的两重组织制作了说明。由于已经知道陈毅将来中央汇报，信中说：我们将等陈毅同志到后，同他作更详细的讨论，然后再给你们指示与批评。

不久，红四军七大选出的前委书记陈毅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8月29

日，周恩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周恩来同陈毅进行了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朱德、毛泽东两人仍旧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嘱咐他：回去以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定，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这便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信中分析了政治形势：军阀混战、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红军必将会坚持和发展。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信中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提出了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任务，大量农民参加红军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并且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陈毅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把这封指示信带回到红四军前委，并请回了毛泽东。11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前委，报告中共中央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后来，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九月来信对于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对于红军的建设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中共六大后经过艰辛的工作，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湖北、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八省127个县，在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十省的162个县有游击活动。

在全国，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了10万人。

八纠正“立三错误”

1930年春天，周恩来去照了一张相片。别人照相片，都要求照得像自己，周恩来照相片，却想方设法要照得不像自己。

拿到相片后，他给陈赓看，问他相片上是谁？并且告诉他相片上这个人是在黄埔军校的熟人。陈赓看了半天认不出是什么人。

周恩来说：“可以了”。于是，他就拿这张相片，托人去向国民党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

3月初，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去法国、德国，但是实际目的不是到法国、德国，而是途经法，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按照当时参加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维汉所说，是“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的一些分歧问题”。

4月，周恩来到达德国。应德国共产党的约请，他在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文章中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情况。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涨。还专门说到：“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工农群众正为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中国的革命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政权。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德国共产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为远在东方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而高兴。

5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参加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解决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处理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于解决中山大学派别斗争问题而同共产国际发生的分歧，以及留学生等其他事务工作。

7月5日，周恩来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在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在联共代表大会作报告，这在当时是只有兄弟党的领袖才能享有的荣誉。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中国革命“主要的革命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他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周恩来说：“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他提出，在党的内部，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右倾，“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

正当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国内，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就独断专行了，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政策越来越“左”，最后发展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这种错误，从根子上来讲，要追溯到中共六大。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上

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前面也说过，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次要方面，这些缺点、错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就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左”的错误。

中共六大后不久，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任务的提纲》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理论，片面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认为要反对右倾。共产国际六大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开展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1929年4月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要求不调和地坚决反对右倾。7月，共产国际执委开第十次全会，说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的指示，是正确的”，要求“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中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争”。

共产国际的东方部下面分三个部：远东、中东、近东，远东部是米夫负责，实际上管中国方面。米夫7月10日在会上发言特别要中国党反对右倾的斗争，说：“为了更加认真地开展群众工作。中共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右倾性质的动摇。”1930年3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依斯基讲话说中国共产党不应“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提出需要“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4月，米夫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号召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决1929年2月、6月、8月、10月，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中央发了四封指示信，内容一封比一封“左”。这四封信，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是有很影响的。特别是10月26日发出的第四封信，提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1929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四号通告，就提出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信，深重地影响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实践，它们也给了周恩来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国际的指示是必须接受和服从的。周恩来在组织上当然也是这样。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熟，对于国际指示有相当的盲目性，认为总是正确的。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周恩来也曾起草过中央通告，如1929年共产国际2月8日的指示信来到后，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第三十七号通告，认为国际这个指示“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共产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来到后，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了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这些通告在国际指示信的影响下，对革命形势都作了过高的估计。

李立三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现在革命的发展，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着新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样，就要很快把全国武装暴动提到行动日程上来。

但是，周恩来比较冷静，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赞成不顾一切地蛮干，他说：“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0）》第二辑。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集，第61页。

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就是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中，他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的判断，也并不是认为时机已经到来，而是要“准备”和“促进”它的到来。这是周恩来和李立三之间的基本区别。

正是由于周恩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此，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就同在国际影响下极力要搞武装暴动的李立三发生了争论。

李立三提出要在南京搞武装暴动，周恩来反对。他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有军委干部曾中生等和中国共产党在南京负责军事工作的人参加。大家分析了党在南京的工作情况，包括士兵组织、群众工作等，认为暴动是困难的。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和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南京乃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统治力量雄厚，认为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否定了在南京举行暴动的可行性。

1930年2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坚决决定”；“目前要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同时也要注意山东、满洲工作的配合”，“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领导力量”。周恩来在会上则强调力量不足。他说：“江苏主要是农村不发展游击战争”；“武汉农村要纠正地方主义，城市铁路、海员工作不够”；“满洲缺点。反帝束缚在反日的合法运动内，铁路工作不够，大连、抚顺工作没有，这样缺点不克服，决不能组织满洲武装暴动”。

当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李维汉回忆说：“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争论。”他还用《三国演义》中的一句话说：“法效直若在，必能制主东行”。意思是如果周恩来在上海，立三的错误就能被制止。

周恩来后来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说到：在过去政治局中，我同李立三是有争论的，我去年两次提出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定要反“左”倾；对革命高潮问题，我在江苏代表会上，在政治局中，都主张按照共产国际的主张，中国现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

实际上，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中国共产党虽然经过一两年的恢复重建，得到不小发展，红军也纷纷建立，但是同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相比，实在相差太远了。如果在城市举行暴动，必败无疑。就拿李立三所谓的“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来说，湖北省会武汉的力量对比：国民党驻有大量军队，还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总兵力相当于十个欧洲的现代化师。而革命力量方面呢？共产党员只有200名，赤色工会会员150名。这一点力量进行武装暴动，岂不是儿戏？怎么能取得胜利？

周恩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时候，李立三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周恩来去了莫斯科，李立三就在6月11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通过了《目前革命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个决议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规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周恩来在莫斯科，继续阐述他对中国革命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同国内李立三的看法是对立的。李立三认为“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周恩来则在联共（布）十

六大的报告中对中国革命高潮，只说是“正在成熟中”，李立三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周恩来则说“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还有他不平衡的特点”。李立三强调“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作斗争。周恩来认为“党内右倾仍成为目前主要的危险”，但“同时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和关门主义”。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大纲中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但“伴着革命发展而产生也有‘左’倾盲动情绪与闭关主义”。

6月12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则认为，“苏维埃的政权实现自广州公社后已成了半殖民地中国实际斗争的目标”，“要有决心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与临时中央政权”。

周恩来的认识是正确的，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李立三“左”的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左”的错误，所以争论是艰巨而复杂的，周恩来在莫斯科需要作巨大的努力。他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一直讲了三天。介绍中国国内的实际，使共产国际领导人了解中国的情况。

李立三主持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送到后，共产国际进行了研究，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于是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转告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开始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周恩来和瞿秋白参加了这项工作，这就是有名的1930年7月23日决议。决议说：“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就是总起来看，这些运动也还不能够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统治。”

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直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议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

共产国际要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去纠正。

1930年8月中旬，一列从德国到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奔驰在苏联广袤的大地上。车厢里坐着一个年轻英俊、两眼炯炯充满机敏和智慧的中国入。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先是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成为从柏林到中国东北的乘客坐在这趟列车上。这样，既是从安全需要考虑，也符合护照的情况。32岁的周恩来，已经是饱经艰险、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了。他机警地扫视了同车的旅客，又看看窗外掠过的白俄罗斯盛夏景色，而心中，却翻腾着今年以来在上海和莫斯科的经历，为了谨慎起见，当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周恩来利用列车停留的时间，下车又同共产国际东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取得联系，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答：“没有了，据国际7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这样，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精神回到国内。

火车到东北后，周恩来从大连搭轮船去上海。

轮船到青岛的时候，正是清晨，旭日东升，碧波万里。船上喊叫乘客们到甲板上来做早操，周恩来来到甲板上，意外地发现帅孟奇也在，帅孟奇是在苏联学习后归国搭船的，周恩来就悄悄地站在帅孟奇的背后，趁机告诉她，到上海后住五马路某旅馆，我马上派人来接头。

帅孟奇在上海五马路按指定地点住下后，就有一个女交通员来接头，叫她不要外出。第三天早上九点钟，周恩来头戴博士帽。衣着朴素，亲自来找她谈话，然后分配了工作。这次谈话，帅孟奇在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周恩来对她谈到当时形势时，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大革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了我们的党组织，使我们受到敌人残酷镇压和破坏，牺牲很大。不能再空喊“革命高潮马上要到来”的口号了，要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经受革命的严峻的锻炼与考验。在苏联学习的理论，要在实际中学会掌握和运用。当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为着这个目的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是要轰轰烈烈，而要扎扎实实。

这是对形势和要求的一番很正确的谈话。李立三的错误，问题正在于追求轰轰烈烈，结果使中国共产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以南京为例，周恩来走后，李立三还是发动了南京暴动，勒令曾中生领导的学兵营的党组织举行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曾中生反映说，这点力量，根本是做不到的。李维汉也提出：暴动后还是把队伍拉到农村去吧。但是李立三批评他们都是右倾。结果，暴动使地下党组织暴露，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100多人，南京的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

李立三制定了一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果，使得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和牺牲。在准备武汉暴动过程中，被捕党员60人，其中省委级干部5人，特科人员1人，农运干部13人，学运干部3人。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有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十一个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以下的组织被破坏更多。党员大量减少。如江苏省，从4月到9月这半年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有3000多人。攻打中心城市的各地红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红二军团由于离开根据地去打武汉，部队由16000人减少到3000多人，丧失了洪湖根据地，只好退往鄂西北山区。红七军由6000多人减少到2000多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十军在攻打九江时失利，由20000多人减少到3000多人。“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已经引起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强烈不满。

周恩来8月19日回到上海。26日，瞿秋白也回来了。他们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的七月决议和负责贯彻这个决议的任务。他们先是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开始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

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

9月1日第一封信中说：“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

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9月4日第二封信中说：“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

9月9日第三封信中说：“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

9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9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七月决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主要错误，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开始纠正了。

9月24日到28日，上海租界内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黑漆的竹篱笆的院墙内，和平常一样静谧幽雅，但实际上，屋子里却是热气腾腾，中国共产党正在秘密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今天还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说今天还不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的形势。”他说：李立三是“把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导致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来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他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若干年后，李立三回顾当时，说：“当时我很幼稚，已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对李立三是善意的。尽管李立三趁周恩来不在国内，自己专擅政治局的那几个月，对周恩来横加指责，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还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并且粗暴地几次致电共产国际叫周恩来迅速回国，回国后要把周恩来调出中共中央岗位，现在周恩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始终认为，李立三是革命的同志。在李立三、向忠发等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周恩来就代为起草了中央致共产国际信，说他们同共产国际认识一致。在李立三承认了错误但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时，周恩来就为他写信向国际疏通。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后来，1945年在中共七大开幕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评价是：“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1930年9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共产国际却对这次会议和领导这次会议的瞿秋白、周恩来横加指责，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王明，事先知道了这个信息，立即摇身一变，从拥护三中全会变为攻击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他倚仗着背后有米夫的支持，在党内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拉帮结派，制造混乱。

周恩来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尽力对各方面做工作，维护党的统一和安全，这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从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后，因为有共产国际支持，实际上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王明把他的宗派人员或者是同他沆瀣一气的人，纷纷派到中央各部门和各个革命根据地，掌握大权。周恩来进行了抵制。如王明要向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派人，就没有成功。周恩来讲过这件事，说：王明要派黄弟红到中央军委，我们挡住了，如果进军委，我们就全部被破坏了。黄弟红是个黄埔军校学生，他已经和蒋介石勾上了，开始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从打进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人员那里知道他给蒋介石写信，要蒋派人同他接头，可以把中共一网打尽。我们告知王明，王明还不服。我们设法取来了黄的这封亲笔信，拿给王明看，对了笔迹，王明才没有话说。这样，当周恩来在上海时，中央军委机关一直掌握在可靠人的手中，没有被破坏。

从1927年到193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周恩来战斗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上海。斗争是残酷的，不少同志被逮捕，有的英勇牺牲了。周恩来说：“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每牺牲一个战友，他想的是把战友的工作担起来，继续战斗。

为了斗争的需要，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逐渐建立起情报科（第二科）、行动科（第三科）、交通科（第四科）。情报科专作情报工作，陈赓曾担任科长，化名王庸。出色的工作，使他不论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场所，还是外国侵略者的租界巡捕房，必要时可以随时进出。敌人的机构里建立了共产党的关系，有多次眼看着党的机关要被破坏了，党组织能事先得知，及时转移；有些党员被捕了，能通过关系，设法救出。

行动科是专做保护工作的。遇有党的重要会议，就派出武装警戒，有时还要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不仅自己备有手枪、催泪弹，有时还能从国民党驻浦东的炮兵营里调来机枪。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五人被捕，当晚周恩来就召开紧急会议同特科负责人研究营救办法，另一方面侦察告密者叛徒白鑫的行动，准备予以制裁。8月28日晨，敌人要把彭湃等队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得知这一情报后，安排了途中“劫法场”营救。后来由于送武器的人来迟，没有成功。四同志于30日被敌人杀害。周恩来流泪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刊载在当天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叛徒白鑫深知特科的厉害，怕自己性命难保，恳求国民党主于让他逃往意大利躲避。出国时间定在11月11日。行动科侦知了白鑫的住所，周恩来到现场观察后，交给陈赓执行。就在这天晚上，白鑫由敌人保护着跨出家门走向汽车的当口，被当场击毙。

交通科建立了中共中央与各省委、各革命根据地的交通联系网，保证了党内的联络。

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事业，也是周恩来在上海时主持创建的。中共六大后，周恩来在上海找了李强，要他自己设法制造无线电台。李强经过刻苦努力，1929年下半年搞出了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随后，李强被派到香港建立电台。在这以前，李克农在周恩来领导下，介绍张沈川到上海一个邮电局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张沈川成为党培养的第一名掌握无线电报技术的

地下党员。1930年初李强在香港建起电台后，同上海地下党的张沈川接通了电报。到1930年，中共中央已经能同中共南方局、长江局、北方局通报。1931年春，曾三、伍云甫、涂作潮被派往江西苏区从事无线电工作。这时，中央苏区领导已经在反“围剿”中缴获了一些无线电设备，后来又以俘虏来的无线电人员为主，编成一个无线电训练队，王净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曾三、伍云甫等三人到后也参加进去。到1931年八九月间，开始了同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周恩来领导特科的工作，派人打入了敌人的心脏、一次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共中央。

南京中央路305号，大门上挂着“正元实业社”的牌子，实际上是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央党务调查科。主管日常工作的特务头子是徐恩曾。但是共产党员钱壮飞却成为他的机要秘书，掌握着这个特务大本营的一切机密和情报。1931年初，中央决定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嘱咐顾顺章完成任务后速回上海。不料顾顺章违反地下工作纪律，送走张国焘后在武汉鬼混，钱花光后就在汉口游艺场登台耍魔术，被叛徒尤崇新认出。被捕后，顾顺章立即叛变，并说有重要机密要面报蒋介石。武汉特务头子立即向南京发报。恰好这天是星期六，晚上徐恩曾外出花天酒地，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钱壮飞见报后，知道顾顺章了解不少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和领导人住处，党将遭受巨大灾难，立即叫女婿刘妃夫星夜赶往上海，告诉中央。钱壮飞又向南京、天津等地的有关地下党员发出警报通知，然后也赶到上海。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陈云等的协助下，果断坚决，分秒必争，迅速采取应变措施：一、把所有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原址。二、把顾顺章知道住址的领导人、秘书、家属全部迁移。三、把可能被顾顺章破坏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站以及地下党骨，干全部转移或撤离上海隐蔽。四、果断处置和隔断顾顺章在上海的一切可以利用的亲属和社会关系。五、终止使用顾顺章知道的联络暗号和秘密工作方法。后来，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把顾顺章押到上海，调动一切军警宪特，会同英、法租界的巡捕配合，进行全市性的大搜捕。但是，都已人去楼空，到处扑空。

周恩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时，是一段十分紧张、英勇、艰辛的历程，是他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泊中重新站立起来，继续战斗，并且发展壮大。其中包含着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很多烈士牺牲了。1937年，国内外形势变化，周恩来到南京进行国共和谈，当他专门到烈士溅血的雨花台凭吊时，一边走，一边嘴里念着他们一个个英名——代英、中夏、登贤……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判期间，曾到上海故地重游，往事历历在目。他对熊瑾玎、朱端绶说：“当年中央政治局机关的那段时期，令人难忘。你们抽空去看看那个地方吧，最好在那里照张相片送给我留作纪念。”他派司机祝华开车送他们去，要祝华照了几张相。周恩来看了相片上阔别十多年的旧址，对这几年的革命经历，充满了缅怀之情。

九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领导

从 1927 到 1935 年，开始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在地方开基建业；后来毛、周同在中央苏区工作，仍是周恩来处于领导地位。周恩来尊重毛泽东，支持毛泽东从事军事领导工作。1935 年后，毛泽东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周恩来协助、配合毛泽东，在军事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29 年 12 月古田会议后，红四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周恩来对此是感到欣慰的，这可以从他的一封信上看出来。1930 年 2 月 1 日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犹东省委指示信中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这年 1 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了。这期上全文登载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在文章前边加了编者按，说道：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是过去没有看到过和听到过的，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应当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1930 年 8 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后，比过去更加重视建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了。在 8 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提出要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统一党的领导，在苏区成立中央局来指导红军和苏区的工作，并且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这时候，他和瞿秋白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酝酿三中全会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时，提出了毛泽东应该成为候补人选，后来在三中全会上得到通过。

9 月 28 日，三中全会结束了。两天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红军当前任务不仅是发展游击战争建立红军，而且要进一步加强红军，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只注意发展而下注意巩固与加强；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接着，10 月 3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10 月 17 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周恩来提议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周恩来等组成苏区军委，会议也同意了。这时候，中央军委已经得知国民党政府在湖南、湖北、江西调动了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将要对苏区进行“围剿”。10 月 29 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击破敌人的“围剿”，提出要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弱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各个击破”的方针，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中，指定在项英没有到苏区之前，由毛泽东为中央局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统集中到中央局。

这时，在中共中央发生了王明等依恃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攻击三中全会的问题。周恩来忙于处理党中央的纠纷。项英到中央苏区后，1931 年 1 月 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为委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

副主席，宣布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周恩来虽然名义上是中央局书记，但仍在上海，还离不开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在苏区，国民党第一次“围剿”已被打败，第二次“围剿”又在准备。周恩来起草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第一个通告，指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于革命的最主要的危险”，“动员和集中一切力量来击破‘围剿’，要看成刻不容缓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在2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常委。这一年，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连续取得胜利。

从以上可见，提议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中央局统管军事政治；提出由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在在表现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的支持。

1931年4月到6月，连续发生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后，周恩来已经很难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了。

周恩来是个著名人物，又是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领导人，各个方面认识他的人很多，但是他能在上海这个国民党严密统治的城市，生活在敌人的刀尖枪口之间，工作得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自身又安然无恙，全是凭着他的机警而富有胆略，勇敢而出色的工作方法。他根据国民党特务的工作规律，制定了自己的工作办法。例如，国民党特务一般是清晨早起、傍晚吃晚饭时间长，他就在这时间出外活动；国民党特务走大街，他穿小弄堂，上海的街道，交叉复杂，中间住宅区弄堂相互贯通，他非常熟悉大街和小弄堂的走向。邓颖超说过：上海尽管电车很多。但是她同周恩来从来不敢坐，出外都是步行。因为电车上遇到认识的人无法躲避，步行遇到“尾巴”可以甩脱。住的地方，少则凡月最多一年就要搬家，搬次家，换次姓名。邓颖超当时尽管是中央机关的总支书记，也只能知道五个同志的住址；一般干部只能知道两三个。周恩来当然知道很多。他是敌人追捕的目标。敌人知道他在上海，但是无法发现他。现在，顾顺章、向忠发被捕 139 叛变，周恩来的活动规律和办法敌人全掌握了，周恩来危险了，他必须离开上海。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安排王明取得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以后，1931年8月回苏联了。共产国际要中共中央去一个人到国际作报告，王明争着要去。如同王稼祥说的：“贪生怕死的王明，不堪当时的艰苦奋斗，又于1931年溜去俄国，住在他的安乐窝里。”上海，一些原来的中央领导人要离开。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王明提出由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周恩来离开了中央的工作，12月上旬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临行前，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同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告诉他，进攻中心城市已经可能，要他到中央苏区后攻打中心城市。随后中央又作了决议，中央苏区攻中心城市首先是要“占取南昌”。还告诉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组织上毛泽东只管政府工作。这就是说不要让毛泽东管军事。

周恩来化装成南方熟练工人的样子，身穿对襟蓝哔叽中式短衣，下着蓝哔叽中式裤子，手提一只小箱，在外滩十六铺搭乘一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从上海径到汕头。在汕头，他重新化装，装扮成一个画相先生，在交通员护送下坐火车到潮安，然后换乘轮船到大埔，再换乘小木船在清溪上岸。清溪

是党的秘密交通站所在地。从这里到苏区，要经过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封锁线，只能在夜间偷渡，走人迹罕见的山路或沟壑，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派了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在深沉的暗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葛，到达永定县的鸟石下村，再由永定交通站派人继续护送，到合溪，然后进入苏区。

周恩来的工作发生了一个极大变化。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是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斗争，提着脑袋过日子，时时处处在敌人的侦察搜捕之中，早上出了门，晚上还不知是否能够回去。现在，到了人民的天下，自由地呼吸和活动，党的领导人生活在群众之中，如鱼泳水，如鸟翔空，有自己的城池，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党组织也受到人民的拥护。周恩来到了汀州，市面繁华，商贾云集，他感到“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他要在苏区领导人民，领导红军，面对面地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争了。

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毛泽东是多年不见的老相识，他们进行了谈话。毛泽东向周恩来谈了苏区的巩固发展问题，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指出进攻中心城市一事有困难，应该先打掉地主豪绅的土围子，来巩固和发展苏区。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把这个意见电告临时中央。临时中央不接受，但也不再坚持首攻南昌了，电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中央的来电中，还附了共产国际的信，说这是国际同意的。这样就有了赣州之战。赣州之战的结果，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这以后，周恩来不但没有不让毛泽东管军事工作，而且更加支持毛泽东。1932年3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主张红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且说“漳州难守易攻”，不管战局一时发展如何，均宜定下决心，“直下漳州”。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倡议攻打漳州的电报后，十分重视，立即由瑞金赶到长汀，批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具体部署前后方的各项工作。4月初，红军总部以及中共福建省委等就在长汀省委驻地联合召开部署红军东征漳州的军事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以及省委领导罗明、张鼎丞、刘晓等都参加了。

毛泽东在会上，从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出发，分析了攻打漳州政治上可以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军事上可以消灭国民党军阀张贞的有生力量和牵制粤敌进攻苏区的计划，经济上可以补充给养等。周恩来也作了报告，指出“红军入闽作战，不是为占领中心城市，而是为消灭军阀张贞的部队，扩大我141党的政治影响，充实我军的给养和武装”。

会后，毛泽东随军出征，指挥战斗。周恩来坐镇汀州，领导支前。他同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深入各区、乡，检查动员情况。闽西各县到处呈现一派为红军东征漳州准备粮草、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上前线的热烈景象。进军漳州沿线的长汀、连城、上杭、龙岩四县，每天都有几千人挑运物资上前线，给红军战士们送水、送饭。送慰劳品的老乡们络绎不绝。还有远从江西的瑞金、会昌、兴国和福建的汀州、上杭、龙岩、永定来的农民运输队，人数之多，几乎超过了红军的一倍。

没有毛泽东的倡议，就不会有漳州战役的胜利。没有周恩来的支持，红军也不可能东征漳州。一个在前方指挥，一个在后方支援，1932年4月的漳州战役，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取得辉煌胜利的第一个战

役。

4月19日拂晓，红军向漳州西北屏障的敌军阵地发起进攻。20日，红军进占漳州。随后，又相继占领石码（今龙海）、海澄、漳浦、平和、山城（今南靖）、长泰、角尾等城镇，分兵发动群众，征集资材。

这次漳州战役，据战报资料：

俘敌1674人。缴获步枪2331支，机枪9挺，山炮两门，迫击炮两门，平射炮两门，飞机两架，步枪子弹133万多发，炮弹近5000发，爆炸弹242枚，筹款100余万银元。

红军完成攻漳任务后，不久便主动撤离漳州，回师苏区。

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对周恩来的这些举措，感到不满。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批评了“中央区的同志从容不迫的去打‘土围子’”，“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4月14日，临时中央又发出了《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又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这时的批评，对周恩来还是不点名的。到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了指示电，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

这年4月，邓颖超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临行前，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找邓颖超谈话，要她到苏区见到周恩来后，告诉周恩来有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邓颖超不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是组织上叫带的口信。她如实地转告了周恩来。这使他们欢欣的会见，加上了一层阴影。

周恩来肩负着临时中央批评的压力，继续支持毛泽东的军事设想和从事军事领导工作。7月21日，他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赴前方。当时，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25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说，应该以毛泽东任总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是朱德，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红军属党领导，周恩来作为中央局代表自然有决定权，只是毛泽东是政府主席，在部队中没有名义不便领导，担任总政委后。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就比较方便。苏区中央局接到电报后不同意，仍旧坚持由周恩来兼任总政委。这样，周恩来在29日亲自给苏区中央局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说毛泽东指挥军事有经验，有长处，“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如果自己兼总政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这样，苏区中央局才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

在军事思想上，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也是一致的，不同意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同志主张的攻取城市，指出国民党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正在筑路、做工事、修炮垒，我军应该

用迅速秘密的行动，使它们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敌军。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同志坚持贯彻临时中央“积极进攻”的要求，主张攻打城市，而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等则认为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地进攻苏区，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赤化根据地北面地区，争取在决战中有利于消灭敌人的条件。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因而才有10月上旬宁都会议的召开。会议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批评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特别是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又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的工作，由

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毛泽东感到既然中央局的同志对他不能信任，就表示请病假回后方。会议批准了他的请假。后来，朱德、周恩来在前方作战中，周恩来仍把有关的作战计划“请送给毛主席一阅”；所起草的作战文电在报送苏区中央局的同时，也报送临时中央政府。

在毛泽东离开红军的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迎战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到南昌组织的，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他分三路进军，中路军主攻，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二个师组成，共十六万人，陈诚当总指挥。另有左路军、右路军作策应。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约七万人。

2月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命令红一方面军在敌人还没有部署定当的时候，围攻南丰城。红军攻城没有成功，陈诚又派了援兵来寻求决战，前方指挥的周恩来和朱德在红军将处于敌军夹击的不利状态时，决心“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主力退却埋伏，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取得了主动。经过黄肢、草台岗两仗，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俘敌一万多人，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这次战争，周恩来和朱德仍旧沿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用大兵团伏击来歼灭敌人的范例。朱德说，这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

这时，临时中央的领导刚刚进入中央苏区，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博古在军事上一味听信李德。12月，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把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这样，周恩来就回到了后方瑞金，前方军事指挥实际上由博古、李德直接负责了，关于以后这一段时期，周恩来曾经说过，他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形式上的，实际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他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后来，1943年延安整风中，周恩来曾经检查自己，说是王明“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之所以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除国际原因外，还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所迷惑有关，周恩来是严格要求了自己。实际上，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是有抵制的。据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下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

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国民党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中共临时中央在反“围剿”中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毛泽东主张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应跳出敌军包围圈，打到敌人后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周恩来也是这样想的。他虽然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无权决定，但当他派程子华去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战争时，是这样交代的：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这样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老根据地就能保存了。

关于建立新根据地的想法，周恩来也是和毛泽东一致的。程子华回忆道：“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2月10日攻占湖南省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经摸准红军准备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在北上路上部署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等红军钻进去然后聚歼之，而博古、李德仍按原来打算不变。毛泽东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照原计划进行，应该由通道向西，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摆脱危机，在通道，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会上，李德仍旧主张“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主张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支持通过了。李德没有等会完就离开了。会后，中革军委发出了红军进入贵州的命令。博古、李德看到命令后，仍旧坚持原来意见，继续命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样，问题没有解决，于是就有黎平会议。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在黎平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去湘西，而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他对毛泽东主张的支持是强有力的。据当年的警卫员回忆说，会议中间他进会场冲开水，只见周恩来站了起来，对着李德，愤怒地拍桌子。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的情况是很少有的。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第181页。

周恩来自己后来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这以后不久，就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

黎平会议是决定性的一次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有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旬，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从组织上来说，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遵义会议结束的下一天，1月18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前后，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时，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军事上，当时大的行动往往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3月10日，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认为红军要到12日才能赶到新场，而滇军届时也将赶到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因而反对这个行动，但因大多数人赞成，行动仍通过了，晚上，毛泽东再三考虑不妥，手提马灯到周恩来那里，建议重新考虑。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又召开负责人会议，说服了与会者，取消了这次行动。此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指挥需要集中，建议成立“三人团”（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南渡乌江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毛泽东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经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的呢？大约在1935年8月中旬。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在这次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的是周恩来。他阐述了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红军如陷在这个地区是没有前途的；向南是不可能的，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在那里集结130个团的兵力；向西是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必须向北到陕甘去建立根据地。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地区，这区域有它的好处，可以使苏区建立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朱德、聂荣臻、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等都同意周恩来所提的北进的方针。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报告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的情况也说明当时从组织上说军事主要负责人仍是周恩来。

8月上旬，在开过4日至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由于积劳成疾，发高烧，昏迷不醒，经诊断是得了肝脓疡病。周恩来因病不能理事，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都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会议的情况表明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已是毛泽东。

1967年1月22日，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谈。

后来，张国焘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阻挠红军北上行动，发展到反对中央共同北上的决定，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见电后赶紧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等就赶到红三军驻地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临时开会作紧急决定，率领红一、三军迅速脱离危险地区，到达俄界。在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了打电报继续催促张国焘北上外，还决定把已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俄界会议后，陕甘支队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下，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下，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红军占领哈达铺。在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陕北有苏区存在。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以陕北为行军目的地。

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此时已经明确长征的目的地是陕北根据地，但中共中央还没有讨论决定，这从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哈达铺写的文章中，仍提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得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到陕北根据地，是在9月28日由政治局常委参加的榜罗镇会议上，这次会议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记录留下来，但后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到：“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即在陕北苏区和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研究了常委的分工问题。事先，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从此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一直是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两位伟大的军事家一直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决胜千里之外，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十致力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促使中国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关键事件，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离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八十年代，国产影片《西安事变》传到台湾，张学良看后，写了一首十分悲枪的诗：

万里碧空孤行远，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今已老，唯有清风今又返。

在这首诗的后面，张学良作了注。

“与毛彦文同看电影《西安事变》，老泪纵横，未终而去，后作诗一首。张学良。”

当时，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事件。现在，几十年之后回头来看，西安事变实在是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伟大行动。

毛泽东是这样看的：“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六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后不久，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先后囚禁于贵州息烽和重庆中美合作所，共12年，在1949年9月6日，遭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唁电中说他：“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时说：“杨虎城将军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英名将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张学良遭到蒋介石的几十年囚禁。周恩来曾经一再地向蒋介石交涉，争取他的自由，但都没有结果。

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的时候，周恩来说，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时候，周恩来又称誉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是“千古不朽的人物”。

杨虎城将军的公子杨拯民说：“西安事变的爆发，决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个必然环节。”

张学良是原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陆海空军副司令。1930年，陈赓到过东北，他的看法，张学良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有爱国心。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这时张学良并非不想抵抗，但是蒋介石给他下了命令：“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也对张学良有复电，说：“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张学良执行命令，日本侵略军没有遭到多大抵抗就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当时东三省包括现在的内蒙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7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7页。

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中国现代史大事记》。

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分)。后来,1936年3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刘鼎第一次到西安见张学良时,张学良对他说:“我张某人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这是张学良的心里话。

日军侵占东三省后,继续扩大侵略,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外不抵抗,一味打内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日军1932年1月攻打上海;1933年1月攻陷山海关,3月占领我国热河省,继而进犯长城各口;1935年策划建立了“冀东自治政府”和“内蒙自治政府”,还谋占中国的整个华北。4年中,中国丧失了东北全部和华北一部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还同日本当局有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次次承认丧权辱国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积极主张抗日。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周恩来和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陕北后,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周恩来在1936年1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上说:当前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这时,刚好张学良在不久前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的时候,他认为红军人数不多,打败红军不成问题,等到“剿灭”红军后再抗日吧!但是,同红军打了几次,都吃了败仗,东北军不到三个月被红军歼灭了三个师。张学良考虑了:为什么在长征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换成别的军队早已溃败了,红军还能打胜仗,即便打败了也不溃败?真是不可思议。他的部队被红军消灭一个师,就被蒋介石取消一个番号,他担心长此以往,东北军将会丧失殆尽。这时候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担任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他要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106师等部队的工作,在1935年的12月底,红军同驻在甘泉县的东北军已经达成抗日协定,双方互不打仗。对于几次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军官,组织他们参加了学习班。1936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阅兵式,让学习班的人也参加了。周恩来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周恩来还亲自到学习班向全体学员作报告,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抗日的道理,讲了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原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就是在学习班上分清了是非后,回去作张学良的工作的。

高福源在苏区亲眼见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军民一心为抗日;听了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话语后,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定回去把所见所闻告诉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

张学良正处于想抗日而不得的苦闷中。端纳有一段回忆:

张学良有一次从西安到南京,拜访端纳。他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说:

“诚实的人在中国没有容身之地。”

“啊,你什么时候有这想法?”端纳问。

张学良作了个绝望的姿势,说:“如果不是我的家乡沦陷,不是日本人还在践踏我父亲的坟墓,我就辞职不干了。”

张学良谈到,他曾劝蒋介石接受共产党关于共同抗日的建议。但他的这种努力却没有结果。他说:“蒋的脑袋像块花岗岩。他总是说‘我是总司令,

你和其他人都得服从我的命令！’”

少帅站了起来，脸色忧郁。他凝视窗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的士兵不愿同共产党打仗，这倒不是他们害怕共产党人的子弹。他们听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人说‘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们要打我们？你们的官长都发了财。他们扣发你们的军饷。他们有三妻四妾，坐的是汽车，穿的是丝绸，而你们什么也没有。’”

张学良缓缓地坐回椅子上，说：“共产党人说的都是真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可是老蒋总是说我们必须同共产党作战。”

张学良在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很高兴，要高福源再去瓦窑堡，带去一封信，约共产党负责人在洛川相见。高福源到瓦窑堡见到周恩来，转送了张学良的信。周恩来热情地同他握手，称赞他为抗日救国的事业作出贡献。然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表示“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这样，就有了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天主教堂的历史性会谈。

这次会谈，从晚上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参加的人有张学良、王以哲和周恩来、刘鼎、李克农。李克农、王以哲等在外间，周恩来、张学良在里间谈。开始时寒暄，周恩来说，自己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他知道，他听老师张伯苓讲过，我们是同师同年，会谈就这样谈下去，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认为在抗日问题上，有可能争取同蒋介石合作。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他们都对会谈十分满意。周恩来在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9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请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在会谈后对刘鼎说：“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他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还说，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50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还回忆起这次会谈。报道说：他说“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他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1993年1月14日，张学良还同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藤光明谈起周恩来，说：“我们有共同的性格。这就是反应迅速，我们是坦诚相见的关系。”“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

1990年12月22日，《团结报》。

1993年1月15日，《东京新闻》。

在国民党内，张学良、杨虎城一再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一直不听，最后发展到张、杨“哭谏”、“兵谏”——西安事变。

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告诉他：“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5日清晨，周恩来带领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18人，骑上骏马，冒着纷飞的大雪，赶去肤施（今延安）。周恩来后来在党内一次会上回忆说：开始我们去，是想看一看情况，我去的时候得的使命是这样的。

到肤施后，17日下午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飞行途中，随机来迎接的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这时候周恩来的想法是：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鼎。

周恩来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他住在东楼的三层楼上，当晚，他就同张学良会谈。据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应德田回忆，张学良事后对他讲了会谈的内容：

张学良讲了劝蒋没有效果，才发生西安事变，逼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看来，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他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提出的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他，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分析，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前途，应该争取和平解决，走上团结抗日前途，反对新的内战。另一种可能，就是杀掉蒋介石，这会引来新的更大的内战。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对张、杨两将军实际的积极的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实现。

应德田认为：“可以说，虽然张学良将军当初就打算只要蒋介石同意八大主张就放他回南京，但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的事。”

当天晚上，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18日，周恩来同杨虎城会见，杨虎城表示同意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主张。这天，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去电报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中共中央连接周恩来的两电后，在18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发了电报，说：“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提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主张。还说：“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一天，也向国民党、国民政府通电主张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

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杨虎城在12月29日致各县长公函中也说，蒋“曾向虎城表示”，“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并答应了六条。放蒋，大家一致了。

但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张学良会送蒋介石回南京。25日，张学良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悄悄地离开了玄凤桥高桂滋公馆，驰向西郊飞机场，卫上报告孙铭九，孙铭九赶紧去问周恩来知道不知道？周恩来惊愕地问：“我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九说有十几分钟了。周恩来立即同孙铭九乘车追赶，赶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在天空了。周恩来不禁叹息而回。

1937年2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周恩来多次到西安、杭州、南京、上海、庐山等地，一直谈到这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不仅注意同国民党蒋介石团结抗日，由于国民党是一个派系很多的政党，周恩来也注意同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特别是地方实力派加强合作，共同抗日。例如对山西阎系和广西桂系。

1937年9月，日军向河北、山西进军，八路军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到了山西，在崞县境内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今属代县）同阎锡山会谈了两次，一次是同彭德怀一起去的，一次是同朱德一起去的。当时山西属第二战区，阎锡山是战区司令长官。周恩来同阎锡山进行长时间谈话中，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阎锡山显然被周恩来说服了。谈判之后，阎锡山曾经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阎锡山还要求周恩来给他写一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仅用一天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送给了阎锡山，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感慨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周恩来同阎锡山谈判中，提出八路军准备开到敌人后方，以沫源、阜平、灵丘为中心创造游击根据地，并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阎锡山同意了，周恩来、朱德等研究了平型关战役的计划。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侧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的作战命令。25日，平型关战役打响，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阎锡山同意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商谈了游击地区。周恩来提出，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建议在绥远、察哈尔、晋北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实施战地全部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阎锡山的思想是，群众不发动起来，是个空子，群众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尤其担心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了战地动员会，山西沦陷区将来他不能掌握了。薄一波向阎锡山解释说，沦陷区已经在日军手中，你也管不了；共产党、八路军要去，你也无可奈何；不如卖个人情答应了，否则连个人情都落不到。阎锡山只好答应了。

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由东向西攻娘子关进取太原，一路由北而南攻忻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3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6页。

进取太原。10月1日，阎锡山到太原，周恩来同阎锡山频繁接触，商谈了忻口会战期间各路人马的指挥归属问题。对于保卫太原的战斗，周恩来对阎锡山等人说，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得胜利，不应用多数的兵力守城或正面堵击敌军。他一再敦促他们决心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促进全民抗战。他还亲自向广大干部、群众作宣传动员工作，薄一波写过周恩来的一次讲话情形：

“党组织决定由我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的约四千学员，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开会，请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这个大礼堂最多只能容纳一千五百人，而学员就有四千人，还有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周恩来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周恩来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时，周恩来同志只有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宏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群众也都听得清楚。周恩来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周恩来同志足足讲了三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像大海的涛声，激荡在五千多听众的心头。”

9月27日，周恩来在牺盟会全省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作报告，讲全民抗战。他说：抗战，中国就存；不抗战，中国必亡。抗战就必须是动员起来全面抗战，而不是政府单独抗战；抗战就必须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就必须发扬民主，发动群众；抗战就必须是改造旧军队，建设新军队；我们八路军要坚决开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他的讲话非常生动，扣人心弦，不仅牺盟会的人听了说讲得好，阎锡山方面的上层人物听了也说讲得好。

周恩来到山西后，做的工作是大量的。

9月中旬，他同主持北方局工作的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会谈了北方局的工作，决定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作中心，加紧布置绥远、河北、察哈尔省的游击战争，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他还布置了河南、山东如何开展工作，派张友渔、梁寒冰组成豫鲁联络局到河南、山东。9月下旬，他派边章五、李锡九、杨秀林、孔叔东分别同国民党将领孙殿英、许权中、赵寿山、张荫梧接头，要各部同八路军联络。背靠太行山进行游击战争。他还同北方局商谈布置了全华北游击战争问题。10月上旬，他在太原会见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要黄绍位发枪发药品，并多组织和派遣游击队。他到山西大学礼堂给驻在那里的“动委会”人员作报告。10月中、下旬，他和彭德怀到忻口会见前线司令卫立煌，还同宣侠父一起到娘子关会见黄绍竑。

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11月2日，忻口放弃。阎锡山11月4日逃离太原。5日，周恩来离开太原，步行过了汾河桥，坐车到临汾。在这里，他就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等向北方局作了具体指导和部署，还在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作《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演说。他给中共山西省委一个任务：二十天扩军三千人。这项任务按时完成了。11月下旬，他离开山西回延安。

周恩来为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建立了功勋，续范亭赠诗一首赞颂他：“站正立场理不穷，樽俎折冲难冲冲。奸雄满腹欺凌意，早在周郎一笑中。”

对于国民党内桂系的工作，早在1937年1月，周恩来在西安就打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派张云逸到广西联络。6月，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又电告已到广西的张云逸，要他在同李宗仁、白崇禧联络的时候，坦率他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落后，则只有失败”。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抗战的中心。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时，经常和叶剑英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黄滇翔陪同，到蛇山下熊廷弼路桂系首领之一、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公馆商谈战事。

广西的学生军开赴抗日前线经过武汉，周恩来应白崇禧的邀请，给他们讲演。“周公有着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又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它具有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感人的力量。”“当时听众对周公饱满的革命热忱，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热情洋溢的讲话，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是令人毕生难忘的一个场面。”

3月上旬，日本侵略军企图由津浦铁路南下，侵占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是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白崇禧请周恩来、叶剑英到他寓所请教对日军的作战方针。“周公对白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从而取得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是江苏徐州东北三十公里处的一个要地，日军为了打通津浦线，企图南北夹击，占领徐州。但南边由于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再加新四军张云逸部的配合，运动于淮河流域，影响了日军行动，成为“北动南不动”。周恩来在1938年3月上旬派张爱萍到徐州，建议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这既可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想借日本之手排除异己的企图，并且给他详细分析了日军的弱点。这些都有助于李宗仁打台儿庄战役，并取得胜利。胜利后，一些人的头脑被冲昏了。舆论界出现了“速胜论”。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周恩来在武汉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向蒋介石转述了，蒋介石也十分赞成。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

程思远：《政坛回忆》。

程思远，《政坛回忆》。

战略指导思想。

这年7月，李宗仁到武汉，周恩来在住处设便宴招待他，谈加强团结抗战的问题。这次会面中，周恩来商得李宗仁的同意，在第五战区设立一个抗战工作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派人当政治部主任，在河南信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五战区的抗日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

武汉撤退时，白崇禧在去长沙途中汽车发生故障，周恩来恰好在后边坐车到达，就下车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们这里不远，你还是同我一道去长沙吧！”白崇禧应邀同车南下。路上，周恩来对白崇禧说，武汉失守后，应该在敌后广泛武装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游击队和游击区。白崇禧认为很对，后来在国民党的南岳会议上提出建议，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省军官进行游击战术训练，以叶剑英为教育长。路上，周恩来还对白崇禧说，中共为了适应武汉失守后的形势需要，将要在广西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白崇禧答应予以协助。后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在桂林桂北路206号开始工作。桂林成了大西南的文化中心，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和《新华日报》桂林办事处等进步文化机构，相继在桂林设立或复刊。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三联书店、黎明书店、科学书店、开明书店等和一些出版社也搬迁到桂林。这些，大大促进了西南地区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周恩来还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作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以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在武汉，他会见了从前线来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向他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在重庆，他同西南地方势力刘文辉、潘文华两次面谈，约定互相信守坚持抗战、尊重各方的武力、保证和配合人民有利于抗战民主的活动。还会见了滇军师长张冲，派共产党员薛子正担任他的秘书、参谋长；派华岗到昆明联络龙云；派王少春夫妇在刘文辉的总部设联络电台。这方面进行的不少工作，对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川、滇将领的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注重唤起民众，实现全面抗战，因而也特别重视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1938年2月他会见冯玉祥。当时冯玉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是没有实权。周恩来同他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主张，分析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道理。他同冯玉祥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请冯玉祥支持，建议由著名作家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蒋介石、陈诚要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同意了。政治部下面设总务厅和一、二、三厅，第三厅是主管文化宣传的，周恩来提出请郭沫若任厅长，这个厅，集中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力量。

周恩来重视文化宣传，挽留不少文化人在国民党地区从事抗日宣传工作。金山曾经讲过这件事：

抗战初，我带领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离开战云骤紧的上海，辗转到武汉。我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留着头发，穿着一套深色西服，双目炯炯有神，微笑着同我握手，好像早就认识我了。周恩来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解除了我内心的紧张。我谈到自己和洪深在洛阳和国民党杂牌军领导部子举周旋，部子举问洪深有没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洪深表示没有，引用了一句王维的诗“西出阳关无故人”。周恩来的眸子凝

注了一下。我不解地问：洪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恩来说，洪先生可以这样说，他需要“保护色”。我提出，我们演剧二队的共同愿望是到延安去。周恩来立即开导我，延安是好地方，但如果大家都去延安，这里的工作谁来做呢？我又说：洪先生是有社会地位的名人，行动需要谨慎，我们这批青年没有社会影响，与其在这里混，不如去延安学习。周恩来还是和蔼地开导我：洪先生交游广，能做很多工作，要好好关心他，照顾他，但是你不是演过不少戏剧和电影吗？知道你的人也不少啊，这也是你在这里工作的条件啊！干革命嘛，怎么说得上“混”呢？！……你要好好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抗战中，在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对党内党外，方方面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3月，他和叶剑英派军事干部到武汉大学等举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对青年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5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到武汉，周恩来同他研究了新四军的工作，后来陆续介绍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长江局由董必武通过熟人关系，在湖北应城汤池开办农村合作社训练班，共办了四期。这个训练班和接着办的汤池临时学校，实际是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干部的。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指示要加强发动农村游击战争，周恩来等向中共河南省委、湖北省委等及时传达，要求贯彻执行。河南省委动员了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路、平汉路组织游击，建立根据地。湖北省委在汉口举办党员训练班，学习游击战争等，周恩来、叶剑英都去讲课。这些干部后来相当一部分都到新四军工作，很多是到第五师，成为这个师的骨干力量。

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在国民党区的工作是艰辛而曲折的。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定抗战到底的决心。1937年9月，他派蒋百里去意大利、德国，促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墨索里尼暗示蒋百里，可以斡旋中日关系的中心在柏林。蒋百里到柏林，德国空军统帅戈林对他说：“中日两国都是德国的朋友，中日战争使德国左右为难，所以德国愿意把握时机做中日两国的调停人。”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把日本方面的条件电告德国驻南京大使奥斯卡·陶德曼，转达给蒋介石。周恩来这时在山西，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指出应“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

后来，12月南京沦陷，日本侵略集团中强硬派抬头，说“国民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政府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蒋介石的幻想没有实现，才在1938年1月20日撤回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对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无时不想消灭它，他想把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中。这年，一次，蒋介石对周恩来说：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唯愿溶成一体。周恩来答：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把他顶了回去。二次，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中共既然也是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同国民党合成一个组织，成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周恩来又顶了回去，说：中共实行三民主义，是因为由此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民党员则不都这样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三次，周恩来应约见蒋介石，蒋介石又提出国共合并为一个党。周恩来答：不可能。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

限共、反共的方针，还秘密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以后，就发生了几次反共高潮。

周恩来 1946 年对外国记者说：“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 1939 年 6 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12 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西南的一些地方。1940 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1941 年 1 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两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或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国民党封锁事实真相，反而诬蔑新四军“叛变”。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向广大人民揭开了事变的实质。随后，周恩来审定了由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在重庆秘密散发，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国共合作和抗战事业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在重庆的历史学家侯外庐、翦伯赞去看周恩来，问他“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夭折？”周恩来回答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的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

周恩来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进行坚决斗争，指出它必须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等十二条办法；一方面发动工作人员四出向国民党内元老派和抗战派、国共以外的各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揭发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一方面安排对付国民党当局的更大规模的迫害，决定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疏散隐蔽、转移和撤退；一方面对留下来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一方面扩大宣传事实真相，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同时，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结果，国内外舆论对蒋介石一片责难声。而日本军队，又乘此时机在河南对蒋介石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陷入了四面楚歌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就连蒋介石国民党内部，也提出目前“剿共”不是“最良时机”。

这次反共高潮，直到 3 月间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进行抵制取得胜利，才算结束。3 月 14 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见面，见面时周恩来提出了新四军的事，要求按照中共提出的十二条来解决。蒋介石虽然没有直接答复，但是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3 月 25 日，宋美龄宴请周恩来和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也同席。席间，周恩来再次提出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的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也比较和缓。事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情况，说：“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

这个时期在重庆的周恩来，工作环境是危险的。紧张时，周恩来的活动被限制只能在城内活动。他的住地红岩和曾家岩，曾家岩五十号是一座三层小楼，周恩来和工作人员住在一层和二、三层的一部分。向楼后俯瞰嘉陵江，江水日夜呜咽地流去；房前是一条大街，国民党特务暗探在街道两旁开设着几家茶馆和烟店，都担负着“特”殊任务。在五十号对面和胡同口，还有军

1946 年 9 月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499 页。

统头子戴笠的公馆和特务机关。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作好了被捕入狱的准备。在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进行着工作。

在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扩大党的影响，唤起人民，如祝寿、演剧、追悼……等。这些活动，名正言顺，国民党无法禁止，而实际上却开展了群众性的宣传。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在周恩来支持下开了规模较大的茶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鲁迅、郭沫若在文艺、学术等方面的成就，并且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要说的话》，说“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号召大家学习他的丰富的革命热情，深这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在重庆的剧人决定从二十日起演出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所辟的《棠棣之花剧评》专页题写刊头，并修改评论文章。周恩来同郭沫若探讨了创作历史剧《屈原》中的问题。剧本写出后，周恩来反复阅读，同专家们一起讨论。剧本公演后，轰动了重庆。

1941年11月14日冯玉祥六十寿诞，周恩来为《新华日报》的庆祝专页写文章《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文章说冯玉样的功绩，在于坚持御侮，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为人之所不敢为，说人之所不敢说，“国家今日，尚需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不负天下之望”。

1941年3月30日马寅初六十寿辰，周恩来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了对联：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1941年张季驾在重庆逝世，重庆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和邓颖超联名送了挽联：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失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1942年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的报告中，讲了当时在重庆开展工作之困难，大批人疏散去延安、苏北、香港、新加坡、仰光和内地各县了，“出版界也无法出版新的书报杂志，加之国民党反动当局压迫加剧，我们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如庆祝郭沫若之五十寿辰，冯玉祥六十寿辰，参加张冲追悼会等。我们还着重抓了当局尚未注意的演剧活动，演了一些优秀剧目。”

周恩来在1942年说：话剧演出是当时在敌人的心脏重庆作斗争的重要而有效的阵地。

张冲是国民党CC派的骨干，后来直接受蒋介石指挥，作为同共产党联系的“桥梁”。张冲过去是坚决反共的，做过对周恩来造谣诬蔑的事情，在国共谈判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合作的发展，他同周恩来的友谊一天天加深，彼此推诚相见。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能等多方面的影响，耳濡目染，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进步，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害怕进步报纸报导真相，派特务没收《新华日报》，殴打报童，捣砸门市部。周恩来请张冲陪同，到现场交涉，在寒风凛冽的夜里，两个小时解决了问题。中共工作人员陈家康送张冲回家，路上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来的事件怎么想？陈家康讲了团结一致进行抗日的想

法，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喟然长叹说：“我死必在君前。”

张冲当时在国民党领导层中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是遭到很大阻力的，有的反共人士对他大骂，有的甚至在会场上用茶杯砸他。张冲受到侮辱，很是灰心。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岳飞、秦桧，我们是忠，他们是好。我们是顾全大局的，他们是不顾大局的。”8月11日，张冲病逝，年仅三十八岁。死后家中贫困，周恩来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向张冲追悼会捐送了两万元。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悼张淮南先生》，文中说：

“先生与我，并非元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中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受憔悴。”“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周恩来在重庆，进行了非常出色的、很有成效的、大量的统战工作。一个长期跟随他在重庆工作的人说，“周公馆就是统战司令部。”

还有人谈到重庆这一段历史时说：“没有周恩来就没有统一战线。”

陈荒煤说：“我觉得，实际上，‘周公馆’是一簇圣火，不仅在抗战的大后方亿万人民心中燃烧着希望的火焰，要抗战到底，建立新中国；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爱好和平人们的心中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中国共产党要坚决打败日本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支援国际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周恩来在重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在大后方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文化运动中，一方面同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一方面表现了高度的凝聚力。以他为核心，从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战到底的高级人士，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到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至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朋友，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从1936年到1946年，为了一致抗日，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内和平，周恩来的主要工作是同国民党谈判和协商。他在一个茶会上曾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国外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从周恩来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何尝不想到前方去战斗！左权将军在太行山抗日作战中牺牲了，周恩来专门写了悼念文章，其中说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纓有愿；困处堑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愿意身临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从事艰难的

1991年1月4日。《华声报》。

陈荒煤：《重访“周公馆”》

周恩来，《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前所未有的谈判。他服从中央的决定，在白色恐怖笼罩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一 奠定多党合作基础

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合作的基础，是周恩来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奠定的。

能够实现多党合作，主要是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抗战时，为了团结抗日。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内的和平和民主。大家共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在斗争中结成亲密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建立，同周恩来的工作分不开。他关心朋友，不忘记朋友，帮助朋友，也接受朋友的帮助，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地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形成良好的合作。

曾任民主同盟上海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说过这样一件事：

三十年代初，彭文应在上海，有一天去看望一个朋友。在朋友家中谈天时，进来了一个人。这人西装革履，十分英俊，进来后见有客人在，就退到室外过道中，和彭文应的朋友轻声谈什么事。过了一会，那位朋友进屋来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没有找到，无奈对彭文应说：“老彭，我急需点钱，可是太太上街了，把钥匙拿走了，我开不了放钱的抽斗。”彭文应当即把身边带着的钱掏出来给了朋友，朋友把钱交给了那个男子，那男子把钱往衣袋里一塞，朝彭文应点了一下头，就匆匆离去了。

后来，彭文应向那朋友问起这个男子是谁？朋友笑道：“说出来，会吓你一跳。”原来，他就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许多报纸上刊登启事悬赏数万元要缉拿的周恩来。据说，当时有一个中共地下同志被捕，周恩来正忙于营救，要用钱来打通关节而千头桔据。

几十年过去了。建国后，一次周恩来来到上海视察，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一个座谈会，彭文应也参加了。会上，彭文应感到周恩来十分注意他，但又以为是自己多心，因为他同周恩来只不过见了一面，又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散会时，彭文应走到门口，忽然听见背后喊“彭先生”，回头一看，正是周恩来在喊他。彭文应大为惊讶。周恩来紧握他的手，重提当年的事，说：“彭先生，你帮过我们的忙。”陈毅走了过来，周恩来把彭文应介绍给陈毅说：“彭先生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支援过我们，是患难之交。”周恩来是不忘记帮助过革命的朋友的。

周恩来对党外民主人士，十分念旧和关心，这是有口皆碑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上海负责人吴稚平，解放战争时期受李济深的嘱托，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京沪杭区特派员，从事民主运动，积劳成疾。1949年5月2日，病重住进了浙江医院，但是经济十分困难。李济深知道后非常焦虑，写信给周恩来请他关照。周恩来很重视，马上打电报给杭州市军管会主席谭震林，要他派人探望吴稚平，解决他的困难，并把处理情况迅即报告。在谭震林等的关照下，吴稚平住进浙江省立疗养院，一切费用由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负责，他的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周恩来还专门复信李济深说：“5月30日大札奉悉。当即电告杭州军管会谭震林同志派员前往浙江医院探视吴先生病状，并送致医药费，俾便购买药品及住院治疗，俟得复后，当再函告。”

有的人说：“什么叫周到，周公一到，就周到了。”周恩来就是十分细致、妥帖、周到地从事一切工作，包括统一战线工作，赢得朋友们的普遍赞誉，巩固了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情谊。

我国现在，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

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中除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外，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就同他们的很多领导人有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

农工民主党原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1930年8月成立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的一些左派领导人为了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就酝酿组织新党。这年11月，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团结了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部分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人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季方、张申府、邓初民等是领袖人物。这个组织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也不赞成共产党发动工农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所以又称“第三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机关由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丘哲等二十五人组成。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和秘密杀害。1935年，这个组织接受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确定以抗日、联共、反蒋为总方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黄琪翔是总书记，章伯钧等为书记。抗战开始后，周恩来1938年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也任政治部副部长，两家住得很近，互相来往，友谊日笃。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在武汉还同周恩来、叶剑英正式会谈，表示今后要密切合作，共同战斗。皖南事变后六个团体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组织是其中之一。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同共产党合作，投入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共同斗争。1947年2月在第四次全国干部会上，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中央执委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委会主席。农工民主党在广东、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等省组织的武装力量，解放后接受了改编。这个党1949年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同这个党的不少领导人合作得很好。有的书信往还，交流看法。如丘哲，抗战时在武汉是政治部的设计主委，常同周恩来来往，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创办《人民报》，反对内战。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局势恶化时，丘哲把南方爱国人士的状况和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写在信中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1946年8月5日回信说：

“映芙先生道右：捧读惠书，敬悉一一，诸承策勉，毋任感幸。目前局势，诚如尊示所云，内战正在扩大，谈判已在若断若续之中。和平坚持，端赖各方协力。敝党仍当本和平、民主、独立之一贯方针，继续奋斗，誓为各方后盾。先生等南方苦撑，已历年所，不图胜利后压迫更甚。遥望南天，不胜怀念。专此布复，敬颂公祺！弟周恩来拜。”

丘哲收到信后，在香港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中传告，使他们在坚持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鼓舞。后来，丘哲在1948年冬从香港秘密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

中国致公党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由海外华侨的洪门人士建立起来的。洪门是我国清朝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本世纪初它的力量已遍及北美大陆和东南亚，以美洲致公堂为最大。二十年代，美国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主张把致公堂改名致公党，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时通过了这一建议。他后来长期担任致公党美

洲总部主席。抗战爆发后，致公党号召党员拥护抗日，号召华侨积极支援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们出钱出力，同国内人民一道，承担着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他们募集捐款和公债几亿美元，支援了祖国的抗战。周恩来同他们经常来往，正如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所说：“恩来同志早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时期，有什么重大问题往往要找民主人士通报，找大家商量。”

皖南事变发生后，司徒美堂等致电国共两党负责人，说：最近看了朱、彭、叶、项致何、白佳电，列举国共磨擦事，不敢轻信，等到中外电讯播放，才知军事当局确曾下令要新四军移防，并以二十五万国军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国共分裂形势严重，海外闻知，万分惊骇。大敌当前，自毁长城，自促亡国，谁不痛心，电请两党“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司徒美堂恰好在香港。日本侵略军企图利用他组织香港的帮会、巩固占领后的秩序，司徒美堂拒绝了日军的利诱，化装逃出，进入中共的广东东江游击区，深深感到中共军队是真正抗日的。他经曲江、桂林到重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就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交谈。蒋介石为了利用他的影响，想给他国府委员的名义，拉他加入国民党，司徒美堂拒绝了，返回美国，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从物力、财力上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帮助。1947年，致公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重庆期间的合作，致公党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靠拢共产党。司徒美堂老人发表声明要致公党“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

同周恩来在国民党区，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开展工作，新朋旧友，团聚在他的周围。如：

黄炎培是新朋，抗日战争期间逐渐往来。在重庆，周恩来经常同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等一起集会聚谈或者单独见面。在黄炎培那时的日记中，经常有会晤的记载。黄炎培说，“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的一群人，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逐步提高了我对中国前途的认识。”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者，1939年周恩来曾应他的要求在职教社的刊物《国讯》上写文章，题目叫《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指出要努力建军，努力建设国防经济，努力敌后工作，以巩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他还曾应黄炎培的邀请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作报告，题目是《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周恩来说，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扩大，中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他强调要加强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讲完后，听众热烈鼓掌。一个听者赶上来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写道：“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后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六个组成团体之一。

许德珩是旧友，1938年他同周恩来在武汉相见，两人阔别已有十年了。许德珩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看周恩来，周恩来谈起许德珩等人的工作问题，提出一个意见，说：日军占领了九江、湖口，武汉现在已经处于危急之中，大家都聚集在武汉，不是个办法，每个人应当尽量回到原籍，参加抗战，保卫家乡，许德珩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就决定回江西工作。不久，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派他的民政厅长王平秋来迎接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等

黄炎培，《八十年来》。

回江西。许德珩等到了南昌，在政治讲习院讲课。这个讲习院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夏征农。后来战争发展，许德珩到了重庆。几年后成为九三学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中，既有新朋，更多的是旧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是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开的。它是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代表大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这些民主派的领导人，很多是同周恩来有历史友谊的，有些是有很深关系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在上海，周恩来当时在上海秘密的中共中央，对她们十分尊敬和关怀，她们也对中共的革命斗争同情和支持，始终保持着联系。1937年周恩来去庐山同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就去探视宋庆龄，宋庆龄兴奋而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从远道来的客人，对中共为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提的主张表示支持。抗战开始，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到重庆，重组“保盟”、的中央委员会。应宋庆龄的要求，周恩来打电报到澳门，把廖梦醒调到重庆任宋的秘书。经常同宋庆龄一起工作的还有德籍友人、王炳南的原夫人王安娜。宋庆龄同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员就是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有时，宋庆龄在寓所举行晚餐会，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李德全等都去参加。大家围着融融炉火，周恩来介绍国内外形势，畅想着胜利的日子。

1933年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同蒋介石破裂，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周恩来主张援助他们，并接见了蔡廷锴派来的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但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坐视了他们失败。当十九路军失败残部退到龙岩时，周恩来曾叫尹时中打电报给蔡廷锴“打起红旗继续革命”。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香港建立了秘密政治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传反蒋抗日。皖南事变后，1943年2月的重庆，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支持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组织了国民党民主同志座谈会，通过经常性的时事讨论方式，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这个组织后来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李济深、何香凝、陈劭先等在广西桂林酝酿建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筹备会。抗战胜利后，这两个组织正式成立。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对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进行迫害，他们迁到了香港。1947年10月“民联”、“民促”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选出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邓初民、朱学范等十多人作为筹备委员，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这些人士中，前面几位都是同周恩来早有交往的，只有朱学范是1939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这年10月，朱学范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拜会周恩来，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看到周恩来和蔼可亲的态度，就自然地交谈起来了。朱学范是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之一。这个协会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建立的一个“劳动文化团体”，朱学范是国民党内进步人士，主张爱国抗日，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朱学范问到陕甘宁边区工会是否出席国际工会问题时，周恩来答：“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工人，应该排除反动派的干扰，团结一致，共同斗争。”“边区工会可以参加劳协，以后和劳协一起出席国际会议。”还叮嘱他说：“要

完成这一任务是艰巨的，还要多加努力。”

周恩来的谈话给朱学范影响很大，使他感到中国工人阶级要求解放，应该团结起来。后来，陕甘宁边区工会就以团体会员身份参加了劳协，边区工会代表廖似光当选为常务理事。1945年，世界工联要劳协派出中国统一的工人代表团到巴黎开会，朱学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请解放区工会派出代表，周恩来又支持他，并且写信给他：“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颇愿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劳动协会。……该筹备会以及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也愿以其所推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之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使之成为中国统一的职工代表团。”后来，尽管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邓发和朱学范仍率领中国劳动协会的统一代表团出席了巴黎大会。

周恩来同后来的民革中央主席屈武的交谊，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又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屈武曾经说：“我与经国，两世友谊，情同手足，当年苏联同窗，溪口话别，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抗战中，于右任赞成国共合作，团结对敌，但是对蒋介石的一些动摇、投降的倾向看不清楚。周恩来考虑到蒋的为人多疑，手段狠毒，担心于的直率会招祸，想通过迂回的路子来提醒他。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屈武是于右任女婿，又是我南方局干部王炳有的同乡，就通过王炳南请来了屈武。在一个多雾的夜晚，周恩来同屈武首次见面。他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他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上爱护他。屈武听了深感周恩来语重心长，为国为民，很受启发，从此他耐心地帮助于有任。有时候，屈武告诉于右任一些消息，于右任从来没有听说过，大为吃惊，便问：“你这些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屈武据实相告：“主要是王炳南告诉我的，有些情况是周恩来先生亲口对我讲的。”于右任听了点头，表示相信，同时不安地对他说：“你要当心呀！重庆到处是特务。”1944年春天，蒋介石召见屈武，要他离开重庆，到陕西去当建设厅长。屈武表示不愿去，蒋介石顿时大发脾气，声色俱厉他说：“一定要去。”屈武出来后，想起蒋经国来，或许他可以转圆，于是去拜访蒋经国。蒋经国听后说：“老兄，不行啊！有人在委座面前告发了你，说你同共产党暗地勾结。委座非常生气，他对我说如果不是看在于院长的面上……他下面要说什么，你自己会明白的。我看你还是暂时到西安去吧。”

屈武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认真考虑了之后，对他说：“那只好去吧。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可以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联系。”

这样，屈武到了西安。后来又随张治中到了新疆工作。

周恩来在重庆，很关心民族工业的发展，他曾经和董必武、邓颖超到合作五金厂等十几个工厂参观。他在合作五金厂看得很仔细，这个厂正在生产炸弹的弹尾和引信、掷榴弹等，周恩来看了很高兴，鼓励他们团结合作，支援抗战，并且题了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合作五金厂的负责人是胡厥文，是一个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不在重庆，没有能见面。后来，胡厥文回重庆后，周恩来专门到胡家中看望他，在多次接触中，两人友谊日深，成为很好的朋友。胡厥文后来是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

周恩来1939年到重庆不久，就亲自出面邀请自然科学界知名人士梁希、

潘寂、全善宝、谢立惠等知名人士，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动员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为支援抗战服务。1940年初，他要《新华日报》开辟《自然科学》专栏副刊，委托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几位人士负责编辑。后来，周恩来又要《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协助“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组织一个范围比较广泛的科学团体，以便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这样，1944年底，这个座谈会就拟出了《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向各大城市征求科学工作者参加发起，周恩来还亲自向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进行动员，不久就得到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一百多人热烈响应，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7月6日协会正式成立。后来，梁希、潘菽、严济慈、谢立惠等都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

周恩来对于科学家一贯是很尊敬的，也是很关心的。谢立惠回忆说：

有一天，周恩来约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七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社，在那里吃午饭。我原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同我们商量。去了以后，看到摆放着酒席和寿桃，感到很惊讶。正在纳闷的时候，周恩来走来高兴他说：“今天是梁老（梁希）的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一句话说得我们差点流出泪来，特别是梁老，激动得半晌没说出话来。梁希先生是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里年纪最大的，但我只知道梁老六十岁左右，却不知道哪天是他寿辰。而周恩来同志日夜为国事奔忙，却记得这个日子，并想到为梁希祝寿，谁能不为之动情呢！

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是这样认识的：统一战线应该以国共两党为主，地方实力派和小党派为辅。所以，国共两党的关系固然应当充分注意，但也应当努力开展两党关系以外的统战工作。当时重庆，除了国共两党外，还有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党派或团体。周恩来很注意同他们建立联系，同他们的领导人交流情况和看法。你来我往，经常接触的，有救国会的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第三党的章伯钧，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曾琦，国社党的张君勱等。陶行知常对别人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表达了他从周恩来那里得到的教益。

1941年的皖南事变，在这些党派团体中引起了震惊。他们感到国民党顽固派对强大的共产党况且下毒手，对他们的组织更不在话下了，周恩来耐心地给他们作工作，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联合起来的必要。这项工作大体在三月间得到成果，15日，周恩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说：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3月19日，上边所说的六个党派、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为主席，后来改为由张澜担任。但是在重庆成立这样一个组织，蒋介石是不会容许的，因而不能公开。他们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张报纸，借以宣布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

在香港办报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从哪里来？人手也没有。梁漱溟就去找周恩来。周恩来答应支持。他打电报给香港的廖承志，予以协助。在中国共产党用财力人力支援下，梁漱溟在香港办起了《光明报》，在报上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发表了宣言和政治纲领。国民党在香港的人见报后，招待记者说梁漱溟是“招摇撞骗”，重庆并没有这么个组织。于是张澜等在

重庆公开宣布这个组织早已成立。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表示支持。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默认了。这个组织 1944 年 9 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以个人身份参加。在抗战中，它为民主、进步、团结而斗争。1946 年政协会议上同共产党密切合作。之后，为国内的和平努力奔走，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周恩来专门发表悼词，其中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1947 年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遭胡宗南杀害，当时周恩来正在转战陕北，得知后说杜斌丞“生得伟大，死得伟大”。1948 年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民盟领导人发表声明积极拥护，先后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等筹组的，1945 年 12 月 16 日成立，成员主要是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始时，它标榜“不右倾，不左袒”，强调中间路线，黄炎培也长期以中间派自居。19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民党警宪特务闯进他的寓所，搜查了他的家。黄炎培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对他表示慰问和支持，还在《新华日报》上详细报导暴行真相，发表社论，对国民党严正抨击。1946 年夏天为了争取和平，民建会在上海推派盛丕华、张纲伯、胡厥文、包达三、阎宝航会同马叙伦等到南京请愿。在下关受到国民党特务围殴。周恩来等立即到医院慰问受伤者，对国民党政府放纵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民建会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致行动。1948 年 11 月，派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为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 1945 年 12 月 30 日成立的。成立后就投入了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和平的民主运动，周恩来予以积极支持。1946 年 6 月上旬，华岗建议由上海市人民选派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周恩来同意了。6 月 23 日，上海五万人示威游行，送马叙伦为首的十人代表团去南京。代表团到下关被国民党特务殴打。马叙伦是民主促进会领袖，代表雷洁琼是东吴大学教授、民主促进会理事。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严肃他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亲自同医院交涉，争取到了床位。后来，民主促进会同中共一致行动反对国民党的所谓“国民大会”，同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发表声明，指出“国大”“不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所承认”，“彻头彻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协的”。1948 年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先后进入解放区。

九三学社是 1946 年 5 月 4 日成立的，前身就是抗战期间在重庆的一些科学界，教育界人士的座谈会，领导人许德珩、褚辅成、梁希等，周思来说：“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 1947 年 11 月 12 日在香港成立的。这年 2 月 28 日，台湾人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举行起义。起义失败后，一些领导者到了香港。8 月，在香港的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酝酿组织台盟。当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负责城市工作部，香港等地的党组织也是他领导的。台盟成立后，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台独”的斗争，

响应中共号召，参加筹备新政协活动，1949年3月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

各个民主党派，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各自内部的思想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因此，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力量，努力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只要大目标一致，就可以求团结，一些小问题或枝节上看法不一致，不影响团结。夏衍讲过一件事：抗战时期在重庆与有些党外人士看法不一致，他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夏衍听了很受启发。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用在同其他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后来，五十年代在第一次亚非会议上，他在国与国之间领导人的交往中，也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促使会议圆满成功。

周恩来同党外朋友交往，总是诚恳待人，不隐讳自己的主张，同时尊重人家的看法。“求同存异”正是体现了这种态度。他的思想、风采、态度，使不少党外人士倾倒。有的是根据周恩来而确定自己对中共的看法的。一些原来只是同中共人员来往而不一定倾向中共的人，后来也靠拢了共产党。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讲到自己的亲共，有一个“由假到真”的过程。他说：

原来他是四川岷匀地方势力，蒋介石的力量深入四川以后，他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他需要找互相支援的力量，否则在政治上孤立无援，自己就不可能在四川生存下去。当时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是可以同蒋介石政权抗衡的力量，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又使得中共敞开了大门，使党外的人士可以同它接触。这样，他开始同中共人士来往，从1938年到1946年在重庆时，他同周恩来等有过七次接触，使他得到了支援，受到了教育，使他一步一步地真的成为共产党的盟友，“由原来利害上的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长期依靠”，最后自己终于“参加了人民阵营”。

十二争取和平，避免内战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的八年抗战，现在胜利了。国内凡是还没有沦陷的地区，到处爆竹连天，一派欢腾；在沦陷区的人民，虽然不能公开庆祝，也无不喜庆重见天日。大家普遍地希望今后国内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

周恩来 1946 年说：“日本投降后，人民非常希望和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和平、民主、独立成为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根据此愿望，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宣言，以适应这种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

1945 年 8 月，周恩来在延安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叫《目前紧急要求》。文件一开始就说，“目前，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设的新阶段业已来临。为着团结全国各抗日党派，保证国内和平，在民主基础上进入建设新中国的轨道，并巩固国际团结”，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十四条紧急要求。这文件后来发展成为 8 月 25 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宣言中说：“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经过八年抗战，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力量都得到很大增强。

八年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战场，在广大人民的支援、配合下，同日军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歼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多人，歼灭伪军一百一十八万六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支六十九万多支（挺）、炮一千八百多门，解放国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两千多万，解放区分布很广。在残酷而艰巨的战争中，军队从血与火中成长，抗战开始时五万多人的队伍，抗战结束时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尽管处于不断后退的地位，但多数也是有战有退、战而后退的。在国内的某些战役和国外的远征军，取得过辉煌的战果。国民党政府在七七事变时，共有陆军现役兵一百七十多万人，海军有七十二艘舰艇共约六万吨，各种飞机三百多架。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正规军二百万，非正规军一百多万，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一百多万人。它接收了日本侵华部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并且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由于抗战的胜利，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大后方特别是沦陷区人民中的威望，曾经一时达到某种高峰。

美国的白皮书说，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和枪械上拥有五比一的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美国政府正在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划，和装备三十九个现代化师的陆军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共两党可以应乎民心，继续合作，和平建设中华，在建设中进行竞争。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坚持了内战的方针，违背了人心所向。

夫人心者必失天下。

这时候的周恩来是尽力争取和平，避免内战。

1945 年 8 月 28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王若飞坐飞机到重庆，同蒋介石

国民党谈判和平。双方在 10 月 10 日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同意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但是签字的墨迹未干，10 月 13 日，蒋介石就在国民党军内部颁发了“剿匪”密令。后来，经过中共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国共双方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同时公布了停战令，并且在这一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是各党各派参加的会议，在政协的决议中，取得了一些有利于和平、民主的成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就在“1946 年 1 月 31 日下午，政协闭幕当天，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一些顽固分子低毁政协协议，说政协协议一通过，国民党完蛋了”。蒋介石任其吵闹，最后说，他自己也不满意。

政治协商会议后，周恩来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美国方面马歇尔，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2 月 25 日签订了关于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统编的方案。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致词说：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五项决议”，这次“又签订了这一方案”。“这是中国和平的保障。我们相信这一方案的实施，将使十八年来武装纷争的局面为之改变，将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将使中国走上近代工业化国家的道路。”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作了很大让步。尽管中共已在解放区、根据地拥有百万以上的军队和更多的数量的民兵，但是表示愿意改编为 16 个军 48 个师，后来又表示愿意减为 24 个甚至 20 个师。张治中认为国民党可以接受了。他向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国民党的军队整编后减为 50 个师，这只是指陆军，此外国民党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除了步兵外，还有宪兵、工兵、炮兵、骑兵、辎重兵等，这都是中共没有的，或者即使有也是很少的，现在中共只要求 20 个师，可以考虑接受。

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张治中和蒋介石，虽是上下属关系，但又是黄埔军校开创以来的老同事，两人就争辩了起来，弄得面红耳赤。

这时，恰好蒋介石的侍从参谋、翻译皮宗敢陪着美国特使马歇尔进屋来了，马歇尔看到他们两人的表情很特别，觉得奇怪，便问发生了什么事？

蒋介石气愤他说：我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

张治中忙向皮宗敢示意，叫他不要照译，遮掩了过去。

3 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会议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大加攻击，说他们是牺牲国民党的立场来同共产党达成妥协。会后，国民党在两党会谈中制造种种麻烦，在前方则大打出手。

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在谈判中真心主张停止内战，尽管谈判中风浪迭起，前线又是关外关内战火此起彼落，他还是千方百计希望“救活”和平，直到 1946 年 6 月下旬，蒋介石对在中原地区的中共新四军第五师发起围攻，全面内战开始。

在国共和谈中，中原地区第五师问题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蒋介石国民党处心积虑要消灭五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救援五师、避免全面内战，作了很多努力。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

五师是个什么情况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长期在以大别山为中心坚持抗战的中原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五师，遭到国民党的重兵包围，抗战时期由八路军第359旅组成的南下支队，和在河南嵩山地区坚持抗日的中共河南军区部队，向五师靠拢。这三支军队在湖北枣阳以北地区会合，然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1945年10月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李先念等是领导人，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由河南军区部队和水西区（贾鲁河西地区）第28团组成，第二纵队由第五师和南下支队组成，共计野战军、地方军各有约三万人。

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调兵遣将，新四军第五师这支部队在中原地区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不少兵力。对此，中共中央曾经说过，这支部队“在极端凶险的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同时，这支部队在蒋介石国民党看来，是他手中的筹码盘中的肉。在国共谈判中，周恩来鉴于这里是一个导火线，曾经提出说现在既然已经停战，可以让李先念部队离开这一地区了。他多次要求军事三人小组调解，但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坚决反对。郑介民秉承的是蒋介石的旨意，因为蒋介石极力阻挠军事三人小组对这一地区的调解活动。郑介民曾经在内部说：“不能让李先念部撤走，这是抓住共产党的一条尾巴，共产党要打，就先消灭它。”陈诚也说：“中共李先念部突围，政府决不能放开一条路让它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他们本领好，政府军不能消灭它，算政府军不行。”

日本投降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中，作为让步，答应可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地区的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或者苏北、皖北解放区，其中就包括中原部队。这一条写在了《双十协定》上，但是中原部队撤不出来。约在1945年12月，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派童小鹏去了解中原部队的情况。童小鹏搭乘美军C46运输机到汉口，在德明饭店找到中原军区驻汉口办事处负责人郑绍文，请他作些准备，然后随童小鹏一起乘飞机到重庆向周恩来、董必武报告中原军区的详细情况：

中原部队在日本投降前，积极进攻敌伪，缩小沦陷区，曾经使中原根据地扩展到60多个县，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战略重镇武汉的围困态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经美军空运进入武汉三镇，然后把这里作为国民党政府从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国民党政府调集了几十个师包围中原解放区，进行蚕食，先后占领了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西、豫中等广大地区，企图进而消灭中共中原部队，打通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东北进军的通道。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决心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当时主要的困难是粮食紧张，医药缺乏，希望得到接济。

中原部队打算向东转移到苏皖解放区，靠拢那里的新四军其他部队，或者是北上进入华北解放区，但是都要经过国民党军的围困区，发生战争，而这时周恩来正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希望取得一个和平的结果。因此，1946年1月8日中共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说，由于最近很可能国共双方停战，我们决定全部留在原地坚持，1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原局复电说，“停战谈判已有结果，命令可能日内下达。如果中途下发生大的变化。

和平新阶段可能即从此开始。”

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方面的张群和美国特使马歇尔在 1946 年 1 月 7 日进行会谈，讨论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 月 10 日，周恩来同张群代表国共双方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和《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公布。协议规定，国共双方军队 1 月 13 日停战，“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也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各部队领导、各级政府发出命令：国共双方停止国内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已经公布，应“严格遵行”。同时蒋介石也向国民党军下达了停战命令。停战令下达后，周恩来派薛子正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武汉调处小组组长。薛子正从重庆到武汉，行前周恩来对他说：中原部队处在敌军包围危急之中，军调小组要国民党立即停止战争、等候调处，你到武汉行营后去找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向他了解中原军区驻地方向。薛子正到武汉后找程潜，程让他到信阳市找 66 军未瑞珂，宋派人护送他到了中原军区，取得了联系。

政协会议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和进攻不断，它的方针是先安定江北，控制津浦、平汉两条铁路，确保徐州、郑州两大战略要地，进而进军华东、华北、东北。1946 年 1 月，蒋介石成立了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分别任顾祝同、刘峙为主任，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逐次向徐州、郑州地区和平汉、津浦两路沿线集中，把中共中原部队压缩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处境非常困难。

2 月下旬，为了维护停战协议、了解各地对停战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解决军队整编中的问题，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以及随行人员乘飞机从重庆到北平，一路视察，到了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3 月 5 日到武汉。在武汉，周恩来等听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武汉执行小组的汇报。周恩来提出来说：新四军第五师驻地粮食不足，要求把全师调驻安徽五河。张治中说，回重庆后再商量解决。6 日，回到重庆，周恩来、董必武等几经交涉。终于同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商定：北方国民党占领的几个大城市如北平、太原、新乡、济南处于解放区包围中，缺粮，可以由解放区卖两万吨粮给他们，作为交换，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在武汉就近拨粮或款给第五师。

第五师受国民党重兵包围，不断遭到攻击。1946 年 3 月 21 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后，同毛泽东商议了这事。22 日，周恩来打电报给在重庆的董必武说：中央决定第五师应该争取全部合法转移，没转移前应予粮食接济，如果交涉不成功，遭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袭击时，只有突围，第五师应当有此准备，董必武接电后，24 日坐飞机到武汉，在武汉向各界呼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用大军包围我中原部队和进攻中原解放区。接着，他到宣化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原解放区军民表示慰问，帮助解决粮食问题和交涉停止冲突。回到武汉后，他又通过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救济公署担任正、副署长的民主人士周苍柏、杨显东，争取了美国人沙克诺夫，给中原解放区送去了几批粮食、医药、被服、食品等，解决了不少困难。

周恩来还从太行、山东等解放区筹得大量现款送到中原解放区，以便购买粮食。

到了 4 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密令国民党军 11 个军 30 万人包围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的 6 万人，准备发起进攻。4 月 22 日，周恩来在重庆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讲到了关内要防备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尤其是察热、五师两处。29 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中说：“为反

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5月1日，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徐水昌交涉，指出国民党准备用包围中原的军队发起进攻，然后发动全国性内战，要求加以制止，否则全部责任由国民党负担。同一天，周恩来又给已经在南京的马歇尔发去电报，指出这一情况，并说国民党如果敢于进攻中原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以致全国糜烂，全部责任应由国民党负。

周恩来是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的，中原之战必然会成为全面内战。

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了。5月3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廖承志、钱瑛、王炳南、宋平、章文晋等也坐飞机到达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当晚，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说首先应当停止中原内战，以免发展成为全面内战。第二天，他就同马歇尔会谈，说：政府军将要在5月4日到9日之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方将自卫还击，这就成为全面内战；为了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马歇尔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部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明天从北平直接飞武汉，会同处理这事，并且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来，当晚，马歇尔告诉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同意去中原调处。

这样，5月5日，周恩来和徐永昌乘飞机到汉口，在汉口同徐永昌、白鲁德会谈。周恩来要求尽早把被包围的第五师部队撤出。还说，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三人小组可以到中共部队指挥部巡视，然后回武汉制订解决办法。白鲁德同意去。徐永昌表示可以派武汉行营的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为他的代表去。

5月6日，周恩来、王天鸣、白鲁德和执行小组人员坐了几辆汽车前往湖北省礼山县宣化店（今属大悟县），路途中，恰逢河流涨水，同行的章文晋叙述道：

“1945年底，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矛盾。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加谈判。我跟他当秘书和翻译，亲眼看到他为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所作的不懈努力。谈判期间，周恩来同志所表现出的不避艰险、不辞辛劳的献身精神，使我终生难忘。1946年5月，他和美国代表白鲁德以及国民党代表一起到武汉以北一百里的宣化店调查中原解放区的国共冲突情况。我随同前往。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途中一座桥梁被冲断，汽车无法过河。国美两方代表都想退回去。周恩来为争取时间，制止中原局势进一步恶化，坚持涉水过河。他让随去的当地同志找来十几个农民，把四辆吉普车抬过河，并把国美两方代表也背了过去。当农民争着背周恩来时，他动情他说：为争取和平，你们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这条河是难不住我的。说着，脱下鞋袜和长裤，向河里走去。恩来同志的举动完全出乎白鲁德的意料，他立即拿起相机摄下了这一镜头，并告诉我，他要把这张照片珍藏起来，作为私人留念。”

这条河宽一百多米，水深达到腰部，周恩来就这样蹚了过去，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人不同于国民党官员的风貌。1980年，章文晋到美国华盛顿，又见到了白鲁德，久别重逢，谈起往事，白鲁德还对周恩来赞叹不已。后来，他送给章文晋一张照片，照的就是周恩来涉水过河时穿着军上衣和短裤站在水

中的情景。

章文晋说：“就是从这种一点一滴的小事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以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不仅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拥护，甚至能赢得政治对手的钦佩和尊重。”

5月8日上午，周恩来等到达宣化店。宣化店全镇只有一条街，百十户人家，地处鄂豫皖边区的一个小盆地中，四周山岗环绕，地形险要。中原部队就在这个险要的地形内，以这里为中心，同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着围困与反围困的斗争。周恩来的到来，使中原解放区和中原军区的领导人倍感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李先念、王震等都到镇口热烈地欢迎他们。当天，周恩来同王天鸣、白鲁德出席了欢迎大会，周恩来对出席大会的四百名县团以上干部讲了话。他们听了李先念、王震等关于国民党军队对第五师围攻的情况汇报。

晚上，周恩来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召集中原部队领导人开会，首先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体军民表示亲切慰问，了解了情况，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从革命全局出发，考虑全国战场态势，决定中原部队主力作战略转移以粉碎敌人的围歼阴谋。然后，周恩来同他们一起研究，对他们如何突围，突围的时机、路线以及给养，伤病员安置等，都作了具体、周密的部署。等到会议开完，天已经快亮了。

第二天上午，在礼山中学，周恩来和王天鸣、白鲁德会谈解决中原地区停止内战的问题。到会的有中外记者四十多人。五师方面的干部、战士用大量事实揭发国民党军进犯和烧毁村庄的暴行。王天鸣尽力掩盖挑起内战的真相，还作了一些保证。周恩来在会上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地发动内战的阴谋，指出这是对《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的破坏、践踏，警告说，如果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一切后果由国民党当局承担。他针对王天鸣的保证说：“诸位都听到了王天鸣将军刚才所作的保证，他说，国民党完全没有意思要消灭抗日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那很好，我欢迎。今后怎样？要看行动。”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在宣化店，周恩来抓紧同王天鸣、白鲁德初步商定了停止冲突的协议。

会后，周恩来不顾持续工作的劳累，又到附近的中原军区机关、部队慰问。他和战士一样端起一碗野菜粥，边吃边谈，说：同志们在敌人的围困、进攻和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你们。他勉励大家取得更大的胜利。5月9日，周恩来等回到武汉。10日，他同徐永昌、白鲁德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汉口协议。为了贯彻协议，增设了一个军事执行小组驻在宣化店。然后，周恩来同徐永昌、白鲁德由武汉回到南京。

周恩来到宣化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签订了协议，暂时阻止了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并为被围困的中原部队争取了时间，合法撤离了一部分家属到其他解放区（大约有三千多伤病员撤到太行解放区），创造了后来战略转移的有利条件。

但是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围困和蚕食并没有停止，到6月间，中原解放区已经只剩下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面积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蒋介石认为

彻底消灭中原部队的时机成熟了，于是下令给“郑州绥署主任”刘峙，要他在河南驻马店设指挥部，统一指挥第五绥区和武汉行营的第六绥署所属的8个整编师、2个旅，要他们“速歼鄂中李先念部”，然后可以把在中原的国民党军队用于其他战场。还调集了西安、武汉的空军，配合作战。

周恩来为了制止内战，再作努力，6月10日访马歇尔，向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争取和平民主，但是国民党正在开军事、财政、粮食会议，准备15天后大打，内战危机日益严重，将迫使我们不能不抵抗。12日，他又针对国民党方面散布的流言，向马歇尔声明，共产党的军队绝不攻济南、青岛，除非国民党军队要消灭我中原第五师。17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说，今天蒋介石提出交通、东北整军、关内三个文件，“战意已大明”。19日，毛泽东写了中共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说：南京周恩来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叶剑英、邓颖超等联名给蒋介石写信，指出内战大有一发难收之势。为了争取和平，周恩来又作了一些让步，但是国民党没有回音，26日，周恩来再同马歇尔会谈，提出让第五师和平地从湖北撤走。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枪声已经响了。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向湖北黄安（今红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中原解放区新四军第五师阵地大举进攻。中共中原部队早已准备就绪，在敌人重兵攻击中，按照已定部署，令第一纵队第一旅伪装主力，由中原地区向津浦路以东转移，吸引了大量敌军前去围追堵截；又令鄂东军区部队就地坚持斗争，迷惑、牵制敌军；然后，中原部队主力分为左右两路，向西突围。右路由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从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移动，29日晚在河南信阳以南突破敌军封锁线，越过平汉路，冲破敌军合围圈，到达陕西南部商县境内，同中共陕南游击队会合，8月3日成立了鄂豫陕军区，359旅则继续北进，8月底到陕甘宁根据地。左路由王树声率领，从光山县的泼肢河向西移动，7月1日越过平汉路，冲破敌军堵截，7月26日进入武当山区，8月上旬同中共汪汉军区部队会合，27日成立了鄂西北军区。担任迷惑敌军任务的第一纵队第一旅后来进入苏皖解放区。鄂东军区部队掩护主力突围后，继续活动于麻城、太湖、霍山等地。

全面内战爆发了。6月28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6月26日国民党方面已开始进攻，迫我起而自卫。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谈中，周恩来作了种种努力，争取国内和平。到现在，表明国共和谈再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和平已经不可能，将由战争决胜负。

但是，这时候周恩来还不能率领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因为参与和谈的很多民主党派人士还没有看清这一点，还希求和平解决问题，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也还没有认识到蒋介石决心内战及和平之不可能。因此，国共谈判还得进行下去，尽管实际上已是大打，谈判是为了教育人民认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这点，后来连马歇尔也看出来了。

马歇尔对叶剑英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

叶剑英把这话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后笑笑说：

“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

这以后。周恩来多次从南京去上海安排全面内战后的白区工作，疏散干部，处理善后，还为党的朋友们的安全牵肠挂肚，作了部署。

7月17日，他在上海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内战已从局部向全面发展。

他在“周公馆”召开有作家、艺术家、画家、音乐家等参加的四五个座谈会，给大家娓娓地分析形势，告诉人们蒋介石孤注一掷，全面内战势在必行，但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时间嘛，快则一二年，迟则三五年。”有些人如周信芳、黄佐临等，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本来打算出洋，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后，留在了上海。

周恩来还面对着另一种斗争。

周恩来在南京，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的这几幢楼房就处在国民党警特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中。前后左右的楼房布满了警特人员的监视哨。门外，修皮鞋的摊子，是特务伪装摆的：停在路边的三轮车，车夫也是警特伪装的；停在近处的汽车、摩托车，上面坐的也是警特人员。有人进入中共代表团住的这几幢房子，就被记下人数、特征、车牌等，寻线索追查；有人从里边出来，就有警特暗中盯梢：如果坐汽车外出，停在近处的汽车、摩托车就随后紧跟，……

周恩来到上海，国民党反动当局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办事处”、“上海市警察局”加紧实施“情报收集计划”。公开的，“以保甲事务为借口，时与该处接触，借以探讯内情”；秘密的，“长期密派员警驻守，监视其活动，并跟踪其中主要人员，以查其活动范围”。同时，还进行电后窃听，策划各种阴谋破坏活动。

下面是国民党警特的一份报告：

“事由——情报谨将35年7月17日至18日晚上所探得周恩来之动态报告于后：17日晚上10时45分，黑牌汽车一辆第12523号（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员厌漱石所有）至马思南路107号门口，穿西装者二人，中等身材，入内。汽车向北开去。

晚上11时15分，祥生出差汽车一辆（号码不明，在调查中）至门口。一老年人，穿西装，入内。汽车向北开去。

18日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偕副官等坐黑牌汽车第14018号（内坐周恩来）及10215号共六人回家午餐，至12时40分坐原车外出。下午1时30分仍坐原车回家。开车者为俄人，能讲华语。自下午3时起陆续有中外记者30余人入内。

停在门口之汽车号码如下：

17698 百老汇饭店。

30292 侨声报。

13293 吉普卡。

31916 吉普卡。

14929 黑牌内坐2人（该车金云几所有，住吉安路125弄11号）。

下午4时30分，周恩来偕副官等五六人乘原车外出，先至南京路华愁饭店6楼C号，住美国人。至6时10分至4路善后救济总署至8时55分乘原车回至马斯南路。

下午9时20分后复智一人乘14018号汽车至靖江路（恩礼和路）。”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周恩来自有对策。有时候，他发觉特务跟踪，当即停车出来，叫出跟踪车中的特务加以训斥，命令不得再跟。例如1946年10月17日，周恩来等三人从马斯南路107号“周公馆”出门坐汽车北行，特务记下车号17360号，然后开车紧跟。周恩来发现后，令座车仍开回到107

号门口，跟踪车也随后来。周恩来就走下车到跟踪车前质问特务：你们是什么机关的？要他们出示证件。并叫工作人员抄下他们的汽车牌号，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宣铁吾未在。工作人员通知特务说，周恩来将给“上海市长”吴国桢打电话，并令特务不得再跟。三天后，《文汇报》报道了“周恩来汽车生尾巴”，国民党当局十分难堪。

同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们也开展了斗争。中共在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委书记邵健专门召开会议，说：党的代表团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周公馆”，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将要来上海，国民党特务和警察已联合实施严密监控，他们可能用窃听电话、拆邮件、盯梢出入人员甚至制造车祸等来破坏，势态十分险恶，“上级要求我们，要组织警察局的地下党员和靠拢我们的人，尽量争取到那里去值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摸清敌人动态，挫败敌人阴谋，同敌人展开反监视、反跟踪、反捣乱、反破坏的斗争。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周公馆’的安全。”

警长徐本初接受任务后，立即作了安排。地下党支部委员宋玉龙、李春荣，身着警服，好像散步似地在马斯南路上走着。

这是一条幽静而不很宽阔的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浓荫覆地，行人稀少。突然，他们发现“周公馆”对面妇孺医院楼上有几个人影晃动，原来里面的人装着刮脸，凭借一面大镜子的反射，正窥视着十米外的“周公馆”。这无疑敌特的一个监视据点。一了解，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统上海办事处”、“市警察局政治科”的人。这一消息很快反映到“周公馆”，周恩来立即采取了对策。

警察局在马斯南路加设了派出所，地下党就派党员进去当了交警和内勤。

一次，周恩来在“周公馆”宴请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于伶、黄佐临、吕复、周信芳、白杨等。工作人员打电话向“洁而精”菜馆订菜，被特务窃听到了，给菜馆施加压力，派特务冒充侍应生同送菜人员混进“周公馆”，企图刺探消息，地下党立即把这一情况报知“周公馆”。“周公馆”派人把守了入口。菜馆人员送菜只能到厨房，一律不得上楼，特务一无所获。

周恩来的生活中，不光有严肃对敌斗争的一面，也有很富人情味的一面，在狼眼环视中，他仍然谈笑风生，意气自若，例如，1946年10月在上海时，国民党军占领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国共谈判破裂已成定局，中共代表团将要撤走。一天，周恩来同几位民主人士谈话，接着又接待一些新闻记者，送走他们后，只剩下了夏衍、章汉夫、乔冠华、龚澎四人。周恩来感慨他说：“这回走了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

他提议去吃大闸蟹。大家同意。这事在特务的档案中记载说：这天下午周恩来和三男一女坐车外出，并注明女的不是邓颖超。特务照例派车跟踪。跟到公共租界角上时周恩来停车走出来，叫出跟踪的特务说：“我叫周恩来，你们跟着我干什么？”特务说：“我们是来保护你的。”周恩来说：“我不用你们保护。”把特务训斥走了。于是五人一起到了四马路高长兴酒店，要了螃蟹和绍兴酒，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周恩来在上海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对外籍人士的交往。美国著名记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就是周恩来同她谈话时她表示自己有美联社的记者证，

可以免费搭乘美国飞机，想去延安采访。周恩来说：“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要去延安，必须赶快。”这样斯特朗决定尽快到延安，后来就有了毛泽东同她的谈话，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点。

在上海期间，第三方面人士请周恩来再到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商谈，周恩来明知不可为，仍一次次地前去，每次谈判都教育了他们蒋介石国民党实际上不要和平。9月下旬，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军队将进攻解放区大城市张家口，就发表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宣布11月12日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第三方面代表原打算10月12日再会南京谈判和平的，听到这个消息，知道和谈已没有希望，就不去了。10月26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国民党宣布召开“国大”，说明全面破裂局面已定。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开幕，除了青年党、民社党外，各民主党派都没有参加，也就是说第三方面人士大都没有参加。10月间周恩来曾经电告中共中央说：现在的中心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如能争取到民盟全部或大部不参加“国大”，就是胜利。周恩来做到了。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回到延安。

十三协助毛泽东，三年定乾坤

1946年10月，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的客厅里，周恩来同几位朋友谈着话。在座的有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许涤新等。周恩来说自己不久将回到延安去，但人民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一定会回到上海来的。

郭沫若即席赠诗一首：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遮可遭。

每逢期骏骥，岂畏路迢迢。

临歧假所赠，陈言当宝刀。”

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11月17日，临行前两天，周恩来给郭沫若、于立群写信说：

“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12月17日给上海的宋庆龄的信中，从力量的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31日，他又给郭沫若写信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发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预测是十分准确的。1947年12月，中国的战争情况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面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的统治由发展转向失败。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数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3月18日到1948年3月23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余里，先后经过十二个县，在三十七个村庄生活过。在转战的开头几个月，特别艰苦和危险，有时距离敌军十分近；有时住和吃都很困难，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人合住一个窑洞，共睡一个炕，批阅文件时坐在院子里小凳上用锅盖放在膝上作桌子。他们处处受到人民的保护和支援。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05页。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05页。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65、371页。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65、371页。

国民党军进攻，采取的是“齐头又并进，走山不走川，白天大游行，晚上大集中”，以万计的大军排成方阵，铺开几十里整的正面，横竖“扫荡”。但是中共中央机关近在咫尺，他们发现不了。一次，中共中央机关正在行军，刘勘率几万国民党军队在后边不远跟着进军，却连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丝情况也得不到。沙家店战斗前，沙家店北面集结了解放军四万部队和大批支前民工，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却连一点风声也探不到。

在峰峦起伏的陕北群山里，在人民的海洋中，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像捉迷藏一样，我打他，得心应手；他打我，找不到目标。有时彼此距离只几里路，我们知道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有时彼此只隔一条山沟，我们看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们。中共中央机关所到之处，老百姓见这支队伍电线多、驮骡多、背盒子枪的多，猜到是来了高级领导；很多老乡还认得毛泽东、周恩来，可大家都是心里明白，绝不传言。敌人拷打群众逼问中央机关的踪迹，群众的回答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群众的《信天游》唱道：

“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连人民。”

在人民的掩护下，虽然敌人重兵搜索，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在陕北的小窑洞里，安如磐石。

人民支持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时时关怀着人民。罗青长讲到那时的情况说：“周总理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不仅非常关心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也包括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全。”周恩来每到一地，都要同群众接近，谈谈情况，作调查研究。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时，总惦记着群众。在王家湾时，几万敌军扑来，解放军主力远在陇东，身边只有四连兵力。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安排群众转移，直到群众到了安全地带，然后自己才和警卫部队转移。在葭县（今佳县），周恩来告知县委，对过不了黄河的老百姓要组织他们向北撤，绝不能让群众的生命财产遭损失。在神泉堡，正值秋收季节，周恩来动员中央机关全体干部、战士帮助群众秋收。在杨家沟，毛泽东、周恩来看到群众经过半年多战乱，害病的多，就要中央机关的医护人员对老乡免费治疗。

周恩来在转战途中，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人民经过敌军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苦，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在石湾镇时，粮草来不及疏散，为了不落入敌人手中，当地干部主张烧掉。周恩来知道后说：“不能，粮草是人民的血汗，连一根草也不能烧。”他对当地干部说：“化整为零，把粮草分散给群众来坚壁。我们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去晋西北安排后方委员会的工作毕，回到陕北路过石湾镇，还去看望当地的小学校，说：就是打仗，我们也要操心孩子的上学。

陕北本是贫穷的地方，抗战中经过大生产运动，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但是现在，战争影响了生产，加上蒋胡军洗劫，有些地方人民生活靠黑豆、糠粃和瓜菜充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也一样吃糠菜糊糊。住在杨家沟时，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还号召机关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两粮支援人民，共节约黑豆七十石、小米三十石，分给了驻地人民和附近村庄的烈军属。

1947年，周恩来作了一个报告，讲了蒋必败，我必胜。为什么呢？“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作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

三条中的一、二条，就是讲共产党为人民，人民支持共产党。

1947年6月30日的夜里，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二十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针，最初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设想。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就是作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有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和谈已不可能，蒋介石要很快召开“国大”，周恩来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到1947年夏天，形势不同了。蒋介石要打内战不要和平的面目已为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遭受迫害，而在战场上，经过一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敌军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430万人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为150万人；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超过100万。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所谓“重点进攻”却把主力深深陷于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它的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域异常空虚。

是时候了。

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中央前委指挥下，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蒋介石手忙脚乱。他派15个旅随后追赶，在前面平汉路许昌以南派五个旅堵截，皖西有三个旅防堵。国民党在湖北自夔门以下没有正规军，安徽除第46师外，只有48师的1个旅和74师的3个旅，在蚌埠、合肥、长江防线只有3个旅。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湖北全境空虚。你们如能乘胜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刘邓大军南下，直达大别山区，如同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心腹地区南京和武汉之间。同时，中共中央又派陈赓、谢富治率军南渡黄河；派陈毅、粟裕率军进入鲁西南。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在中原大地、江淮河汉之间展开。

这时候在陕北战场，也经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笼罩在陕北高原上空的乌云开始消散。

整个战局改观了。周恩来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

胡宗南向蒋介石要求无论如何部队必须休整三个月，以便重整旗鼓。但是战争是你挑起的，什么时候停止就由不得你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叫唤：经济力量仅能维持六个月。趋势是走向崩溃。

人们开始露出笑容，完全相信共产党必胜，准备迎接更大的胜利。

1947年7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战绩，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将超过敌人。9月，他在陕北葭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九万多人。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吃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这预告在新的战争年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那么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这一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的兵团支援东北这事，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15日，锦州解放。歼灭敌人十多万。

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指明了锦州战役必将发展成为全东北的大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的大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到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2—282页。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86页。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90页。

最后决心”。为了留住傅作义部队在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二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的计划，以防傅作义部队退到绥远，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侮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日夜繁忙，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用电报作了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有二十二份。邓颖超曾经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

1948年，为了使部队由游击战争时期的组织过渡到正规化，周恩来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他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长期来，周恩来从事着同一些国民党将领秘密联系的工作。1945年12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要他们做好原西北军将领的工作。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这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周恩来在南京时电告中共中央，冯治安的副总司令张克侠已被国民党方面注意，现在要把张的妻子儿女先送到解放区，请告徐冰办理。同月，他电告陈毅说吴化文愿意找出路，请陈毅联系。后来在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约二万人阵前起义，促使战役提前十二天结束，人民解放军减少了约二三千人的伤亡。淮海战役开始，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洋和张克侠率部两万多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使淮海战役可以扩大规模的因素。

在辽沈战役围攻长春的紧要关头，守城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曾泽生已经起义，司令郑洞国正犹豫未定中。郑洞国是黄埔军校学生，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96页。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97页。

金冲及：《同邓大姐的几次谈话》。

周恩来给他写了一封充满师生情谊的信：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这封信纸短情长，实际上概括了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当年黄埔军校，革命精神高昂，要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翻身而奋斗，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坚持黄埔初衷反帝反封建，黄埔学生分走殊途，所以周恩来要他回念当年黄埔，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这信用电报传到前线，交给国民党新7军副军长转郑洞国，由于司令部附近已呈混乱状态，信没能送到。郑洞国是后来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这件事的。他说：“对于周总理的这番亲切关怀，我是始终未能忘怀的。”1950年郑洞国到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他，黄埔军校教官聂荣臻也在座。周恩来紧握郑洞国的手，炯炯的两眼注视着郑，说：“欢迎你，我们很久没见面了，难得有这个会呀！……”

郑洞国写道：“我被周总理的坦诚、热情所感动，觉得他还像当年的周主任，那样诚挚可亲。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半天才愧疚他说出几句话：‘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周总理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微笑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咱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1946年12月16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着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等在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从“一二·一”到1946年“六·二三”上海代表到南京请愿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形成第二条战线，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长后，1947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便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美蒋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会议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新高潮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随着国民党的全力进行内战，军费支出猛增，物价飞涨，抗战时大后方的原有工业体系，到1946年秋已经有百分之八十解体，1946年6至10月，上海的工厂倒闭一千六百多家，工业产量只达到战前的四分之一。国民党接收的大批敌伪厂矿，大半没有开工。美国货大量输入，外贸出现巨大赤字，

郑洞国：《毛泽东、周恩来对我的关怀和教育》。

《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1947年3月8日。

经济、财政趋向崩溃，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不聊生。

1947年，人民中最敏感的阶层学生界首先起来反抗。学生运动高潮不断。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的浪潮波及到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合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在学生运动中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民党的中央社当时有一个显然是缩小了的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发生“学潮”109次，506天。它说：“学潮”和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描述过这时候的中国：“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1949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

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生活不下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维持不下去了。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恐怖镇压。例如，1947年2月17日，北平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察宪兵八千余人，一夜间拘捕同中共和民主党派有联系的人以及市民二千多。6月1日，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成都、桂林等地进行大逮捕，全国被列入黑名单准备予以逮捕的达六万人。

恐怖镇压的结果是更加强烈更加广泛的反抗。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也避免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主义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其中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它分析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他说，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提出了“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如上海撤出约二千人，北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0—27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页。

童小鹏：《周恩来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第二战场斗争的历史贡献》。

王沛：《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是历史之必然》。

平撤出约一千人，南京撤出几百人，这些人在解放后大部回到了城市，成为人民政权各条战线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内不撤走的，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千方百计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毁灭城市的企图，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元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他们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国民党政府天津图书馆馆长时子周的一段话，可以反映当时很多上层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民解放军快来了，朋友们劝时子周赶快离开天津，时子周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国民党里面，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互相倾轧，已经没有什么好人了，好人也不给他干了。共产党里头倒有不少好人呢！可以肝胆相照的人物，周恩来就是一个。”

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认识过周恩来的，准备留下来同中国共产党共建新中国。

周恩来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用很大部分精力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和政权。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海外到达解放区。为了使他们平安到达，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11月初，他受已到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那时他还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今属平山县）住，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一册，名叫《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

1949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北平同张治中率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谈了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17日，周恩来说：“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条款。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迅速渡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新中国即将诞生。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是大会临时主席，致开幕词。第二天，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并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会上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开端，是新中国开基立业的盛典。会场内外洋溢着热烈喜庆的祥和气氛。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30日，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后，在全场沸腾的氛围中胜利地举行了闭幕式。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在全体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下午6时，全体代表坐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纪念碑的碑文是毛泽东撰写的，周恩来手书的，碑的基座上有八块浮雕，反映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历史中的八个重要内容，设计处长兼雕塑组长是刘开渠。关于八个重要内容，设计处请示毛泽东，有人提议上秋收起义，毛泽东不同意，说：“还是刻八一南昌起义。”

在这个典礼上，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了碑文，周恩来手书的碑文，永远地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庆祝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一位在场的外国人描写道：“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昔日皇宫主门的城楼上，悬挂着几个巨大的红色宫灯。在这座城楼上聚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员，他们是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乐队奏起了国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礼炮齐鸣。”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描写道：“北京故宫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这支中国人民的军队，从头到脚装备着从国民党分子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他们连续不断地通过广场，历经两个半小时。”

这天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从此，周恩来开始了他二十六年国家总理的辛勤劳苦的历程。

下篇

十四开国运筹

新中国诞生了。

经过一百多年志士仁人的流血牺牲，六亿神州春临大地，中国人民掌握了政权，可以建设自己的国家了。

周恩来在少年时代，就深切地盼望着“中华崛起”，盼望着“中华腾飞于世界”。他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历尽艰辛。到1949年51岁，政权在手了。他身为国家总理，掌管着全国的建设大业。他将在党和政府特别是政府工作中，经历新的艰难曲折，费尽一生的未来岁月，呕心沥血，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奋斗。

1949年春天，3月23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离开西柏坡，25日早上坐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下车后坐汽车到颐和园休息。午前，周恩来就到西苑机场检查了进行检阅的安排。下午，和毛泽东等在西苑机场检阅了部队。当晚，中共中央机关到香山驻地。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离双清别墅不远的一个小院内。

第二天，周恩来就进北平城，处理和平解放北平的善后事宜，并且同已经到北平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导人会谈。

当时，很多民主人士住在北平内城的北京饭店。周恩来从香山动身，要经过青龙桥、西苑、海淀、紫竹院，从西直门进城。他有时一天一趟，有时一天两趟。那时的北平，尘沙满地，道路陋劣，周恩来白天在城里，晚上回香山，或参加会议，或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商议问题，整天风尘仆仆，劳累得很，常常在汽车行走中就睡着了。因为来回太不方便，后来就在中南海找了个地方，有时晚上就住在城里。

北平故宫西侧的中南海，朝南是新华门。进新华门是碧波粼粼的南海。南海中间有一个小岛，那就是有名的瀛台，当年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点就在这里。南海北岸同瀛台相对的，是勤政殿，历来是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勤政殿西边的大处所是颐年堂，勤政殿和颐年堂之间，有一处宅院，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构造。这里就是后来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开始，周恩来就住在这里。这里最后一进院子有正房五间，周恩来住东面两间，西面两间留给林伯渠住。过了一段时间，北平城内秩序日益见好，安全有保障了，毛泽东也将从香山迁入城内居住，周恩来把里院让给毛泽东住，自己迁到中院居住和办公。不久，江青也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搬到前院的东厢房。不过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另找住地，之前，周恩来曾经到过西花厅。西花厅的院子里正逢海棠花盛开，似乎伸出了欢迎的胳膊。周恩来特别喜欢海棠花，他说海棠是“群花”。这样，他选中了西花厅，搬到这里住，一住二十多年。每年到春天，满院子海棠花灿若云霞，周恩来十分高兴。

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西北角，西北两边濒街，是一个不大的院子。这是清朝摄政王府西花园的后半部分，地处中南海内中海西岸紫光阁西边。明末清初，中南海的这一带宫垣颓坏，殿址湮没。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醇亲王载沣的幼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成了摄政王。宣统元年，在这里修建了摄政王府。王府的建筑分中路、东路、西一路、西二路，最西面叫西花园。西花园又以西花厅为中心，分为前后两院。前院的主建筑就是西花厅，是举行会议或见客的场所。厅房西侧有门通里院，门侧的屋子和厢房是秘书和警卫员们办公的地方。里院的中间正屋，是起居室和餐厅，

东屋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卧室，西屋是周恩来的办公室。自从周恩来搬到这里后，这里的灯光就经常从黄昏亮到黎明。就以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说，周恩来亲手制定的全国节假日，元旦放假一天。但是这一天白天，周恩来要同人谈话，晚上，照常办公不误。根据当年的台历记载，他“夜办公至二日七时”。

周恩来这阶段主要忙着三件大事。一件，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一件，准备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又一件事，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管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周恩来来到北平后，几乎对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一些知名人物，都一一拜访过，如李济深、傅作义、黄炎培、冯友兰等。据当时的工作人员说，“从三月底总理到北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政军民工作，特别是对民主党派的工作，都是总理在管。”“从五月起，新政协的准备工作，一直是在总理领导下进行。”“无论是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的人事安排，都是总理提出意见，然后报告主席。”

刚解放时的北平，到处秧歌舞，时间锣鼓声，大家都在兴奋地为将要建立新中国而工作。

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说，为了开好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有一个《共同纲领》的草稿。会前，周恩来起草过一两次。6月间，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一心一意，亲自动手，写出了稿件。稿子写出了以后，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然后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基本通过。然后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共同纲领》全文约有八千字，有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六十条。在我国还没有宪法的情况下，这就是临时的大宪章，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周恩来在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正如共同纲领草案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所规定的那样，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共同纲领》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写在《共同纲领》的总纲第一条。

周恩来担任总理，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率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新中国的政务院，是由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在政务院下面，设有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并有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工矿、交通、文化、

教育、民族、侨务等各个方面的部、会、院、署等三十个部门。政务院设副总理 4 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各占一半；有政务委员 15 人，其中非共产党员 9 人。政务院从总理到委员、副秘书长的 26 人中，非共产党人士有 14 人。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当了部长或主任。仅就二十一个部的统计，非共产党员人士当部长、副部长的有 26 人。如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朱学范，李德全，民主同盟的章伯钧、史良，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起义将领傅作义，作家沈雁冰，教授梁希等都担任了部长，黄炎培还是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们都有职有权地负责领导各自部里的工作。

黄炎培在旧中国是拒绝做官的。北洋政府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拒绝了，1946 年，国民党几次请黄炎培参加“国大”，然后到政府中任高官，黄炎培“笑而谢之”。现在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报上发表这条消息后，他儿子黄大能看了非常纳闷，就问黄炎培：“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向他讲了周恩来的动员经过，然后严肃他说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当时黄炎培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永远纪念着的 1949 年》。文章中说：“我生已七十二岁，已过七十二个年节，何以独要纪念 1949 呢？因自 2 月 15 日从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监视来到北京，筹备政协，参加政府以来，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动。其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

那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段君毅曾经谈到当年的政府工作，说：“周总理对政府工作抓得很紧，在他直接领导下，政务院一般都是每周举行一次办公性质的政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是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正副秘书长、各部部长。”“政务院每次政务会议的议程都比较多，每次都要讨论研究一些重要问题和批准通过一些重要文件等。参加政务会议的民主人士比较多。周总理主持会议，总是抓住主要问题，同时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总理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记性特别好。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教卫生、统一战线和外交、外交等工作部门的情况，他都十分熟悉。所以，周总理每次主持召开政府会议，即使开好几个小时，他都有话可说，并且很注意同民主人士交换意见。周总理考虑问题总是想得很周到、很细致、很深远，总要事必躬亲。他既抓政府工作的大政方针的制订，又亲自过问和处理大量具体事情。周总理是这样的工作作风。所以每当我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总要先准备一个很详细的汇报提纲，而且对所汇报的事情都要一件一件地查实，不能马虎。”

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中国共产党员，人人都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和谐。周恩来作结论时，对委员们发言内容的取舍，唯正确与否是从，不论是谁的发言，不遗漏一点好的意见。一些当年参加过会议的人今日说来，记忆犹深。孙起孟曾经谈到政务委员罗隆基的感受，说：“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也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的日子，他竟然力疾与会。我曾劝他不宜勉

黄炎培：《八十年来》。

尚丁：《黄炎培》。

强，他很坦率他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时间多长（我记得有一次从下午三时开会，一直热烈讨论到深夜），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因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一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入了化境，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关于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周恩来当时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上说过一段话：“党外的人士最初同我们的干部共事时，一般有骄傲和看不起党员干部的心理，进而渐对我们的干部有了新的认识，感到自身的不够，一切都想问我们，由此再进一步，才会获得真正的锻炼和进步。”“党的干部，要在思想上认定，这些党外人士，不仅为今日所必需，而且其中多数是可以争取他们长期合作的，因而对他们要有一家人的想法，团结教育他们，并给他们以考验的机会。”

这时期，周恩来已经有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思想。1949年10月在招待民革的会上，周恩来就说，我们的关系是很深的了，但是革命朋友不能以此为止境，共同纲领是最低纲领，合作是长期的。

章伯钧当时有一种消极情绪，认为农工民主党快要完成任务了。周恩来就到农工民主党干部会议上讲，“农工民主党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我们还要一同到达社会主义时期咧！”

这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民盟四中全会人员，会上，周恩来说：“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不论民盟或其他民主党派都应当继续存在下去。”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又针对民主党派任务已经完结了这种意见，说：“这是不对的，就是社会主义还要跟我们一道去呢。”

政务院成立以后，成立了总理办公室。当年的秘书杨超曾说：我们在办公室中，总理床上安着电铃，他一按电铃，我就去了。他指示一条二条三条，我记下来赶快去办。有时上厕所也把我叫去汇报。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我们几个人都搞不过来，总理的精力过人，他的工作特点是在百忙中总是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工作节奏快，工作安排得很紧凑。另外他接触面广，政府、地方、军队，各方面都有。总理实践经验丰富，运用自如，头脑清醒，布置了工作还要及时检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依然统治着中国，1949年的大革命胜利了，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现在要彻底铲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

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劫收了日伪财产和德、意两国的在华投资，侵吞了沦陷区的许多私人企业和财产，迅速发展起来的。到1949年，官僚资本拥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全国钢产量的90%，电力的67%，煤炭的33%，有色金属

和石油的 100%，水泥的 45%，硫酸的 80%，织布机的 60%，纱锭的 38%，糖的 90%，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1949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进一步指出：“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有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政务院成立后，这项工作成为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到 1952 年底恢复时期结束，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共有银行 2400 多家，工业企业 2858 个，其中，发电厂 138 个，采煤采油企业 120 个，铁锰矿 15 个，有色金属矿 83 个，炼钢厂 19 个，金属加工厂 505 个，化学加工厂 107 个，造纸厂 48 个，纺织厂 241 个，食品企业 844 个，等，以及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全部铁路、机车、客车、货车和一部分船舶，还有铁路车辆修造厂、船舶修造厂 30 多个。这些都成为新中国政府手中国营经济的力量。

党和政府对于这些企事业单位的政策，不同于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权机构。对后者，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各级政府机构，采取的是彻底破坏的方针，重新建立人民政府来进行统治。对前者，则在人民政府成为新的主人以后，不加以破坏，而“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一般说，都是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把官们完整地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1949 年 11 月，被蒋介石集团劫持到香港的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十多架飞机飞回祖国，周恩来还专门致电两航的总经理和全体员工，欢迎他们的“光荣起义”，宣布接受他们的请求，将两个航空公司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要他们“团结一致，提高警惕，粉碎反动派的阴谋，负责保护一切资产”，并且希望他们“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

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项根本措施，是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大约已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主要是在北方的老解放区和半老区；还有约三亿一千万人口的地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主要是在新区特别是在南方。1950 年 2 月中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进行中苏谈判时。还专门打电报给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提出，“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 1933 年文件及 1947 年土改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2 月 28 日，周恩来签署，发出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内说：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在 1950 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土改。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九省，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人地区，凡是准备工作已经充足、群众的觉悟和组织已经达到应有水平的地区，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土改。上述省份中如有某些地区准备不足，群众觉悟和组织不充分，或有土匪骚扰的，可由省人民政府决定仍不实行土改。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1951 年秋收

参看林蕴晖、范守信、张弓：《凯歌行进的时期》。

1949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

1949 年 11 月 12 日，周恩来发出的电报。

以前不实行土改，1951年秋收后由肯人民政府决定实行土改。在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区，以及少数民族和汉人杂居区，1951年秋收以前部不实行土改，1951年秋收以后是否实行土改，另行决定。

1950年6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全会要求在三年内必须有计划有秩序地完成新区土改工作。同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9月中，周恩来说：“在农村中把农民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里解放出来，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样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没有这个条件农民的生活是不会改善的，农民的购买力也不会提高。”“假如在三年左右把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完成了，那农村生产的增加是可以想见的。这也是发展工业的一个基础。”

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我国在新解放区，在约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反对封建主义，最根本的是要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反封建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软弱，没有能领导农民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群众完成了。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新中国一成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特权，都不容许再存在了。但是它们的经济侵略势力，像吸血管一样插在中国人民身上，吮吸着人民的膏血，也必须肃清。这主要是要收回海关，控制对外贸易，进行外汇管理，对在华的外资企业进行清理。按照《共同纲领》，凡依靠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一切特权必须取消；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要由国家统一经营；对外贸易要实行管制；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管理；一般企业在服从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允许存在，但要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这方面的工作，到1952年底也告一段落。

这里，以新中国的海关建设为例，来看周恩来的指导思想。

海关是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大门，关系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自从1853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就夺取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总税务司的职务长期由英国人担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美国人担任。新中国建立时，全国共有独立海关27处，分关19处，支关127处，工作人员一万多人。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海关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是一个重要内容，现在是时候了。

我国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是孔原。1949年周恩来同他谈话，要他担任这个职务时，他感到比较突然，回答说：“我连什么叫海关都弄不清楚，更不用说懂得海关业务了。”

周恩来和气地对他说：“不了解海关情况，不懂得海关业务，不能成为不去做的理由。革命取得胜利，收回了海关主权，难道还让帝国主义继续控制中国海关吗？你不懂得什么是海关，我也是不懂得的，但只要亲自做一做，去体验体验，就可以学会过去不懂的东西，逐渐熟悉并做好工作嘛。”

1950年9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妇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周恩来分析了旧海关的弊端和海关工作的重要性，说：“新中国必须把被帝国主义把持的旧海关加以彻底改造，使它成为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的人民海关。”

周恩来一席话，把孔原说得心悦诚服。他满怀信心地接受了接管海关、筹组新中国海关总署的任务。后来，他在工作中认识到，旧中国海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半殖民地性质。从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近百年时间里，我国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收支权一直被帝国主义控制着。从全国海关总税务司（旧中国海关最高机构）到各地海关税务司，主要领导职务全都由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着。因此，中国海关门户洞开。帝国主义利用它们攫取的权力，大量向我国输入商品，收买廉价原料，使我国长期变为落后的从属于外国的半殖民地。二是半封建性质。旧中同反动统治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壓力，滥行开放对外贸易口岸，到处设立海关，致使旧中国海关机构繁多，关卡林立。而且封建军阀一旦立稳脚跟称霸一方后，他就要设关立卡。旧中国苛捐杂税多，其中也包括各种名目的海关税收。一句话，旧中国海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它不但不能够保护和促进我国民族工业、农业的发展，反而成了帝国主义摧毁中国民族经济，榨取和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工具。

周恩来指导海关总署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明确人民海关工作的基本方向，对旧海关机构进行根本性改革。海关总署1950年1月提出了《关于税收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经政务会议讨论和周总理核定批准，3月7日公布实施。这年底，周恩来和孔原又联合署名公布了《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二）重视海关法制建设。1951年3月，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77次政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草案）》，4月18日公布了《暂行海关法》，5月又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三）重视争取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旧海关人员。

1951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作外交报告时说：“现在，这个特权已经彻底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完全收回了海关的主权。”

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在将要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和北平一些大学教授的会议上讲，“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来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爬在地上喘不过气来，今天，推翻了代表这三座大山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站立起来了。不过，这还主要是从政治上说，人民解放了。从经济上、社会基础上说，又经过了上述几年的努力，三座大山才算彻底铲除，人民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大地上，真正当家作主了。

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国际、国内，建设和战争，千头万绪，压在了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的辛劳忙碌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外国友好人士曾经问过周恩来对建国前后的比较。周恩来说：建国前，“作为那时代一个革命青年，那还是比较容易的，所有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争取胜利。但取得胜利后，问题就多了，作为管理一个大而复杂的国家的领袖面临的问题就更多，是非常困

孔原：《周恩来与新中国的人民海关建设》。

孔原：《周恩来与新中国的人民海关建设》。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

难的”。

周恩来的全身心都扑在了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事业上。

十五熠熠闪光的思想——“以农业为基础”

我们不但要推翻一个旧政府，而且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贫穷、落后、困苦，荒芜的土地，凋零的工厂，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工业年产值 140 亿元，只有抗日战争前 1937 年的一半；产业工人只有 306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0.56%；钢产量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90 多万吨下降 83%，人均只有 58 市斤；粮食产量只及战前的 3/4，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418 市斤，有 3 亿人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人均国民收入 66 元；1949 年物价比战前上涨 85000 亿倍……

清代《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有一句话：“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

谁是回春国手？是中国共产党，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领导的党和人民政府。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

他还说：“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摊子，不仅是烂的，而且是乱的，没有条理，没有材料。”他说，“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是不主张百废俱兴的，他说，今天来讲百废俱举是不可能的，建设必须有重点。国土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大陆上和沿海岛屿上还有大量的国民党部队，在已经解放的地区，政治土匪们还到处在活动和骚扰。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0 年 6 月，人民解放战争继续着，歼灭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 200 余万人，超过了“三大战役”中歼敌的总数，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若干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在清匪反霸和镇反中，剿灭了政治土匪 90 多万，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

那时候，对人民政府来说，军费负担是很沉重的。周恩来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1949 年 12 月，人民解放军的人数是 470 万，战争中要把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1950 年达到 500 多万，全国公教人员 300 多万，文武加起来，就是 900 万。他说：“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

1949 年是个灾荒严重的年份，水、旱、冻、虫、风、雹等灾害相继发生。最严重的是水灾，受灾面积一亿两千万亩，灾民四千万人，其中情形最严重的灾民七百万人。救灾任务很重，从 1950 年 1 月到 9 月，政府就支付 22.4 亿斤细粮，这也是必须支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 年，政务院还是把财政开支的 24% 左右用在了经济建设上，这个数字，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的建设投资都要大。

到 1952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 827.2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了 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145%，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为 134.9 万吨，粮食产量为 3088 亿斤，棉花产量为 2607 万担。职工平均工资比 1949 年增长了 60—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了 30% 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3 页。

1950 年 9 月 14 日，《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问题》。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3 页。

上。交通运输方面，以国家的大动脉铁路来说，全国铁路到1950年6月底，已通车二万二千零十九公里，占88%，到1950年年底就全部通车了。

建国前后，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也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政府在经济上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在十多年的战争中形成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物价还在多次地大幅度上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政府还不能够控制它。一些反动的资本家说：“共产党军事是一百分，政治是八十分，经济是零分。”他们预计中国共产党治理不了这个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烂摊子。

政务院成立后，1949年11月，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讲：“我们还需要一二年吃苦时间，将会使物价趋于平稳。”当时他估计是，“两年左右使物价稳定下来”。他说，“我们的战略前途是一定胜利的，但是必须战场组织得好，战役运用得好，才能完全胜利。”

周恩来委托陈云抓经济工作，周恩来给予全力支持。陈云有力地进行了平稳物价的工作。

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机资本的作祟，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特务叫嚣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政务院给了投机商以毁灭性的打击。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渐向下浮动，日趋稳定，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了十多年的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1950年6月，周恩来说：我们用种种方法克服困难，已经得到经济胜利，今年二三月间把十二年飞涨的物价稳住了。不过物价能否平稳，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国家的收支平衡。这方面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这时期，周恩来在恢复经济和建设新中国中，提出了很多熠熠生光的思想。例如：

在这全国除旧布新的过程中，对旧的东西怎么看？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到处热气腾腾，当时大家的思想上，普遍是要砸烂旧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是否一切旧的东西都要不得了呢？周恩来在1949年11月对政务院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我们要建立新的革命的秩序，在其中发现新的事物，掌握新的事物。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并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了，旧社会中的事物就都一无可取了，都应丢在垃圾堆里。就是从垃圾堆里，街上拾荒的也还可以找出他所需要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旧的东西批判地接受一些，使用一些。例如盖新房子，也可以用一些旧材料……

在这之前，5月间，他向南下工作团讲话中也说，旧的里面也有很多可用之物，新社会是从旧社会中来的，每个人是从上代延续下来的，所以不能否定旧的一切。

这些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说这样的话，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现在，几十年后来回顾周恩来所说的这些话，才能领会到他的远见卓识。

又例如，怎样对待毛泽东？

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而共产党的中央主席是毛泽东，因此，毛泽东的威望在全国人民中无比地增高，大家都要学习毛泽东。

周恩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讲了“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但是同时，他讲了毛泽东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对热情、单纯的青年人说，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圣人”，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后来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大家都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当年周恩来对广大青年讲的这番话，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当时情况下而能说这样的话，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被捧成了“神”，所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非议了毛泽东，谁就是反革命，“四人帮”粉碎后，毛泽东仍旧是不可冒犯的神像，怎样来正本清源，还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而又能不受层层阻力呢？1978年，胡耀邦就借助于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周恩来这个讲话，重新教育了广大的中青年。

这里，特别要讲到周恩来在建国之初，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

1949年10月建国，12月，周恩来讲了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第一条就是城乡关系。他根据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说，今天，我们已经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接着，他就说，既然是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村。那末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

周恩来说：“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

周恩来是熟悉农村，了解农业，对农民真诚挚爱的。他从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到1949年3月进北平，17年中，除了1938年到1943年夏天，再加1946年，这六七年基本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外，其余都是在农村生活着，就是这六七年间，他也是时来时往，经常到根据地。他对农村与农民十分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建国后他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后，曾经讲述电影里老班长的一段话，“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让她（指春妮）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周恩来说：“我每次听到这段话就要流眼泪”。

建国后周恩来到农村视察时，走到田边地头，他经常会关切地对身后的人们说：“不要踩坏地里的麦子。把话往后传。”

1936年，埃德加·斯诺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他描写周恩来在农村会见他的情况：周恩来陪着斯诺走过了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果实的玉米田，周恩来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这是在解放区的农村。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灾荒不断，例如一则1937年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谨，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日三千万人，已有好几十万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

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

斯诺当时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他是到中国来找“东方的魅力”的，结果，他“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看到了有的人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挂在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人的眼光茫然无神，即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人们把什么都卖光了，卖了妻，鬻了女，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甚至最后一块遮羞布；儿童们的小身体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中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

旧中国的这一切，周恩来是多么熟悉呀！

新中国一成立，首先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吃饭、穿衣问题，也就是“温”和“饱”。这两项，都离不开农业，要吃饭，得靠农业；要穿衣，在化纤还没有的时候，也要靠农业。所以周恩来说：“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

要以农业为基础，这点，终周恩来的一生，他是始终执著地坚持着。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个五年建设是要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打下基础，强调的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然而，1953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接着，他说：“农业更需要发展。”

他说：过去，我国农民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现在他们生产了粮食，要求改善一下生活，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米并不算多，全国四万万八千万农民合起来就要一百多亿斤。城市工业人口增加了，也需要粮食。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也需要粮食。灾荒地区每年也都需要救济粮。另外，我们还要争取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机器。在当时我国出口的六种东西中，就有粮食、油籽、牲畜、小麦、经济作物五种是农产品。因此，要用极大的力量来注意发展农业。他要求：地方党委，特别是省以下的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当放在农业方面。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要用仅占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来养活世界上占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农业确实是我国的一个头等重要的战略问题。

苏联在革命胜利后，抓了工业化，工业发展很快，但是1928年到1932年间进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却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农业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徘徊不前，直到五十年代初，粮食的年产量才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水平。

周恩来不采取苏联的作法，他一直强调要抓农业生产。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1953年到1957年这五年中，农业的收成是两个丰收年，一个平年，两个歉收年。凡是上一年农业丰收，下一年必然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凡是上一年农业歉收，下一年必然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较慢，实际经验也说明了农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1937年5月15日北平《民主》载，转引自《西行漫记》第73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1页。

1956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组织人草拟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这过程中，周恩来提出的主要经济思想之一，就是强调在继续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突出农业的地位。他提出在“二五”期间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协调，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他说，只有农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他常常提醒人们：我们国家人口多，粮食的需要量很大，这主要应当靠我们自己生产，有时候进口一些粮食，那只能是临时作点调剂，如果我们在粮食生产上出了大问题，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保证不了我们的需要。

1957年3月，周恩来来到了浙江杭州。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闻名的花园般的城市。1939年他到浙江的时候，杭州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周恩来鼓励人们的是“收复杭（州）嘉（兴）湖（州）”。新中国成立，杭州回到人民的怀抱，建设得越来越美丽。西子湖欢迎着周恩来。作为一个祖籍是浙江的人，周恩来心情十分愉快。杭州市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请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欣然答应了。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仍然讲了农业。他说：

我们国家的建设，扩大农业基础是首要的任务之一。重工业是应该优先发展的，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实现工业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甚至不能丝毫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关键在于农业。我们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搞得更好，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所需要的粮食就会感到不够。现有的耕地是有限的，这就迫使我们首先要把农业搞好，真正能够提高生产。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是五万万多农民的工作，是全中国人民的工作。

关于农业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周恩来讲过五个方面：

- （一）工业人口要吃饭，要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
- （二）农村是劳动力的源泉，要看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少劳动力；
- （三）要看农业能为工业提供多少原料；
- （四）农村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的大小，要看农业的发展程度，有多少购买力；
- （五）中国面积广大，交通落后，要看农村能够提供多少运输力。

他说：所以，农业先上去，工业才能跟着上。如果不把农业生产增长起来，工业生产就没有巩固的基础。

后来，六十年代初，我国进入了“大跃进”失误后的调整时期，周恩来有一次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讲：可以写一副对联，

上联是——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实现衣轻重。

横批是——综合平衡。

在调整中，周恩来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个中心环节。他说：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农业中，首要的是粮食，这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他用了极大的力量来抓粮食生产，并且说，发展粮食生产的主要方向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几十年间，周恩来不但提出了要以农业为基础，而且贵在坚持。

直到现在，农业是基础，仍然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十六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建国前，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建国后，周恩来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因为徐向前有病，1950年初聂荣臻被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这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医生再三要他休息，主持军委工作的是毛泽东、周恩来。

军事工作是十分紧张的。聂荣臻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从这也可想见周恩来当时的繁忙程度，他既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要兼管政府的工作。

前方，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薛岳部队三万多人。剩下的战事不多了，而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五百多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

1950年4月间，周恩来在第28次政务会议上说：“1950年把军队数目从五百六十万减到四百万。”

1927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后，搞裁军，用来排斥异己。周恩来说，我们复员，“不要惊动起义军队，因为过去一裁军便裁了杂牌军”。总的目标是减到二百八十万，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复员到四百万，减少一百多万。

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对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说我们的整编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由委员十五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是副主任，6月20日，政务院开扩大会议，布置复员工作。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毛泽东也到会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复员的是建立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党政军民要齐心把工作作好，复员前要很好动员，进行评功、鉴定，复员时部队要欢送，地方要欢迎，妥善安置，要规定一系列的待遇，如发给粮食、布、现金，直至对婚姻纠葛的处理办法等。傅作义、张治中等也到会了，听了很激动。他们说：从旧社会来的人，最有体会，同国民党的裁军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措施”。

正在新中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情况突变。6月24日，周恩来还在主持政务院会议，讲1950年准备再减少军队一百二十万。6月25日，朝鲜北南双方爆发了内战，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27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还命令他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

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周恩来在百忙中，时时关心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朝鲜是我国东北的紧邻，而东北，白山黑水，区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当时中国仅有的一点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在东北。周恩来注视着地图心想：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

他同毛泽东商议了这件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13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商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第42军和若干炮兵师、高炮团、工兵团，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5日前到达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通化、本溪、铁岭等地。空军编成三个团在东北训练，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开会，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在会上，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解放了华南、西南广大地区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期间重要的是建设，大家忙于政府工作，部分力量搞军事。今年对军队提出了生产任务和考虑复员一部分，只用部分部队进行解放海岛和准备进军西藏，而在生产和复员上却用了很大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给了我们新的课题。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战争的东方基地。它如果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兄弟国家问题，不仅看作和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益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根据战争的情况，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这和我们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是有联系的。我们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积极准备，万一形势恶化，就会措手不及，陷于被动。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讲到了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

8月25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到：“现在看，朝鲜战争可能变成长期”，“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他讲了在北伐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和关内抗战，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有朝鲜子弟参加，朝鲜民族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朝鲜战争之初，朝鲜人民军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20日攻克大田，到8月中旬，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成了胶着状态。

我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8月中旬连续开会，研究朝鲜的战争情况。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对于在什么地方登陆也作了分析，认为适宜登陆的港口有六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8月23日凌晨，作战室的负责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分析结果。周恩来很重视，带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9月15日，美军七万多人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入退却。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

美军过不过“三八线”？如果过“三八线”北进，就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这是一个严重的行动。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都密切地关注着。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了《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最后一句“也不能”三字下面“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是这一讲话稿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在定稿时周恩来亲笔加上的。

这个讲话，10月1日《人民日报》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

接着，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这次约见的时间是在凌晨一点钟，这也说明了周恩来急迫的态度和制止战争扩大的心情。这次会见时作翻译的是浦寿昌，周恩来事先对他讲，要突出一个“管”字，把这字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份量，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他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在翻译时准确无误。

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美国政府当然是要考虑的。八月间，杜鲁门曾经派阿弗里尔·哈里曼到东京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问他这个问题。麦克阿瑟表示不相信苏联有意于直接干涉，或卷入一场大战，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9月27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并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周恩来的国庆讲话和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白宫，杜鲁门没有重视，认为这只是周恩来的“恫吓”。但是，杜鲁门觉得“中国对朝鲜的干涉的可能性当然不能不加以考虑”。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指示。指示中说：“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一方面，美国政府却放出空气，说是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

10月15日，杜鲁门乘飞机到太平洋中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杜鲁门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说：“这次会谈回来

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10月7日，美国侵略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

中国出兵不出兵？中共中央酝酿了多次。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6日，又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是主张出兵的。周恩来也是主张出兵的，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14日下午，中央派飞机从西北把彭德怀接到北京的会场上，彭德怀也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会上决定彭德怀领兵前去。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央正式决定之后，周恩来受委派，在10月8日这一天，带了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到苏联去商谈。他们坐的是安2型飞机，时速只有二百多公里，到莫斯科用了三四天时间。第一天到伊尔库茨克，第二天到新西伯利亚，接着又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才到莫斯科。斯大林当时正在南方黑海之滨的休养地，因此，周恩来等又乘飞机到达斯大林的休养住所。

据当时同行的康一民谈：“周总理此行的目的是，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且要求苏联给中国军事援助和派空军进驻东北及北京、天津、上海等沿海大城市。”谈判中，苏联方面有了变化。

当年的志愿军领导人洪学智有一段回忆：“我们13兵团已经做好了一切战前准备，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立即向朝鲜出动了。就在这时，斯大林突然通知我们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后来我听彭总讲，斯大林说的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我们能不能打胜这场战争有怀疑。他看到我们真的决定要出兵了，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就犹豫了。斯大林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装备那样差，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没有底。觉得如果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一旦我们打败了，就把他们给卷进来了，苏联就会有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毛主席和彭总都感到很突然。”在莫斯科，周恩来同样也感到很突然。他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这时，前方的志愿军已经整装待发。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打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毛泽东，10月12日20时”

彭德怀13日就赶到北京。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会后，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说：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35—438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25—26页。

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人民已经打了十几年仗，军队的装备陈旧，要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军队打仗，困难是不小的，特别是空军还没有建立起来，作战时没有制空权，就会十分不利，所以中国决定出兵后，希望得到苏联在装备上的帮助，特别是空军的支援，结果发生了这一个曲折。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这件事，说：“他（指美军）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谈了一天，晚上就要决定，马上电问毛主席”。“毛主席电报去，觉还是出兵，先打李承晚军，把美军孤立，逐步想办法”。

又一次，周恩来谈到这件事：“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指出兵过鸭绿江——作者），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不派飞机，我们还是出兵”。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同莫洛托夫等继续商谈，最后苏联方面同意中国出兵和给予军事装备的援助，并且同意派飞机帮助中国防空和训练，不过飞机只到沈阳。

后来，周恩来回国后，10月29日又同苏联顾问沙哈诺夫等会谈。沙哈诺夫对周恩来说，苏联方面又同意派苏联航空员驾驶喷气式到安东担任防空了。11月10日左右，苏联空军可以移到安东。

10月24日，周恩来讲了当时形势：美国飞机已经侵入我国领空十二次之多了。我们国家需要恢复生产，我们的确也正在恢复。我们本想1951年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还考虑增加公教人员生活费、但是敌人不让我们这样作，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我们想他是否会停在“三八线”？敌人占领汉城，印度尼赫鲁转告我们，三外长会议说好不过“三八线”。但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三外长会上决定的是和缓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在9月30日发表了声明。10月3日，敌军已过了“三八线”。我对潘尼迦讲不能不管。尼赫鲁转告英国贝文，贝文通过尼赫鲁表示到离鸭绿江40英里就停止，当时已到平壤。现在已由平壤北进。显然，这是第二次欺骗。“敌人得寸进尺”，我们“过去做的已无效，只有力量的管才能起作用”，管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给敌人以挫折，使它知难而退，另一种是它可能孤注一掷，因为美帝国主义内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有准备。我们并不愿战争扩大。周恩来说：“力争第一种可能”。

10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在北京最后一次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鲜后的部署和作战方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这时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正迅速

1960年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71年12月30日，周恩来同在京上层爱国人士的讲话。

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向有关方面负责干部和民主人士所作的报告。

向鸭绿江推进。25日，两军相遇，开始了第一次战役，经过十三个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到11月7日结束。志愿军把敌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敌军坚持要占领全朝鲜，增强地面部队到22万多人，飞机1200余架，发动全面进攻，宣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志愿军作好准备，进行第二次战役，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原“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这次战役震惊了世界。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九天连续作战，把敌人赶到三七线以南，解放了汉城，又歼敌一万九千多人。后来又经过第四、五两次战役，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了敌军二十三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美国统治集团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经不可能了。1951年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透露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中旬，又通过中立国的外交人员向我国试探，同时，军事上暂时放弃了实行全面进攻的行动而转入战略防御。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根据中朝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和美国政府表示愿意谈判的意向，提出双方谈判的建议。30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令发表声明，同意停战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通知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会晤。10日，双方在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战争的物资消耗十分巨大，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彭德怀甚至讲：“三七开，前方功劳三分，后方功劳七分。”例如1953年夏季攻势中，一次二十多分钟的火力急射，就用了弹药1900多吨。金城战役一仗，消耗物资34000多吨。战争三年，仅主食、弹药、油料等几项主要物资的供应，就近300万吨。志愿军是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既要由国内筹集，还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运上去。聂荣臻回忆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在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周恩来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应，他关心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1951年1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周恩来就要聂荣臻同他一起专程赶到沈阳听汇报，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

《聂荣臻回忆录》下卷，第747页。

《聂荣臻回忆录》下卷，第749，750页。

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面上加绠线。当知道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就要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他及时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如1951年9月下半月到10月底，各种物资运上去需要一万二千个车皮，而按铁路运输能力只能上六千个车皮。周恩来知道后就指示主要运粮食、被服和油料，保障了前方最迫切的需要。

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志愿军的后路。中朝双方及时采取了措施。

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组织后勤供应运输，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不少指示，经毛泽东批发，如《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决定组织第一、二、三批志愿军轮番上前线，使作战既有生力军，部队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了持久性和高度的机动性。甚至，他连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也考虑到了。1950年11月他听到前方回来的人谈到，志愿军司令部还没有足够的防空洞，这地方是著名的金矿区，附近有四部电台，驻扎已近一月。他立即写了中央给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的电报：“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会应形成决定，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

停战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派李克农、乔冠华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随时向周恩来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缜密地考虑到了。他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大量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发去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的工作，仅1951年8月下旬到10月25日，就有50多件，总数约有一二百件。

美方是谈谈打打。它把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上，作战飞机最多时达到2400余架，舰艇300余艘，运用了当时除原子弹外的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仅美国远东空军就出动了72万架次，投掷和发射了47万吨弹药。但他们始终没有能攻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防线。最后，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支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中国军队装备的改进，特种兵跳跃式地发展。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全力支援前线，加强国内空防、海防、边防和地方治安的同时，加紧组建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兵和海军舰队等，突击训练，力争尽早入朝担任作战任务。其中，除了空军是1949年11月开始组建的，海军是1950年4月开始组建的外，其他各兵种的领导机关都在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间建立起来了，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并决定创办解放军军事学院。

当时，武器装备从苏联购买，部队的编组、训练请苏联顾问帮助，特别是成建制地接收苏军的航空师、坦克团，就有不衔接之处，如苏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没有我国解放军传统上的地位和职权，有些条令也不适用于我国情况。周恩来不照搬苏联的一套。1950年1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等都参加了。周恩来在总结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志愿军和将来战争中我军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保证。这些好传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思想，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作风等。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保证过去的优良传统。苏联有他们的历史和条件，我们有我们的条件，像党的领导、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等，要按我们的传统体现在我军中。

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来，这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就由彭德怀主管了。但是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总理，仍经常关心着军事工作。1952年第二季度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时，周恩来同时编了《五年军事计划纲要》。

1957年，周恩来说：“这四年多，我过问军事工作比较少了，但也看了一些报告，知道在这方面有进步的地方也有减弱的地方。”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海陆空军军官大会上，专门讲了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问题，他说：

“四年多来，我们做了一些新的部队建设工作，如实行了兵役制度、军衔制度，颁布了各种条令等，这些都促使我们的军队在正规化方面前进了一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要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为加强。”

十七经济建设已经居于首要地位

建国之初，北京曾经盛传过一件事：

一天，周恩来总理坐车到西苑飞机场（那时还没有首都机场）去送外宾，回来时，他看到路边上有一座新盖的大楼。他立刻对秘书说：这座楼是谁家盖的？建设计划中并没有呀！秘书回去一查问，果然这是计划外的建筑，是建筑公司利用几项建设后的剩余材料，自行动工兴建的。

这件事说明，周恩来对于建设事项的熟悉，真可谓全局在胸，纤毫不漏。

战争年代，周恩来管军事，也是这样。在大决战中，一次，作战参谋送来一份敌军兵力部署的详图，他一看，立刻指出，缺少了一支部队，漏写了。现在，他把自己填密的心思、不倦的精力，用到经济建设上了。

周恩来的这个转变，是在 1949 年。

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着全国范围的大进军，他的心目中，是把战争放在第一位的。直到 1949 年 7 月，他还说：“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战争仍旧在进行，但是周恩来的思想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12 月，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

周恩来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当时，周恩来五十多岁，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敢说敢为，为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 年 12 月，他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不料想，1950 年夏，发生了朝鲜战争，后来我国进行了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需要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同时，周恩来还要照顾到国内的事情，在国内，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仍在进行，必须统筹安排。他的心是多么挂念着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呀！

当然，首先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否则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在战争情况稳住以后，他就在考虑怎样继续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了。

一方面是迫切的心情，另一方面又要看客观的可能。这就反映为方针的几次变化。

1950 年，国家预算赤字是百分之十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能取得这样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 页。

的结果，当然是一个大胜利。当时，军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二，抗美援朝直接支出占军费的百分之六十，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一。

1950年12月，周恩来手书1951年的概算总方针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

到1951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这时他说：“抗美援朝仍应成为1951年各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我们要“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到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这时他加了一条：“同时也着手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到今年11月，周恩来又改变了方针，是“既要保证朝鲜战争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概括这十二个字成为六个字：边打，边稳，边建。

1952年度，军事费用（包括在朝鲜的战费）降到了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这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

1952年，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二五”建议、“三五”草案、“四五”纲要草案以至不少的重要年度建设计划，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或参与指导下草拟的。1952年初，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来劲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为由陈云任组长的八人小组编制“一五”计划。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时间，审查经过修改以后的“一五”计划草案，然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然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颁布实施。总的说来，“一五”计划草案曾经进行过五次重大的修改和充实。周恩来经常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包括细节一一进行研究，直到最后定稿。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很成功的。这个计划的完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草案”提出了“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1953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上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4年9月23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旧中国为什么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因为落后，首先是经济落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人民直不起身来，处于被压迫、被榨取的境地。革命胜利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改变了生产关系，这就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

曹应旺：《论周恩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77页。

中华民族才能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说自己要说的话，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周恩来的这个思想在脑海中是很牢固的，贯串他的一生。十年后，1963年9月5日，他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还对他们说：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又十年后，1973年3月，周恩来在会见喀麦隆的总统阿希乔时，说：核武器越多越不好打。也就是说世界大战还打不起来。他说：“我觉得我们第三世界还是应该从改善人民生活着手，首先是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这最主要。”

所以周恩来特别关心经济建设，说提高生产力是“最主要的事情”。

他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还说：“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可以使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现在，人民掌握了政权，具备了条件，周恩来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是我国经济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曾经多年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吴群敢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草案，“在此期间，所有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包括选址、规模、配套等等，都经周恩来逐个审定并电告苏方首脑洽商。‘一五’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初步改善了我国工业的地区布局”。

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马列讲，1952年8月，周总理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和陈云、李富春、李强、阎宝航等同志以及计委、经委的部分同志到苏联去谈判，在双方协定苏联对我国的援助项目时，开始是九十项，以后增加五十一项，合共一四一项，到1956年时经过增补，成为一五六项，这一五六项援助项目，从项目定下来，到来货、安装、生产，以及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施工设计、试验研究等，周总理都是亲自过问的。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周恩来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就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新的政府，从而发展生产，开发实业，达到经济的发展。他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01页。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3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

吴群敢：《周恩来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法。”“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无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那时候，才能够“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

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中国开始了，周恩来已经是政府总理，面对着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极不合理的经济布局，他费了很多心血——对能源、电力、有色金属、重要煤矿等这类属于经济命脉性质的工业，放在什么地方；内陆地域的大片工业空白中，怎么布点；等等，大到国家宏观安排，小到企业内部的一些重要措施，周恩来都考虑到。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抓紧经济建设，而且抓得很多，很广，很细，对许多部门的情况、问题、数字了如指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有的还不止去一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直这样。

例如，为了解决石油问题，我国开始兴建大庆油田，周恩来就去过三次。康世恩回忆说：

周总理第一次到会战现场视察，正是大庆艰苦创业的1962年。当时，大庆全体干部、群众住牛棚、干打垒，以五两粮加野菜保三餐，艰苦地开发建设油田。6月21日，千里油田，芳草萋萋，碧空如洗。周总理来后，首先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登上钻台向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他关怀工人冷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话。他走进大庆北二注水站后，仔细地看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他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时间，就嘱咐“要把时间标上”。当他发现二百米外有一个职工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向地窝子走过去，人们劝总理不要下去了，总理却一个劲向前走。家属杨德群又激动又担心，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周总理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他一面弯下腰往地窝子里走，一面问小杨是哪里人？生活习惯不？小杨一一回答了。在地窝子里，周总理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周恩来深入工厂、矿山基层，不光是视察、了解情况，而且也是学习。五十年代他不止一次地到过上海钢厂。1957年7月他到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时，登上了五号行车，恳切地对行车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拜你为师。”他在徐师傅指点下，亲自驾驶了行车。

1958年7月17日上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到上钢一厂，在炉前，他和工人一起挥舞铁锹，进料加矿石，尽管满头大汗，依然干劲十足。在劳动间隙，他和工人一起就地休息，聊天，了解情况。厂领导把冷饮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恩来一边擦汗水，一边看着手里那瓶汽水，问：“他们呢？”

一旁的工人扬起手中的汽水瓶：“我们都有。”

周恩来看见工人手中的汽水是白色的，自己手中的汽水是淡黄色的，就问厂领导：“怎么颜色不一样？”

“这是为总理预备的。”

周恩来慈祥而又严肃地说：“都是劳动者嘛，工人能喝，我为什么不能喝？不能特殊。”说着，他把自己手里的淡黄色汽水换了一瓶白色的盐汽水，

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

康世恩：《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和工人一起喝着谈起来。

一次，周恩来在上海视察时，召开一个有关工资调整问题的调查会。参加会议的大都来自工厂、学校、机关的基层单位。起初，大家都很拘谨，不敢发言。周恩来十分随和，脸带微笑，主动地同人们交谈。在周恩来亲切和蔼的谈笑中，会场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了。正在周恩来谈话时，一个建筑公司的队长突然说：总理，你讲的不对。被突然打断话头的周恩来，并没有责备这一冒失行为，反而笑呵呵地鼓励这位同志发言，还说：今天，我就是来听取大家的意见的，什么意见都可以谈，对我都有启发、帮助。一席话使得在座的人完全消除了拘束，大家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群众的意见，一一谈了出来。会后，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说：会开得很好，我了解到不少具体情况，目的达到了。

周恩来为自己写的修养要则之一是：“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非常内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直至亲自实践和体会。

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定要落实到经济建设这个业务上；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他认为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等。这里，提一下他对于综合平衡的强调。

周恩来说，经济建设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建设不看到整体不行，看到了整体，心中有了全局，才能够建设有重点，安排有先后，全面地考虑问题。他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突出地强调了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这部机器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好。

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周恩来在1962年说：“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是“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为了改变“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不协调现象，就必须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4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1页。

十八“要使江河都对人民有利”

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叫《理水》，写的是夏禹治水的故事。

我国古代相传，尧时洪水泛滥，舜继位后，仍旧是“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水患严重。禹的父亲鲧治水，采取堵塞的办法，没有成功。禹治水，采取疏导的办法，洪水流退，鲁迅笔下的禹，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身后跟着一批乞丐似的随员，走遍天下，他娶妻四天，就为了治水而离别，专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引田水入川，引川水入海，迁移户口，凿通山谷，调有余，补不足，生产走上正轨，人民安居乐业，日益富庶。

现在浙江省绍兴市，有大禹陵，陵上一座大殿，里面站立着禹的高大塑像，双手在胸前捧着“玄圭”。人们来到这里就会肃然起敬。1939年春天，周恩来到祖籍绍兴市，曾经专程来这里瞻仰，并且在“大禹陵”的巨碑前摄影留念。

大禹在周恩来的心中，是有深刻印象的。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8月，周恩来要科学家们团结一致，建设祖国。他说：“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旧中国，人民饱受水害。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说是为了抵御日军，在河南把黄河决堤放水，十七个县一片沼泽，一百四十万灾民无家可归。1946年，国民党政府又要将黄河堵口复堤，淹没解放区。为此，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并且在七月间同伍云甫等坐飞机到开封，听取解放区有关负责人意见，并且到花园口视察。当时的河南老百姓，深深仇恨着四大害：水、旱、蝗、汤。这四害中除了汤是指国民党汤恩伯的军队扰民害民外，前三项水灾、旱灾、蝗灾都是自然灾害，而水灾居第一位。

1949年是我国水灾很严重的一年。这年夏天，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浙江、江苏、上海的海堤在台风侵袭下几乎全部崩溃，千百万灾民需要救济，粮食供应十分紧急。周恩来在建国初一次政务会议上讲：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河堤年久失修，从先天来说是个多灾难的国家，加上近十二三年来战争的破坏，黄河又改道。把黄土带到淮河、洪泽湖，甚至于长江。他说：战争是造成灾难的重大原因，战争全面胜利以后，政府准备大兴水利。

11月，周恩来就接见以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藻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代表，对他们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正在草创，鼓励他们用大禹治水的精神，为人民除害造福。

这次会议确定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水利建设的任务是，依据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人民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物力及技术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以及疏浚河流、兴修

《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意思是说洪水为害，浩浩荡荡，包围了山岭和淹没了部分丘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页。

运河等工程。

当时正是我国普遍地进行土改以解放生产力的时期，周恩来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几件工作，第一件就是“兴修水利”。他说：“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

1949年到1952年是建国后的恢复时期，国家的财政经济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政府却拿出了尽可能多的资金来从事农田水利建设。1950年，用在水利建设上的经费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时期水利经费最多的那一年的十八倍，1951年增至四十二倍，1952年增至五十二倍。我国大约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是经常处于水患的威胁之下，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来保护的，而这些地方正是我国人口集中、工农业发达和大城市所在的地方。这三年间，对全国四万二千多里的堤防的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和加固；对一些历来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沂河、沐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进行了全流域的治理，还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这些工程有的十分浩大，如在治理淮河中，就要修建水库十三处、控制工程十七处，还要疏浚旧河，开挖新河，修建船闸等。

这三年中，水利工程上完成的土方量，有十七亿立方米多，相当于十条巴拿马运河或者是二十三条苏伊士运河修筑时的土方量。

全国在三年中共扩大灌溉面积约四千九百多万亩，另外有一万八千多万亩的农田因为增加或改善了水的供应，免于旱灾的威胁。

周恩来说：我关心两件事，一是上天，一是水利。

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前者关系到国势，后者关系到民生。上天难，治水也是很不容易的。

从治水的大者来说，大体是：五十年代前期，周恩来抓治理淮河，开治淮会议，发治淮决定，建治淮机构，订治淮规划，调治淮所需，保证了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的胜利完成。随后他又领导制定了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兴修引黄济卫工程的战略决策。初步解决了淮河、长江、永定河流域的燃眉之急。五十年代后期，周恩来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设施的决策。六十年代，周恩来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七十年代，周恩来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

原水利部长钱正英说：“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4页。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第8页。

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七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十六点三万千瓦发展到二千七百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九万多马力发展到八千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周恩来曾经三到三门峡，在水库工地上度过八个日夜。1958年二三月间，他在风雪严寒时际，视察荆江大堤，还溯江而上，勘选三峡坝址。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六次到密云水库工地解决问题。他在东北延边，询问水源状况和水土流失问题。他到南国琼岛，了解松涛水库的建设并题写库名，他在西双版纳嘱咐要保护森林，做好水土保持。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很关心水利工程，常要到现场看看。1960年，广东新丰江水库遭到地震，周恩来风尘仆仆，亲临现场，研究震情，察看堤坝，指示当地有关部门加固维修，防止河源地震破坏堤坝，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1958年7月，黄河花园口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洪峰流量达每秒二万二千三百立方米，浊浪排空，一出豫西峡谷，就冲断了郑州黄河大铁桥，汹涌大水紧逼堤防工程。7月18日上午上报中央，那时周恩来正在上海开会，当即停下会议，乘飞机在黄河上空视察洪水，然后到达郑州。

原铁道部长吕正操说：“1958年，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7月17日夜，黄河铁桥十一号桥墩被冲毁，京广线受阻。周总理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带着我们乘飞机赶到郑州。在飞行途中，总理和我们谈论到西晋时杜预曾在孟津架过浮桥。一下飞机，总理就叫人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同时听取汇报，了解实情。接着，又到大桥上视察，一直忙到夜间十一点半。为了尽快恢复南北运输，总理不顾疲劳，又要求连夜召集群众开会，动员抢修。这时，职工已经入睡，听见钟声，都赶到宿舍球场。大家见总理精神抖擞地站在前面，情绪十分激动。总理说：‘历史上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桥，我们现在一定能够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桥。’他号召大家献计献策，同心同德，早日把桥修好。开会期间，下了一阵雨，有人要给总理打伞，他婉言谢绝了，一直冒雨把话讲完。听了总理的讲话，群众的热情很高，会上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过十四昼夜奋战，大桥很快修复了。8月5日下午，周总理再次来到大桥工地，同抢救工人、战士、社员会面。”“回到住地，又听到济南黄河铁桥也出现了险情的消息，总理不顾劳累，次日又飞抵济南视察。”

周恩来曾经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用上两三个月，踏遍黄河沿岸，从源头到入海口，仔细研究怎样开发利用，从根本上改造黄河，变害为益。

但是，他哪有这个时间呀！

周恩来的心愿是：“要使江河都对人民有利。”这是他为荆江分洪的题词，反映了他在治水工作中的思想主旨。

周恩来的作风一贯是民主的，在水利工作中他也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不是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而是倾听各方面的议论，以同志和朋友的身份，平等地交换意见，对别人提的问题，一一认真地作解答；自己不了解的，不耻下问。他鼓励别人讲出自己的见解，说得对，他欣然一笑，表示赞同；对于不同意见，有时就展开争论，他说：“真理越辩越明嘛！”

例如在研究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时，他就说：“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的。”“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曾经是周恩来的秘书的李岩说：总理很重视来自基层的经验，有什么好的工作汇报，他都看得很细。总理对水利工作非常重视，主张排蓄并举。那时淮河沿岸地区常打架，上游早期蓄水，下游就干旱，等雨期上游要排水，下游就会受水灾，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指出要统筹兼顾，协调上下游沿岸的关系。

他觉得周恩来的治水思想，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边实践边完善的。

杨纯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分管水利工作。她说：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次总理和我们一起到官厅水库，他一路上作调查，问数字，了解情况。总理的思想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他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具体目的的。周总理对建水库发电的事情问得很仔细，甚至亲自调查研究。他对水库建成后的效益问题非常关心，比如说建一个水库要占多少农田，能储蓄多少立方米水，可发多少电，等，他都一一了解，并请专家来座谈。她记得在建刘家峡水电站时，为了调查了解具体情况，周总理请了许多专家，其中还有苏联专家，在西花厅开会，问他们水库建成后实际的蓄水量是多少，从上游夹带下来的泥沙量是多少，如何解决等等。这一下把专家们问住了。本来他们来之前准备得很充分，算的数字也很清楚，但是没有想到周总理要问这些不利因素。同时还有许多问题，专家们也不能说准确，如要淹多少田、洪水来时多少流量、上游的植被泥沙情况怎样，等。结果，专家们只好说他们回去再算算。

周恩来看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利和弊两面他都充分考虑，并抓住主要方面，主次分明，他认为水利工作首先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要为生产办水利，不是为水利而水利；要把治水工作从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的目的；治理时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以治标辅助治本；要综合利用，整体规划。

经过多年的摸索，1958年，周恩来提出的治理长江流域的方针，可以说是已经相当完整的治理大江大河的思想：

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

修建水库，周恩来强调库区的山上要种树。他说：“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木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

他认为林业是关系国际民生的大问题，是百年大计；我国的林木是不够的，应该有计划地采伐，不要乱砍滥伐。从六十年代起，他针对林业生产重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3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6页。

采伐、轻育林的错误作法，多次讲到长此下去，林业生产就要出现中断的危险，我们将会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历史错误。1962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林业问题，说：“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后来，他的这一思想发展成为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实现青山常在，永续作业，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说，林业工作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要两条腿走路，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

他主张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人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树，养成一种好的风气。

十九提出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国家，要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开始时提的是——工业化。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49年6月，建国前夕，他又说：中国将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1949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也说，中国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52年，我国的经济已经恢复，朝鲜停战也已在望，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准备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当时周恩来估计，“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新中国的建设，开始时仿照苏联的模式，但是已经与苏联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周恩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就是不同之一。经过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的实践，建设中国的路究竟怎么走？周恩来在重新探索了。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中国也要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走自己的路。这种探索经历了几十年，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归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周恩来尽管事务繁多，但是他并不埋在事务中，他是一个思虑深远的政治家、战略家。在公事间隙、文件旁午之余，他从宏观上试图把握中国的未来，探索除了工业化之外，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目标。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后，中国共产党全党接受了周恩来的提法，把它写入了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总纲：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周恩来一再地、反复强调地提这个目标，内容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科学，他的思想不断发展着。

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略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26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有不同，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四化的一项内容，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1957年8月13日到20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预算和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讲明了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

1955年，经过上年的日内瓦会议和本年的万隆会议，世界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了。周恩来说，这“才考虑把国防工业放慢一些”，这以后的几年间，国防现代化暂时不提了。这时只提工业、农业、科学文化这“三个”现代化。

周恩来关于几个现代化的提法和把交通运输现代化纳入工业现代化的主张，受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1957年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他们的讲话中，都提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仍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是要重新提出1954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1959年，周恩来恢复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这年12月24日，他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说道“我们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也恢复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

三年后，周恩来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表达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1956年1月周恩来曾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

科学方面的最近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1月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56年1月，他就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对于这四个现代化，周恩来认为“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2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

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当然，这里所说的同时并进，是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缓有急的同时并进。

周恩来关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设想，是开放性的。1964年4月23日他在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又说：“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

在1964年末到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他正式向全国完整地提出现在这个“四化”号召。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样提，有一个国际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强调要什么“国际分工”，要中国只搞农业、轻工业，实际是卡中国。周恩来据理力争，主张建立自己的体系。

另一方面，这也是从“工业化”的提法发展而来的。

什么叫做“工业化”？

我国开始建设时依据的是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70%。斯大林1933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0%，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

1956年7月周恩来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在谈话中他讲到：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0%到70%。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达到工业化所需的时间并不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1953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1949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1952年是28%左右。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占56.7%。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083亿元，占65.6%。195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8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83亿元，占74.9%。所以，如果按照60%到70%的要求来说，1958年已经达到了；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说，1959年也已经达到了。

但是，那时候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地说，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化。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为什么不要提出呢？周恩来经过了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对工业化的解释已经在作新的考虑了。原来的单纯百分比的要求，显然太简单了。

1953年，周恩来已经认识到，以工业总产值占的百分比多少来计算工业

化，以及只提“工业化”，都是不够的。这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全国劳模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周恩来看到报告后认为不应孤立地只提工业化，提议他作些修改，说：“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重点建设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53年，周恩来就说，“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时他已经看到苏联当年一味发展重工业的弊病，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全面地协调向前。他说：“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中。

“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说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也还是在继续发展的。此后不久，他在1959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经济、文教、科学、国防、财政、贸易等各方面”。

1963年8月，在一次《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立足现实，瞻望前途”。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说：“必

周恩来：《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1953年6月28日。

周恩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1953年9月29日。

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9月8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23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

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他提出要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他说：过去的“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当时他提出了到1975年的奋斗目标。

他认为，达到了这些目标，“就可以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了”。

在1963年，周恩来认为，经过建国后14年的努力，“我们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在1964年末到1965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周恩来提出，不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上，周恩来在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它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层。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完整的要求。

这样，就把实现四化目标和成体系地进行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战略目标是比较长期的，为达到目标，必须一步一步进行。有短期内的努力方向。后来，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也按照分步走的设想来指导全国为战略目标而奋斗。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1966年起，在建设上用“巨大的而又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

十年后，1974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四届人大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当时的起草小组，包括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是成员，邓小平主持。起草小组中对此争论很大，邓小平坚持了下来。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稿。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沉重的癌痛，以全国人民熟悉的激昂有力的声音，作了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雷动。他再次鼓起了中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周恩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目标》，1963年8月23日。

周恩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目标》，1963年8月23日。

周恩来：《第二十五年计划的两个重要问题》，1963年11月15日。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二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随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他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确定后，怎么进行？这个问题，当时中央很多领导人在考虑中，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一方面我们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在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大家都应该很好地研究”，“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最近议论了这个问题，认为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说：“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比的道路。”他认为“在我国实现现代比，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这个时期明确了，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但这四个方面是为主的。

邓小平是1952年由西南调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的，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届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为领导成员之一，是参与研讨的。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的设想，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更是集体拟定者之一。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个报告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后来他产生了分步走翻番的设想。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到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会谈中大平首相问到：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回答他：是不是可以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翻两番。197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左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是人均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后来邓小平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问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

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四个现代化的初步目标。

邓小平提出的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后来，他又把两步走发展成为三步走，1987年4月30日他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的谈话中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算是第一步，翻了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邓小平文选》（1975 - 1982年），第240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在下个世纪用 30 年到 50 年再翻两番，目标大体上是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1987 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指出到第三步实现的时候，中国就算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四大的报告又指出在建国一百周年时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时，“四个现代化”，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也就基本实现了。

二十既要自力更生，又要开放搞活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是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对外开放的。1915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的时候，写过一篇《海军说》，其中说到英、日、法、美、德等国，开放向外，海军强盛，接着，讲了一段关于我国的话：

“返观吾国，百年前守闭关主义，庞然自大，视异（种）为夷狄，视他族为化外，海军之事固无庸议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其自侮自伐既如此，是有甲午之败，全军覆没，虚各尽失，割地丧师，真情毕露。强盛之希望既成泡影，和平之期意复如幻想。弃良港，捐巨款，以图一时之安。而外人鲸吞蚕食之议，瓜分豆剖之思，无稍息焉。”

周恩来上中学，受的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后来，他又到欧洲考察了各类思潮和救国的道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具有丰富阅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思想和性格是开放的，具有现代文明交往的品质。

建国后他任国家总理，是主张既要自力更生，又要开放搞活的。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7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__新中国建立之初，1949年底，周恩来讲到国家建设是以国内的力量为主呢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

接着，他加上了一句：“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

以后，1963年，相隔十五年，他又讲了十六个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强调自力更生，这是符合中国的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尊自强。要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变得富强起来，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我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我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经济。

强调自力更生，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世界上人口居第一位的国家，应该这样。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主要是要靠自己，不可能主要靠外援，不可能主要靠进口，任何一个外国的力量，即便它是一个大国，也不可能代替我们自己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强调自力更生，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况的。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帝国主义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它封锁我们，对我们禁运，给我们造成很多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面对困难，迎向困难，用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困难，“多难兴邦”，想办法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有一次，周恩来到浙江的新安江建设工地视察。当他听到说这里所用的采砂船、筛分机等设备，全都是国产的，他十分高兴。他对周围的摄影记者说：“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多拍几个镜头？”当有人汇报说新安江电站只有一只与电频率同步的大钟，还需要进口，周恩来当时就指示有关人员，要上海承担专门研制的任务，组织力量攻关，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为电站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周恩来在上海的工业展览会上，看到都锦生丝织厂经过革新后的丝织机，就问：“这样的机器，外国有没有？”

“没有。”在场的老工人回答说。

“好。”周恩来高兴地说：“回去多搞几台，给外国人看看，我们不要在外国人后面跟，应当超过外国。”

这表现了民族自豪感，和自力更生的志气。

但是，自力更生是“为主”，并不是闭关锁国，并不是排外，并不是不要有无相通。这点，周恩来一直是很明确的。

新中国建立之始，不可能对西方开放，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当时我们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还是开放的。邓小平讲过：“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

1952年4月，周恩来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他就讲了“互通有无”这一条。他说，我们开国以来就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的，美国对我们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样对打破禁运就很有利。1955年11月，日本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到北京，周恩来接见他们，在谈话中他讲：“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经济发展”，“必须在和平共处的环境中互通有无”。

这种“互通有无”，到1956年中共八大时，周恩来就把范围扩大到“经济、技术、文化”多方面的交流了。他说：“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缓和，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周恩来的思想是开放和合作的，他说：“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

周恩来从来不讳言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1955年5月他在同法兰西妇联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谈话时，说：“同工业发达的国家比，我们的机械化水平距现代化很远，不仅要十几年，要半个世纪才能赶上先进的国家。”

六十年代，他说过，中国要经济上取得完全的独立，需要上百年时间。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作报告。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报告，可以看到周恩来主张开放的博大胸怀。他提出：“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要向兄弟国家学习，也要向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

要知道，这些国家当时对我国还是敌对的，周恩来这样说，要有十分的勇气和远见。当然，它们的国家制度是资本主义，周恩来说：“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

周恩来曾经多次派出人员到国外考察学习。他还要求驻外国的使馆要抓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6页。

好科技调研，学到一点东西，他自己出国时，也很注意学习访问国的经验。1956年底到1957年初，他出访亚欧十一国，这时中国正计划大规模地勘探石油，发展石油工业，他就很注意参观炼油厂和炼油设备，认为中国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

周恩来的看法是，“任何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不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的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应该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他要求迎头赶上。

他要求“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坐火车外出，车上的列车员告诉毛泽东说，为了买一条尼龙裤子，要排两小时的队。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对周恩来说，能不能引进一些。

周恩来说，不光要引进维尼纶，而且要引进其他的先进技术。

后来，就引进了维尼纶工厂和彩电显像设备。

在周恩来任总理期间，一直很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大的引进有过三次，一次在“一五”时期；第二次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派了许多考察团到国外去，后来在整顿中引进了一批；第三次在“文革”中“九一三”事件后。这三次动用的资金，都在几亿、几十亿美元。

周恩来主张引进技术要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从仿制做起，进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和提高，叫做“一学、二用、三改、四创”。

1970年，周恩来在参观广交会时，又一次提出，闭关自守，不利用一切机会引进技术，是不对的，但是立足点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凡是重要的尖端技术和特种技术，非我们自己动手不可，依赖外国是不行的，我们应当有这个决心和勇气。“对外开放”这个话，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提出来的，周恩来的时候还没有。不过，周恩来提到过“门户开放”，反对“闭关自守”，反对“盲目排外”，反对“孤立思想”，反对“关起门来建设”，这些都是我国对外开放思想的先声。

对外要开放，对内要搞活。在探索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始，周恩来就提出过搞活的想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光辉的思想。

五十年代，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十分迅速，连党的领导人也是没有料到的。1956年春，北京市长彭真就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到了这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宣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后来斯大林根据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公有制，其中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也就是按照这种模式的，存在公有制的两种形式。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59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5页。

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却发生了新的问题，小商小贩没有了，原来走村串乡、走街串户的商业渠道中断了；夫妻店没有了，也就没有了起早贪黑、半夜都肯开窗售货的作风；人人都吃大锅饭，八小时工作制，按时上下班，却没有了想方设法多作生意的积极性；甚至在工业、手工业方面，多余的劳动力也缺少了出路，有的城市还出现了“地下工厂”。

当时在经营管理上，普遍出现了统得过死，产品质量下降，品种花色减少，人民群众感到不方便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否只能有两种所有制形式？是否可以不必按照苏联的模式，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另作安排。

中共中央在考虑。周恩来在考虑。

周恩来认为，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保留一些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挥它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对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都是有利的。

他主张：活一点有好处。

1956年1月30日，正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人们纷纷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或合作社营，周恩来就在全中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讲：

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对于人民生活来说是方便的，是受人民欢迎的，应该长时期内将它保留下来。对于数量极大、分布极广的小商店，在公私合营以后，应该继续实行代销拿手续费的办法。

当时很多手工业经营都改造成了手工业合作社，周恩来主张区别具体情况，凡是不适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对于手工业产品，国家只能把那些适合于国家包销的产品，进行加工订货，大部分产品还应该由手工业合作社或者手工业者根据原有市场联系，或者根据新的市场需要，自己推销。有些特殊的手工业，有些是手工业，如果不便于组织，就要容许他们单干。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他说：

在农业上，“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

商业方面，“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这样，“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性、服务性的行业，都应该让他们继续保持分散活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

“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

再早，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要求手工业户保持原有的供销关系，不要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上还说：“今后不论在城乡居民区域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

至完全自购自销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到了 1957 年 4 月，国务院会议研究私人开办小煤窑、小矿产的问题，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以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可采取自负盈亏办法，有些私办的小学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门都可来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搞一点，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他说，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资本主义复活不了。

对于就业门路，周恩来也主张拓宽一些，“各方面都可让他有点自由，这样有好处”。

周恩来认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一切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善、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

上边这些主张的基本精神，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并且不是要把一切都纳入国家计划。这些是周恩来对于在中国这样的具体情况下，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方针性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宝贵的。 —

二十一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在擘划新时期的中国内外政策时，思考着用什麼原则来替代过去的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他感到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他认为还是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或其他的什麼组织形式。

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在谈话中他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后来邓小平曾经多次讲，要推荐用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周恩来提出的，现在，已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中。

这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是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接见来北京谈判中印关于中国西藏问题和印度关系问题的印度代表团时，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来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些原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乘专机到日内瓦，参加有中、美、苏、英、法五国外长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出席大规模的国际会谈。

新中国的外交在周恩来领导下，走向了世界。

到达日内瓦，当周恩来矫健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时，人群中一阵骚动，记者们纷纷拥向前来。围观和抢镜头的新闻记者有好几百，周恩来端庄的风采和潇洒的举止一直是记者抢拍的镜头。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十分引人注目，周恩来更成了西方新闻界报道的中心人物。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

在会议的中间，6月下旬，周恩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冒着热带的酷暑，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两次访问分别发表了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其中都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在毕生的外交生涯中，坚持不懈地用心血浇灌着这五项原则，使之在国际社会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到1976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有九十多个国家在同我国共同发表的文件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增加到一百多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周恩来后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在国际交往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已经育许多国家主张把它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这是周恩来对中国外交和世界外交工作的突出贡献。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

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入了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 15 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并且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 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扫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会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 12 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 12 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美两国的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由于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经过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在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的结局。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

1954 年 10 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中国派出了代表团，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1955 年 4 月 7 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台湾国民党方面针对这次会议，制定了谋害周恩来的计划，代号是“一号”。

亚非会议定于 4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 11 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忽然收到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邀请周恩来先去仰光，以便先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缅甸、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样，周恩来、陈毅等就改走昆明，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其他人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不料，

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机翼轮舱附近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 11 人全部遇难。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299·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还想到了在国外的其他代表团。当时，外贸部领导人雷任民正率领访日代表团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由香港飞到日本。周恩来给雷任民去了电报，指示他们不要再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后来，他们坐了苏联的船只到海参崴，然后折回北京。雷任民说：“这件事，使我们全团每个同志都感到了周总理工作的细致与认真，都感激周总理对我们的关心与爱护。”

周恩来仍然去参加万隆会议。14 日，他到达仰光。15 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

17 日，到达万隆。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多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18 日，亚非会议开幕。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冒雨踏着积水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阻拦，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台湾国民党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间，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 29 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 7 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 22 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 月 19 日，会议第二天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

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

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冲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从这时起，人们感到会上的空气变了。原来，可以感觉到有一只黑手想把会议拖向失败的方向，现在，另一只强有力的手把那黑手轻轻推开了。

会场上鸦雀无声，听周恩来讲下去：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力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力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代表席上、来宾席上、记者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短短的十八分钟的发言，驱散了会场上空的乌云，引导会议绕过暗礁，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也使与会各国和整个世界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它的谦逊、诚恳、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求同存异”这个周恩来提出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周恩来走出会议大厅时，群众再次聚拢来，周恩来站在沸腾的人群中间，举起了右手，微笑着；很久，汽车才能从人丛中开出去。

后来。周恩来一再讲要求同存异，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小异也不让人家存，那就不可能有对话有外交了。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 - 157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 - 157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 - 157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 - 157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 - 157页。

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总理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

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提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几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小时睡眠。据卫士长成元功统计：开了七天的会，周恩来总共才睡了十三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就以4月24日闭幕这天来说，上午8时开代表团团长会，会上一直争论到下午6时半，还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打破僵局，达成协议。6时35分开全体会议，到晚上9时半闭幕。然后，周恩来、陈毅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回到达曼·沙里路十号代表团驻地已经11点。11点半，会见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25日零点30分会见范文同，直到5时，才上床休息两小时。起床后会见日本的高碕达之助，10时半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在广肇会馆召开的招待会，并讲话。

“在推翻了殖民、封建的统治以后，中国人民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中国在政治上是革命成功了，但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很落后，中国需要长时期的建设，才能赶上今天世界上工业先进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亚非会议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的还是尚未建交的，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阐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周恩来和以他为首的代表团在万隆，受到万千华侨的关怀和保护。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万隆分会成立了秘书组、食品采购组、住房组、家具组、车辆组、洗衣组、翻译组和记者组等。华侨自愿报名备征用的汽车有160多辆，车主们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让我们向祖国表示一点心意。周恩来和陈毅的住处是郭贵盛先生的别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周围是绿树、红花、青草地。住地经常围着一个二三百米长的半圆形人圈，从早到晚，雨天也不散，为的是要看到周恩来。他们说：“仔细看看新中国的总理。这一生也值得了。”百多年来中国贫穷落后受欺压，华侨在国外也被人瞧不起，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扬眉吐气。”

二十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毛泽东 1957 年在同一位外宾的谈话中，说：“周恩来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非常精明强干。”

仅从外交方面说，周恩来也 already 是一位中国的、世界的少有的伟人。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为了迎接全国胜利后即将面临的纷繁的外事局面，周恩来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是在 1949 年二月经毛泽东审走后发出的。这个文件中，对于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报纸刊物通讯社，以及外国记者等，都规定了暂行办法。它通告各地，现在我们同任何外国都没有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解放大中城市以后，不承认这些国家在旧中国的代表是正式的外交人员，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可以“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是在步骤上，却要按照问题的不同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后来，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周恩来说，“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新中国一成立，外交工作也就开始了。

起初，周恩来以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这样近九年。他着手组建起外交部，从三个方面延揽人才。

一是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干部，其中有许多人过去就参加过外事活动的。

二是国际问题。外交问题方面的专家。周恩来曾经以北京大学教授、专讲西洋史的专家周鯁生为例说，“如周鯁生先生，他们经验多，历史长，起码可以做外交方面的研究工作”。

三是进步知识分子、外交界的老职员。

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

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周恩来既是决策人，又是指挥者，同时又是实践家，三位一体，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建国以后所有重大的对外行动，都是周恩来亲自领导实践的，或者是直接指挥的。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读了政府公告。公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这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交世界上的各国政府。

1950 年 2 月，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协助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谈判。这次谈

转引自裴坚章、张光佑：《高瞻远瞩，求同存异》。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71 页。

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周恩来在与抗美援朝有关的外交斗争，和随后的停战谈判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周恩来一再据理力争，联合国不得不允许新中国的特别代表前去，走上这个国际讲台。伍修权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这个国际讲台上，有力地控诉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

这期间，国内，在周恩来领导下迅速地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一批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主权和尊严，把旧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外交一扫而光。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朝鲜停战以后，周恩来敏说地判断国际形势，抓住国际形势相对缓和的时机，经过中央决策，大力地推行和开展和平外交，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提出了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分别地共同倡议，把它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运用这些原则，对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和促进亚非团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新中国从此开始，登上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

周恩来亲自“解剖麻雀”，以解决中缅两国边界的问题作为示范，从而使得我国同大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得到了公平合理的解决，安定了我国的周边环境。

从1956年到1964年，为了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周恩来三次出访亚非欧国家。第一次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2月，访问亚欧十一国，共75天。行程近十万八千里，第二次在1960年4月到6月，访问亚洲六国。第三次在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访问亚非欧十四国，共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这三次共计到达亚洲、非洲二十八个国家，支持它们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对我国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找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发展关系的途径。

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从长远着眼，做日本人民的工作，在日本领导集团还是很顽固的时候，他就说要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中日两国是有两千年友好历史的邻邦，今后要世代友好下去。

对英国，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

周恩来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富尔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会谈，于1964年初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

对美国，周恩来并没有把它排除在我们推行的和平政策的范围之外。他在同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坚决斗争的同时，一再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来解决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美大使级的会谈进行了很多年。这是一种外交上的创造形式，既是我国对美国进行斗争的场所，也是保持中美双方联系的一种渠道，对以后打开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为了维护中苏关系。周恩来是作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的。一方面他耐心地做工作，力求维护团结的大局，另一方面他也坚决地同苏联的干涉、控制我

国的图谋进行斗争，特别是顶住了他们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高压，显示了我国的彻底的独立自主的立场。

从新中国建立到 1965 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有 49 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衰败没落的、屈辱受压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形象在世界上树立起来，特别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把我国看作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斗争中，他们同我们并肩战斗。这一切是同周恩来的长期努力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工作一度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严重干扰，和平外交被诬蔑为“三降一灭”，出现了一些违反外交政策的严重破坏行动。周恩来在困难的处境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加以补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外交工作经过 1966、1967 年的破坏和混乱，从 1968 年起逐渐恢复正常。

七十年代初，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我国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是这个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和直接执行者，1970 年 11 月 14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单独会谈，通过他口头回答尼克松，欢迎尼克松派特使来北京商谈。从这时起到 1971 年 4 月 14 日，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然后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跨越时代的握手，这些，周恩来都作了精心的安排。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契机，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国建交的新高潮。9 月，周恩来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会谈，说，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时候了。他和外交部长姬鹏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即日起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到 1976 年 1 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 107 个。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恢复了。

钱其琛说：“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八十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外交所开创的新局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建国初，周恩来随毛泽东到苏联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提出要中国承担义务，除苏联人外，不许第三国公民进入和居留于中国东北地区。斯大林的用意是不让日、美、英等国人进入东北。但这是继承帝国主义传统、干涉中国内政的。周恩来没有同意，机智地反问：东北有很多朝鲜居民，还有蒙古人，算不算第三国居民？斯大林哑口无言，只好作罢。

1952 年，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苏联征求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意见，苏联因为气候寒冷，不能种橡胶，而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是禁运橡胶等物的，斯大林多次提出由中国或中苏合作在中国南方建橡胶园。周恩来只同意中国自建橡胶园，苏联可派专家来参加。

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从来都讲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统一祖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另一方面是美国侵占台湾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周恩来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他说，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立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

1972年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等来华，安排尼克松访华的事情，发言人齐格勒说，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租用通讯卫星估计要一百万美元，美国已准备好了，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方负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情况。周恩来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你告诉齐格勒，请他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在租用期间，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方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向使用者收取费用。齐格勒听后很惊讶，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同意你们的办法，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

周恩来认为，独立自主的基本外交立场，反映在外交态度和风格上，应该是“不亢不卑”。他说：“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自卑便是狂妄，不亢不卑才是我们的态度。”独立自主的外交，使中国人民鼓舞，也使海外华侨扬眉吐气。

周恩来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一律平等的，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五十年代，缅甸总理吴努同周恩来打交道时，讲了一个故事：一次，一头大象被猎人逮住了，套在网里，不得出来。一只兔子看见了，怎么办呢？结果是兔子一点一点把网咬破，救出了大象。吴努把中国比作大象，把缅甸比作兔子，兔子虽小，关键时刻却也是能帮大象的忙的。

周恩来很理解这个故事的寓意，说：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中国人口虽多，但底子薄，仍属发展中国家，将来即使经济发展了，我们也记得自己的朋友。

后来的缅甸领导人吴奈温说：周恩来虽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同小国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相待；在与小国处理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时，他总是本着最大的同情和谅解作出让步。

1954年，许多国家派代表团来北京参加我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在分配接待任务时，剩下欧洲一个小国的外长率领的代表团还无人负责。周恩来便自告奋勇，由他负责接待。他说，我们是大国，但不能歧视小国，应当尊重别国的民族感情。

周恩来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大国还是小国，都很尊重。一次，他到机场为一个非洲国家的元首送行。外宾登上飞机后，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专机无法滑向跑道，滞留在停机坪上。周恩来坚持仁立在风雨中向客人频频挥手。客人在机舱里一再表示请总理回去，周恩来仍一直等到飞机起飞才回来。

专作警卫工作的领导人李树槐说：总理很尊重亚非被访国的安排，出国访问时他对我们说，我们住在人家这里，你们就不要去检查饭菜，警卫工作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页。

也不要搞得过严，叫人家觉得我们不信任他们，这样不好，在访问马里时，这个国家的人信教，太阳一下山就跑出来磕头。一次周总理要出去参观，可司机和警察连人影也不见，一问，他们都在大树下磕头。我们问总理怎么办？总理说，不要急，不要催，让人家磕完头再说。

1964年1月，周恩来出国访问中预定将去的下一国加纳发生了谋刺总统事件，总统住进城堡，停止外出活动，周恩来坚持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并且建议取消机场迎送仪式。加纳总统感到中国人不愧是患难之交。

周恩来是从旧中国过来的，深深了解被压迫民族的痛苦，因此在中国人民得到解放后，很关心那些还在为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而斗争的民族，关怀刚取得独立经济上还比较困难的國家。对他们，伸出友谊之手。有的国家粮食紧张，我们以低于国际市场价卖给大米。有的国家，矿石销不出去，我们就并不压价地收买。周恩来在非洲访问时，特别注意被访国家的物产资源。如马里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蔗糖和茶叶，周恩来就派专家帮他们种植茶叶和甘蔗。马里竹子很多，周恩来就派人帮他们制竹床、竹椅、竹沙发。在帮助柬埔寨建工厂时，周恩来指示建的工厂投产后要对柬埔寨国计民生有好处，派去的技术人员要同他们职工一样待遇；援建造纸厂，要尽量减少废水流入循公河。周恩来的思想是，帮助这些国家，是要使他们经济上独立起来，而不是依附于你。

有的大使深有体会地说：“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中国也同样体现了真诚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例如但赞铁路，我们明知这一项目十分艰巨，但为了但、赞两国的需要，毅然推迟了自己的建设项目，承担了援建的重任。我们还帮助一些国家建立了工厂、大会堂、体育场，帮助它们发展水稻、茶叶生产，向它们派遣医疗队，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他在1963—1964年间访问非洲时提出了中国对非经援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平等互利、帮助受援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精神，同某些国家附带政治条件、要求享受特权、旨在进行控制的‘援助’形成鲜明对照，因而深受当事国的欢迎和赞扬。”

在新中国同外国建交的实践中，周恩来创造了三种方式：全建交，半建交，设立商务代表处。

对还没有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周恩来提出开展民间外交，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从建国到1975年9月，周恩来接待了二千八百九十多次来华的外国客人，其中很多是民间人士。我国同有些国家，是从民间交往，到半官半民，最后建交的。

1952年，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派出代表团，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的。会议后，我国邀请日方代表团来北京，对日贸易从此开始了，后来制定了中日贸易三原则，目的就是要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1954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周恩来会见代表团全体人员，说：主要任务是促进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此行应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些民间的交往，是可以改变国外人士对中国的看法的。日本的冈崎嘉平太说：我虽则搞过多年的外贸，但是对新中国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最初以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世界上的共产党都是一个模样的，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惊奇地发现他和有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他是那样的但率、真诚、机智而又潇洒，我对新中

国的看法一下子就变了。

这些外国朋友，是民间人士，又往往对政府有影响，有些原来就是政界要人。我们同日本进行民间贸易，签订备忘录，日方代表是松村谦三、高碓达之助，前者是日本自民党的元老，而自民党是多年执政党，后者曾任鸠山内阁的通产大臣，都和政府关系密切。周恩来的主张是“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从文化、体育、贸易做起，扩大民间渠道，广交朋友，最后达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多次说，新中国的外交包括政府之间的关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他支持民间友好往来，为建交创造条件，而且强调要通过这些往来，向各国人民学习。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他把各方面的来宾看作“送上门来的老师”，向他们了解情况，进行切磋。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外交干部这样概括他：高瞻远瞩，首创精神，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原则坚定，以理服人，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调查研究，多谋善断，广交朋友，热情真诚，洞察形势，真知的见，豁达大度，放眼前程。

美国教授林家翘见过周恩来后，说了四个字：正大光明。他说：“我想正大光明四个字可以代表他。”

周恩来在外交中，既坚定持重又灵活机智，既谈锋犀利又温文尔雅。他实事求是，相交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对方。很多外宾同他初次会面，都“一见如故”。

很多外宾见过周恩来后，佩服他的广博学识和惊人机敏，感到他有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亲切动人的魅力。

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由于他的修养、品格和学识，即便是敌手，也往往对他内心折服。他善于解决复杂的难题，而使各方都能接受。他善于做人的工作，爱憎分明而又有东方的人情味。周恩来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础。

二十三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讲到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了很多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有的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有的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提出来的。决议说：“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

薄一波讲过，周恩来1951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6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62年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是“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和政策的代表作”。

周恩来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代表者。

在中国共产党内，可以说，周恩来是最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善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且最为知识分子爱戴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周恩来认识很多知识分子，有上层的，也有中下层的；从时间上说，很多人是早在建国前就开始交往的，既有忘年交，也有生死交，很多是你来我往，推心置腹的。

周恩来与郭沫若、马寅初这两位知识分子的交往就是代表。

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同郭沫若相识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期，周恩来、郭沫若都在上海。周恩来支持郭沫若去武汉。两人关系密切起来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武汉时期，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劝说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后来武汉沦陷，又同在重庆，为坚持团结抗战而努力。建国以后，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工作、生活很关怀。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职务，五六十年代经常带领和平代表团出国参加争取世界和平的会议。每次出国前，周恩来总要接见他们，详细商谈、布置，回国以后又要及时看望，询问郭沫若的身体情况和代表团的的活动。

1955年，一次郭沫若从香港乘坐荷兰的飞机前往日本，飞机起飞不久，发生故障，只得返回香港，另次再到日本。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着急。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周恩来通过苏联使馆打电报到日本，嘱郭沫若不要坐飞机回来，并且请苏联专门派了一条船接郭沫若回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形势很乱，周恩来要童小鹏接郭沫若和夫人离开住处，秘密地在六所住了一个多月，形势稍为和缓一些才回家。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周恩来关心郭沫若，作了三点指示：一、为了安全起见，二十四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二、郭老的房间和走廊要铺上地毯；三、请郭老从小卧室搬到大办公室住。郭沫若对第二、三点不理解。后来，周恩来见到郭沫若时，向他解释说：第二条，因为地面太滑，老人防跌，铺上地毯，防止摔倒，第三条，因为老年人需要充足氧气，卧室小氧气不足，有害身体。郭沫若听后很感动。

郭沫若去世后，在他的遗物中有周恩来给他的信件三四十封。这也反映了他们久远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马寅初同周恩来交往也很早。他比周恩来大十六岁，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抗战初期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对当时孔祥熙、宋子文等

在蒋介石包庇、纵容下巧取豪夺发国难财不满意，公开发表演讲斥责，被蒋介石秘密逮捕。在重庆的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得知后，同重庆各界人士一道设法营救，并且通过《新华日报》公布了这个消息，引起了舆论界的公愤。1941年3月24日，周恩来要《新华日报》登出一条消息，说今年欣逢马寅初六十大寿，定于本月三十日在重庆大学礼堂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下“手谕”严禁召开这个祝寿会，但是重庆大学师生冲破重重障碍，祝寿会如期举行。重庆各报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扣下消息，不准报道，但是《新华日报》却巧妙地透露了消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了马寅初，但是仍把他软禁在家中，不准他担任公职，不准他讲演和写文章，也不准任何大学聘请他教书。马寅初写文章寄给报纸，都被退回。他在政治上经济上陷入困境，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南方局宣传部的许涤新支持马寅初。《新华日报》派记者去取来文章，予以发表，给予最高稿酬，经济上接济了马寅初。马寅初非常感动，感谢周恩来在他危难中伸出了援助之手。

1944年11月，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一天，郭沫若到马寅初家中，进门就大喊：“大好消息！大好消息！”马寅初忙问什么事？郭沫若手指敲着桌子吟哦道：“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你的灾难也有攘解之日了。周公说他将尽一切努力，要求国民党尽快恢复你的自由。”马寅初心潮澎湃，拉住郭沫若畅饮起来。经过周恩来和各界人士的营救，国民党终于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自由。以后，马寅初把周恩来视为知己，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建国以后，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51秋，思想改造运动开始，9月29日，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高等教育界的学习会，请周恩来出席，并且在会上讲话。周恩来当然不好推辞，这就产生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周恩来说，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做一个报告，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那末，我讲一讲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周恩来不是一般地向别人说教，而是先从自己讲起。他说，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周恩来讲了三十年来的经历，取得过成绩，也栽过跟斗，碰过钉子，他说，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于是他讲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为谁服务问题、思想问题、知识问题、民主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七个问题。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认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有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中国近代的实践，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大多数知识

分子是可以站到这个立场上来的。

周培源是听过这次报告的，他说：“周总理那次的讲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现身说法，从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谈到新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等，内容感人肺腑。”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主张，人们是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对于“改造”二字，实在任何人不必回避。后来，1957年5月，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出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句名言。

周恩来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讲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过来，要注意克服思想上、生活作风上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但是周恩来从来都没有把知识分子看成是新中国的异己力量，而是看成劳动人民的自己人的。

1949年4月，在筹备建立新中国时，周恩来是把知识分子放在与工人、农民同地位的，他提出了“劳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他说：“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

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他说：“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1950年8月20日，周恩来签署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决定中，规定“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合作社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

1952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教育部，人民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教师也参加工会。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愿意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奉献的，他们在解放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新中国成立了，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从国家的战略高度，一再提醒大家看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1950年6月他就在讲：“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1951年8月10日在政务院的政务会议上，他又说：“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工作一开展，知识分子就更不够。”几天后，他又提出这个问题说：“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这两年我们常说，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任何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问题。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铁道部只修了三条铁路，如果再多修一点，也会感到人才不够。其它部门更不用说。”

1955年春天，周恩来提出要来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11月，他向毛泽东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8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8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页。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31、34页。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31、34页。

亲自陈述了他对知识分子受伤害的忧虑，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这月，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且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胡乔木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小组，着手筹备。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大规模的调查，政协也派出大批人员到全国各地了解，在这个基础上，主持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然后在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这个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重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的党员负责人，都参加了，共有上千人。

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说：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

“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在这次会议上，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和将要起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表述。周恩来说：“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那天，也到会讲了话，肯定了这次会议。

这次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明确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待遇，解决了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齐心协力去作的任务，振奋了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说：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出了他们今后应当遵循的方向。很多学者、专家纷纷表示拥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愿意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成绩来。

1956年，周恩来还批评了很少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共产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当时，参加共产党是很多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事情，有这个愿望又怕批不准而不敢提出来。

周恩来认为应当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到1962年党员应当在高级知识分子的总数中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他很关心这件事。

1957年3月，地质学家李四光患肾脏病在杭州休养，周恩来正好陪外宾到杭州，忙完公事，就去看李四光。李四光喜出望外。周恩来问了他的身体、病情，看他精神还好，就亲热地与烛交谈了起来，问他对参加共产党有什么想法？李四光早就想要求入党，但心想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几十年，吃尽千辛万苦，自己过去没有投身革命队伍，怕自己条件不够。周恩来听了，恳切地对他说：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建议他同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谈谈自己的想法。周恩来三次到医院看望他，关心他。第二年12月，李四光经地质部、科学院有关同志介绍，被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

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知识分子，周恩来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认为教育对于国家建设是举足轻重的十分重要的事业。

在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前夕，周恩来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象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他讲：“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旧中国教育落后，知识分子少，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周恩来就讲“我们必须在教育观念上来一个改变”。他主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树立大教育观念，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办好教育。他认为仅仅按照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的顺序来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科学水平是不够的，既要发展正规的普通教育，也要发展其他类型的教育，包括成人教育、职业教育。

教育建设的基础是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这点，周恩来是肯定的。他说：“教育要大众化，首先要办好中小学教育”，“在落后的中小学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能把大学教育办好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人口迅速增长，普通中小学大量发展，这时，周恩来预见到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对中国的发展不利，他召集国家科委、教育部、劳动部等部门的领导人研究这个问题，提出要改变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入大学，要给青年学生以职业技术方面的训练，不能升学的便于劳动就业。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的发展，是有利于我国人民科学、技术、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的。周恩来当年提出的这些关于教育的主张，是战略性的，很有远见的，既可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又可以大大增加我国中等知识分子的数量，适应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以后，按照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知识界很快就兴起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有组织地开展文化学习、业务学习。可惜，这样一个好局面没有保持多久。1957年春夏极少数右派的进攻，改变了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日渐发生偏差，反右派严重扩大化，知识分子被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许多人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

六十年代初，周恩来试图纠正这种情况。这就有了他的第三个报告《论知识分子问题》。

1961年夏天，周恩来就说：“有一个时期好像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

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有人向聂荣臻反映，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受到歧视。

聂荣臻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恰好这时周恩来、陈毅也在广州，聂荣臻就请示周恩来。

周恩来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聂荣臻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周恩来答应了，这就是3月2日对这个会和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们的讲话。

周恩来重申了他的一贯看法，说，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

1952年10月24日，周恩来，《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949年5月9日，周恩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5页。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他们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以后逐渐靠近了革命。沈钧儒在清朝是进士公，黄炎培是举人公，董必武是秀才公，还有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他们在旧社会想为中国做点事，但是做不成，后来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了出路。从共产党来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队伍当中，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过去我们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也是必要的。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极大的进步。1957年6月以后反击右派，但这决不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和过去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周恩来因为有事急于回北京，行前，陈毅把他准备向会议讲话的大意，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赞成，说：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陈毅在大会讲话中提出了“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他的讲话受到六十多次鼓掌和笑声的欢迎。

3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报告，说：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对于周恩来、陈毅在广州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中共中央有些人是不同意甚至反对的，上海的柯庆施就不让传达陈毅讲话。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没有说话。后来，这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时，有人提出说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是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说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主张是不同意的。

当时邓小平的态度是：“陈总讲的是对的。”“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看法有分歧，没有解决。后来，“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到“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一往十年。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重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应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从此以后，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重新纳入了正确的轨道。

二十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立功立德，望云峰千何，沧波万里。回首九年前往事，犹自激人心底。泪雨川流，琼花浪涌，举国哀歌里。古之遗爱，几人堪与侍比？

今朝手抚斯文，言犹在耳，隐隐雷音启。最忆广州一席话，唤醒春风桃李。改造寻根，学研到老，剖析先由己。照人肝胆，千秋万代兴起。

我国当代的佛学大师、也是诗词大师赵朴初，写关于个人的诗词，写得最多的是周恩来，其中有些已广泛流传。如一阕《金缕曲》，就被文艺界以书写和演唱的形式用来表达哀思。上边这阕《百字令》，是赵朴初在1985年读到当年周恩来的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讲话后，“手抚斯文，言犹在耳。隐隐雷音启”，有感而发的。

赵朴初很有感触地说：“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丧三年，留在人们心中的对于总理的怀念是终身的。”

这种怀念和情愫，在很多民主人士的心中是同样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总的说来，统一战线工作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但是，它也是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我国的发展比较顺利。这期间中共中央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统一战线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个阶段，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期间，我国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的“左”的错误，在统一战线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在这个阶段中，统一战线仍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的恢复岁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业界、知识界和统战部门干部，都为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个阶段，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并且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国家、人民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许多民主人士和党外朋友遭到迫害和摧残，统一战线也遭到严重损伤和破坏。

周恩来对于我国的统一战线事业十分关心，进行领导，这是贯穿了他的一生的。在上面说的三个阶段中，他或者是维护和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或者是防止和挽救了统一战线的损伤和破坏，他总是在积极的方面、对我国的统一战线发挥重要的作用。

建国前夕，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讲了筹备会上对于统一战线的讨论情况，说大家认为“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这时候的全国政协，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的。周恩来说，将来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

那个时候，不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民主党派内，都有一些人认为革命已经胜利了，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任务了，有的主张取消，有的主张合并，对这

种“左”的观点，周恩来摇头不以为然，几次表示不同意见。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周恩来在这个会上又讲：“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他一方面时各个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说他们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国内有群众，在国际有影响，不论名称是叫“会”、“盟”、“社”等，他们仍然是政党；另一方面，他也说明民主党派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不能用英美的政党标准来衡量他们。

在1951年1月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说：我国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我们合作，是有贡献的，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是帮助他们团结、进步和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事业中同他们真诚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周恩来说：“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在政府中工作的民主人士，要“有职、有权、有责”。这时，1950年，周恩来已经有了长期共存的思想，他说“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从1950年到1954年，我国各地普遍地建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到1954年9月，我国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产生了政府的新的领导人。国务院的三十五个部长、主任中，非共产党员十三人，占三分之一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常委七十九人中，非共产党员三十九人；副委员长十三人中，非共产党员八人；国防委员会委员七十九人中，非共产党员二十九人。

开过这次人代大会之后，12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62次会议上讲了讨论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问题，他说：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了，但是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将存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今后的任务是要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为了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第二届政协委员的名单，要扩大团结。

在这个月下旬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1952年6月，我国的一次以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筹备成立全国工商联的会议。周恩来到会上作了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953年9月，全国政协开常委扩大会，邀请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对于民族工商业者，“只要引导上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将来在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可以不流血，可以和平地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总之，人们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尽了力，将来就会得到应有的报酬。这种过渡，会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

“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八个字，得到民族工商业者的欢迎。黄炎培形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同登彼岸、花团锦簇”，“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了。

民主党派是否还要继续存在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的方针。周恩来对这个方针作了阐述。

他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经想同其他一些党派合作，但是其他党派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因此这个想法没有能够实现。在我国的情况下，我们同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都是合作的，团结的，那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怎么能设想不能合作下去呢。“好像讲到社会主义，就只应该有一个党才对。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

长期共存，民主党派存在多长时间呢？周恩来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互相监督，怎么个监督法？周恩来说：“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共产党员首先要党的监督，可是整个党的工作，也还要其他党派来监督。”“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嘛！你做得对，人民拥护，做得不对，人民就不拥护。”我们“应该愿意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当然，反过来，民主党派也应该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

周恩来解释这个方针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他认为我们是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大国，要建设社会主义，要把人民的生活搞好，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工作，要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要监督，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但是这样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互相影响，互相监督，起制约作用。

可惜，这些正确的方针和好的设想，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而受到影响。反右派严重扩大化，把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党的干部中的很多人错划为“右派分子”，接着又因“左”的错误影响，使得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受到严重干扰，损害了同党外朋友的合作关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周恩来对国内阶级关系的趋势作了分析。这年3月他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于今后我国的阶级斗争，应当看到它的总趋势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的”。

4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这一重要报告，他说，现在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我们要把建设的任务担当起来。“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再次强调要扩大和发扬民主生活，认为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听到不同意见，看到不同的侧面，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一个党的政策也才能完备。他提倡在“六条标准”原则下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讨论、研究、切磋，求得更好的认识，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但是，这年下半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左”的错误思想重新抬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统战工作又受到了严重干扰和损害。

但是，也有新的突破。

在这个第二阶段的十年中，有两件事曾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件是从1959年起对在押的战犯进行特赦；一件是1965年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回国。这两件事，都是周恩来付出大量心血的。

1959年12月4日，我国第一批特赦了王耀武、爱新觉罗·溥仪等三十

三名战犯，统战部门对他们在生活上、工作上作了妥善的安置。这些人从罪人改造成了新人，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威力和工作的成绩，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这些战犯中，有些人开始是很顽固的。如杨伯涛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被俘后几次自杀没有成功。关押期间对他耐心开导，到抗美援朝时期，他转变了。他的转变是由爱国开始的，在这些人关押期间，周恩来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指示对他们的改造和教育，他们释放后，又接见他们。他们的思想顾虑，了这一点地被打破。

郑庭笈说：我释放后，住在北京我兄弟家，12月13日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在家里等候，有首长接见。那时我兄弟家的保姆对我说，什么首长接见，他们是故意来看看你们是不是在家里。我也很疑惑，猜不出有什么事，只得在家等。次日下午一点钟，我们同狱第一批释放的十个人被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才确信是周总理要接见。我们在厅里坐下，相对无语，心中忐忑不安，大概过了半小时，进来一个人，是傅仪。以后，周恩来、陈毅、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来了。章士钊还称杜幸明为社长官，大家不禁笑起来。周恩来同我们一一握手，一个个交谈，然后讲了话。

周恩来告诉他们，“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斗争，翻了身，站起来了。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党和国家对你们是信任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作贡献。”

杨伯涛说：“周总理除了会见我们外，还安排我们这些人到各处参观学习，让我们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对待俘虏的作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们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腐败。我为国民党工作过十九年，又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三十几年，我感到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只有共产党有这个力量。”

李宗仁回归祖国，这在国际上震动很大。国外评论说，这次行动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统一战线的一次大的胜利。

这是周恩来长期工作的结果。

从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间，李宗仁的助手程思远五次到北京，每次周恩来都亲切会见他。第一次，周恩来着重地对他讲“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第二次是1959年，周恩来对他讲，李宗仁有爱国精神表现，但回国的时机还下成熟。第三次在1961年，周恩来要在香港的程思远回国一行，对他说，希望他去同李宗仁谈谈，劝李宗仁对美国的新总统不要抱什么幻想。第四次在1963年11月，周恩来要程思远转达李宗仁“四可”，可以回国定居，可以回国后再会美国，可以方便时再来，可以在欧洲暂住再定行止；“四不可”，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1965年，时机成熟，李宗仁决心回国。周恩来亲自作安排，并且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开会。座中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周恩来和颜悦色地加以解释，最后大家心悦诚服，没有异议。李宗仁由程思远陪同到北京后，周恩来热情接待。李宗仁说：一回来就再不出去了。周恩来说：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

程思远说：“从周总理对李宗仁先生的关怀，我们看到了总理在处理问题上的严肃认真、坚持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也感到了总理无微不至、体贴入

微的关怀。”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工作，疯狂迫害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就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后来，形势的发展使工作无法进行了，但周恩来仍极力保护党外的友人，如1966年开出的保护名单，1969年致信人大、政协的军代表“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曾经一再作出努力要开展统战工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对于党外的朋友和同志，总是强调团结和协商，他作风民主，态度诚恳，襟怀坦白，对人尊重，既坚持原则而又灵活机动，既思想深邃又不强加于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说：“总理一生中，团结、保护党外人士的丰功伟绩如昭昭日月，他是党的统战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模范执行者。他团结、成全和挽救了难以数计的好同志。”钱昌照对周恩来的待人，归结为八个字：“放而不纵，严而不厉。”

周恩来说，对党外朋友的团结，要以信任为基础，“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他认为在同党外朋友的合作中起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必须明确彼此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领导地位。”

周恩来主张，对朋友要“采取但白的态度”，凡事“都要真诚地讲给他们听”，同时也要倾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成为共产党的“诤友”。民建主席胡子昂曾经讲到“林彪摔死后，总理及时找我们少数民主人士开了一次紧急座谈会。会议结束后，我的车子还未来，总理就陪我谈心。他极为诚恳地对我说：‘多年来，你为党、为国家做了很多工作，可以算是我们党的一位净友’。”胡子昂说：“在极左思潮和‘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听到周总理亲口以‘诤友’相赠相勉，我感到无比地温暖和鼓舞。”

周恩来对党外朋友十分尊重。例如李宗仁回国后，1965年9月26日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是李宗仁在上海时提出来，周恩来当面答应的。对这事，吴冷西回忆说：

1965年9月中旬，周总理要我和龚澎、张彦、姚溱到他办公室去，告诉我们，李宗仁先生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请总理推荐几个人作参谋或顾问，他决定推荐我们四人去当顾问，认为我们几个人对中央的对内对外政策比较了解，有两人还多次担任过政府代表团的发言人，有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经验，可以给李宗仁先生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当顾问，只能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喧宾夺主，一切都由李宗仁先生自己决定。这点你们一定要记住。

周总理强调，我们党的方针是三句话，爱同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既往不咎了。我们一律以诚相待。你们去当顾问，一切都要尊重李宗仁先生。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要

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他作主。讲话稿不用我们起草，因为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能说会写，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文字表达会比我们更适合李宗仁先生的习惯和身份。

这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中外记者和港澳记者共三百多人，盛况空前。

周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因而尊重朋友也表现在尊重朋友的感情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屈武讲过一件事：

屈武的丈人于右任，是台湾国民党的“立法院长”。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于右任是想留下来的，但遭蒋介石胁迫，去了台湾。夫人高仲林却留在了西安。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从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胡子”（对于右任的熟称）最近有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周恩来就同屈武商量为于夫人祝寿，“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儿媳去祝寿（夫人于芝秀已在西安）。陕西省统战部热情接待了他们。于有任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如副省长孙蔚如、工商联主席韩望尘、全国政协委员茹欲立、知名人士杨子廉等都参加了。寿宴轻松欢快，于夫人兴高采烈，十分感谢。过后，屈武把这事写信辗转告诉了于右任。于右任收到信和照片，高兴到了极点，喜出望外。他要屈武向周恩来表达诚挚的谢意。屈武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由于两岸相隔，于有任终于没有能够回来。逝世前，他发出哀音：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感人的事迹数不胜数，他在党外人士中，有口皆碑，得到普遍的尊崇。他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了人民民主，在统一战线中尽到了党的领导的责任。长期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曾经说，周恩来的统战工作，“给了我们重要的言教和身教”。

二十五各民族必须友爱合作建中华

我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是个多民族国家。周恩来讲过，我国很多民族之间，在建国以前的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团结奋斗的关系。

建国前，在汉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年代，在内蒙古也有了革命根据地。在新疆，兄弟民族也有过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南地区的游击斗争，也有很多兄弟民族的人士参加。在中原大地，有不少兄弟民族的先进人物参加了红军。人民抗日军和解放军，其中包括朝鲜族人。三十年代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留下了革命的影响，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干部。

所以，汉族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和情谊，是有历史渊源的。

周恩来 1928 年就认识了蒙族的乌兰夫。当时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周恩来参加中共六大，到中山大学看望中国同志，给他们讲六大的精神和国内的形势。交谈中，有人告诉周恩来，乌兰夫（云泽）等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人。周恩来很高兴，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格外关注。抗战期间，周恩来和乌兰夫在延安见面了，他对乌兰夫在绥远地区的工作情况很了解，这说明他是很关心少数民族工作、注意研究内蒙情况的。他对乌兰夫说：“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1947 年 3 月，内蒙古的东部大部和中部一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电报指示，批准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电文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这个政府并非独立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这个电报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等，都有明确指示，为后来继续充实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

乌兰夫说：“周恩来同志被誉为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在筹备建立人民共和国时，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其中关于民族政策专门写了一章，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共同纲领》还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周恩来说：“中国的民族很多，其中汉族的人口最多，约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其他民族只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大，大概占我国领土的百分之六十。”“我们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了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

1957 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周恩来在这

乌兰夫：《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呕心沥血》。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08 页。

个会上有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讲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问题、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问题、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问题。他说，我们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共同基础上，各民族团结起来。我们采取的一个根本性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而采取的最适当的政策。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

中国地区辽阔，历史地发展成为一个大国。在古代，它还不是完全统一的，各民族间有时彼此作战，这在历史上也是有记载的。汉族侵犯过兄弟民族，汉族也被一些兄弟民族侵犯过，如北朝、辽、金、元、清，但总的说，汉族侵犯其他民族的次数多。这些，是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新中国，宪法上规定了民族平等，新中国应“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周恩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站起来以后也还会栽跟斗，还会是个落后的、贫困的、受欺侮的国家。“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周恩来很重视改变旧中国对少数民族的鄙视。他说，广西境内的苗、瑶、侗、壮好几个少数民族，在汉族史书上记载的名称，几乎都加“犬”旁，意思是说他们“非我族类”，宣扬汉族至上。直到民国初年编的《辞源》，还是那样写的。这就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周恩来任总理，尽力铲除这一类痕迹。如广西的壮族，原来称“僮族”，但“僮”字在封建时代有役使的儿童的含义，如家僮、书僮等，因此这个字有贬低的意思，周恩来建议用与它同音而意义极好的“壮”字来代替它，旧中国壮族并无自治区，新中国设“广西壮族自治区”为省一级行政区域，七百八十万壮族同胞深为满意。又如内蒙的呼和浩特，旧中国称“归绥”；新疆的乌鲁木齐，旧中国称“迪化”，“归绥”、“迪化”都带有大汉族主义的意味，因而都改用当地民族自己的称呼。

周恩来强调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我国民族交叉居住的很多，除省级的民族自治区域外，仍有很多地区是多民族杂居的，民族自治区域内居住的也往往不只是一个民族。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居住着十三个民族，维吾尔民族人数最多，所以称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虽然面积很大，但全国一百四十多万蒙古族人口在本自治区的只占三分之二左右，另外几十万人分住在东北、青海等地，新疆还有蒙古族的自治州、自治县。全国回族人口三百五十多万，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有五十七万，而全自治区有一百七十二万人口，可见其他民族占多数。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有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藏族人口。满族是中国过去的统治阶级的民族，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奴役各族人民，虽然曾经使得中国一度强盛，但是最后它实行“宁赠外人，不给家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国衰败了。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歧视满族，满族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周恩来主张

以上数字均为五十年代中期统计数字。

恢复满族的应有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这样做。周恩来对傅仪和他的家属说：“现在民族平等了，各民族共同发展。满汉要团结得更好。”

早在1950年周恩来就提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在民族自治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他一再要他们学习所在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更强调的是要帮助少数民族培养大批干部。1956年春天，周恩来到中央民族学院，仔细观看了藏族学生的宿舍，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学好本领，建设西藏。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各地先后办起了十所民族学院，已经培养出了一百多万少数民族干部。这些学生，后来很多人成为民族地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如西藏自治区党委成立以来，始终把大量培养民族干部当成大事来抓，到1979年，全自治区的民族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省级干部中民族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一·五，地、县领导班子中民族干部任一把手的占百分之五十六。

周恩来主张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建国后，人民政府先后帮助各民族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各个民族从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其中不少民族越过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同汉族一道进入了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给以巨额的财政补贴和智力投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任荣说：从五十年代起二十多年间，周总理多次指出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国家每年都要拨出相当数量的款项，派出一批又一批科技文教工作人员和各方面的骨干支援西藏，帮助发展西藏的经济和科学文化。从举世闻名的川藏、青藏、新藏和中尼公路干线、民航机场、电站、输油管道，到河堤、影剧院等，都是周恩来亲自审定的。西藏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在1959年到1979年的二十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四倍，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二点三倍，牲畜存栏数增长了二点五倍，各类学校发展到六千七百多所，在校学生二十九万多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

周恩来很注意发挥藏族干部的积极性，工作放手地让他们去做，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阿沛·阿旺晋美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藏族红军老战士天宝患了青光眼病，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让他住医院治疗，要医院“尽一切努力”，后来天主的眼病痊愈了。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说，“宁肯全国承受更大的困难，对西藏的供应一点不能减少”。1975年8月29日，周恩来已经病重，他躺在病床上，还接见了将要去西藏参加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典的中央代表团团长，谆谆嘱托他到西藏后要鼓励各族干部，增强团结，保持安定，发展经济。这年10月，西藏歌舞团到北京演出，周恩来在医院里从电视上看了后，还托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说：总理听你唱的歌曲和过去一样好，很高兴，你要好好为人民歌唱，要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旧中国的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内蒙古的情形也是这样。建国伊始，内蒙古牧区疾病流行，特别是梅毒为害，人口下降。在周恩来主持下，从中央和各地抽调大批医务人员，组成驱梅队去治疗，几年间把危及蒙族生存的梅毒病消灭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周恩来决定在大荒漠上兴建起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组织了支

援包钢，支援包头、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的大军。1959年，新兴的工业基地包头已经初具规模，包钢的大部分基础工程已经建了起来；具有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的包钢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投产。周恩来亲自到包头庆祝。10月15日，他听取了汇报，仔细询问了工程进展情况，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还视察了厂区，同工人交谈，接见了职工代表。他祝贺这个建设的胜利，同时又嘱大家还要用更大的努力，加快包头和内蒙古的建设。周恩来在文化建设方面对内蒙古也很关心，还多次接见过内蒙古的文艺演出团体，特别是高度评价了内蒙古的文化轻骑兵——乌兰牧骑，推荐他们到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去巡回演出，扩大影响，促进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的。

周恩来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设想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工业中心，他提出要用全国的力量去支援。1965年夏天，他和陈毅到新疆，走了天山南北很多地方。新疆有一首歌曲流行全国：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周恩来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肯定这首歌所唱的内容，赞叹他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地面、地下，生产潜力非常大，就是要大大发展生产。”

周恩来在和田、喀什、石河子、乌鲁木齐多次同各族干部谈话，一再说：“在新疆要特别重视加强民族团结。”他参观喀什棉纺织厂时，指示要热心培养好第一代维吾尔族纺织工人。他深入农村，从果园生产情况问到民族的家庭生活、经济收入。在和田，他看了文工团的演出。三十个演员都是多面手，能歌能舞能弹奏，反映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恰好几个月后，贺龙也到这里观看了演出。于是这年冬天，周恩来和贺龙邀请这个文工团到北京演出。周恩来还请全体演员和乌兰牧骑的文艺战士一起去他那里作客。

1975年9月，周恩来在病床上接见了将要去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祝贺，并且说：我很想念新疆人民，可是已经不能再去新疆亲眼看看了，请你们多带回些照片，以便能看到今日的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去过，有时是出国、回国途经这里，有时是专门到这里。1955年“五一”节，周恩来在昆明检阅了各族人民的庆祝游行队伍，晚上和陈毅到云南民族学院同民族师生员工联欢。大家为总理准备了沙发，但是周恩来却绕过沙发走到石阶中间，笑着向大家招手：“同志们，大家都坐到一起来吧。”大家坐在一起，周恩来问这问那，谈笑风生。纳西族的同学引吭高歌：

亲人啊，周总理！
毛主席派来了慰问我们的人，
您带来幸福和温暖。
鱼不能离开水啊，
各族人民不能离开党。
您的品德像玉龙山晶莹的白雪，
永远留在各族人民的心坎上。
唱得多么欢乐啊，跳得多么高兴啊，
我们无法抑制激动欢乐的心。
掏出红心啊！献给周总理，

祝福，祝福，祝福敬爱的周总理健康幸福！

1956年冬天，周恩来和贺龙来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芒市，参加中缅两国边民联欢大会。周恩来说：“我虽然几次到云南，但是，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是第一次。你们富饶美丽的土地，你们的劳动创造，特别是解放以来在各方面的成就，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1961年4月13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允景洪，参加傣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泼水节。当地的记载说：

在开始泼水的时候，周总理和各族群众都用一根柏木枝条蘸着银碗里的水互相洒。

我们傣族有个风俗，泼水节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明彼此越亲热，越尊敬。各族群众觉得这样洒水，还不能表达对周总理无比热爱的感情，于是就改用大盆来泼水。周总理的警卫人员担心首长的健康，就用雨伞去挡水。周总理立刻要他把雨伞收起来，并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周总理放下银碗，拿起一只脸盆，把一盆盆清水向各族群众泼去。大片大片的水花在天空飞舞，晶莹的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一道彩虹，把周总理和各族人民紧紧地联在一起。

兄弟民族，很多都有宗教信仰，周恩来指出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他说：“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另外，一个民族往往有自己的不同的风俗习惯，对此也应当尊重。他说：“人家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的。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他在西双版纳时，当地领导人向他介绍说傣族地区农民有不施肥，不修水利、靠天吃饭的习惯。周恩来亲切他说，要提倡积肥施肥、兴修水利，改变落后的耕作方式，但是要多做工作，逐步改变，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习惯呀！要尊重民族的习惯，等待他们自己有要求时再改变，而改变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

二十六生育要有计划

一次，周恩来同美籍华人教授来华参观团的人们座谈。在讨论了美国的家庭里，究竟是父母受子女的影响大，还是父母给子女的影响大这个问题后，周恩来一转话头，询问长期从事动物的生理研究节育方法的张明觉专家说：“最近研究有没有新的进展？有没有比目前的避孕丸更简单有效的办法？”

张明觉回答说：现在还没有。许多实验是需要长期去做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还会发现更好的节育方法。

周恩来感叹说：推广节育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立刻他又插了一句幽默的声明：这话并不是对在座的已婚女宾而说的。

在场的人都笑了。

接着，周恩来又以山西一些农村为例，用比较严肃的语气说：虽然经过多年来的社会教育，但是许多人民仍旧还没有去掉一些传统的旧习惯，对于产妇的卫生和保养，距离合理的水平还比较远。而且，旧的传统习惯无形中是鼓励妇女多生育的，例如重男轻女。这也是促进人口增加快的一个因素。生了女孩，不满意，打算再生一个，希望是男孩。

在座的任之恭教授原来是山西人，他很同意这些话。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人口统计，过去往往不大准确。实有数可能比统计数要多。我们现在如果不实行节育，那末到本世纪末可能超过十亿。这样多的人口，吃粮就成问题，教育也跟不上去，所以，节育必须定为我们的一条基本政策。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忧虑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在 1840 年的时候，人口有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人，到 1947 年是四亿五千五百五十九万人，其间经过了一百零七年，平均每年增加四十万人。固然这个统计数字未必十分精确，但它确实反映了旧社会人民生活困苦，卫生条件极差，加上灾荒不断，战乱连年，生长不易，死亡频繁，影响人口数的增长的基本状况。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了，卫生防疫工作开展了，在和平的环境中和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从 1953 年到 1957 年，平均每年增加人口一千三百万。据统计，1957 年全国人口达到了六亿四千万人。

这问题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

1955 年 2 月，周恩来开始提出我们应该提倡节育的问题。在这之前，1954 年 5 月 27 日，他当时在瑞士日内瓦开会，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写信给在北京主持政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反映我国大城市中的妇女在自身得到解放后，存在着节育的愿望和要求。邓小平见信后，支持这个意见，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卫生部“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所以，周恩来说，节育“这一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讲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提倡节制生育。他说：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

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

接着，在 11 月 9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讲了要提倡节育。在 10 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这期间，周恩来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多种场合，多次他讲这个问题。

1957 年 3 月 24 日在杭州市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讲：“我向你们建议，最好提倡晚婚，提倡节育。”

这年 6 月在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他讲了“应该有计划地生育”。

周恩来说，在旧中国，因为贫困不能结婚、卫生条件差，水旱灾荒无人管、长期内战，人口的增长率很低。解放后，这四方面都变化了，人口增长很快。人多就有人多的问题，人多地少，需要节育。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

后来，他归结说：“计划生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倡晚婚，一方面提倡节育。”

五十年代，党外人士中有马寅初、邵力子呼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人口过快地增长。对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是赞成的。马寅初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

当时有人认为马寅初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这一套。对这个说法，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人口多确实是个问题，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这个问题不能驳掉，说它是马尔萨斯思想。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规律上有他一定的客观性，而到他主观主义作出结论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则成为反动的理论。到法西斯时代，人口多就成为对外扩张的根据。”

1957 年 6 月，马寅初在人大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发言。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有的人写文章说马寅初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也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有人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为此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明确地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

周恩来保护了马寅初。这年，他还视察了北京大学，会见了校长马寅初。

1963 年，周恩来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马寅初先生对人口的看法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提的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性的。我们不可能采取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那种分析和结论，那是反动的。但是，人口增加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马尔萨斯说了，我们就否定人口增殖力相当大。

周恩来到工厂、农村去的时候，也经常向工农群众讲这个问题。举例说：

1957 年到 1963 年间，周恩来曾经五次到浙江杭州梅家坞。梅家坞是有名的龙井茶叶产地。有一次，周恩来同干部、技术人员们座谈。同总理坐在一

1963 年 7 月 8 日，在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101 次会上的讲话。

朱正直、徐汤莘、杨勋：《马寅初传》。

1963 年 7 月 8 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01 次会上的讲话。

起，大家开始都有些拘束和紧张。周恩来看到厂这个情况，他微笑着同人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做什么工作、家里有几个孩子，等。当他听到大多数人家里有三四个孩子时，就幽默他说：中央要我当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我当不了，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说服力呀！他边说边笑了起来，大家也笑了，笑声中，百姓同总理的距离消失了，起初的拘束、紧张感随之而散。周恩来笑着对大家说：“我要和大家做朋友了，以后要经常到梅家坞来。”周恩来同大家的谈话中，讲到了要作好计划生育工作，要搞好学校教育。

1963年4月，周恩来到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在公社领导人的陪同下，他看了大田和社办工厂，问了很多问题，其中特别提到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中小学生入学率、农村青少年读书等问题。他问：全公社有几所中学？有几所小学？有多少学生？有没有不读书的孩子？小学生毕业后升初中的情况怎样？初中毕业后升高中的情况怎样？小学毕业生一般有多大年纪？中学、小学里是否进行农业生产知识的教育？周恩来说：小学毕业生每年有几百人，只有一所初中。升高中的更少了，多数中小学毕业生要在本地参加工作，所以必须加强对在校学生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教育。周恩来笑着说，“娃娃太多了。”

这年6月，周恩来在大庆油田视察时，听到女职工李英积极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他十分高兴，希望大家向她学习，并巨同抱着孩子的李英专门合影留念。现在这张照片已经收入了大型画册《周恩来》中、成为珍贵的瞬间。

周恩来生前，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关怀备至，对卫生工作十分重视。他主张预防为主，强调中西医结合，“相互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他一直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关心群众要懂卫生知识，也关心计划生育工作。尽管在那时，计划生育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是周恩来大力支持。他认为，要有几条规定，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先搞试点，主要是抓城市，农村要结合医生下乡，有步骤、有重点地搞。卫生部门要抓，对技术指导、培训干部，也要订几条。他认为计划生育是大事，人类的发展应该有计划，这样可以使人民体质更健康，生活水平更提高，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有好处。

1965年11月，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召开，会长傅连璋和大夫林巧稚请周恩来接见代表和讲话。周恩来就讲了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

他说：“对计划生育要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要有一些规定，如在工资、住房、供应等方面，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一方面要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命令。又要自觉自愿又要有所约束。要用各种办法帮助人们避孕。怎样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现在全国有七亿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太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要使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年纯增长率控制在百分之一，这就很了不起。总之，计划生育是一件长期的事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计划生育问

李林达、金延锋，《梅家坞人的怀念》。《浙江党史》，1992年第3期。

朱本福，《周总理视察马陆公社》。《上海党史》。1991年第12期。

题又受到了重视。本章开始的那个座谈会，就是 1972 年夏天的事情。

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百分之二点六降到了百分之一一点一六，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基本得到控制。”

二十七实事求是与反冒进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国家热气腾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们心情舒畅，朝着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奋发进取。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成功，使得和平共处的思想深入人心，世界和平和互相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共中央估计，世界大战一时还不会打起来，可能有十年到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时机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

一切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对于经济建设也是这样。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的重要思想。1956年春天，他提出：“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在处理经济建设问题时，周恩来既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也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他说，要“实事求是地稳步前进”。对这，他还在1956年1月的一次全国政协的会议上，作过阐述。他说：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会犯保守不前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353

后来在这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他总结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经验时。第一条就是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那时，我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积极”，又“稳妥可靠”、体现了周恩来的上述想法。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当然希望国家发展得快一点，但只是快是不够的。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恩来同薄一波提出了“多”、“快”、“好”三个字，毛泽东也同意，接过去说“要快、要好，要多”，后来李富春又补充了一个“省”字。这就成了多、快、好、省。

我国五十年代的经济建设工作，从指导思想来说，“左”的倾向比较大，曾经几次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因而在那个时候，周恩来的反对冒进的讲话就比较多。他说：“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

1953年经济有些冒进，周恩来来说：“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的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周恩来是一个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1956年初，在上年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不小心谨慎地办事了，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应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就是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

这期间，发生了一次同毛泽东面对面的争执。

熊华源：《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胡乔木谈过：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以及速度，增加了预算的指标。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在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四五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例如4月14日周恩来来到鞍山钢铁厂，向厂党委书记问到今年能不能增产某些产品的时候，对方感到为难。5月6日到太原钢铁厂，也了解到完成生产指标有困难。周恩来是想快一点的，但也了解了完成指标的困难。

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周恩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这个月，他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国家预算，并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这个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和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上。刘少奇要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社论稿写出来后，送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社论稿也送给了他。他在上面批，“不看了。”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叫《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一股未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否则，“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提前来”。

1956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1956年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

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时候，国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这个数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朗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6%，财政收支平衡有余，保证了市场供应，还补充了上年挖掉的国家物资储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年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这个纠正冒进的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苏联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前一个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在后一个会上，毛泽东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叫做《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

毛泽东回国后，1958年1月，他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

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会议从11日开到22日，毛泽东接连不断的声色俱厉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领导人。最后，毛泽东作会议的结论，说“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毛泽东所说的三个东西，指“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指出：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又提到“1956年吹掉三样东西：有痛心的，有漠不关心的，有高兴的——三种态度，是一个教训”。还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反冒进”这个词提高到“这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当年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有过叙述：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他还说，虽然和毛主席常常见面，但并不能因此在思想上就能完全一致。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桌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词。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

去。”“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范若愚说：“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两次讲到可能发生的大灾大难，一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历史上有党内分裂，今后会不会有新的分裂，可能有，分裂是新陈代谢。

党的分裂当然是大灾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什么样的人 and 毛泽东下一致才会引起党的分裂呢？这是很明显的。四年前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周恩来还作过重要发言，记忆犹深。必须维护党的团结。

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要，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要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二十八从“大跃进”到调整

从 1957 年 9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 15 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周恩来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 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他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寻上又要尽可能地使之幢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 1958 年钢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估计 1958 年粮食产量达到 6000 亿斤到 7000 亿斤，比 1957 年增产 60%—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 10 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当场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他心情十分沉重。7 月 18 日，周恩来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夜战”“苦战”，一亩地种了 12 万穴，他当即指示，要合理密植，要关心木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在大刮“共产风”时，周恩来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 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 620 万吨，5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 800 万至 850 万吨。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从 1957 年的 535 万吨，达到 1958 年的 1070 万吨）后，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 102 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 万吨生铁，需要 1000 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

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亲自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还调了一万三千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

“大跃进”是“以钢为纲”，当时冶金工业部的领导人是怎么看周恩来的呢？王鹤寿、吕东说，“纵观周总理在‘大跃进’前前后后的言行，在那股‘热浪’席卷全国的情况下，周总理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贯彻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他们讲到1959年春在“大跃进”高潮中，冶金部开“鼓干劲”会，请周总理来作报告，同总理抓往当时“两条腿走路”这个口号，大讲两点论，大讲辩证法，说：不仅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洋等并举是两条腿走路，而且一系列问题上都要“两条腿走路”。搞“群众运动”，一定要和集中领导相结合，一定要强化生产指挥系统，讲发扬民主，不可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讲“突出重点，保钢保铁”，不能忽视综合平衡；当“促进派”，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他们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作这样的报告，真是用心良苦，寓意深长。”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不光是1959年春，1958年夏就有了；也不光是对冶金工业，而且几乎对所有当时发热的方面。

“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且设备和钢材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7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外贸工作会议。这时，在“大跃进”的热潮影响下，都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领导中也有人这样。周恩来马上找外贸部负责同志谈话，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重合同，守信用”。

当时，文化工作中有的提出“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县出一个梅兰芳，每县出一个郭沫若”。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有类似情况。周恩来就召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人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夏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到西花厅开会。就文艺、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

进行商议。他鼓励大家消除顾虑，敢于讲真话。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他认为教育方面在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要马上停止；文艺不能简单地配合政策，反对“文艺放卫星”之类口号……“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使大家头脑清醒过来，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差。会议结束，大家走出西花厅时，天空已经发白了。”

这年夏天，他到戏剧学院实验剧场看了师生演出的一个话剧。因受当时的影响，话剧中宣传了共产主义就要到来。周恩来看后，严肃地指出：“五年后就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容易啊？！你们不要这样宣传，这个戏太浪漫，脱离了实际。”

当年的财政部负责人戎子和说：“我从周总理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一段主持召开的几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时的言行看，他是不赞成‘大跃进’的那些做法的。”

郭洪涛是当时的国务院交通办公室负责人，1958年11月去南方了解物资运输问题，回北京时飞机刚在西苑机场降落，周恩来就要他们去汇报。他们提出按照当时条件，要极大地增加运输量是困难的，难以适应各方面“大跃进”的要求。周恩来同意这个看法。郭洪涛说：“从这一次他听取我们汇报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虽然正在批评右倾，但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需要极大的毅力，更需要无私无畏的党性，才能做到的。”

1958年11月之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话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后，1959年人民如何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

林默涵：《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

郭洪涛：《永恒的怀念》。

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他说，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大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2月25日，他看话剧《烈火红心》的演出。看后说：不能只用军事信心来对待工业，光凭信心，没有科学根据是不行的，我们军队打胜仗是有科学根据的。又说：光凭蛮子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1959年5月3日，他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艺术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讲：跃进总要有个限度，有一定的可能性，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了。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努力在这方面作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材料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开时·369··369·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农村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同志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要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

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领导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舞会上，询问周恩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三年“大跃进”，经济上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效益下降，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重工业自身到了1960年底也掉了下来。农业生产大步倒退，总产值1959年比1958年下降13.6%，1960年农业总产值又比1959年下降了12.6%。粮食产量据1961年核实，只有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3901亿斤下降了26.4%，跌到了1951年的2874亿斤的水平。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人民生活愈来愈困难。粮食紧缺，副食品紧缺，生活日用品紧缺。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夹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应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八字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

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 1962 年 3 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新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1961 年开始的调整，主要是把被破坏了的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工业和农业、消费和积累两大战略性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

要进行调整，这在当时，中共中央有些人思想上是有阻碍的。他们坚持“左”的设想。如 1963 年陈伯达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业的决定稿，就不提“调整”。周恩来批评说：“甚至连‘调整’都不敢说。不要讳疾忌医，因噎废食，我们在调整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了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当年的周恩来，排除一切阻碍，坚决地把国民经济重新纳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再禁不注党内的下一致和互相责难，必须齐心协力，共挽危局。

周恩来这样做的另一层道理，是为了替下面干部承担责任，使他们好进行工作。如果上层把责任向下推，群众又向上追究责任，夹在中层的干部就很困难了。正如周恩来对一次七个部门专业工作会议的代表所说：“要说责任，还在我身上，你们是负次要的责任。”“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责任在中央、国务院，还有国务院的各部。你们回去，可以向下面传达这一点，减轻大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这时期讲过几种关系问题，讲到“公”“私”关系时，他说：“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接着又说，“对共产党员，一般要求作到完公后私，有的时候，要求作到公而忘私。”周恩来自己正是这么做的，他承担责任，完全是出以公心，有利于克服困难，渡过危机。尽管“大跃进”之前，他受到了那么严厉的批评，现在他仍然站出来，毫无怨言，全心全意地把所有精力用在挽救经济，挽救国家上。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救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272 页。

1963 年 2 月 1 日，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华东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上的讲话。

困难时期，周恩来一方面是抓下一年的生产，而更紧迫的，是抓当时的粮食调配和口粮供应。这是燃眉之急。

那时候，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好几个省的农村饿死了人。农村中因为吃粮不够而浮肿病普遍、有的城市中也开始出现浮肿病。全国六亿人口，城市人口 1.2 亿多，“大跃进”多了 2900 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 360 亿到 400 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 1960 年国家库存只有 180 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一些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如，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从外面调进来的粮食不够销售的需要，粮库几乎挖空了。当时这些省市的库存粮食可供销售的时间，北京仅有七天，天津十天，辽宁八九天，上海粮库中几乎已经没有大米，试想：这些地方，特别是大城市中，人民天天要吃饭，如果一旦粮店没有粮食出售了，外边也没有粮食调进来供应，那会出现什么情景？

试想：如果几百万市民闹起来，党、政府还能不能站得住，国家会怎么样？

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说法，我们国家到了“非常时期”。

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机关抽调一万干部下乡做工作，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对他们作动员报告，称他们是“赴国难”，现在已是“国难”当头。

确实，尽管人们照常工作，市面照常开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流照常在长安街上川流不断，但是，一股潜藏的极大危险，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它如果一旦爆发，就会像轰雷，像闪电，震动整个的党和国家的基石。

党和政府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国家和人民到了极为困难的时期。

重担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的办公室的桌上放着写了许多数目字的纸张，上面写的都是粮食帐，这是他自己用毛笔或铅笔计算的。某城市的粮食能支持几天，哪个地方赶紧要调粮食去。每天晚上，粮食不落实。不睡觉。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各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二千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当时的粮食部部长陈国栋，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陈国栋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时全国人口六亿左右，城市人口一亿二千几百万，‘大跃进’多了二千九百万人进城，粮食供应数量大量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负担不起。许多地方纷纷告急，形势很紧张。”“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按过去规定，工作到半夜，就应有夜餐，三年困难时期取消了，但当我们工作到深夜时，邓大姐有时也端给我们一碗素挂面，那样照顾我们，是总理、邓大姐私人招待，公家并不开销。”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花钱待客，但由于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还不免要向客人收粮票。例如，1962 年 4 月 2 日，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负责人、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到家中作客，对他们创作的《霓虹灯下

的哨兵》给予鼓励。吃饭中间，邓颖超说：“今天是我与恩来同志拿自己的薪金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还要请每人交三两粮票。”

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 500 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在进口粮食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操碎了心。当年的外贸部领导雷任民讲道：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1960 年 12 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粮食数量是进口 150 万吨。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 250 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知道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数量，足以说明回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资金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我国船只进出这里它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我们一致认为：货源是有的，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迫要找出路，我们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我们。至于运输船只问题：第一，尽量买 FOB（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用外国商船；外汇中国银行可以周转透支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情似乎才踏实了。

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粮食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也常问到。为了粮食，总理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困难时期，即便有时候出差到供应比较好的省份，周恩来也很注意，如 1962 年 6 月，周恩来、邓颖超到东北的吉林省视察。吉林是农业生产比较好的省份，在长春，当地出于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知道北京供应紧张，早已作好准备。到后第二天早餐，吃得很丰盛，周恩来、邓颖超即刻提出了意见。邓颖超亲自用红铅笔写了一个菜单：“山珍海味、名贵食品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少吃，多吃面食和粗杂粮。”油炸品少吃是因为当时全国食油也很紧张。这个菜单送到了食堂，一位老厨师看了十分感慨说：“我做了几十年的饭，所见到的都是要吃高级山珍海味的菜单，从没见过这样的菜单……”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 1959 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化大革命”开始，1962 年夏天周恩来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人员讲话中，讲到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十个问题，第一是农业问题，第二是国家支援农业问题，第三仍是粮食问题。等到这年秋收后，12 月周恩来讲了话，才

说过去三年是粮食紧，现在粮食产量已逐步上升，但是，棉花又最紧了，成为农业上的关键问题。粮食产量逐年回升，到1965年已回升到3891亿斤，城市供应就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确实是费尽心血，几年功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

中国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致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在陈云、李先念等协助下，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后，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陈云提出了大幅度调整一系列原则。不久，陈云因病休养，仍由周恩来、李先念负责调整工作。周恩来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参与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二十九文艺三篇话意深

1958年的“大跃进”，在经济建设中，违背了客观规律，发生了“左”倾错误，这种错误也影响到了文艺工作中，电影界的情况尤其严重。许多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提出“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等，要两三个月就拍制出一部故事片来。

1959年4月23日上午，周恩来因病住院治疗。他就想利用这个时间，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于是找了陈荒煤、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等，请他们到医院去谈谈。

见面后，郑君里高兴他说：“我们正希望听听总理的指示哩。”

周恩来不高兴了，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不是什么“领导指示”，否则我就不说了。

郑君里像孩子般地央求周恩来讲。

周恩来讲了话。出院后，5月3日，他又邀约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在紫光阁谈了话。两次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说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文艺是精神产品，工作不能过分紧张，既要力争完成任务，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等等。这两次讲话的精神都是要纠正当时文艺工作中的片面性和“左”的思想。

但是，1959年下半年，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周恩来的讲话精神没有能贯彻执行。周恩来后来说，“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到1961年后，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周恩来在这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以及下一年在紫光阁接见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时，又讲了文艺工作。

陈荒煤认为，周恩来1959年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这三个讲话，表明了周恩来“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始终是一个以身作则，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楷模”。

周恩来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文艺界的朋友”。他关心文艺，爱好文艺，并且熟悉文艺界的很多人。建国前夕，在北平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到会作报告，说，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约有六万人，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新文艺工作者约有一万人以上，大家要团结起来，使新中国的文艺“获得伟大的胜利”。这次会议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53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生活，“创作有正确思想内容的优秀的文艺作品”。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周恩来1955年11月为广东粤剧团题的词。

1956年4、5月间，浙江省昆苏剧团到北京演出《十五贯》。周恩来看后认为这个剧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推荐了这个剧，《十五贯》轰动了全国。当时我国正在进行肃反运动，这个剧肯定况钟这个历史人物，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非常成功。很多公安人员看后感动极了，对党政其他干部和广大群众，这剧也有教育意义。

周恩来就《十五贯》这个剧讲了两次话，不但救活了这个剧种，而且为戏曲改革指出了方向。他讲到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讲到老艺人在旧社会奋斗的艰辛，讲到历史题材也可以有大的教育意义，讲到昆曲的改革可以推动全国其他剧种的改革，讲到要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讲到“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等等。

周恩来对各种文艺形式都很重视和喜爱，对于传统的戏剧、曲艺等，他从来反对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应该钻研、继承和改革。1958年8月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无锡市曲艺演员玉一梅在中场休息时看见周恩来在休息室休息，就进去请他签名，苏州弹词演员侯莉君也跟了来。周恩来为他们签了名，嘱咐他们说：要尊重老艺人，对艺术要钻研。在我们新中国，无论是曲艺事业还是曲艺演员，都是属于人民的，因此不要有也不应有低人一等的想法，要做出成绩来。

周恩来过去在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与文艺工作者们有很好的友谊。建国后，他又交了不少新的文艺界朋友，热情关心他们，对老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尊重。

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弟子钟灵谈过一件事。

1955年，我们为了齐白石老人有个安静的环境作画，在雨儿胡同布置了一所四合院，把老人从跨车胡同迁入新居。1956年的一天，周总理来看老人，同他谈了话。之后，总理在另一间房子里把我叫去，严肃他说：“把老人接到这里住，是你的主意吧？”我点了点头。周总理责备说：“你也不想一想，老人有儿有女，他也需要享受大化之乐嘛！胡闹。”只有两个字，“胡闹”，声音并不大，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亲自搀扶着老人走过院子，并对我说：“我把老人送回家，你把老人的东西收拾好随后送去。”这样，老人就坐总理的汽车开走了。周总理和齐白石大师有着崇高而深厚的友谊；老人获得国际和平奖金，周总理亲自前来祝贺；老人逝世后，周总理亲临追悼会表示哀悼。

1957年春天，周恩来和贺龙陪外宾到杭州，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曾去看望了他们。在外事工作完毕后，一天下午，春雨濛濛，周恩来自己撑了一把雨伞，步行到金沙巷盖叫天家中，进行回访。盖叫天含着激动的眼泪，颤动着双手，接过周恩来的雨伞，迎他进屋内。周恩来在谈话中，亲切地关心盖叫天的健康和工作，称赞他勤学苦练，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沈尹默是有名的书法家，一次，周恩来到上海时接见了。沈尹默一进门，周恩来上前迎接。沈尹默是眼睛高度近视，看不清人，误以为是接待人员，便把身上的大衣脱下，随手交给周总理。周总理接过大衣，挂在衣架上。交谈起来，沈尹默才发觉为他挂大衣的就是周恩来总理，内心感到失礼，非常抱歉。周恩来却安然处之。

周恩来介绍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入党的事，当时曾经传为佳话。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时期，程砚秋隐居起来，矢志不登台演戏，表现了民族气节。北平解放，周恩来到北平，曾经亲自到西四报子胡同程砚秋家中拜访，程砚秋没有在家，家中人没有接待。后来，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宴会

上，两人见到了，从此接触多了起来。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程任副院长。周恩来平时很关心程砚秋的各项情况。1957年，程砚秋向研究院的党组织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好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而程砚秋也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当艺术顾问。程砚秋在莫斯科见到了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申请，并且问周恩来看自己够不够条件。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需要经过你所在单位的党支部讨论，就我个人来说，是同意你入党而且愿意作你的入党介绍人。当时贺龙也在场，他说：也算我一个。

周恩来回国后，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总支书记马少波谈了这件事，马少波是主持戏曲研究院日常工作的。后来，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支部大会同意程砚秋入党。周恩来在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自己的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11月13日，周恩来写信给程砚秋，把这些意见抄告给他，说：砚秋同志，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程砚秋接到信后，在12月3日写了一封回信，说：

“对您的珍贵指示和对于我的愿望，感到兴奋极了，想了多日真不知应用何语言来回答，您再三说您三十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请放心吧，我永久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去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专此敬复周恩来总理台鉴。”

1958年3月，程砚秋去世。周恩来对程派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很关心，对程的家属也很关心。1959年程砚秋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周恩来请程派弟子赵荣深、王吟秋、李蔷华、江新熔、侯玉兰、李世济以及琴师钟世章、鼓师白登云，到家里座谈，提议要搞一个程派剧团。其中的江新熔，原是八路军文工团的演员，一次她为周恩来和梅兰芳、程砚秋清唱了一段程派的《三击掌》，大家很赞赏。唱毕，周恩来对程砚秋说：“程先生，你一辈子没有收过女徒弟，今天，我介绍江新熔作你的弟子。我当这个介绍人。”他回过头去对江新熔说，过去你是山东的“梅兰芳”，今后要做山东的“程砚秋”了。并且建议她把“熔”字改为“蓉”字。1960年，程砚秋逝世两周年之际，周恩来又在家中请一些人去座谈继承和发展程派艺术问题。后来，程的大弟子赵荣琛、王吟秋等成立了北京青年京剧团。

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期间，文艺界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文艺界也受到了损伤，1959年又是反右倾，到了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一开头就说：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

他提出：“我们党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大家都是在社会主义立场

的范围内探讨问题，是为了把文艺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当时，文艺界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争议。周恩来说，对于《达吉和她的父亲》，不论是小说和后来改拍成的电影，他都看了，是一个好作品。他说：昨天看电影几乎流下泪来，但是没有流下来，因为导演的手法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

周恩来主张：“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当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

周恩来是十分民主的。黄宗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记下了周恩来同赵丹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与电影哪个好的争论：

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

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

赵丹说：“那不过是电影这个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们两个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略停微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他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张颖说：“周恩来同志重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但他从不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而是以同志和朋友的身份与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周恩来同志也曾批评过一些作品和演出，但不强加于人，而是以理服人。”

在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中，他认为文艺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作家、艺术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因此，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往往决定着作品的性质。文艺工作者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才能够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意气风发。有了这样的气魄，才能产生出好作品，不仅写人物要有理想，即使画人物画、山水画也要如此。

他认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周恩来从政治角度、群众观点、领导作风这三个方面论述了文艺的客观规律，并且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这个角度来批评领导缺乏民主作风，违反文艺的客观规律。认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他强调实践。所谓实践，包括生活实践和劳动实践，此外还要有写作实践和艺术实践。他形象他说，“蚕不吃桑叶吐不出丝，蜂不采花酿不出蜜，创作人员不到工农兵生活中去，写不出好作品”，同时，他强调了题材的广阔性和多样化。

周恩来认为，文艺应当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某些最本质的东西，但是必须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式去反映，“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

转引自陈荒煤：《周恩来时电影艺术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呢？”所以，作家、艺术家的创作需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且应当从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生活出发，使本质包含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之中。

“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周恩来从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统一的观点，指出文艺要寓教育于娱乐，多方面地满足群众的需要。他说，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艺术家要面对人民，为人民服务，作品要到群众中去考验，领导的责任是要在政治上把关，而在艺术上少加干涉，尊重艺术的规律。要发扬民主，发挥文艺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产出符合我们伟大时代的更多更美好的作品来。

周恩来不但关怀国内文艺事业的发展，而且关心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他在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就请了世界著名电影大师卓别林观看中国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看得情绪激动，潜然泪下，以至原来准备接着放映的《白毛女》只好停映。卓别林说：“你们有数千年的文化，希望你们能充分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你们的成就会吸引整个世界。”

从1949年到1966年，周恩来任总理而“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展这期间，我国和外国签订的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有三十多个，平均每年有一百多起、两千人次的文化交流项目。在表演艺术的交流方面，我国派出去的艺术团体或艺术家个人有一百六十八起、一万一百多人次。我们接待的外国艺术团体有二百二十五起、两万一千五百多人次。通过交流，也锻炼了我国的文艺队伍，传播了我国文化，并且创作了不少受欢迎的优秀节目，如《红绸舞》、《荷花舞》、《春江花月夜》等。

中外文化交流中，大部分是文艺方面的交流。周恩来强调“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应从本民族出发”。他说：“我们的民族从来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他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思想是开放的，既反对保守僵化的盲目排外思想，也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他说：“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

这是以我为主的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的文化。

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转引自张平：《周恩来中外文化交流思想初探》。

三十要关心人民生活

六十年代初，我国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后果，生产下降，物资很匮乏，人民的粮食定量很低，副食品也很少，生活困苦，不论是一般群众还是中央领导人，都是这样。

一次，周恩来到杭州参加中央的会议。将要离杭州回北京的时候，杭州的交际处干部提了一筐新鲜蔬菜，让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替总理带回北京，周恩来的卫士长向当地同志讲了周总理有严格规定，不能接受任何的地方馈赠，这筐菜不能收，把它退回去了。不料第二天登上飞机后，发现飞机上已经放了两筐菜。卫士长就找交际处的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交际处的同志说：这不是给周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发票，你们付钱好了。卫士长只好付了钱，把这两筐菜带回北京，转给了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位领导人家中都分了一份，也是收钱的。卫士长把周恩来的那一份领了回来，炊事员替周恩来作了菜，到吃饭的时候，周恩来看到了这盘菜，非常生气，饭也不吃了，把卫士长找了来，对他说：我同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为什么不听，接受了地方上送的菜？卫士长答：这不是专门带给你的，是带给中央领导同志的，每个人都有，供应处付了钱，我们领的这一份也是付钱的。周恩来一听，更火了，说：“付了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卫士长只好承认：“当然吃不到。”周恩来说：“我们吃得到，人民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

这件事，给这位卫士长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周恩来不接受地方的赠送物品，即便是寄来的也要退回，属于食品无法退回的，要照价付钱，这是一贯的，卫士长很熟悉。这一次的事情更教育了他，办事情一定要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想。

这是困难时期啊！人民群众吃不饱，有的地方的老百姓甚至吃野菜、树皮。毛泽东、周恩来等和人民同艰苦，共患难。周恩来过去喜欢吃红烧肉、狮子头，这时连肉也不吃了，同普通职工一样吃过人造肉——小球藻。家中不让炸花生米、炸油饼，怕费油。他甚至吃过用树叶做的点心。陈士榘回忆说：“毛泽东最喜欢吃猪肉，周总理多次动员他吃一点猪肉，毛泽东反问道：有的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你让我怎么去吃猪肉？你不是也不吃吗，我们都不吃。”

1960年3月29日，周恩来接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说：“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曾经发生饿死人事件。”还反映：“该地区田地荒芜”，“农民纷纷逃亡在外”，“干部作风恶劣，人民不敢反映”，万望“派员密查”。

周恩来看信后，心情愤激，不能平静。近年来，连续的盲目冒进，浮夸等不正之风大有滋长，又加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困苦。当地干部的作风这样恶劣，农民背井离乡外逃，这种情况，必须重视。他把来信转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并亲自写信说：

“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

他在信尾还专门加了一笔：“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接到周恩来的信后，曾希圣作了调查，查的结果，问题确实存在，虽然还不像来信所反映的那末严重。当地采取措施解决了问题。

周恩来任总理期间，亲自处理或者发函解决的人民来信，大约有七八百件。他心系人民，经常关心着人民的生活疾苦。

“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这是周恩来的话，反映了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对人民一片爱心。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革命的胜利。鲜艳的五星红旗，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它高高飘扬，教育我们永远不要脱离人民，永远关心人民的利益。

长征，是悲壮的史诗，它预兆着革命必将胜利。长征中，成千上万的人民子弟倒下了，把革命的重担，托付给了后来人。据福建省的统计，中央红军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人，其中福建子弟近三万人，到达陕北的只二千余人。大多数人在征战途中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牺牲生命的以千万计。

解放战争中，在前线作战的是人民子弟兵，在后方支援的也是人民群众。平津战役解放军百万大军，靠的是河北平原上十万辆大车车轮滚滚昼夜不息送军粮。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多，也是全靠人民群众的支援。陈毅说过：我们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人民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革命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在三座大山压迫下遭受的苦难，真正当家作主人，发展自己的国家，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且不断地得到提高。一方面，由于战斗的岁月中与人民结成的深厚情谊；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深刻认识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作为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最最关心的是人民群众。

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人民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领导的，共产党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和人民形成了血肉联系，在胜利后，决不能和人民群众隔离。

解放初期的北京，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还不可能很快恢复。市面还很萧条，一到夜里街上便灯火昏暗。一天晚上，陈云打电话给周恩来说：“王府井的霓虹灯亮了！”霓虹灯亮了！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周恩来很高兴，马上招呼身边工作人员：“走，到王府井百货公司去看看。”可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商店的人员正在忙着打烊，把顾客向外撵。一打听，说是中央领导要来，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周恩来听了非常生气，立刻就批评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是不是你们通知了警卫局，才这么办的？这种作法要不得。过去在战争中，在白色恐怖的敌人统治区，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什么都不怕，人民和我们一起打垮了蒋介石。今天，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解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怎么倒反而同群众隔离呢？要知道，我们的干部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是在人民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镬死！”

1955年夏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颐和园的长廊里漫步，事先没有作什么布置，游人很多。周恩来作为游人的一员，谈笑风生，异常兴奋。突然，他停住脚步，指着前面绕开长廊走的人们问随行人员：“怎么回事？你们又来

人了，干涉群众。群众走群众的，我们走我们的，你们要相信群众。”

随行人员赶紧跑到前面，通知在那里做警卫工作的人员不要干涉游人自由行走。从长廊迎面走过来的群众热情地向周恩来打招呼，周恩来也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致意。

周恩来的一条修养要则是：“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作为总理，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周恩来总理的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国家的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两者的关系必须摆正确。周恩来说：“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两者的正确关系。

周恩来认为，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常常容易发生矛盾。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待遇提得过高过快，达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将影响建设的需要，这是违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是不对的；反过来说，对于职工的收入、福利待遇甚至职工的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不对的。如果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他们的生活不能够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买的物品不能够及时地供应，那么，人民群众就会有意见，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出来，经济建设也会受到影响。

周恩来说：“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所以，从宏观上说，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在保证建设不断发展、经济不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地、不断地得到提高。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这点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物质生活上，而且表现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所以，关心人民生活，周恩来认为也要从这两方面注意，既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这包括扫除文盲，发展教育事业，开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工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电视等事业，并且要开展体育运动，增进人民的身体健康。

周恩来认为在我们的国家建设中，要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看作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

作为总理，周恩来要在国家的重大建设事业上，从总体上和长远上，体现出对人民的关怀。同时，由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即便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也无不使得他关心。

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五十年代，北京市的群众反映公共交通十分拥挤，上下班很不方便。这一反映传到了周恩来的耳中。一天傍晚，周恩来走出了中南海的办公室，悄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43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30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44 页。

悄地在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前乘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然后又改乘电车，在整个北京市绕了半圈，以亲身体会公共交通的状况。车上是比较拥挤的，人很多，但是过了不久，乘客们还是发现了人丛中的周总理，他也在一起乘车。大家非常激动，全车都活跃起来了，人们纷纷给周总理让座。周恩来客气地请大家坐下，自己一路站着，亲切地同乘客们谈心，倾听大家的意见。事后，他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周恩来到重庆钢厂视察，看到工人抬钢板，劳动强度太大，就提出：人工抬钢板，又笨重，又危险，一定要想法机械化，注意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周恩来到洛阳，看到洛阳市工厂烟囱林立，黑烟滚滚，污染严重，就说：“你们洛阳自古就有栽种牡丹的传说，但是，像这样的‘黑色牡丹，可不行”。洛阳市政府很快注意了这个问题，减少烟尘污染，并且建立起了劳动人民的公园，园内栽种牡丹。周恩来是很早就提出了环境保护问题的。

上海的肇家浜路，过去是一个污水浜滩。三十年代周恩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对此印象很深，五十年代他到上海的时候，专门去察看了肇家浜路，登门串户同居民谈家常，摸摸他们床上的被褥潮不潮，问他们饮用水从哪里取来，小孩们嬉戏时会不会掉进污水里？

他出国访问的时候，看到有的国家城市的马路上有人行横道线，马路中间有行人安全岛，便于保护走路的人，回国后就推广这一办法。

周恩来的生活俭朴，一直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本色。他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革命博物馆曾经展出过周恩来的睡衣——整个后身的三分之二都打了补丁；原来的布料是条纹的，由于长期穿着和洗涤，已经磨损得几乎看不出来了。他穿着的中山装，看上去干净而挺括，实际却是织补又织补过的。衬衣也是这样，旧的旧，补的补。一双凉皮鞋，穿了二十多年，鞋底断了换个底又穿，就是不肯添一双新的。他住的地方——西花厅，是老式平房，有些梁柱已经虫蛀腐朽，外面的油漆也大部脱落，窗户裂着大缝，一到冬天就透冷风，要用报纸糊严实。地面铺的是旧建筑用的方砖，很潮湿。工作人员考虑到周恩来夜间工作，经常通宵达旦，时间长了容易得关节炎，多次想修整一下房子，周恩来执意不肯。

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提出要修建政府办公大楼。方案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批准，严肃他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十多年了，过去整天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的干部，已经成为各级各类的领导者，一些人高高在上，官僚主义滋长。另一方面，下一代也成长起来了，他们没有经过战争年代的艰苦，却分享着建国后的尊荣，怎样教育好他们，使他们接好革命前辈的班，这，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63年，周恩来一再他讲要《反对官僚主义》，一再他讲要《过好“五关”》。

周恩来说，我们有的同志“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供应越多越好，离开人民群众却是越来越远。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自己图享受，怕艰苦，搞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的公愤的。如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

他说，干部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

活关。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人民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他十分强调对下一代的教育，说：“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 407 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萧华回忆说：“有时，总理听到某个高级干部的孩子搞特殊化，群众有意见，就严肃地提醒我们，不要放松对子女的管教，不能使他们特殊化，脱离群众。周总理不仅关心干部子女，更关心全国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他常讲：要教育好革命下一代，要向他们讲传统，讲红军艰苦奋斗的生活，讲爬雪山、过草地，讲延安精神，要他们继承和发扬先辈的这种精神，特别是部队，不能把老传统丢掉。”

有关叙述周恩来这些方面事迹的文章和书籍是很多的，它们都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关心人民生活，关心人民事业，一心一意想着人民的博大情怀。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26、427 页，407 人，指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院 73 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萧华：《忆周恩来同志对红军青年工作的关怀》。

三十一向现代科学进军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代就爱好自然科学。他说自己“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1917年以前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毕业同学录》上描述周恩来，是“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在他的中学作文中曾经论述过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分为几个时代：一是人工之时代，“十指所勤，毕生所经，本能所具有也”。二是役物之时代，“驾车有马，耕地有牛，司晨有鸡，守户有犬”。三是汽力之时代，用“汽力以代物力”。他说，现在，西欧英、德诸国，正在提倡“电力光力以代兴汽力者”。而在我国，“汽力之兴，仅见诸二三工厂”。年轻的周恩来叹息说：“此英美德日所以趋于强盛，而吾国所以日就于衰弱也。”

这时期的周恩来，研读过《天演论》等科学名著，还翻译过美国医学博士沃豪的著作《医学与中国之关系》。他的诗中就说过“邃密群科济世穷”。他给同学的赠言是：“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后来，周恩来到了欧洲，参加了共产党。这以后的二十多年，周恩来一直在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久久埋藏在周恩来心底的重视科学技术、以科学技术来改变我国落后和衰弱面貌的思想，又升起来了。

1949年五六月间，北平解放不久，周恩来在东单三条胡同的协和医学院礼堂，向在北平的部分科技人员作报告。周恩来勉励大家要为新社会服务。

这年7月，在北平举行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周恩来又到筹备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内容主要是号召科技界要联合起来，为今后发展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和科技事业共同奋斗。

建国之初，我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才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00多人。无论是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自己都不能造，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说，今天搞建设了，光是靠很高的政治觉悟就不够了，还必须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发展生产。

他说，“总起来说，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大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强调，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

在1956年1月周恩来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专门用了一章来谈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他说：“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

他说，现代科学的进步应用在工业生产上，正在使生产过程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生产出

周恩来：《试论奢靡二说》。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7页。

1953年9月29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页。

来，各种新的金属和合成材料也在生产出来。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而且电子学和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

周恩来说：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中心讲的是科学。此后，我国的科学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

这次会后，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有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参加，组织了钱学森、钱伟长、张光斗等 200 多科学家，研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列为第一项。周恩来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这年 4 月，还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初步设想。

1956 年，科学技术领域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这是我国科学事业开始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年。

这时期，周恩来极力争取我国滞留在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从美国回来的有二三百科学家，从其他国家回来的有四五百科学家。钱学森、王淦昌、汪德昭等大约五十名博士的回国，加上在国内的老科学家，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回国，周恩来是费了不少心血的。这里说说钱学森回国的事例：

钱学森 1934 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1935 年赴美留学，1939 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他成为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的助手。1944 年美国陆军委托冯·卡门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去。1946 年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1947 年任教授。1948 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1949 年，中共党员曹日昌教授写信给他，谈了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深情。他还看到周培源写给林家翘的信得知北平解放的良好状况。1950 年 7 月，钱学森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不再返美。但正要出发的时候，他被拘留了起来，后来虽被保释，但处处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一直滞留了五年。1955 年 6 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避开了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的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是国内上层的民主人士，他收到信后，立即送给了周恩来。这时已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在 1955 年 8 月 1 日开始，周恩来就授意中方王炳南大使，依据钱学森的这封信，同美方交涉，最后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8 月 5 日，美国政府通知钱学森可以回国。在乘坐美国邮船的归途中，钱学森是被当作犯人看待的。

周恩来深深为钱学森的归来而高兴。王炳南说：

“五十年代末，周总理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这样的事，又何止钱学森一人。汪德昭回忆：1956年底，我响应周总理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李克农同志请我们吃饭，他告诉我总理亲自干预了我回国的问题。李克农说，在我回国的问题上中调部与科学院有矛盾，中调部主张我留在国外，科学院主张我回来。这件事惊动了总理，同意我回来。李克农听说是总理的意见，就坚决照办了。我回国后在政协会上见到了总理，他就拉着我的手谈起来。

钱三强 1937年到巴黎，在著名科学家居里的实验室工作，1940年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又担任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他在法国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就听到不少关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勤工俭学时从事拯救危难中国的事迹。他在法国参加过刘宁一等领导的一些斗争。1948年回国，不久北平解放，他在北京饭店听过周恩来的一次形势报告。周恩来手中不拿片纸，而所举的各项数据准确无误，他精力充沛，襟怀坦诚，语言亲切而中肯，侃侃而谈，三四个钟头，始终紧紧地吸引住全场听众。钱三强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报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接着，又一件事情，使钱三强激动不已：

“1949年2月底，当时住在北京饭店的丁瓚同志电话通知我，党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郭沫若，团员包括各方面人士40余人，他和我也在团员之列，要我协助办理出国事务。”

“我那时回国半年多，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备建立实验室，但物质上困难很大，很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我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我把这个想法向丁瓚谈了，但又有些后悔，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还很困难，要拿出外汇购置仪器图书实非易事。丁说他可以反映一下我的要求。不料几天过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在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约我会面，他对我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定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预算20万美元的数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刚解放，国家经济还需要恢复，因此这次预备先在代表团带的费用中支付5万美元，以后再陆续支付。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代表团副团长是刘宁一同志，你过去很熟悉，这次需要支付款项时和他商量办理即可’。听到这个传达，当时真是心里暖乎乎的，有这样为民族、为事业着想的党和领导，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定会大有希望，后来知道，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统治下，要给科学事业拨款是何等地困难，这在老一辈科学家心中是深有体会的，中国共产党来了，情形就根本不同了，解放全国的炮声还在南方大地上隆隆震响，对发展科学事业就已经放在了心上。科学家心中充满希望是自然的。

钱三强说：“建国伊始，周恩来就十分重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

薄一波曾经讲过我国在周恩来的部署、关怀、主持下，科技工作取得很多成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总理的直接部署、关怀、主持和聂荣臻同志的具体组织下，由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等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这个期间的科技工作成果累累。重要的有：在陆相地层中找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打破了‘中国贫油论’。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弹，打破了美、苏核垄

断。与此同时，第一次在世界上人工合成蛋白质——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胰岛素；弄清了第一个核糖核酸的结构，为人工合成酸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余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于1959年9月试制成功；创造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排除了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的一道难题，也为这种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了可能。此外，在农业科学方面，系统研究了东亚蝗虫生活史，基本消灭了严重危害农作物的蝗灾；最早培育了矮秆水稻，为后来水稻的大幅度增产做出了贡献。在医学方面，成功地解决了烧伤总面积达98%、其中三度烧伤为90%的病员的治疗问题”。

周恩来极为重视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

1952年夏天，在编写《五年军事建设计划》的纲要时，曾经考虑过我国要不要研究试制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等尖端武器技术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政治战略问题，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技术，人家就瞧不起你。但是，如何搞法，何时上马？还须仔细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为此，周恩来曾专门写信给竺可桢，介绍他的军事秘书去征求竺的意见。竺可桢谈了研究试制这些尖端武器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要有专家人才，而且要成龙配套，集中研究，现在国内已有一些人才如钱三强等，但人还比较分散，我国在国外也有许多专家，须力争他们回国，形成队伍，二是要进口一些尖端的资料设备，是否能争取到苏联的援助。三是要花大钱，搞尖端武器技术比常规武器技术要贵很多，动一动都要以亿元来计数。秘书向周恩来汇报了竺可桢的谈话后，周恩来认为：这是内行话。为了加快这一战略措施，周恩来除采纳了竺的一些意见，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外，还曾经向苏联方面进行试探，请求苏联方面援助。但是，苏联方面认为中国不具备条件，对于提供原子弹、导弹尖端武器技术资料及专家的问题根本不谈。因此，这件事就暂时没有上马。

1955年，这项工作又提上了日程。这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刘杰找去，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情况，包括人员、设备、资源，还详细了解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需要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

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我国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了，经国务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李毅、赵忠尧、郑林、

王淦昌、彭桓武、罗启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长。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初步形成了。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他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原子弹、导弹、遥测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

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鼓励他写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步骤，开列了可以调来做高级技术工作的21人名单。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从此，钱学森开始了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历程。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

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口，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

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对什么是重点，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技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为了加强理论研究，周恩来指示加了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当时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它们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说：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要发扬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他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他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周恩来、聂荣臻把它用到科技攻关中来了。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周恩来的思想是：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当然，中间也会有跳跃。

到1962年，全国科研机构已经发展到1300多个，有各类研究人员94000多人，还不包括国防方面的。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大批工程停工，不少工厂企业下马，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支持聂荣臻等的决心，毛泽东也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从此以后，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的研制、试验，一直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首先是方针明确。

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方针，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方针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究竟是先搞原子弹、氢弹呢，还是先搞导弹？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方针。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

1961年8月12日，在国防工委会议上的讲话。

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荣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筒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精神为之大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对我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攻克尖端科学技术之关。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要知道做到这一步，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试验中也出过事故。

1971年12月30日，我国在西北某地进行投掷第一颗实战氢弹的试验。试验没有成功。

飞行员杨国祥驾驶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然而投掷装置无动作。采取超应急措施，第三次投掷仍没有成功。

飞机在空中盘旋，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突然爆炸，不但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浓眉颤抖，保护科技人员要紧。他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呢？杨国祥坚定地说：“我要带弹返航”。

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终于，杨国祥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惊人的寂静中，在某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事故原因找到了，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1972年1月7日，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在白玉般的天地间，杨国祥又驾机起飞了，到了沙漠上空，塔台发出命令。杨国祥一按开关。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惊天动地一声巨响，飞机一个大回旋，硕大的蘑菇红云升起。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成功了。

这时候，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初期，批斗之风席卷了大陆。一天，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周恩来震惊得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他震怒了，写下了一批科学家的名单，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这批科学家中，不少人后来对我国的尖端科技又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屠守锷，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火箭的总设计师，1971年9月10日，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又如梁守槃，后来研制出了中国的“飞鱼”导弹，性能大大优于法国的。1984年的天安门阅兵式上出现这种导弹时，曾使得外国人大大惊讶。

“文革”中，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弹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把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下令把发射基地迁到陕西西安、渭南、商洛一带，把正在建设的新疆反导弹靶场搬迁到云南。周恩来指示，仍放在原来的地区不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

对于原子弹，周恩来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在本国国土上试验，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要“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人为的误差坚决消灭掉。”先进行了“冷”试验，证明导弹安全自毁系统和弹头引爆性能装置性能可靠，再进行“热”试测试检查。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中国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

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从1964年到1966年，发射基地先后完成了空空“霹雳1号”导弹的定型试验和“霹雳2号”导弹的初期试验；完成了“红旗1号”、“红旗2号”导弹研制性试验和定型试验。周恩来亲自视察了导弹发射基地，参观了地地导弹发射阵地和地空导弹实弹发射。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侵入我国领空的、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在1965年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十三次会议上，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争取在1970年左右制成。我国建造核潜艇，周恩来和贺龙、聂荣臻等在1958年就在考虑。这年中央作了决定，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暂停了。到1965年8月召开第十三次中央专委会时，在周恩来主持下，批准恢复制造核潜艇。

为了研制这些尖端项目，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安排下，冶金部密切配合，提供了高水平的新型材料。上述这些成果，也为后来试制洲际导弹、发射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聂荣臻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并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一个核电站的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在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三十二雪里丹心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状况日益见好，可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起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作家曹禹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写道：“尽道人间春色满，岂忘雪里寸心丹。”

这是1981年写的，当时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乾坤扭转，呈现出满园春色。但是、谁能忘记，不久前的十年，国家和人民如同陷入浩劫之中，如同埋入雪坑之中，周恩来一片丹心，拯国家民族于水火。

九十年代的今天，回想“文革”那疯狂的年代，很多事情简直可笑，但更沉重的却是后怕。正如有的同志所说：“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细想一下，那时没有周恩来的全力支撑，在那样的大动乱中，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最高权力，很有可能被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丑类所夺取。如果出现那样情况，自然就会亡党亡国亡头。到那时，党将彻底变质，国家将四分五裂，军队可能各立山头，战火四起，经济破产，人民陷入痛苦深渊，这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帝国主义将会乘虚而入，历史将大倒退，人民受大灾难，想到这，人们自然地想起了周恩来，周恩来如同鲁迅所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以他为首的健康力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的人民和干部，维护了党和国家的生存。

当时，广大的共产党员、人民群众、友好人士，坚持着，大家心中想的是：只要周恩来等中流砥柱还在，中国共产党就还有希望，中国就还有希望。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之中。

“文革”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人来批判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青、张春桥等商定对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稿子后征求修改意见时，江青特意交代，“不叫周恩来看。”一次，周恩来看到了刊载着对这一稿子的讨论情况的《文汇报》。张春桥十分惊慌，马上命令不用《文汇报》，改出不编号的《记者简报》，每期只限印十二份，直送张春桥控制分发，以便继续向周恩来等“保密”。

《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文章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登后，《人民日报》受到压力，在11月30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了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是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按照学术问题的对待办法，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进行讨论。

在这同时，林彪在部队中挑起了对罗瑞卿的诬陷和批判。罗瑞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是推荐人之一。罗瑞卿就任后，不愿放弃原则追随林彪，因而遭到林彪的打击。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叶群带了他的亲笔信和他们授意吴法宪等写的假证明，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主要是说罗瑞卿要从林彪手中夺取军权和反对“突出政治”，说罗瑞卿让刘亚楼转告叶群要林彪“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一切交给罗去管”。周恩来、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得知后，认为刘亚楼已经逝世，这些情况死无对证，不足凭信。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也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

1966年的春天，我国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北方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基层推动抗旱。3月，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抖，他就赶到了灾区。当他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时，突然又发生了五级地震，房屋剧烈摇晃，墙上的泥土沙沙地往下掉。大家关切他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他在这里工作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去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慰问受灾群众。从灾区回来后，他又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

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是后来参加的。这次会上，林彪已经表现得很嚣张。他坐在中间。刘少奇、周恩来反而坐在两旁。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

这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所谓的“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党委。周恩来等批评了这张大字报。后来，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皇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派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保护了广大的参加工作组的干部，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是“我们没有很好地交代，也没有召集他们开会”。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删掉了原来稿子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进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部队要有区别，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学家、技术人员；等等。

直到1966年12月，周恩来还在指示新华社：文字上不要用“黑帮”、“黑线”的提法。

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企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稳定局势，但是要做到这一条是十分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他们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一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疆之

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情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要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他不断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向他们宣传、解释党的历史、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四十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谈话就更多了，估计不下一百次。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此外，他还要频繁地同中央机关的和外地来的群众组织代表谈话。仅七机部的群众组织代表，据统计，从1966年到1969年九大前就谈了几十次之多。

周恩来竭尽全力引导一般干部和青少年们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谈了一批又一批，日日夜夜。

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专家王年一说：“‘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光怪陆离，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中央常委中第一个在公众场合否定错误做法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作这样的否定最多的，都是周恩来。”

当时，“中央文革”认为十七年来这也是“黑线”，那也是“黑帮专政”，主张都要“大乱”。对此，周恩来从来不赞成，他反对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例如：有些人拼命攻击“科学十四条”。周恩来强调说，“科学十四条”是“红线”，“红线”在科研战线占主导地位。批驳了这些人的谬论。

他在接见全国工艺美术界群众组织时讲：全国解放后，在工艺美术战线上，在显示新中国的新气象方面是有成绩的。应该看到，工艺美术在为国内人民服务、在为世界人民服务上是有成绩的。我们不能把任何事业部看成是一条黑线统治着。

他指出北京市十七年来基本上还是好的，反对看成漆黑一团。

他说：“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他在红卫兵大会上讲，建国以来的十七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

他谆谆告诫红卫兵：“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他告诉人们，不可再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说：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

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250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王年一：《周恩来1966年8—12月的一些言论》。

1966年9月13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9月15日，在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不算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要打倒。

他反对搜查、抄家、抓人、戴高帽、静坐这类行为。一次，在一个批斗会上，一个林彪死党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江青称赞这人是“造反派”。周恩来当即严肃地说：又不是三岁小孩，不能这样干嘛！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发出。其中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是当时稳定局面，保护十七年建设成果的重要举措。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革”初期的破坏性影响，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

这些文件，是报毛泽东同意以后发出的。周恩来经常运用毛泽东想法中的正确方面，加以发挥，用来抵制林彪和“中央文革”搞乱一切的图谋。一般说，他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当然，也有不支持的。例如，从8月18日开始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来京的红卫兵，到第三次接见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已经见了好几百万了，火车、吃饭、住宿一切都免费，再来就困难了。毛泽东说，现在才是开始，我要接见成千万，后来，一直接见八次，约1300多万人次。这么多人的吃、住、往、返、接见、谈话这一整套组织、接待、宣传、教育工作，都要周恩来来操办。

8月下旬，周恩来、陶铸商定，起草了一个保护要害部门和党与国家机密的文件，包括军事领导机关、公安、外事、电台、新华社、电讯局、档案部门、航空场站、铁路枢纽、港务局、码头、电站、尖端企业和部门、银行、仓库、重要的公用事业等。周恩来提议照发，江青看了后非常恼火，送毛泽东阅后批“此件不发”。

9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文中要求红卫兵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组织纪律性，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机密不致外泄，档案不致遗失，财产不受损失”，“保证国家专政工具正常行使职能”，“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这个文稿，被“中央文革”康生等人否定了。

9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军委总参、总政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也在这时，毛泽东后发出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总政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

10月1日，林彪在讲话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这月，毛泽东说犯了所谓“路线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找毛泽东谈，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

样的提法，毛泽东做了解释，这一提法没有改变。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说了“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是十分恼火的，江青在“文革小组”内，把周恩来比作三国时蜀国主张投降晋国的谯周、说“樵周是老臣”。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周恩来在10月3日的红卫兵会上说，“我不是和稀泥。”

他是根据党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办事的。

林彪、江青一伙一再鼓吹什么群众“真正发动起来”。这样的话，周恩来从来不讲。

周恩来并不因为受到他们的攻击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还说，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

周恩来极力治“乱”，这个期间他坚持两条：一、不准跨行业串连；二、不准停止生产。但是这两条，在11月间被张春桥破坏了。

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三十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违反中央有关规定，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实际上承认了他们的跨行业组织和停止生产闹“革命”。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他同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是隐蔽的，结果也并不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停止。11月中，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冲进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中央文革”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够实现。林彪说：生产影响一点也不怕，中心搞“革命”，12月搞了个中央“十条规定”，允许学生到厂矿串连和厂际间串连；又发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乱的形势更加发展了。

三十三更艰难的岁月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张春桥、姚文元急急忙忙赶到上海，接见“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等，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6日，在他们的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上海夺权事情发生后，8日晚，“中央文革”起草了以中央名义向上海的贺信。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的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支持或者策动下，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967年开始，周恩来本来仍在致力于局势的稳定。“中央文革”搞乱全国的方法之一是串连，操纵北京一些学校派学生和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推动“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从而又形成全国性的互相串连，纷纷来到北京。1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上讲：“希望你们在今天会见以后，早早回到各地去。”就在这一天，他还在讲：“中央的精神是一般不轻易罢官”，即便有的领导人有错误，也“应当给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继续在运动中接受考验”。张春桥、姚文元等在上海鼓动夺权，事先周恩来并不知道，事后周恩来仍然申言他的主张。在1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提出：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走资派”、“犯严重错误的”是极少数，“犯个别的一般性错误的是极大多数”，因而“撤职查办要少，撤职查办的，也要叫他们工作，不要扫大街去”。这意见，毛泽东接受了。但后来在又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对关于夺权的事说：不要分走资派与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了，夺过来再说。实际上否定了上一次的意见。

关于串连，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草拟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周恩来把这个《通知》的稿子报毛泽东，并特地说明“此稿已经我和富春、陈毅、先念、震林、荣臻、富治等同志商议过”。对于这么多老战友的意见，毛泽东这时仍是尊重的，同意发出《通知》。3月19日，周恩来又把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并亲笔加上“这个通知可在城市、农村和部队中张贴”。这对于串连形成的混乱，有所缓解。

这时，在全国性的串连中，已开始形成一种趋势，就是建立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如“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等。对此，周恩来采取了否定的态度。1月中旬他在接见省和中央部门的群众组织时都讲：“我们不赞成现在马上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从来没有承认”。当时，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为非作歹的组织如“全国工农兵红色造反夺权总部”、“中国工农红旗军”等，在刚刚建立的时候就被瓦解，从而制止了全国性政治力量的出现，保证了党在全国的统一领导。

1月上旬上海夺权后，各省市“造反”组织也纷纷夺权，各地党政机构都瘫痪了，这方面形势更乱。这时期毛泽东在党中央常委会上说过一句话：“各省的夺权”要国务院批准”。有了这句话，周恩来就同副总理们分工管理

全国各省，严格把关，尽管“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夺权，直到2月中旬，被夺权得到承认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仍只有五个省、市：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

党政机构瘫痪了，夺了权的不承认，周恩来依靠什么力量呢？他在毛泽东同意和军委副主席、秘书长叶剑英的密切配合下，采取了军管的办法。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同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广播电台实行军管。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及中央规定必须保护的单位实行军管，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军队接管民用航空系统。

到2月中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军管的有10个。全国有6900多个单位实行军管，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共用了三十二个团的兵力。国家的要害、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中央、国务院的手中。

2月中，周恩来在接见一些群众组织代表时宣称：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也影响到军队院校、解放军报、总部机关、各军兵种和大军区、省军区。各地“造反派”无法无天，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也乱起来了。

周恩来在1966年11月就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1967年1月24日，徐向前到林彪驻地，还请来了叶剑英、聂荣臻，拟定了稳定军队的七条。后来，周恩来也参加了，整理成“军委八条命令”。周恩来亲笔加上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签署，报毛泽东后发出。“命令”规定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冲击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2月3日，周恩来把这个文件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发下去，指出除第七条专讲军队的外，“都适用于地方”，并且加了一些内容，如在“保密系统”的下面加上“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等，着重保护住要害单位和部门。

接着，就发生了一二月间党内领导层的很多老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抗争的所谓“二月逆流”。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稳定军队、要不要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徐向前说：“那时，地方上的混乱程度比军队要甚。‘造反派’全面夺权、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国务院系统受到猛烈冲击，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老同志不约而同，憋着一肚子气，忧党忧国忧民嘛！”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会上，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围绕着军队要不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争论起来。江青等认为军队也要搞“四大”，徐向前等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地方已乱成这样，军队战备任务很重，不能再搞乱。争论没有结果。

2月13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和主持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又展开争论。16日，再次开会，斗争达到白热化。

会场上，周恩来坐在桌子横头主持会议。一边坐着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十分鲜明。

斗争是从谭震林因上海要打倒陈丕显和汛期渔船停产闹革命而对张春桥、姚文元责问开始的。

当时，毛泽东曾指示要把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却被当地无理扣押着。谭震林在会场门口碰见张春桥，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张答：“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当张春桥借口“群众”来刁难时，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他站起来，拿着皮包要走，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会上，李先念说到，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作法是从《红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开始的。

周恩来当即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这次会是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健康力量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指责。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他同老同志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对他们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等意见是支持和赞同的。

这从他后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来。

这次会议的第二天，17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了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叫党委靠边站，要保护老干部，他们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无休止地斗争，揪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子、“喷气式”等。16、18日在接见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和国务院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现在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直到这年7月，他同鞍钢来人谈话，当他听到对方讲群众自发如何如何，他们回去尽量做工作时，周恩来还说：一个“尽量”，一个“自发”，我听了就不高兴，我们还是有组织的。

2月16日下午会议结束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给江青，然后报毛泽东。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在会上提意见的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也攻击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当面对毛泽东作了规劝，并自己承担了责任。毛泽东的气才逐渐消了。经周恩来的努力，毛泽东的同意，到4月下旬，又让这些同志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了。五一节，也让他们上了天安门。尽管林彪、江青一伙在

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对这些同志又加攻击，终不能把他们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到后来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在钓鱼台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诽谤周恩来。然后，又攻击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根子”。

周恩来岿然不动。3月21日，他仍然在一个文件上加上：“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严肃地说：“不通。”他在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演出。周恩来和军委总政治部希望“两派同台演出”，团结起来。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流血事件。这时，“中央文革”掀起了反对周恩来的新高潮。5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六七月间，“中央文革”一伙多次在会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在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用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

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恩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林彪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极点。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接着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损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声誉。

周恩来说：一方面火烧英代办处，另一方面搞外交部，再是搞外办，“四天外交部没有人管”，“已经四天了，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变成犯罪了”。

必须对“中央文革”采取措施，特别是对在北京上窜下跳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要采取措施。当然，这最后是要毛泽东决定的。

毛泽东这时在上海。周恩来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稿和其他有关这三人的材料，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了王力的讲话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临行前，又问毛泽东还有没有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毛泽东说：是这样。

杨成武乘坐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见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这个决

定。周恩来立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几个月后，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

周恩来对这件事是看得很深很透的，后来他讲到过，王力“实际上要姚登山当外交部长，有人说他自己想当总理，也许想当副总理，还有比他大的人想当总理”。

这一次，除去了“中央文革”一直在北京制造中央部门和全国的动乱的干将。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

周恩来采取了严厉的措施。8月29日，昆明的“造反派”包围兵工厂，要实行“文攻武卫”。搬武器。周恩来亲笔批示：“如劝说无效。即抓其头头。”

9月初，周恩来要杨成武约在北京的大军区领导起草命令，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亲自主持文革小组碰头会通过，连夜同在京的大军区、省军区和三军两总部的同志复议。又亲自作了修改，然后报毛泽东于5日发出。

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等错误作法。他针对要发动“第三次大串连”的论调。说“我听了非常诧异”，“中央没有这个决定，也没有这个估计”，“所有外出串连的都要撤回本单位、本地、撤消在外单位，外地的联络站”。

9月13日，又制定了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各种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必须立即严加制止。”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

周恩来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指出要反对武斗，制止武斗。

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夺金库就开枪。”

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七八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

……

经过艰苦而又耐心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三十四尽心竭智护英华（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靠的是一大批忠心耿耿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干部。林彪、“四人帮”一伙要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就要打掉这一大批干部。中国后来要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也得靠这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这是当时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领导人岗位，他尽心竭智，保护一切他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于领导干部，“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他“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了毛泽东的“想整一下”，打倒大批干部，往死里“整”，以便篡党夺权。周恩来则用了毛泽东的不想都整倒，极力缩小打击面，并让受到打击的干部重新站立起来，尽力保护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护干部的事迹，可谓感天地，位鬼神。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面主张要说理，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一面感到来势不大对，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没有能够实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就要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把罗瑞卿“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总医院，妥加保护。吴法宪马上密报给叶群。叶群说：“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代。”吴法宪就向周恩来打诨语，拖时间。后来罗瑞卿只好被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的组织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绝不能让抓人。”当罗瑞卿被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了回来。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师们的保护，是众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关怀备至。1967年1月，在江青的指使下，戚本禹鼓动一些“造反派”攻击朱德，一时间，大街上出现了不少反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有的还贴出海报要召开万人大会批朱。周恩未知道后，征得毛泽东同意，在大会的前一天就叫秘书通知戚本禹，取消“批判朱德大会”。大会没有开成。

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五十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二十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要正确地对待陈毅。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师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确定1967年1月5日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陈毅、叶剑英到会作检讨。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说：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指出，不能开这个批判大会，如果开的话，老师们不能参加。他连续两个晚上接见这些组织的代表，对他们说：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副主席，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

这时全国已经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之风，各大军区、军兵种的负责人遭揪斗，电报，电话纷纷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告急。叶帅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要他们采取紧急措施保护老干部。1月19日，江青要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叶帅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所谓的反击“二月逆流”开始以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是陪斗。

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的材料。9月8日，林彪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是土匪”。接着，江青就在会上诬陷贺龙是“坏人”，是“大刽子手”，“要把贺龙端出来”。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万寿路新六所。后来，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周恩来让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不安全了，周恩来又安排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他不断派人嘱咐国家体委“造反派”，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贺龙的夫人薛明有一段感人肺腑的叙述：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总理对贺总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里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龙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总理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部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扒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在外边开回来。我们看到，总理每次回来，下汽车时，好困难啊！腿沉得抬不动，每逢下车时，都有个同志上前扶总理下来。总理太疲惫了！太辛苦了！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车轮战，搞热攻，让总理一天到晚无休止地工作，不让总理休息。总理回来后，睡一觉，还有好多问题要处理，下午三四点钟就又走了。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里很不安。他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心里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中午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吧。”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向服务员招手，示意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停了一会，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总：“你看过报纸了吧？”贺总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有清静的时间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中南海里也分成了两派。1967年1月19日，总理和李富春同志一起找贺总谈话。总理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你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总和我虽然并不了解总理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总理的处境太难了。谈话结束后，总理紧紧握着贺总的手，难舍难分。贺总含着眼泪激动他说：“你教育了我们两代人。”总理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序，总理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

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总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总理最后诀别！

1967年1月20日凌晨三点钟，我和贺总离开了西花厅，由杨德中和贺总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2月18日后，开始了批所谓“二月逆流”，周恩来也被列入“犯错误”的行列，但他仍极力保护贺龙。18日，他要秘书告诉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词拒绝，这一天，周恩来继续要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转移走了，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后，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经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同她失散五年的孩子们团聚。

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到北京的。四川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三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们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通报了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作布置。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师，周恩来也倍加关切。在“文化大革命”极度混乱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在夜深人静之际，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师住的地方，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并通报给了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师住地。周恩来专门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师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师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请示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他们还是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就布置了老师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师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周恩来保护老师、稳定军队的措施，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当时，中国的存在，就靠军队这个支柱了。林彪对其他老师十分忌刻，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由不同的方面军、根据地发展而来的，对这些历史和人物，周恩来心底是清清楚楚的。中国的未来靠健康力量的存在，首先必须保护好军队，又首先要保护好他们的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

1966年3月中旬，周恩来来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期间毛泽东因为沪剧《芦荡火种》（后来改编为《沙家洪》）拟到北京演出没有

成功，说彭真搞独立王国。毛泽东问周恩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周恩来答：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毛泽东又问邓小平，邓小平也作了同样的回答。这年12月，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把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抓走。江青得意他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周恩来得知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1967年4月20日，周恩来参加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别人为他准备的讲话稿上多次点了彭真等的名，周恩来把凡是点名的地方都删掉了。

当北京的“造反派”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让他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去广州揪薄一波，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照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薄一波到北京后受到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事件”时，周恩来亲自写电报发给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地关心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开到5日，开5天。到8月4日，突然决定会期延长了，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即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身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又提出要揪上光美去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工作人员，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企图用谎言把王光美诬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受骗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的“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一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周恩来独撑危局，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

他坚定他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他的健康考虑，劝他暂时离开中南海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以便工作，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这人。后来，他诚挚地对这人：“同志呀，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周恩来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作了自己能够作到的一切。

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作出错误的“开除”处理之前，那天晚上，周恩来一夜未眠，在屋里踱步焦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说：“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后来，1970年周恩来同埃德加·斯诺谈话中，仍你呼为“刘少奇同志”。斯诺说：“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韩素音说：“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处境中，周恩来苦心保护大批科学技术专家。1966年8月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就力争要写上保护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他多次亲自出面保护科学家。例如1969年8月，周恩来对七机部的军管领导人杨国宇说：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杨国宇就拿了个“令箭”，开列了一张需要有卫兵保护的专家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扩大到几百人，呈报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就批准了，表扬了这种作法，还说“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当周恩来得知数学家华罗庚受冲击时，立即指示有关负责人：“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正是由于周恩来、聂荣臻等的维护，尽管“文化大革命”搅得全社会动荡混乱万分，但是我国科技界和科学家们，仍然捷报频传，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

三十四 尽心竭智护英华（二）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文化界人士受冲击特别大，周恩来保护他们费的心血也特别多，陈荒煤编的《周恩来与艺术家们》这本书中有很多记载，这里只说一下夏衍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夏衍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已经被扣上了“反对写工农兵”的“题材广阔论”的帽子，被康生等在社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一次，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说：“我也曾经说过题材广阔的问题，也欢迎你指教。”康生连说：“不敢，不敢。”后来，夏衍被调出文化部，安排到对外友协“闭门思过”。1966年初，在一次会见印度尼西亚电影代表团时，周恩来安排夏衍参加了。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登出了接见时的照片，毛泽东、周恩来、夏衍及江青一起同外宾合影。江青看到后忿忿他说：“真不像话，这个时候了还让他出来亮相，不是白批了吗！”为了避免招来江青、康生等更大忌恨，周恩来要人转告夏衍：安心在家养病，如身体许可，可到下边去看看，但是“南方不要去”。这是告诉他要避开上海这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12月夏衍被江青、康生一伙秘密逮捕。周恩来叫秘书向有关部门查问，都说不知道。夏衍是谢富治手下的公检法“造反派”会同文艺界的红卫兵抓走的，受到酷刑拷打，腿被打断。他通过一位好心的医生带情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要谢富治放人，谢富治说这是江青、康生搞的，他管不了。一天，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江青说：“夏衍被打断了腿，应让他先回家治疗。”江青说：“运动方兴未艾，都把他们放了，我们还批判什么。”此后，江青伙同谢富治给夏衍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经林彪表态，关到秦城监狱，一关关了八年多。这中间，周恩来几次提出要释放夏衍等一大批同志，都因江青、康生阻挠而未果。直到1975年冬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夏衍才被假释回家。廖承志来看夏衍，带来了周恩来对他的慰问，后来又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夏衍的情况，周恩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好！只要人还在，就好……”

仔细体会这句话，周恩来是队长远着眼的。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民主人士的事例，写不胜写。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尊重未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红卫兵”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指示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

荣毅仁说：“‘文革’中，是总理保护了我们，否则，我们早就完了。”

班禅也说过同样的话。

很多人都说过。

周恩来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实际上保护的有几百位党内外领导人。这名单和有些保护干部的文电，《周恩来选集》下卷已经披露了。红卫兵有一次到了张泊中的家，但没有动手抄家。周恩来知道后，一方面向这些青少年红卫兵讲历史，说张治中是党的朋友，曾经三到延安；一方面指示卫戍区调了一个排守在张家周围，后来几次红卫兵来，都被挡了回去。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放过，周恩来就叫周荣鑫把张治中护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周恩来还指示301医院接纳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入院，也是采取的这种保护方法。有的人不愿离家到医

院，他就派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身穿便服，臂 441 带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阻挡前来抄家的红卫兵。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等都是受到这种保护的。对宋庆龄、何香凝，周恩来更是加强了保护措施。

即便不是名单上的，许多人也受到了关怀和保护。钱昌照说，在他家所在的居委会范围内还有蔡廷锴、熊克武、李书诚三家。1968 年的一天，公安局的同志对他讲：“总理交待我们，这四家人不允许红卫兵闯进去。白天我们还好办，每天晚上就特别担心，只好扮成便衣整夜巡逻。”钱昌照这才明白为什么当时红卫兵没有进过他们这四家。

这里，介绍四位并非领导昔的原国民党将军的遭际，他们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唐生明，同住在北京前厂胡同×号。“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就被扣发了工资。

9月6日那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上午10点多，沈醉拎着黑塑料提包快手快脚跨进了前厂胡同×号院。他按顺序先进了郑庭笈家，然后到杜幸明、唐生明家，最后进宋希濂家。由于“文革”之人越烧越旺，政协讥讽的干部群众对他们这些特赦人员（包括起义人士）也划清了“界限”，多数人不接触、不说话，少数人是冷眼相待或怒目而视，敢打招呼的（大半在私下无第三者时）当然也是少数。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除了饥寒找他们劳动或有事，都不愿出门，也不愿意到机关找没趣，甚至领工资的差事也请沈醉代劳。沈醉在年岁上是他们的小老弟，身体好，胆子大，历来乐于跑腿、串门、帮助人。老人哥们还没张口，沈醉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他说，冷言冷语由他一个人去应承，何必每个人都去机关惹麻烦呢。老大哥们知道沈醉的脾性，便没有推辞，全拜托于他了。这一天他一进宋希濂的屋子，便同刚刚进郑、杜、唐三家一样，劈头就说：

“二位哥嫂，有新鲜事奉告。”

“什么事？看你的模样像是报喜，不像是报忧。”宋希濂笑着说。

“是报喜。”沈醉坐下，接过宋希濂递给他的香烟，继续说：“今天一上班，我在财务科领工资。打开工资袋一看，仍然是原数，一分也没有扣。我问为什么。答曰接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补发。这上级又是谁呢？财务科不说，我也不便问。我一直在想，如今政协和统战部的领导都自顾不暇，还能过问我们的事？再说就是过问了，‘革命群众，听不听也是问题。’”

“你分析得有理。”宋希濂说，“现在这种情况，仍惦记着我们，说了话还算数的，不会是一般的上级。”

那么，谁在关心着他们呢？正当沈醉、宋希濂默默抽烟时，唐生明推门进来了，杜聿明和郑庭笈跟在唐的后边。他们都露出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唐生明十分激动而肯定他说：

“我刚才打电话询问了可靠人士，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前厂胡同×号院的主人们都沉默了。他们的内心在翻滚，眼眶很快潮湿……前厂胡同×号院这几位的境遇和心情，也是一大片民主人士、特赦人员的境遇和心情。正如杨伯涛所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政协机关中是专政对象，整天扫地、请罪，有些人还挨了打。总理知道后，让我们不要再上班了，并让机关发还了所扣工资，这对我们实际是一种保护措施。”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外人士也受到冲击。周恩来想了很多办法来保护他们，使他们摆脱困难，除了派警卫守护门户，护送到医院疗养外，还包括请他们参加各种纪念活动，第二天名字见于报纸，说明不应“打倒”。这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1966年在那样紧张的形势下，周恩来还领导筹备孙中

山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章士钊、邵力子等都参加了筹委会。大会有宋庆龄讲话。10月1日，新中国迎来第十七个生日，一大批高级民主人士仍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这些在当时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梁漱溟是共产党的一位党外朋友，他直言敢谏，且不论他所持的观点是否正确，他可算得是党的一位“诤友”。1970年他在全国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中，提意见说：“‘宪法’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当时，林彪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副统帅，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还要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梁漱溟竟敢提这样的意见，岂不是“大逆不道”？他自己也作了挨斗挨打甚至进监狱的准备。不料，几天之后，小组召集人却宣布说：上级认为，对这事“不必纠缠”。梁漱溟竟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一关。他心里捉摸：这“上级”是谁呢？一定是周总理办公室，就像“文比大革命”之初不扣发我们的工资一样。后来，事实说明正如同他想的那样。政协当时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周恩来不但关心民主人士，而且还泽及他们的家属。如覃振的女儿在南京二十三中教书，被“造反派”扣上“为亡父反动政客覃振翻案”的罪名批斗。周恩来知道后，就致电南京有关领导人说：“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使他的女儿渡过了难关。溥杰的妻子嵯峨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她说：“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立即对我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在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周总理的关怀拯救了我们一家。”

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包括一般的党员和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个惊涛骇浪中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人，周恩来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以保证他们的生活。这在当时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保护了一大批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干部，使他们不致生活无着，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初期协助周恩来管理经济工作的谷牧说：“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大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

周恩来灵活地运用一切机会保护干部。有时候，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一大批。有时候，他先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然后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举一个例，当年的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回忆道：

周恩来“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他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他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

不过更多的时候，周恩来是用说服教育来解决问题。这样，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要更多了。当时任警卫局领导的李树槐回忆起周恩来保护谭震林的一段往事：

1967年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讲，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三点把你们的负责人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人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三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张霖之的死就是这样。1966年底、1967年初，全国掀起了揪斗“走资派”的浪潮，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造反派”抓走，被打死了。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痛心，掉了泪，他在国务院会议上十分激昂他说：我是总理，你们（指“造反派”）把一个部长抓去47天就没有给我报告一下。他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下届党代会上人家问我，张霖之候补委员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回答呢？周恩来又问，还有哪个部长被抓？李先念讲了有关部长被抓的情况，周恩来说，赶快派联络员把他们接出来。接着就把吕东、陈正人、段君毅等几十位领导人接到国务院保护起来。当时在那里住过的，还有玉震、吕正操、钱正英、康世恩等。原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揪斗后整得很凶，周恩来也派人把他保护起来，但后来被戚本禹派人抓走了。

孙维世的死，也使周恩来十分伤心。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二十年代初在德国时和朱德一起经周恩来介绍参加共产党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抗战初，1938年，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在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和邓颖超惊喜地看到了他们。邓颖超说：“维世啊，你当我们的女儿吧。”孙维世亲热地叫了“爸爸”、“妈妈”。周恩来、邓颖超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她。后来，孙维世和孙泱都被送到延安学习。1939年周恩来坠马伤臂，去苏联治疗，孙维世随去苏联进了莫斯科戏剧学院，在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1946年回延安。建国后，她和著名话剧艺术家金山结婚，任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副院长，导演过《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江青一伙的迫害而死。周恩来深深地愤怒了，但怅望长天，只好把怒火埋在心间。

正如段君毅所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对干部的保护是尽了极大力量的，可是他说的话也常常算不了数呀。有时，周总理替挨整的干部说了话，‘造反派’反而对他保护的人斗得更加厉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

1967年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篡取

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这时幸而政治局常委会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还是国务院总理，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人，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不光是对人，而且也对物。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许多文化古迹和历史遗产。“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文化古迹幸亏有周恩来的关心才保护了下来。否则，更多的珍贵遗产将要遭受破坏，或者不复存在。

三十五 “生产绝不能停”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周恩来，是这样说的：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不能停，经济不能乱。

起初，“文化大革命”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1966年8月中旬从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开始影响工农业生产。

这时候，周恩来既要应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明枪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经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要进行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说，我们不能眼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项目被放在一边，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这时期，他一再地指出，抓革命要促生产。《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是反映了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的思想的，提出了要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这个思想当时在实际中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不少地方党委有了准备，到1967年周恩来再次强调时，较普遍地实现了。

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这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铁路中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因为大动脉不畅而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之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毛泽东后来也讲了“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把这作为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

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这同林彪、江青一伙借“文化大革命”来搞乱国家、打倒一切的图谋，是针锋相对的。

林彪、江青一伙是要搞乱经济战线的。

以大庆为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伯达就亲自写信，唆使北师大的一个“造反团”到大庆煽风点火，鼓吹“打倒一切”。一时之间，大庆领导班子十七名成员中，十六名被揪斗，十二名被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后关进了牛棚。劳动模范王进喜惨遭揪斗、毒打、游街。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被辱骂为“只知生产干活，不懂路线的老瞎牛”。大庆油田的生产失去正常的指挥，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知道这些消息后，心中非常焦急。1967年1月8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王进喜和全国石油系统的群众代表，讲：“为什么有人硬要反对大庆？为什么他们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为什么？”2月1日，他在接见工交战线群众代表时，激动他说，大庆最近很乱，甚至还有人反对王铁人，我恨着急，我一提起这件事就很激动，恨不得去看一看。

周恩来曾经三次去过大庆，一再说过“大庆的工作是成功的”，并且要人谱过《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大庆之歌：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
现在，大庆乱了。

为了保护大庆油田，周恩来决定继鞍钢之后，对大庆实行军管。

鞍钢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也很乱，周恩来原来准备请李富春去那里稳定局面的，但是“中央文革”提出来要派张春桥去鞍钢。张春桥一去，结果可想而知。周恩来就拖在那里，迟迟不派，后来实行了军管。

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11月13日，陈伯达提出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子，上面写着“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陈伯达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稿拿到正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在11月中旬召开的这个会上，这个文件稿子遭到来参加会的各地负

责人的激烈反对，大家支持周恩来的一贯主张，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化大革命”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听了后，立即围攻批判。说什么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同，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公然说谷牧，“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王力说什么工交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是几起几落，是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来压，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压。他们露骨地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6日，林彪作总结讲话，对谷牧的“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不得不作些暂时的“退却”，以保护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他一方面明确表示，这是“我让他们写的”；另一方面，他提出大家要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以便兢兢业业，毫不松懈地抓好生产。

会后，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矿企业的工人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达全国，这样，全国城乡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旧保持着六十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就开始逆转了。1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全国大乱。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28日，周恩来在宣布广东实行军管时，讲了“下面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3月10日在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区党委的电报中，周恩来亲笔写道：“军管会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后来，实行军管的省份，普遍设立了抓生产的班子。但是，由于整个来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1967、1968年，经济仍难以避免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

1967年7月初，周恩来在接见河南一个群众组织的代表们时沉痛他说：现在全国除了东北外整个铁路交通中断了，煤运不进来，许多工业用电停了，民用电也停了，整个生产生活都在受影响。

9月间，他又说，现在运输已降到最低水平，码头货物堆积如山，外国船只卸不了货，每天罚款，国家损失很大。像沈阳、西安这样的大工业城市，有很多援外项目，也停产、停电，我们想起来就难过。

11月下旬，他对黑龙江的某“造反派”代表说：你们东北是最冷的地方，

但现在最好的煤矿日产量还不到过去一半。东北离开煤怎么行？他严词斥责几派之间的打“内战”。

周恩来极少讲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他用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1967年5月，周恩来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明了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杨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在周恩来修改的《关于确保援越抗美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命令》中，提出了对一切破坏运输、装卸的行为，作为反革命行为看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到了1968年7月，这种行为还有发生，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就发布了“七三”、“七二四”布告，把这作为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对待，采取了“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的断然措施，打击了这些“造反派”组织。同时指出，在处理这类事件时，要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还指出了要“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革命秩序”。

1967年的“全面夺权”，很多“造反派”争权夺利，为了一己一派私利而“内战”不止。对这，周恩来尖锐地指出：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夺权的人在内）的私心杂念要去掉，去私立公。这个权也要夺，去掉私权，拿公权夺私权。他一再地强调说：革命应该体现在生产上，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他说：空喊“革命”而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革命与业务要联系起来，结合起来。1968年2月2日他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和国务院直属单位的代表时，再次强调：每个部门一定要把革命和业务、和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只抓“革命”，不管工作，否则就是“口头革命家”。

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气焰嚣张，周恩来敢于严厉地这么说，是很不容易的，难能可贵的。但是那些只顾争权夺利的“造反派”，根本不听周恩来的话。

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国务院已经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在中央碰头会上通过，成立了中央的业务小组，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谢富治、杨成武、余秋里、谷牧等参加，周恩来任组长。

1966、1967年，原来经周恩来负责组织审议，并且经中央原则通过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被丢在了一旁。1966年的年度计划受到了冲击，1967年的计划草案中央已经不可能审批，1968年的计划也无法编制，到了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开始以后，各省、市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会开到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

划工作座谈会，讨论 1969 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且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对林彪、江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经发行了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二十二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对经济建设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7 年，周恩来为了我国国防工业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签发过好几份电报，如：

3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兰州军区，对某军事工厂和西固电厂一实行军管，“不准夺权”，“文化大革命只准业余进行”，不准外边人进厂或内部人出厂串连。接着，又电令该厂不准夺权，不准停产，立即停止“四大”，改为正面教育。

7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又电令制止某国防工厂武斗。

9 月，某国防工厂发生武斗，抢走了绝密资料。国务院、中央军委立即电令“一并交出”，否则“以违犯国法论罪”。

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池必卿说：1966 年底，二机部所属一个国防工厂“造反派”800 多人到北京上访，周总理要我和二机部的刘杰、刘西尧去解决问题，说这是国家关键的工厂，工人不能停工停产，不能发生武斗，否则会带来恶果；周总理还派我和刘宁一坐专机到工厂所在地去做工作，这说明总理特别关心国防工厂的生产问题。

北京医院保卫处人员谈过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揪斗干部，北京医院正在抢救国防科工委的孙志远，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在医院坐镇，周总理几次到医院听汇报。一次，他对崔·455·义田说，抓革命要促生产嘛！只抓革命不搞生产那怎么行，你们要大胆地抓工作，一定要把抢救工作抓好。周总理讲这番话时非常严肃，心情非常沉重。

在那个时候，只有周恩来，才能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破坏，保护工农业生产的进行，保护我国工业特别是国防事业，不受大的损害。

1969 年 4 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和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批评了取消检验制度。1970 年 2 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 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针对“文化大革命”的破除一切，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 1969 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 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1970 年 2 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本来要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这次会议因为林彪、陈伯达的突然发难要设国家主席，发生了混乱，打破了原定议程，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没有远景要求，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三十六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的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党。

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从这些话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的沉重心情和坚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的干部，还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巨又坚韧的战斗，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说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所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陈云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周恩来的苦衷，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来。“文革”中，某省有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贴大字报批评周恩来“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当地对这个人进行了批判，并且要进一步“审查”他。省委办公厅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叫身边工作人员给省委打电话：“不要进行批判，不要施以压力。”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作秘书工作的顾明说过一段话，十分透彻地讲了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是逐步认识到了，如对王、关、戚，对陈伯达，“九一三”事件批判林彪，一直到批评“四人帮”。周总理做事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如果那时批评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很多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所以我认为在“文革”中的不幸之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总统尼克松说，他同周恩来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尼克松认为这是不奇怪的。 —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有位经常采访周恩来会见外宾的记者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地谈起来。”

1967年2月3日，周恩来感到异常不舒服，经过会诊，发现他有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七十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求之不得。

国外有的作者这样写道：“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以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大了。到1970年，林彪一伙感觉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在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于是就图谋提前“接班”。在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发动突然袭击，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

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召开四届人大，讨论下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要保证安定团结，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会前，周恩来似乎已经预感到要出事，他对国家计委去的领导人说：你不要乱跑，就在住地呆着。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这位同志就在总理秘书房子里等着，等周恩来派人叫他去参加计划报告的讨论，但是一直等到夜里还没有来叫他，并且说不讨论计划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出了第六号简报的问题，陈伯达、吴法宪等纷纷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识破了他们的图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

周恩来那时身体很不好，心脏病时常发作，但是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接连地找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人谈话，做工作。有一次因为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医生、护士常常守在办公室门外，拿着氧气袋，准备随时救护。经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他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

九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的逐步开展。

万矩成、姜桂依编：《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25页。

陈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怀念》。

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第192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林彪一伙并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了一个武装暴乱的计划。林立果等人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

1971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市负责人谈话，批评了林彪及其同伙。林彪一伙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待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在途中，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北返。专车一路不停，到达丰台车站时，毛泽东召见了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和北京市领导，共四人，并下令从38军调一个师到南口。然后，专车进入北京站，毛泽东回中南海住处。

林彪等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又知道毛泽东已有察觉，十分恐慌。接着，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关于“九·一三事件”，新华社记者刘回年等作过长篇报道，这里摘录一部分：

晚上10时许，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得悉：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飞机叛逃，时间在明天（13日）早上六点，目的地是广州……，可能要叛国，黄、吴、李、邱同他们是一伙，预定明天早上从北京同时起飞。

警卫部队立即报告北京。

这时，首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上10时30分，总理的秘书走近他身旁，悄声说：中央警卫局来电话，说有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总理拿起电话机，听对方报告着。他浓眉紧蹙，当即向对方说：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随后，总理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同去的有哪些人？”接着又告诉吴法宪：“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接了电话之后，即按照胡萍编造的一个假情况，向总理报告，说什么那是一架刚改装好的三叉戟飞机进行夜航试飞，到山海关机场后，发动机出了故障，飞机不能回来。

总理立刻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胡萍一面采取说谎的办法拒绝执行总理的命令，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立刻给北戴河去电话，告诉林立果早打主意，并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打电话，统一关于飞机出故障的口径。

林彪、叶群得知总理在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顿时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叶群在晚上11点22分故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林副主席想动一动。”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总理问。

“空中动。”叶群答。

“你那里，是否有飞机？”

“没有。”

事实上，林彪的256号专机当时正停在山海关机场，而且几天以前他们还调去了一架伊尔—14，为什么叶群还要撒谎说没有飞机？这就一下子露出了马脚。

山海关机场当时归海军管理，总理立刻打电话给李作鹏：“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但是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却将总理的指示篡改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

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这天晚上，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情况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总理进进出出不知多少次，福建厅的会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

南逃阴谋已经败露。林彪、叶群、林立果更加显得六神无主。他们现在什么都输光了，预感到末日将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保健员、公务员都打发去看电影，关上客厅的门，进行最后一次密谋。

9月12日深夜11点多钟，林彪决定改南逃为北叛，立即飞苏联伊尔库茨克。

匆忙中，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周宇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11点40分，在别墅里值勤的警卫战士用电话向警卫大队队部报告：“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口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警卫部队的干部，一齐从大队部跑了出来。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高级防弹红旗车，打开前灯，高速驶来。里面除林彪外，还坐着叶群、林立果等。汽车驶近大队部门口，警卫战士们示意要车停下。叶群在车上大嚷：“警卫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冲！”车子急速地闯了过去。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分别坐上轿车、吉普车尾随追去。

林彪一伙乘坐的轿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穿过海过大桥，很快就超越了在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两卡车警卫部队，往山海关机场逃窜。车子一直开到三叉戟飞机前，未等停稳，林彪一伙就仓皇跳下来。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他们不等架上客机梯子，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一个紧跟着一个往上爬。林彪的秃脑袋几乎顶着了叶群的高跟鞋。他们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上飞机，也没等关上机舱门，就要飞机急速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在机场奉命关闭了夜航灯和没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一片漆黑中于9月13日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

13日零点20分，当林彪的专机准备强行起飞时，机场负责人三次打电话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不下令采取阻止起飞的紧急措施。

“林彪坐飞机跑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向北京报告。那是13日零点32分。

“林彪的飞机向北飞去。”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报告总理。

周总理发出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雷达，密切跟踪着林彪的飞机，随时向总理报告飞机的方位和飞行角度。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总理说。

“能听到。”调度人员回答。

“我要对潘景寅（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总理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

“他不回答。”调度人员报告总理。

飞机来了个狡猾的动作，改变方向，往西飞往内蒙古西部。但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往北直飞。

“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调度人员报告。这是9月13日凌晨1时50分。

林彪叛国外逃了！周总理把电话机一摔，立即驱车前往中南海毛主席住所报告。毛

主席气愤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的座谈记录整理稿，可以补充一些情节：9月12日晚8时，周总理在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约10时半后，接张耀祠报告，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从北戴河住地电话报告：林立衡来报告说，林立果傍晚驾三叉戟机到山海关。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叛国投敌，他们要乘这架飞机到广州或香港。周总理当即转告警卫队部，要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随后，周总理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去山海关的专机，并告诉吴法宪：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当胡萍谎称这是训练用的飞机，出了故障，不能回来时，周总理又令飞机停在那里，任何伤不准动，修好后立即返京。林彪、叶群见周总理查问飞机，又不见了林立衡，慌了手脚。11时22分，叶群给周总理来电话，说：“我们想动一动”。周问：“是空中还是地上？”叶答：“空中。”周问：“你那里是否已有了飞机？”叶答：“没有。”周总理放下电话说：“这是阴谋！”随后给李作鹏打电话：“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11时50分，林彪、叶群由住地乘车开山海关机场，张耀祠打电话让张宏、姜作寿（警卫二大队大队长）等布置卫队采取阻拦措施。他们一面派于仁堂（二大队副大队长）带部队乘吉普车迅速赶往山海关机场控制飞机起飞，一面由姜作寿、肖奇明（警卫团一大队六中队队长）组织部队在马路上阻拦林彪汽车。林的汽车冲过阻拦卫队，距卫队约一百多米处突然停下，警卫员李文甫下车，车里响了一枪，肖奇明就向林的汽车后玻璃打了两枪，因为是保险车，没有起作用。（事后周总理批评了，说开枪是错的）肖奇明带了六人乘吉普车，姜作寿带了三十多人乘卡车追赶。林彪的车快，追到山海关机场，林彪、叶群已上飞机，开了发动机。于仁堂等让海军童副参谋长阻止飞机起飞，童对空放了三枪，机场关了灯火，飞机在黑暗中强行起飞。时间是13日零时32分。

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命杨德中到西郊机场，监视吴法宪行动。周总理亲自下达中央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并派陆军进驻机场。同时，还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空军，与周总理直接保持联系。周总理命令调度人员向256号机呼叫，表示希望飞机飞回北京，不论是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在锡盟（内蒙）降落也可以。但是没有回答。张耀祠、汪东兴接到北戴河部队报告后，先后到了中南海游泳池，让工作人员叫醒了毛主席。13日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256号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总理把电话一摔，生气他说：“叛徒。”就乘车到中南海报告毛主席。周总理同毛主席谈了大约半小时，就回人大大会堂作紧急备战部署。毛主席从游泳池转到人大大会堂118厅。周总理回人大大会堂后，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吴法宪仍留西郊机场），在这以后，政治局成员一律在新疆厅集体办公。周总理亲自给大军区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叛逃，令部队进入战时状态。14日下午二时，外交部接到驻蒙使馆加急电报，得知林彪的飞机于13日2时30分在蒙古境内坠毁了，机上人员全死。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消息。

关于飞机的坠毁，周恩来说过：“因为飞机上的领航员、报务员都未带，仓皇上去的共九个人，从热河承德出境，飞到蒙古后又降不下去，因无领航员。后来在草地降落，飞机起火烧死了。”在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等和蒙古有关部门领导人联合调查后，蒙方写的现场调查纪要是这样说的：“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观察飞机失事的情况，从最初着陆的地方起强烈擦地，从 29 米起着火，从 21 米起机身部分破碎，并向周围散落。”“从飞机失事地点找到八男一女共九人的尸体。”

关于“九·一三事件”，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上，有一段简要的叙述：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谋杀计划失败后，林彪随即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他当时准备作为政变根据地的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八架，于 9 月 12 日将其中的 256 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林彪得知周恩来总理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判断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 13 日零时 32 分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

在这次事件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变，并处理善后事情。9 月 18 日以前，所有参与实施“571 工程”的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胡萍，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贺德全、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作战部长鲁珉、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等分别被隔离审查。接着，王维国、陈励耘等受羁押。24 日，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总参谋长和三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海军、后勤司令）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周恩来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三十七批判极左，力挽狂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常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吃饭，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一次，有一位烈士子女来看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傍晚在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他决意面对这场灾难，为党为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

这八个字贯串了周恩来的一生。他曾经说过：“现在不是兴‘爬坡’、‘拉车，这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很快通知叶剑英，要他转移到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备军委办公会议，以利进行集体领导。”

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主持了。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指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并且说，“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4月12日，他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又说：“《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否定一切，不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美国的韩丁这年受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国，看到演的戏都一样，千篇一律，看了一个戏等于别的戏都看了。韩丁对此有意见。在一次讨论文化的会议上，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周恩来就请韩丁发表他的意见，使得张春桥等很恼火。韩丁说：“这就是他这个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心理学家的作法。”

这年上半年，周恩来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生效。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片面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评极左思潮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1973年，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的时候，周恩来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放下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

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以外，其余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说，经济工作中存在着“三个突破”的重大问题，必须着重地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果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在1972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切实地得到解决。这年年底，职工人数达到了561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了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了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情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后，生气他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强调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的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3—464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4—465页。

年比上一年增加了 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 年 6 月 9 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凡是没有经过批准的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规定和政策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央在 12 月 10 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 1972、1973 年的努力，几个“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顾明说：“恩来同志亲自狠抓了综合平衡，宏观控制，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在后来‘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一直保持了物价稳定，经济上没有发生最后的崩溃，这是恩来同志在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为中国人民作出的贡献。”

这是“文革”十年的大乱中从经济方面来说的重要贡献。

在反对极左思潮的指导思想下，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

1972 年 2 月 5 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质量、品种、产量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央批转下去，但是由于张春桥作梗，文件没有能够发下去。

1971 年 12 月，从我国援外的飞机发生严重的质量问题引起，周恩来连续 6 次指令或批示，要严格执行试飞和检查制度，而这些在“文革”中是被破坏了。周恩来委托叶剑英召开了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亲自到会听汇报、讲话，强调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第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抓”“三促”：抓援外，促质量；抓飞机，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他和叶剑英亲自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

1972 年 1 月，由于汽车生产的质量下降，周恩来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这年四五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

这些，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了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

1972 年 8 月，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上”。10 月到 11 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了纠正一些过左的作法。1971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

顾明：《怀念与思考》。

陆达：《呕心沥血破尖端》。

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尽管“文化大革命”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在周恩来的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五十年代一样，1973年他还在说：“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把中国自己搞好，这是我们最急迫的事。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把经济发展起来，还要几十年的时间，至少二十世纪做不完。”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立，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周培源回忆说：1972年夏，以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有27位成员的美籍华裔科学家组成的大型代表团来访，认为我国对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都不够重视。周恩来7月1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事先，他已经了解到他们的意见，接见中又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对我说：“周博士，你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当时，周总理的指示在北京大学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但是他的要发展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的指示，在科学院还是起了作用的。科学院今天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就是从那时开始逐步建成的。

这年10月，周恩来针对当时正常的升学制度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主张，是后来我国恢复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邓小平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

周恩来还对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指出极左思潮在文风上的表现，“你们当前要从文风入手批林”。他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文革”开始时，“中央文革”一伙要打倒外贸部长叶季壮和外贸部党组，周恩来对“造反派”说：“三外（外交、外贸、外经）是红线为主”，使外贸部得以继续工作。1966年夏秋开广交会，正是“文革”“破四旧”时，广交会中许多民族工艺品是反映我国民族特色的，自然有山水仕女，花鸟虫鱼，“造反派”要去砸，周恩来指示在门前贴出国务院布告，不准冲击，还派廖承志等去做工作。“九·一三事件”后，反对极左思潮，对外贸易中反对了“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的错误作法。

周恩来提出要引进技术。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

1973年10月26日，会见一外国记者时的讲话。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0、47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64页。

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 13 套大化肥、4 套大化纤、3 套石油化工、1 个烷基苯厂、43 套综合采煤机组、3 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 43 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 39 亿 6 千万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又一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到 1979 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迈进了一大步。

在国内大型建设上，周恩来也开始恢复因为“文革”而停顿的项目，以葛洲坝工程为例，这是周恩来在五十年代就已确定的。“文革”中，武汉军区向中央提出了修葛洲坝工程的问题。1971 年，周恩来同意上马葛洲坝工程，经毛泽东批准兴建。周恩来十分关心，说这个工程完全是我们自己进行的，一个外国人没有，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好。1972 年 11 月，周恩来带病主持葛洲坝工程会议，宣布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指定林一山主持工作，还亲自参加了林一山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和过问工作计划的起草。他表示对这个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希望大家都抱细心谨慎的态度。这同“文革”中“四人帮”造成的风气也是针锋相对的。

周恩来主持工作这段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 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这年生产钢 2522 万吨，煤 41700 万吨，粮食 5299 亿斤，棉花 5124 万担，都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财政情况也是好的。这是周恩来等所作的重要努力的结果。

外交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部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的维护，他想了很多办法保护陈毅部长和许多领导干部。1967 年上海“一月夺权”后，2 月 7 日，周恩来、陈毅联名发电给我国驻外大使馆、代办处，指出“各驻外机构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不建立战斗组织，不夺权”。到了批所谓“二月逆流”后，外交部比较乱了，直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后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以后，外交部的工作又逐步走上正轨。1969 年 3 月苏联军队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制造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这次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紧张状态。这年 9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中来北京，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他会晤，严正指出，如果他们用战争、侵略手段，我们坚决抵抗，同时说明，我国历来愿意同所有国家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包括苏联在内，中苏不应为边界打仗，当务之急是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之前，首先要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避免冲突，维持边境现状。柯西金表示同意，这次会谈缓解了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维护了我国的边境安全和民族尊严。苏联方面评价这次会谈的历史作用，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双方离开了全面冲突的边缘，使苏中关系从引向灾难性冲突的道路转入到了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竞争的轨道。”——

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在重新考虑中美之间的关系。1969 年九届一中全会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师，由陈毅牵头，共同研究国际形势。陈毅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

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议出意见后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从这年6月7日到7月10日，四位元帅进行了六次讨论，共19小时，最后形成一个报告。陈毅说，这个报告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战略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有必要。

经过四位老师讨论研究和中央的酝酿，再加美国总统尼克松积极表示要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会谈，毛泽东、周恩来定下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决策。周恩来进行精心安排，亲自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联系，促成了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7月秘密来北京。周恩来同他坦率会谈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他们商定了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的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到机场迎接，留下了周恩来同尼克松握手的历史性镜头。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随后，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后来，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到了南方，双方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这次会谈，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

1971年10月25日，正当基辛格再次公开来华谈判期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尼克松访华后，同年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会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我国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外文化交流事业被称作“封资修文化大交融”，“毒害人们精神的危险渠道”，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对这种状态不能再容忍，1972年经毛泽东同意后，将这方面的计划等工作交外交部管，有关艺术团、艺术展览的来往具体项目由对外友协承办。总的说，虽然1968—1970年间对外文化交流几乎中断，但十年间仍派出文艺团组四十多起，达三千人次，大部分是1971年我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派出的。 —

三十八干部问题是关键

怎样使许多老的领导人复出，这是周恩来经常在思虑的。

1970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歌舞团访问中国。首场演出的这天下午，负责接待工作的王国权接到几位老师的秘书的电话，要入场券。老师们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王国权接电话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后，严肃他说：“发请柬。”这就比入场券的规格高多了。这天晚上，老师们入场时，全场自动起立鼓掌。演出结束，请老师们上台同演员会见和合影。世界上的报纸对此大加评论，说中国的老师们将要重新出来工作。这件事对于后来老师们的复出起了促进作用。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用了很大力气来为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

在1971年后不长的时间内，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有175名将军从囚室、荒原、地牢走出，恢复工作，进入了指挥的岗位。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批准，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在几次讨论国庆时两报一刊要发表的社论时，周恩来都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他建议在毛泽东那里召开一次会议商量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请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

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责成纪登奎提出了一个三百六十多人的名单（大部分是高级干部），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周恩来说：“‘文革’期间，在抓叛徒问题上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许多冤案。要有个原则的政策界限，有利于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他要纪登奎起草《关于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决定》。周恩来主张“先放人，后结论”，“有口供，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中央、毛主席作了决定的结论暂不动，放出来再复议”。这说明，当时周恩来认为，即便在“文革”中由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的案件，也是可以更变的。

这几年中，报纸上常常出现参加某一活动的人员的长长的名单，有时几乎长达半版、一版。这是周恩来利用各种纪念活动等，通过发表名单的办法，解放一批又一批干部。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不少干部就这样得到了解放，或者使受迫害和长期靠边站的干部亮相，为重新出来工作造成舆论。1972年廖承志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得到“解放”，但是还没有职务。在一些活动中，记者报道了名字，未加职务，周恩来在看稿时加上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这样，就恢复了廖承志的职务。一些冤案如贺龙、“杨、余、傅”等，也相继平反。

解放干部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周恩来1974年住进医院后，还在不断地做。如1974年12月下旬刘景范被接回家，他说：“由于周总理过问了我的案子，毛主席作了释放我的批示。”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

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周恩来不仅对人们的“生”关心，而且关怀着人们的“死”。《光明日报》的朱军谈过一件事：1973年9月13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二级教授何鲁去世，刘西尧、周荣鑫、吴庆彤签批：“似可考虑在《光明日报》登一下。”但在当时姚文元主宰宣传大权的时日，尽管有这三位领导人的批示，《光明日报》也不敢办，因为这样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弄不好会招来横祸。怎么办？朱军想起了向周总理求助。他给周总理写信，讲了情况，问可否刊出，今后类似消息是否刊登？20日凌晨信送出，晚上11时左右有了答复。周恩来批：

一般的政协委员、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逝世消息和有全国性的，似可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何鲁先生病故即属此类。妥否，请批。

朱军说，“我读后热泪盈眶，连呼‘知人民者总理也’。请示报告中不宜直说或多说的‘潜台词’，被总理炯炯目光穿透。总理不仅答复了何鲁先生的消息可以登，而且类似消息今后均可以刊出。总理的批语最后四个字‘妥否请批’，问的是姚文元。从这里也不难窥见当时总理处境多难啊！”

对于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周恩来代表国家对他们赔礼道歉。

1973年3月4日，周恩来对中联部等十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说，过去我们对待专家有错误的地方，现在要多做工作，挽回影响。8日，中联部、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三八”节茶会，在京的外国专家和夫人、子女都被邀请出席，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对“文革”给专家们造成的痛苦和不幸，一一表示歉意。他谈到露丝·史密斯的遭遇，致歉时史密斯严峻的脸上现出理解和感动。他对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离开中国的劳埃德·屑克夫妇表示关心，欢迎他们再来中国。他向被诬陷入狱，刚获得自由的柯鲁克、爱泼斯坦、丘茉莉、夏庇若等赔礼，内疚他说，让你们受苦了。整个大厅，安静极了。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专家们从沉重的思想负担中解脱了出来。

周恩来非常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并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省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这种关心具体到地点、住所、安全、生活和医疗条件等。正如邓小平所劳动的工厂负责人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总理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形成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看后批给周恩来，虽然仍称邓小平同志有所谓“严重错误”，但说“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

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把原来的秘书、公务员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写信给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考虑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谈话的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旧任副总理的建议。1973年3月，医生嘱周恩来必须休假治病，周恩来赶在休假之前，9日，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并向党内外群众解释，这样，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办妥这事后，周恩来才去治病。

休假结束后，这月29日，周恩来又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会见了小平同志，他的身体、精神都好，29、30日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29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同一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多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是，万机待理，周恩来不可能真正得到休息。由于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他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已经得到毛泽东同意，请假两星期，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政府方面事情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还建议要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在玉泉山做了第一次治癌手术。恢复工作后，他将要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5月20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的名单上，亲笔加上了“陈云、李富春、邓小平……”等老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时，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这以后，周恩来不断地提出让邓小平参加重要的会议、活动，还提到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例如，8月间开中共十大，在十大主席团名单（草案）和十大中央委员名单（草案）上，都写有邓小平，他致信毛泽东“名单现呈上，请主席审阅”。在中共十大，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时，正逢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进行，在出席开幕式领导人的安排上，周恩来加上：“还应加董代主席、朱委员长和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在活动日程安排上，周恩来批示，“比赛过程中，多请董老、朱委员长、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分别日期去看。”10月，周恩来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谈到邓小平，说“是他指挥了渡江。他不是司令员，是政委，是我们组织的两个野战军——二、三野战军联合组织一个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实际上是他指挥这次战斗”。

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

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当天晚上，周恩来就召开政治局会议。14日，他写信给毛泽东：一致同意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小平同志作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写了中共中央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一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在通知上他还注明，此通知可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这期间，1973年6月9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了延安。

周恩来自从1947年3月18日在隆隆炮声中离开，已有26年没有回过延安了。现在，他身患绝症，已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多么想再看一看当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呀！他回到延安的那一天，一走出机舱，就激动他说：“我回到老家来了！”看到老区人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流下了眼泪。当延安地区领导人答应努力使粮食产量五年翻一番时，周恩来高兴得不顾医生不准他喝酒的禁忌，同他们干杯。他参观了延安的革命纪念馆，看到只宣传毛泽东一个人时，喟然叹息说：“主席太孤单了。”周恩来反对宣传他自己，他强调要宣传毛泽东，宣传集体，宣传群众。他亲自同陕西省、延安地区领导人座谈，点名要宣传许多人，如陈毅、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王若飞、刘志丹……尽管其中有些人当时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叛徒”、“反党分子”等，周恩来还是提到了他们。

“四人帮”一伙和林彪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开始时是紧密结合，狼狈为奸的，后来虽因争权夺利而增大矛盾，但表面上仍是勾结很紧的，在1969年到1971年9月上旬这两年零9个月，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来往电话就有470多次，平均每两天就有一次电话联系，互表关心，互致问候。林彪一伙的自我爆炸和全党全国对他们的声讨，也使“四人帮”一伙暂时有所收敛。

后来，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这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干部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江青一伙知道了，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485.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八九月间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天，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周培源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想法》一文（实际上是贯彻周恩来关于基础理论的讲话的），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

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称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

周恩来通过批极左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到1972年8月，他还在对宣传部门负责人讲：“极左思潮各部门都有，没有批深批透。”“运动就是要落实到政策上，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二者不能脱节。”“新华社、人民日报极左思潮没有批透。”11月底，他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看后称：当前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

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送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会议常常开成僵局。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过一首“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艰难、辛勤和用心，道出了解放干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连续不断的。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谈到影片《李双双》，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他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宁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

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美国的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不断地进行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科教组文件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他们宣扬“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得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曰“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印好的批判文章撤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团长，去联大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江青才算不再闹了。周恩来积极支持邓小平到联合国大会作报告，从各方面加强了邓小平出国的安全布置，从3月下旬开始，就减少他在国内的工作量，以便他作出国准备。周恩来说，在4月6日代表团离开北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后来，4月19日回国，又安排了同样的盛大的欢迎场面。

这一时期，由于“四人帮”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1972年前后的批判极左思潮，虽然后来遭到了挫折，但是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毕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又一次斗争高潮。这次斗争，为1975年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健康力量进一步与“四人帮”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十九“组阁”之斗

1974年4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沉重。6月1日，他作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三 五医院里了。

这时候，各地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周恩来想了一系列办法来限制这个运动，包括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能上街、不要开群众大会等。他强调“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和同意下”来进行。

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是“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讲“批现代的儒”、要“批党内的大儒”，这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农村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他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夺权创造条件。

这年10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1974年9月底，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回到上海，“四人帮”等借此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实际上，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是毛泽东同意的。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还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以适当地买一些船，以便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时，我国外贸租用外轮一年要花几亿美元，而七十年代初世界性的石油能源危机使运输业萧条，一艘万吨级的轮船用原价的百分之二十多就可以买来，周恩来提出的用买船代替租船，可以加强我们的运输力量，买一条船过几年就能连本带利赚回来。现在我们国家的商船队运输能力居世界第六位，这同周恩来当年这个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但是“四人帮”却捏造了一个“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观点来批判。交通部派了两个干部去风庆轮担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了。“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理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在北京就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然后，江青一伙背着周恩来和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什么“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后来王洪文是这样交代的：10月12日之前，约一个星期，政治局开会后，江青把我留下来对我讲，她去看了周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的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的提名观点。”并且说周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经常到周那里说话的有叶、邓、李。

王洪文说，“目的就是在毛主席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这次去长沙告状……主要是恶人先告状，抢在邓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前……实际上是诬蔑陷害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阴谋活动。”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报告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碰壁后，江青并没有罢休。王海容、唐闻生在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上作证说：1974年10月18日白天和晚上，江青两次找她们到钓鱼台，要她们陪外宾到长沙时，把“四人帮”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的话转达给毛泽东。晚上谈话时在场的还有江青召集来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时，王、唐才知道王洪文已偷偷地去过长沙，在毛泽东那里碰了壁。后来，在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她们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风庆轮”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王海容、唐闻生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她们所说的那样，而是她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了之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

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的问题。

周恩来住院后，本来是由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也由他负责。这以后，由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了。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他靠输血维持，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夺权的阴谋。

病中的周恩来同叶剑英商量，要去长沙见毛泽东。叶剑英考虑此时正是筹备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周恩来能去，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是十分有利的，他同医疗专家商议，制定了保护治疗方案，并且向随行医疗小组叮嘱：“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躯，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身体十分衰弱的状况，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次去，周恩来带了拟在四届人大提出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院各部部长备选名单。

周恩来拖着病体辛劳奔波到外地，对健康是很不利的，会使病情恶化。医生曾经这样劝告他，周恩来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考虑的是政治需要，以国事为重，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这一次，周恩来在长沙逗留五天，同毛泽东四次交谈。两个人促膝长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这次谈话，铁定了毛泽东不可能把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四人帮”一伙。

周恩来回京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说，我向毛主席提出了是否可“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主席说可以“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在报告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后，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

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这一次，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策略的斗争，在党、政府、军队的领导人安排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拟定人选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3日到18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他是多么希望实现他从青年时代以来一直抱有的愿望，使中华崛起呀！建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迅速向前发展着，但“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四人帮”则利用“文化大革命”，抛出一种又一种谬论来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夺取权力制造舆论。周恩来的重申目标，不啻是拨开浓雾见晴天，使人们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念，看到了前途。

这次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周恩来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一天，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委一百多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四届人大后的国务院，“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还要副总理们多做”，“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李先念：常务，主管财政、贸易”，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周恩来的这些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实际是影射攻击周恩来等老同志。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的人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去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对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等人，叫她们不要搞“四人帮”。会后，又经毛泽东、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1975年是斗争十分尖锐的一年。上一年，1974年1月24日，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以后，江青多次置中央政治局于不顾，到处写信，送材料，甚至以个人名义给部队写信，煽风点火，企图再次制造“大乱”，并且常常在会议上搞这样那样的突然袭击。周恩来1974年底会见毛泽东后从长沙回北京，随即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其中指出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批评了江青等人以后，5月4至5日，周恩来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讲了在中央的“工作和手续问题”，针对江青胡作非为指出：“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会谈一谈”，“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写信和通电”，“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他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针对江青一伙提出的“反经验主义”，周恩来写道：“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者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者，能打仗人就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

这期间，周恩来与张春桥还有一次直接的交锋：

5月21日，周恩来写了一封致王洪文转政治局传阅后给毛泽东的信，讲“四人帮”发动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信中说，王洪文讲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是在姚文元文章中，而不在张春桥文章中，但实际上，是张春桥在3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会上提出的，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这个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的讨论情况中也可看出来。这封信传阅到邓小平处时，邓小平加了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封信传到张春桥时，张春桥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这封信经过传阅退到周恩来处，5月27日，周恩来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指出：“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周恩来在信中讲了经过情况，然后说：“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

在周恩来严肃的质问下，在事实面前，一向狡诈虚伪、造谣歪曲的张春桥只好写道：“不再改了。”

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对“四人帮”的批评，使他们稍有收敛，从而为当时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

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但是，“四人帮”是不肯甘休的。1975年8月，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一位教师谈到对《水浒》这部书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晁盖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四人帮”认为有机可乘，就借此大做文章。他们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会议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并且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但然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外宾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曾任柬埔寨驻联合国大使的秀减拉西说：1975年8月我陪宾努亲王去医院，看望周总理。那时他病已很重，但尚能走路，对我们还是殷勤款待。“他还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秀浦拉西说：“我在中国五年，我感到中国有周恩来是幸运的。”

实际上，对于邓小平，周恩来心中是早有考虑的。就以1973年来说，周恩来在会见加拿大友好人士郎宁等人时，就让他们见一下邓小平，说：“我要你们会见一位将成为很重要的人物的人——邓小平副总理。”

四十鞠躬尽瘁为人民

“文化大革命”中，1972年，周恩来说，他非常喜爱鲁迅的一句名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孺子”，是指人民。周恩来说：“对群众，对广大的同志，应该做一个‘孺子牛’”。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挂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

1968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尉凤英把一枚从沈阳带来的毛主席像章送给周恩来，夸耀说：“这是新样子，带转的，还会闪光。”

周恩来笑笑，意味深长他说：“你们总变，我总不变。”

他抚摸着胸前那个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徽章说：“我就喜欢这个。”

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

在医院里，周恩来仍旧关怀着人民。例如，当他看到甘肃定西地区的灾情反映时，立即批示道：“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必须立即解决。”周恩来对当地老百姓是想得多么周全！

他在病床上看到新华社反映庆阳地区灾情的报告后，批：“发放救济口粮款，至少要增加无息长期农贷。”

他因为自己患癌症而想起云南的矽矿工人受放射性物质影响，在一次手术后，要医院派人到当地进行研究和治疗。

周恩来是累病的。“文革”紧张的年代，他有时甚至不敢坐下，因为一坐下就会睡着。既累又急，委屈、忧郁、愤懑，这一切都让位给党和国家的根本大局，他为了维护这个根本大局而坚持工作。1967年，得了心脏病。1972年，得了癌症。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位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74岁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也向在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还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却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他把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就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之前，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带着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事实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小手术13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一次手术。但是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旧坚持工作。他同中央的一些老同志会面，谈话。例如，他同叶剑英次话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

1974年，周恩来在病中亲自调来了“贺龙专案组”的案卷，进行重新审

查，推翻了林彪、康生一伙批准的。专案组用逼供信的办法捏造的“证据”，报经中央批准，给贺龙平反，恢复名誉。周恩来把原稿中评价贺龙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了“重要”的贡献，改为“重大”的贡献，并亲笔写上要把平反文件发到县团级，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1975年6月9日，党中央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这天，周恩来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阻，理发修面，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仪式。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者同志，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但在当时“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情况下，悼词没有能发表，也没有报道。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在关心着人们，尤其是解放干部的问题。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他们把宋任穷等9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名单中没有，就赶紧找工作人员去商量，因时间紧迫，集中了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晚上的焰火会，第二天名字见报，等于又解放了一批人。周恩来在医院中，想到了文艺界的一些老人。他说：应该给文艺界的老同志解决问题，安排工作和生活，恢复组织关系。后来文艺界的一批人在邓小平的具体负责下，得到了安置。

在《永远在初恋》这本书里，有一段这方面的叙述：

1975年春天，在病房中。

周恩来总理正靠着床头垫得高高的枕头上批阅着文件。

他在一份报告上仔细地看，上面写着：

“谢和赓，1967年7月1日因特嫌叛嫌拘留审查，现在耳朵失聪，不能言语，建议释放治疗。”周恩来按了一下电铃，一位秘书闻声进室。总理指着报告问。

“这谢和赓是抗战时期我们派到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身边工作的地下党员，怎么成了叛嫌特嫌呢？拘留他，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秘书回答说：“这是中央文革搞的案子，有江青同志的批“喔！”总理皱了一下眉头说，“也该打个招呼嘛！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啊！”

他马上联想到了王莹，又接着问：

“那么，他的妻子王莹呢？三十年代我们党派到电影界工作的第一批优秀演员，她在哪里？”

秘书带着悲戚的声调回答说：“我查询过有关部门了，王莹同志与她丈夫一起因特嫌、叛嫌于1967年7月1日被拘捕，1974年3月3日已含冤病死在狱中。”

“这简直是胡闹嘛！他们夫妇俩都是从小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好同志，怎么会是特务、叛徒呢！到底有什么证据这样说？这不是怀疑一切，冤枉好人吗？”

总理愤怒地坐起，两眼中闪烁着悲痛的光芒。他用手中的铅笔迅速地在报告上批示：

“立即释放，送医院治疗！有什么情况，及时告我。周恩来。”

谢和赓走出了秦城监狱。

刘景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康生陷害，被逮捕入狱。他说：“1974年12月24日这天，看守人员把我带进了会客室，原来是中央专案人员和家属接我来了。由于周总理过问了我的案子，毛主席作了释放我的批示。”

周恩来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在医院内，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

他还告诉罗青长，要他同公安部门配合释放一些被拘押的人，如说：“像黄维应该放”，“还有孙铭久”，也应该放。

他还告知，曾拥护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杨度，后来是共产党员。

1975年的冬天，周恩来的癌症已经全面扩散。毛泽东要人转告，问他对国家大事还有什么意见提出来时，周恩来又提出，应该关心那些跟党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包括至今尚在关押没有作出结论的人，应该尽快恢复他们的政治生命，年老病残的应该允许他们先回家。

周恩来关心着干部，关心着部队。

彭绍辉记载过一次偶然的会面：“1975年7月24日的傍晚，我在离机关不远的地方散步，突然周总理在医生和护士的陪同下迎面缓缓走来。我惊喜异常。自从周总理患病以后，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总理，没有亲聆过总理的教诲了。我们大家是多么想念他啊！于是我疾步走上前去，问候总理的健康情况。总理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毫不在意他说：‘还好’。接着，总理却关切地问我：‘你身体怎么样？’我凝视着他消瘦的面孔，想到他在医院里还处理国家大事，接见外宾，关心世界革命运动，我感到自己的病实在算不了什么，便说：‘请总理放心，我还能坚持工作。’总理上下打量着我，微笑着说：‘要注意休息。’这天，总理虽然面色有些憔悴，但精神很好，眉宇开朗，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在一个长椅上坐下以后，总理详细地询问了总参工作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以后，总理又问：‘罗瑞卿同志怎么样？能走路了吗？’我听到这里，感到浑身一热，激动万分。为党、为人民操劳成疾的周总理，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还这样关心部队，关心干部，这是多么好的总理啊！我声音哽咽他说：‘我们大家都盼望你早日恢复健康！’这时，总理站起来说：‘问同志们好！’当我和总理告别时，总理再次叮嘱我：‘回去后别忘了问罗瑞卿同志好！’”

罗瑞卿是1965年“文革”前就首先被打倒的，列为“彭罗陆杨”大案，但他仍在周恩来心中。后来，1977年，他复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了军队整顿工作。

周恩来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说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借批判宋江来攻击“投降派”。周恩来嘱身边人员把《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给他看。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这时，他的体重已经由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

周恩来关心着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1975年冬，“四人帮”趁着周恩来病重之际，开始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矛头对着邓小平。邓小平的处境很困难。有一次，周恩来输完血后，眉宇间闪出一缕忧思。他对守护在旁边的医生说：“我很惦记邓小平同志，

沈祖安：《青松磐石做霜久》。

彭绍辉：《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你能否代表我去看看他？”这位医生按照周恩来的嘱托，专程到邓小平家中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关心。

这两位五十多年的战友，现在都处在艰难之中。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的工作担子很重，但每星期总要到周恩来处一两次。经常去周恩来病榻旁的，还有叶剑英、李先念等。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去，特别是处理重大问题前后，都要去周恩来处。开始，谈话能坚持三个小时，后来，减到两个小时。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就坐得越贴近，后来，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周围人员记得，最后一次谈话时，叶剑英叫他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片言只语中，他们知道叶帅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

在重病缠身而“四人帮”的阴云迷漫下，周恩来说过：人民是公道的，相信党和人民的大多数，常言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会有公断。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于个人的生死安危，他早已置之度外。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他的侄女周秉德说，“在那些无法和伯伯见面的日子里，我在西花厅曾经和伯伯通过电话，伯伯还是那么坦然达观，反倒做起我的工作来，要我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在病痛的折磨之中，用微弱的声音同邓颖超一起吟唱国际歌。

邓颖超说：“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

1976年1月7日，深夜十一点钟，周恩来微睁双眼，对守护在病床前的医务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理想。

周恩来永垂不朽，他在亿兆人民心中永在。

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将永存一座光芒四射的星座——周恩来。

邓颖超：《继承遗志，永远向前》。

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

后 记

十五年来，我从事周思来同志著作的编纂工作和对他生平、思想的研究，常常深深地被周恩来为国为民的忘我献身精神，以及他的高尚品德、睿智才华、隽美情操和作风感动不已。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反映其万一。本书的撰写，得到李琦同志的审阅和指导，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